

前 言

《文艺通报》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主办的党的文艺工作刊物。自1981年创刊到1985年底，已编发了67期。由于《文艺通报》发放范围较小，不少同志未能读到。为了帮助各级负责同志和文艺工作者学习与掌握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交流文艺工作经验，我们将1981年至1985年《文艺通报》的部分内容选编成书，交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内部发行，以便使更多的同志了解这些内容，并提供查阅的方便。

本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是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文件、批示和讲话；第二辑是中宣部、中央及各省文化部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情况和领导同志讲话；第三辑是文艺工作的通讯、经验介绍、调查报告、文艺界先进人物事迹介绍，以及《文艺通报》编辑部撰写的言论等等。

本书所收录的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批示，除少数已经公开发表外，多数尚未公开发表。请同志们在撰写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公开出版的书籍时，不要直接引用。如要引用，应以公开发表的为准。本书系内部读物，请大家注意保存，不要丢失。

对于本书编辑方面存在的缺点，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

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辑

- 胡耀邦同志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的
讲话（一九八一年） 1
- 胡耀邦同志谈文艺批评中的点名问题（一九八一年） 10
- 胡耀邦同志在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
（一九八二年） 12
- 胡耀邦同志对要求成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一封信的
批示（一九八二年） 15
- 胡耀邦同志关于体育和文艺队伍风气问题的批示
（一九八三年） 16
- 胡耀邦同志的一段重要批语（一九八三年） 17
- 胡耀邦同志给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的复信（一九八四年） 19
- 胡耀邦同志关于文艺演出团体的两件批示（一九八四年） 22
- 胡耀邦同志关于电影的批示（一九八四年） 23
- 胡耀邦同志关于舞蹈艺术工作的谈话纪要（一九八三年） 24
- 胡耀邦同志批示（一九八五年） 26
- 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一九八五年） 31
- 胡耀邦同志关于当前文艺工作一些问题的讲话（一九八五年） 50
- 陈云：应该宣传英雄主义（一九八一年） 64
-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重要意见（一九八三年） 65

陈云：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要看对人民是否有利 （一九六一年）	66
陈云：在评弹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一九七七年）	67
陈云：出人、出书、走正路（一九八一年）	70
陈云同志与朱穆之同志谈话要点（一九八四年）	72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管理工作和文艺演出团体改革问题的 谈话要点（一九八四年）	74
中央负责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两封信	
一、关于爱情描写问题（一九八一年）	76
二、关于文艺评论问题（一九八一年）	77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是否重提“思想改造”口号的一封信 （节录）（一九八一年）	82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大张旗鼓地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批示（一九八一年）	84
中央领导同志对谢铁骊代表两点建议的批示（一九八一年）	85
中央领导同志对进口和转播外国电视剧的批示（一九八一年）	87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件批示（一九八二年）	88
中央领导同志谈如何对待人性、人道主义	89
中央领导同志的一项建议	90
习仲勋同志的一个批示（一九八五年）	91
胡乔木同志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的 讲话（一九八一年）	94
胡乔木同志关于电影的一些意见（一九八二年）	101
胡乔木：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一九八二年）	103
王任重同志在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八二年）	108
邓力群同志关于文化艺术改革问题的谈话（一九八三年）	115

中央批准美协的一项建议	118
中央批准《关于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12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的通知	128

第 二 辑

中央宣传部召开电影创作座谈会（一九八一年）	146
中央宣传部召开文学创作座谈会（一九八一年）	151
中央宣传部召开戏剧创作座谈会（一九八一年）	157
中央宣传部召开群众文化工作座谈会（一九八一年）	162
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批准《关于召开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问题的请示报告》	166
中宣部召开西北五省（区）文艺座谈会	169
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界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的通知	171
贺敬之同志在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一九八二年）	173
贺敬之同志关于起草《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的谈话（一九八二年）	182
贺敬之同志关于文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问题的一封信（一九八四年）	184
贺敬之同志看塘沽版画展览后的谈话（摘要）（一九八四年）	187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关于电视问题的谈话	189
周巍峙：同心协力，辛勤创造，为开创社会主义儿童戏剧的新局面而奋斗	193
高扬重视文化艺术和出版发行工作	199
国家民委关于宣传报道和文艺创作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习俗问题的通知	203

关于利用电视片进行爱国主义宣传问题	205
-------------------------	-----

第 三 辑

短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指导	208
哈尔滨话剧院党总支坚持艺术生产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209
首都部分演员和剧场工作人员座谈职业道德问题	212
短论：堂堂正气	215
一次热情而严肃的会议	217
——北京作协党支部讨论从维熙入党会议情况介绍	
短论：领导干部要关心文艺	222
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推荐小说《围墙》	224
短论：要理直气壮地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	228
贵州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情况	230
短评：统一思想的锐利武器	235
天津市作协组织作家学习《邓小平文选》	237
专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	241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出版	
北京市文艺界深入学习胡耀邦同志的重要批示和讲话	248
进一步发挥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伟大作用	253
——《作品与争鸣》编辑部召开学习胡耀邦同志关于当前 文艺工作一些问题的讲话座谈会	
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心中飘扬	264
在改革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274
甘肃歌舞团抵制“一切向钱看”的倾向	278
一次会风好的文艺评奖会	281
上海京剧院演员孙爱珍写给院领导的演出情况汇报	283
京津部分作家艺术家参观引滦工程并访问英雄人物	287
总政邀请十八省市的作家艺术家深入部队生活	293

为了军事文学创作的再突破	296
——一九八四年夏部队作家赴云南前线深入生活小结	
评论：到第一线去	303
关于报告文学的思考	305
刘兰芳在党支部帮助下继续前进	308
歌声美，心灵更美	313
——记于淑珍同志的几件事	
艺术精湛品德美	320
——记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	
为了理想，永远跟着党向前奔	325
——王虹剑同志事迹	
人民需要这样的艺术家	331
——记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	
将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335
——记王玉梅同志生活片断	
一家办得比较好的文学期刊——《当代》	342
《文艺研究》五周年小结	345
大型军事文学期刊《昆仑》受到读者喜爱	350
论评：推荐《故事会》的好经验	354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方针	357
夺得电视剧“三连冠”的回顾	362
《四世同堂》为电视剧创作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368
鄂川黔三省群众文化见闻	373
剧团体制改革的新尝试	378
在新形势下搞好工厂的业余文化工作	382
天津市文化局组织文艺演出队赴引滦工地慰问	386

文艺演出中值得注意的倾向	390
文艺作品描写“中央特科”历史题材要慎重	392
关于不宜与外国艺术团体结成姊妹团体的通知	393
为什么要翻译和大量出版《爱娃与希特勒》?	395
云南人民出版社对翻译出版《爱娃与希特勒》作出检查	397
浦安修同志给杨尚昆、习仲勋同志的一封信	399
列宁关于文艺问题谈话一段译文的重要更正	400

胡耀邦同志在会见全国故事片 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文字上有些调整，并作了若干补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

我是啦啦队，是球赛的“啦啦队”，是广播、电视的“啦啦队”，是电影的“啦啦队”，就是给大家“加油”！我们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门的同志，都应该给自己确定这么一个任务，就是当“啦啦队”，帮大家鼓劲。一个体育，一个文艺，有广泛的群众性。而凡属具有群众性，有益于人民，能鼓舞和教育广大人民积极向上，又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事业，我们都要组织和领导人民，千方百计地把它们搞上去。这才算得上真正具有我们党经常说的群众观点。

还有四天，一九八一年就要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如何看我们今年的工作，如何迎接新的一年呢？送同志们两句话：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如果说新年要有对联的话，这可不可以算一副？

我们的同志，任何时候都应当坚持两分法。中央最近开了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开了九天，总结了今年的工作。用两分法看问题，可以看到，一方面，今天我们全党的工作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总的说来是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些事情没有搞好，包括有些本来应该做得更好一些的事，也还没有做好。比如思想工作问题，物价问题，等等。今年全党工作是这样，文

艺工作如何呢？希望同志们也采取两分法这样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加以分析，以利明年的工作。

就电影来说，应当充分肯定，几年来进步很大，今年又有新的进步。好的和大体可以的影片是主流，大多数同志是很努力的。特别是一些青年导演，青年作者，和青年演员，快马加鞭地成长起来了。我觉得，全国几亿人民，包括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种人群，男女老少，对你们电影界的成绩和进步，对你们所作出的贡献，是高兴和欢迎的，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是感谢你们的。这就叫做是非自有公论。你们应当相信这一点。这也是一种应有的自信心。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就是确实有些影片不够好，有些同志努力不够，个别作品和个别同志还有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问题，无非是两条：

有一条，有些作品，有些同志，政治情绪不健康。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地就是忽视以至否定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而把我们革命过程中的失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都看成是整个党和国家不好，整个革命队伍不好，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好。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前途，或者前途渺茫。这就是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情绪的不健康。

为什么要批评白桦同志，就是因为他那个《苦恋》在政治思想上是不健康的，对人民思想有害的嘛。经过批评，他认识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这就很好。这样，《苦恋》的问题就完满地结束了。白桦同志还是党员，还是作家，还要继续写作。人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央的方针和做法，同以往一个时期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说明了我们党，确实是由过去的失误和挫折当中，取得了教益，更加成熟起来了。

毫无疑问，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鼓足干劲批评，这是没有什么好留情的。最好是本人和同行实行自我批评，而不要护短。这不但是对于作家来说的，对于我们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也是这

样。今后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如果有错误，可不可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毛主席的错误都可以批评，我们这些人如果确有错误，为什么不能批评呢？为了我们伟大的事业，革命队伍中无论是谁，犯了错误都要批评。但批评一定要讲究科学，讲究政策，决不是乱批一通。也许有同志会说，一批评，就破坏了积极性。我们说，问题要看你是什么样的积极性。如果是错误的积极性，难道不应该来一点破坏吗？这样的破坏，同时也就促进健康的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扬。

第二条，有些作品，有些同志，思想境界太低下。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的就是不能正确处理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把爱情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

当然，爱情是文学艺术的重要题材之一，可以写，而且应该写。去年我在剧本座谈会上就讲过，谁说不能写爱情呢？这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嘛。问题是究竟把这种爱情放在什么地位上。我们一切共产主义者，一切革命者，一切爱国者，胸怀和眼界应当广阔和远大得多。热爱我们的伟大祖国，热爱我们的伟大人民，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才是最可宝贵的。如果可以把我们的热烈爱慕的感情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的话，那么第一位的就应当是这个东西。至于两性之间的爱情，只能是第二位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艺术比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艺术，应该前进一大步。现时，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首先要教育人们特别是青年，爱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爱我们的人民。一个革命者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个人的爱情，以至于生命。

人们都还记得匈牙利裴多菲的有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位十九世纪中叶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为了祖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能够达到这样崇高的思想境界，难道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作品和作家，反倒可以倒退到爱情至上吗？不应当使两性之间的爱情超过革命，

压倒革命。不应当宣传爱情高于一切，一切为了爱情。我们的文艺作品，总是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激励和鼓舞人们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身嘛！

坚持两分法，才能更上一层楼。不但你们明年要更上一层楼，我们全党的工作，各行各业的工作，明年都要努力奋斗，更上一层楼。你们说明年可以争取出一百部故事片，这很好。但还有个问题：什么样子的—百部？大家都认为，不但数量要达到—百部，而且质量也要比—九八—年达到更高的水平。这就要求同志们付出巨大的劳动，从思想上、艺术上和各项工作上，努力认真地解决—系列的问题。关于经济发展，小平同志有—句话，就是明年要有—个扎扎实实的、没有“水份”的—定的速度。这句话很好，既有一—定的数量要求，又有严格的质量要求，把数量同质量统—起来了。我看小平同志这个要求，对我们电影工作，是完全适用的。

刚才同志们提出了许多实际困难，我们应该听。我们今天只解决了—个问题，就是利润留成的问题。至于其他困难，—类要请宣传部、文化部、文联去解决，还有一类则大概是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比如多数人的房子问题，工资待遇问题等等。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见是好的；有些情况实在不象话的，可以考虑采取—些临时性的措施，例如对某些同志特别是作出了优异贡献的同志，实行补助的办法。但是，总的来说，同志们都会理解，我们现在还是低工资。这个问题，中央研究了—多少次，相信情况可以逐步有所改善，但要在十年之内有很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第—，我们是个历史遗留下来的穷国；第二，大跃进犯了错误；第三，“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又碰上林彪、“四人帮”这个鬼；第四，现在要解决的问题确实很多。由于这四条原因，我们各行各业的工资待遇，不但五年、十年，就是本世纪之内，也很难有很大的改善。

我想索性把话讲到底。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犯大的错误，而

又鼓足干劲，把国民经济不断地推向前进，那么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可能逐步略为加快一点；但是，总起来看，从现在起，五十年内，也就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头二、三十年，中国生活水平要赶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是不大可能的。看一看历史吧。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一百多年，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发生了一次社会大变动，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从这以后，再过一百多年，大约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我们国家才有可能再来一个经济和社会面貌的全面的根本的大变化，站到世界的前列。所以，社会历史进程，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在这两个世纪内，要多吃一点苦。苦一点有什么了不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两个世纪，正是中华民族大变化、大前进的两个世纪啊！

这种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要求我们的同志，能够自觉地经受各方面的艰辛和磨炼，并且经过这个历史阶段的困苦，开辟我们民族的远大前程。这样的思想境界，才真正是思想解放了嘛。这样的思想境界，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也是革命现实主义的。难道这不叫现实主义吗？我们下定决心，要在今后的半个世纪内，通过我们自己的艰苦奋斗，来达到建设一个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教育发达、道德高尚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的，使我们国家翻这么个大身，这才真正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那种无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把人民的事业和理想看得一个钱不值，一无是处的精神状态，难道称得起是现实主义的吗？那是短视主义，自然主义，没落情绪！

同志们，这个思想境界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和时代的特点。我在这次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现在，在整个人民当中，在党员和干部当中，坚信我们国家能够由乱到治，由穷变富，实现大变化大发展，并且自觉地为而奋斗的，还只是比较少数的人们。许多人只是热烈期望，一些人将信将疑。还有极少数人，则是坚决反对这个大变化大发展的，他们要倒退。这就

要求我们，一定要经过我们的思想工作、理论工作、宣传工作，经过我们的文艺工作、新闻工作、教育工作，使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奋斗目标，真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和信念，真正成为亿万人民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舆论。我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如果不为这个目标服务，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文艺工作者不是站在这个时代思想潮流的前头，而是站在旁边，专写些和演唱些“风花雪月”“卿卿我我”之类的东西，或者站在后头，专写些和演唱些“凄凄惨惨”、“不堪回首”之类的东西，那能有什么前途呢？更不要说站在对立面，专门用阴暗的心理和仇恨的眼光来歪曲革命和诅咒革命，那就更加没有前途，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当然，这丝毫不是说不批评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我们说过多次，可以而且应当批评。问题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是什么样的思想境界。

刚才夏衍同志对我说，要我多讲几句关于学习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只你们这一行，而且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我们大家都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当然，社会分工不同，学习的要求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就文艺工作者来说，我感到，一定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加强向社会生活的学习，加强对文化科学和历史知识的学习。

马克思主义产生一百多年，有丰富的文艺理论。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对文艺工作的一切问题，都提供了现成的答案。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只能是为了从马克思主义学得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指导自己的艺术实践。我们应当力求有较高的思想性，又有较高的艺术性，并且力求使这二者统一起来，融为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并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风尚的进步。王朝闻同志的《美学概论》和其他一些同志的美学著作，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看了一点，没有看完。我感到，不论哪一种美学理论的书，都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们总还是可以帮助

我们从中弄清楚一些有关美的概念和常识，使我们少走点弯路。现在我们一些同志对理论问题注意不够，而文艺理论工作的成果确实也是太少了。

深入生活，深入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各种人和社会的各种现象，这是我们文艺创作的前提。离开这一条，只能主观臆造，或者说，只能按照作者的主观需要去胡编。比如那个坦克里面谈恋爱的情节，别的不论，只问一点：坦克乘员人数是有限额的，怎么能够随便加一个人呀？高尔基曾经诚恳地劝告一位青年作者：不要急急忙忙地写，而要学习。他还说，要能够鲜明有力地反映新的生活，就要注意现实。现实有三种：过去的现实，现在的现实，还有已经看见大致轮廓的未来的现实。

关于学习科学文化和历史知识，特别是要在语言上顽强地多下功夫的问题，我以为也需要提起同志们，主要是青年同志们的极大的注意。“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它说明了没有好的文采，没有好的语言，就不能打动人心，不能影响广大范围的人们这样一条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而无文，肯定是没有多少生命力的。大家看中国近代的大文豪，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等，哪一位不是语言艺术的大师？但是现在一些青年同志，看来却没有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本来文学素养不足，又不肯用功学点中国古代的散文和诗词，不肯用功学习群众语言，结果搞出来的东西干巴巴，没有多少感人的力量。长此下去，怎么能行呢？

有同志说到电影《知音》，我以为这个片子还是可以拍的。蔡锷作为旧民主革命推翻袁世凯的英雄，确实立了大功，小凤仙也算得上是一位有限力有胆识的妇女。但是我不知道电影的编剧和导演同志，是否看过小凤仙给蔡锷的挽联？那挽联的上联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下联是：“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你看，这里说到蔡锷的抱负和斗争，也说到小凤仙自己，以

及她同蔡锷的关系，是有一定思想深度和文采的。如果《知音》就用这副挽联作为主题，甚至把它写个主题歌，岂不很好，思想境界和文采不是可以更高一些吗？可见，还是需要加强历史和文化的修养。如果我们的作品，既有正确的主题和动人的情节，又有丰富而优美的语言，那就一定可以有力地教育和感动人民。

有同志说，我们电影也要象打球等等那样，到国际影坛上去争雄长。我以为，这个问题需要分析，如果不分析清楚，我们一些同志可能迷失方向。现代国际体育比赛，作为竞技运动，是有国际公认的统一的竞赛规则和评判标准的。按照这种统一的规则和标准，优胜劣败，了了分明，很自然地为全世界所承认，而无所谓阶级性。但是文艺(包括电影)就不同了，它是具有最强烈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意识形态部门之一。同样一部文艺作品，不同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和世界观的不同，可以作出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评价。当然，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艺，在艺术形式和技巧方面，可以而且应当互相借鉴。一切民族的文艺，它们的一切积极成果，都会对全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文艺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能以是否适合我们民族人民前进的需要为转移。所以，今天我们文艺的根本奋斗目标，不是要到国际上去如何如何，而是要真正深入到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的心灵中去，成为鼓舞亿万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奋斗的强有力的精神武器。真正做到这一点，那么这同时也就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伟大民族，使自己的文化复兴和繁荣起来，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对于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将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并将给它带来巨大的推动。在世界文化史上，这难道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吗？

总之，为着我们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着我们国家的翻身，人民的翻身，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奋发图强，准备进行持久而艰苦的努力。要学习中国女排为祖国为人民争光的拼搏精

神。同志们说担子重，感到有点“压力”，我看这是一件好事。高楼自来水上不去，就是因为“压力”不够。“压力”要有一点，看是什么压力，当然也不要太厉害。更上一层楼，归根到底，要靠自己迈开两条腿。而能不能迈得开，就看我们对祖国、对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的程度。

今天这个会开得不错。我建议，这样的会，今后每年十二月开一次。（鼓掌）范围扩大一点，导演来，作家也来，演员和歌唱家也来一些，年终算个总账，目的是为着新的一年的战斗。我还是讲这一条：更上一层楼，离不开努力奋斗。祝同志们明年努力奋斗！（鼓掌）

（总第4期 1982年1月8日）

胡耀邦同志谈 文艺批评中的点名问题

本刊编者按：文艺批评中的点名问题究竟怎样掌握为好？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论述，现摘发如下。

查一查从去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以来，理论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的错误言论和错误作品，选择其中主要的，加以评论。有些省是有的，有些省如果没有，也不要一刀切。批评要中肯，要入情入理，不要夸大曲解，更不要组织围攻。批评自我批评是一个经常性的任务，不要赶时间，可以此起彼落，但是一定要切实抓好。关键是小平同志说的党的思想状态。这是坚持四项原则、坚持双百方针、反对自由化的大事，不是三天两天敷衍过关的事。请你们考虑。有些次要的，开开会，口头批评批评就可以了，这里确实有个方法问题。（王任重同志：有些批评，可以不点名。）可以分四种情况：一种是写文章点名的；第二种是写文章但不点名，只批观点的；第三种是只作口头批评，帮助教育；第四种是发表自我批评的东西。点名的要少，各地要点名的，先报中央宣传部批准，这就不会形成运动和围攻。这样是否比较妥当，请你们考虑一下。有先有后，不搞一阵风。同志们，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思想界现在点名批评的，没有几个，而我们做党的工作的，现在在报纸上被点名的有几十个，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直到部长，连副总理都点名了，为什么我们的思想界一点到自己的同

行，就叫起来，说什么反右派开始了？为什么点到党政干部的名，就说这个应该，还嫌轻了？这种情绪不好，逻辑上也讲不通。

（总第7期 1982年2月25日）

胡耀邦同志在广东、福建两省 座谈会上的发言(摘录)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

必须做坚定的、清醒的、 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央的《紧急通知》，强调地提出了一定要对那些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利用权力进行投机诈骗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加以严惩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我认为必须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我们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们国家兴旺还是衰败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很明显，党员和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在经济上的犯罪行为，已经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党的威信。如果听之任之，任其发展下去，那就会更加严重地毁坏我们党的威信，毁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甚至毁坏六十年来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一切革命成果。对于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我们一定要提起全党同志的高度警觉。

应当充分肯定，粉碎“四人帮”五年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同志的努力奋斗，我们已经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中挽救过来，并且使之重新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会忘记的。但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党和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除了战争危险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重大危险了呢？当然不是。在和平的条件下，

危险仍然存在。正如紫阳同志刚才讲的，那种使党衰败下去，走向“和平演变”的危险性，就远远没有消除嘛！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比三十年前的“三反”、“五反”时期严重得多；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整个社会风气方面，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主义残余的侵袭和崇洋媚外等现象的严重性，也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在你们两省，还有其他地方和部门，不是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和干部，甚至某些党组织，在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之下，烂掉了吗？在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还有很大的危险。这是第一个要清醒的地方。

危险主要来自哪里？我们经常说要警惕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的阴谋，还经常说要警惕已被打倒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渣余孽的蠢动，这些话无疑都是对的，确实应当经常地加以注意。但是我们同时还应当明确认识，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党，只要党自身的肌体是健全的，能够有效地抵御各种“病菌”的侵蚀，自己不倒下去，自己不烂下去，始终和人民在一起，那末，任何敌对力量要把我们搞烂，把我们推倒，就都不是那么容易，他们的阴谋就都不可能得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来自别的方面，而是来自我们党内不坚定分子的腐化变质。看到危险主要来自哪里，这是第二个要清醒的地方。

就党本身来说，关键又在哪里呢？是不是全部三千九百万党员都是关键所在呢？不是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党内中上层的领导者，在于主要的领导干部。如果我们中高级领导干部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把我们的党带好，党就有力量克服一切错误的东西。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八年《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中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

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非常深刻，非常重要。他那时说要有一、二百人，现在历史条件不同，恐怕要一万到两万人，大体就是中央管理的干部那个范围吧。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万到两万个干部真正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战斗力就可以大为提高。党搞好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管多么艰难，都一定可以搞好。反之，如果我们党内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在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而且不能及时地加以制止，任其滋长泛滥起来，那就很危险。所以，关键是在于党的中高级干部，这是第三个要清醒的地方。

坚定和清醒，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清醒地看到危险，指出主要危险和关键所在，不是回避和掩盖它们，而是勇敢地、恰如其分地加以揭露和处理，团结起来战胜危险，这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的表现，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表现。反之，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回避和掩盖矛盾，或者乱斗一气，那就既谈不到清醒，也谈不到坚定。

这两天有好几位同志说，现在对我们是一种考验。这话讲得很对。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在最近几年内，我们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政党的领导集团，能不能真正顺应历史的潮流，放开眼光，拿出魄力，打开局面，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伟大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对我们确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历史性的考验。我们这些人干得究竟怎么样，若干年后，比如说二十年后，我们的后代就将作出一定的评价。我看这里无非是三种可能：第一种，肯定我们这些人确实是一些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人。第二种，说我们这些人无能，庸庸碌碌，是平庸之辈。第三种，说是昏庸腐朽，昏聩之徒。大家看，“有为之人”、“平庸之辈”、“昏聩之徒”，有这样三种可能的评价。所谓对我们的考验，我看归根到底，就是考验我们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三种情况里面，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种。

（总第11期 1982年4月28日）

胡耀邦同志对要求成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一封信的批示

(一九八二年四月五日)

现在各种学会、协会有如雨后春笋，请各有关部门注意防止“逐名者多，务实者少”的倾向。我们现在确有大批为人民作了许多贡献的老学者、老专家、老艺人，如今，他们精力已经衰退，甚至生活上还有一定困难。我们宁愿从政治上、生活上给他们更多的照顾，使他们有一个更舒适的晚年，而不可到处筑坛拜将，布道施法，如果这样，很可能使他们疲于奔命，又浪费了许多财力物力，特别是有可能于我们的学风不利。想干这样的事的，主要是我们一些不愿埋头作切实工作的干部，串连的是这些人，积极搞发起的是这些人，因此值得我们自己注意。此事请中宣部牵头考虑一下。

这个学会是否需要，应当怎么搞，我不清楚，也请中宣部商有关机关酌情处理。

[注]北京德外安定医院陈学诗同志四月一日写信给胡耀邦同志，要求成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胡耀邦同志作了以上的批示。这个批示的基本精神对文艺界类似的学会或研究会都具有指导意义，各地文艺领导部门要实事求是解决这个问题。

(总第13期 1982年6月1日)

胡耀邦同志关于体育 和文艺队伍风气问题的批示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

许多同志议论体育和文艺队伍中的风气有不少问题，值得注意。我主张组织一点人，具体地抓一抓，一方面要好好地要把他们的劲头鼓起来，另一方面把风气搞好，使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的文艺、体育搞出一个新水平。

(总第33期 1983年5月12日)

胡耀邦同志的一段重要批语

现在我们一些部门不抓本部门队伍的这种建设（注：指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只单纯抓业务，这种办法不行。还有些同志对本部门队伍的思想、作风、组织状况很不了解，即使了解一些问题，甚至了解到一些严重的不正之风，也不敢讲，不敢批评，不敢坚决斗争，业务怎么能上去？要改正这种不好的作法，要经常抓，一级一级的抓，有些事要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要下决心，力争尽快地使本部门队伍的党风有根本的好转，这要作为观察各部门是否打开了新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本刊编者按：这是今年四月二十六日胡耀邦同志在一份调查材料上就业务部门要抓好本部门队伍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问题，写的一段很重要的批语。联系宣传文教战线、文化艺术战线的实际来看，这个批语是多么切中时弊啊！

有人一看到批评文艺界的问题，就认为这是否定了文艺战线的主流，否定了文艺工作的成绩。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错误的。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已经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因此，现在不存在否定文艺工作的主流和成绩的问题，党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肯定近几年文艺战线的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文艺队伍是一支很好的队伍。我们是在这个前提下谈文艺界的问题的。

正如我们应该睁开两只眼睛看待整个社会生活一样，我们也应该睁开两只眼睛看待文艺界，看看我们自身。整个社会生活的

主导方面是好的、健康的、光明的，文艺界也如此；社会生活仍然有阴暗面，有丑恶的东西，文艺界也不例外。对社会生活的^下光明应该歌颂，对文艺界的光明也应该歌颂；对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和丑恶应该揭露，对文艺界的阴暗面和丑恶也应该揭露。只提倡歌颂生活的光明，却不允许歌颂文艺界的光明，只提倡文艺界批评社会生活的阴暗和丑恶，却不允许批评文艺界的阴暗和丑恶，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文艺界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如果认为只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阴暗面，唯独文艺界通体光明，岂非咄咄怪事？

文艺界的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现象，应当引起一切宣传和文艺领导机关的注意，文艺领导机关和从事文艺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应当把解决这些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不讲职业道德、一切向钱看、生活上腐化堕落、不讲人格国格、经济犯罪、文化犯罪、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等等现象，在文艺界不是确实存在吗？“只单纯抓业务”，在文艺界就是只见“文”不见“人”，这是不行的。对文艺界实际存在的问题看不见，或者看见了却不敢批评、不敢斗争，也是不行的。办法就是“一级一级的抓”，“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要下决心”。

要把文艺界的风气、尤其是文艺界的党风的根本好转，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这是文艺工作开创新局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关键环节。

（总第35期 1983年6月15日）

胡耀邦同志给英籍女作家 韩素音的复信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不久前在我国访问期间，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对我国国际书店进口外文书籍问题提出了意见。今年一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给她复了信。复信全文如下。

韩素音博士：

中国对外友协将你给我的，但没有注明日期的信转给了我。一个星期前我从贵州省考察回京后才看到它。

五十年代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以后，我几乎年年都知道你从事紧张的创作，特别是从事宣传新中国和增进各国人民友好的活动。你的巨大热情，勤奋和良知，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你的中国广大朋友们由衷的敬佩。

中国出版的你的三本书，读到过的青年人告诉过我，他们是喜爱的。我只是看了你那本自传性小说《花开花落》。因为我想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你要我查的《待到早晨到来时》那本书，中国国际书店的同志说，他们只收到美国班顿图书公司的推广产品和样本，没有接到过推荐信。他们将样本展出了，但还没有订户。至于《黛西公主》这本书，他们没有引进过。

中国的出版事业，这些年来确有较大的恢复和发展。这是我们出版界广大同志辛勤努力的结果。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的出版事业存在着两个大缺点，长期没有得到克服。

一个是出版了一些不该出版的书，同时也漏掉了一些该出的好书。对本国的书和翻译外国的书两种情况都有。为什么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呢？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一支包罗各方面作品的强大的审稿定稿的队伍。

另一个缺点是注意了出版书的门类和品种（这是应当的），不太注意读者对好书数量的需求。你说，许多关于中国的好书，包括斯诺先生的书在中国都买不到，这一点我是相信的。“文化大革命”前我就向我们的出版界建议过，要按中国人口多和出版能力有限的情况，把出版物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要提倡看的、而又为人们喜欢看的书，每年要确定一、二十种或二、三十种，不是印几十万册，而是印几百万册甚至印一、二千万册，敞开供应。另一种是给各种专业机关专门人员参阅、研究的书，这种书品类繁多，也要广为收集出版，每年大概也要出几千种，但只能印几万册，几十万册，主要供给县以上图书馆。我不知道我们出版界这方面的现时情况，但我想，这个问题可能由于对下情不太了解和对人于事难于决断，大概还解决得不好。

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遇到千千万万个问题的一个例子，而且还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例子。从这个例子中你还可以想到，我们前进中还有多少事情不如意和需要努力解决呵！

非常非常地感谢你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从事的为了进一步改变自己命运的伟大斗争。你说，你在计划要为中国科学家和艺术家建立一笔基金。你的心太好了！但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经济力量有多大。因此，我希望不要过于勉强，不必太匆忙，太焦急。还有，新中国毕竟从旧社会脱胎出来不久，又是在前人没有走过的荒原上行进，不可能没有该诅咒的东西，失误而要重新改做的东西。有人抓住你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过的某些过头话，使你难堪过。这也使我们这些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对你不起。因此，希望你今后撰写中国问题时，更好注意到描绘中国有待努力克服和应该奋勇进取的一面。

衷心地祝你精力充沛地工作！

胡耀邦

1984.1.15

（总第46期 1984年2月29日）

胡耀邦同志关于文艺演出 团体的两件批示

一

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直接为群众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在我看来，都应该而且必须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和严格的按劳分配制度。坚决实行这种制度，再加上正确和切实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有效地消除各种弊端，使我们的各项事业走上蓬勃发展的新轨道。那种把工作质量同经济核算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我认为没有通观事物的全体而得出来的片面观点。为了促进文艺演出团体注意提高质量，还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即：凡编写和演出新节目、好节目，按质按量发给奖金，直至由国家颁发奖金。河北同志们提出的既规定经济指标，又规定艺术生产要求，制定剧目规划和相应的鼓励办法，形成一套促进社会主义艺术生产制度的设想，很值得注意。

二

文艺演出团体现在生活待遇是很低的，同意在工资改革政策未解决前，他们自己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主要是不演坏戏），采取多演出，减点人等办法，增加些收入，用来改善演员生活，在我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好。前几天，有些年青同志同我谈，他们认为体育界很关心运动员，而文艺领导政治要求高，但关心舞台群众实际困难少。这件事，是否要注意一下，请考虑。

（总第49期 1984年5月12日）

胡耀邦同志关于电影的批示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六日）

一个片子能否公演，我意今后要坚决废除一个人拍板决定“生”“死”的作法。要走群众路线，有严重缺点的就修改。搞精神污染的，坚决禁演。但这后两种情况肯定是极少数，而且要充分说理，使最大多数人，也包括创作者的多数，感到改得好，禁得对。

（总第52期 1984年8月2日）

胡耀邦同志关于舞蹈艺术 工作的谈话纪要

(根据记录整理)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胡耀邦同志同文化部同志谈为外宾组织一次歌舞晚会时，谈到舞蹈艺术工作问题。要点如下。

应该大力发展我国各民族的舞蹈。少数民族的舞蹈很丰富，各有各的特色。它们动作不同，服装样式和色彩也各异，称得起丰富多彩。如此丰富的少数民族舞蹈，为什么不好好地加以保持，加以发展呢？相比之下，汉族就几乎没有什么舞蹈。汉族舞蹈，唐朝时似乎还很盛，大约自宋以后，渐渐衰落了。解放后汉族舞蹈有所发展，五十年代的“荷花灯”、“红绸舞”等等还不错，还有许多舞蹈家，几十年一直辛勤努力，对舞蹈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又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在整理少数民族舞蹈的时候，我们一些同志又往往把人家的特点搞掉，而把汉族的马戏、杂技动作，或者京剧甚至芭蕾舞的动作，生硬插进去，结果把少数民族舞蹈也破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应该提醒我们的同志，注意保持民族特色。没有民族特色的舞蹈，是没有生命力的。

长期以来，舞蹈艺术发展不够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掌握舞蹈本身的特点。舞蹈有大型的、有小型的，有古典的、有民间的，而无论大型还是小型，古典还是民间，都应当注意保持自己的特点。现在有些舞蹈，往往勉强编上情节，搞两

个人物在台上走来走去，东倒倒，西歪歪，又不跳舞，成了哑剧、活报剧！这些同志是好心，想加点政治。但是勉强加进政治内容，搞人物，搞情节，很难搞好。我说这种做法，是搞“微观政治”，是简单化。一个舞蹈，能让人看后感到愉快、欢畅，感到美，提高精神境界，就很好了嘛，怎么能够一概要求它勉强从属于这样那样的具体政治任务呢？还应该看到，如果我们把各民族的舞蹈都很好发展起来，真正体现了多民族的不同特色，多采多姿，这本身就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样的政治意义，还不够大吗？这也就是政治嘛，是“宏观政治”！所以我想借这次商量安排晚会节目的机会，请你们考虑一下，究竟怎么搞舞蹈？研究一下舞蹈艺术的基本规律。多少年来，似乎没有很好讨论舞蹈、音乐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

这次安排节目，多搞一点集体舞，比如十几个人的群舞。至于单人舞、双人舞，个人技巧必须很高才行，否则宁可少一点。还要注意，节目不要长，不要一跳就是十几分钟，要精一点。一个节目，一、两分钟，至多五分钟就够了。我在罗马尼亚看他们的晚会，全是民间舞蹈，这个地区、那个地区的，各种不同服装和动作，而且全是两三分的，一个接一个，也没有报幕，很生动，很好看，使人感到愉快欢畅。

这次晚会以舞蹈为主，蒙古舞、维吾尔族舞、藏族舞、傣族舞、苗族舞、哈萨克族舞等等，都应当是外宾在他们国家看不到的。选节目要注意到这一点。那些勉强加上情节，又没有舞起来的节目，就不要参加了。时间长的，十分钟以上的节目，也不要参加了。整个晚会，最多不超过一个半小时。

（总第55期 1984年12月26日）

胡耀邦同志批示

我建议中宣部和文化部联名，把这个反映发到全国所有的文艺团体去，每个单位一份，并且要每个党支部讨论一次。要使那些单位的每个共产党员明确认识到：文艺创作和表演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发愤图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献身。文艺团体的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可忘记这个最重要的任务。我说的是要认真肩负起这个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而不是要求我们文艺工作回到老路上去，再搞“左”的那套东西，即事实上禁止人们的创作自由，规定和干预作家的写作计划，要作家搞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给作家穿小鞋，打棍子；也不是要求我们的文艺创作和表演重新搞那些干巴巴强迫人们听训的东西，一切轻松活泼有益于增进人们心身愉快健康的东西都要继续提倡。对这一点，我希望不产生任何误解和出现新的偏差。

出国留学人员对对外宣传工作的反映

最近，我留美研究生王鲁闽代表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近二百名我留学人员，向教育部和有关单位写信，对国内在三十五周年国庆前夕及时寄送庆祝国庆活动的电影、录像、录音带、幻灯片等宣传品表示称赞。信中说：这些材料对于激发我留学人员的爱国思乡之情，对帮助港、台学生进一步认识今日祖国大陆的面貌，对加深美国朋友了解我国的情况起了很大的作用。

信中还今后的对外宣传工作和内容提了一些建议，现摘登如下：

将近一年来，我们放过的国内影片、录相带可能有近二十部了，在这里的反映如何呢？从贴出广告后，前来观看的人数上可以看出一定问题。电影：台湾、香港同学来看的人数最多的是《风雨下钟山》（那天共有三百多人来看，其中有近一半是港、台同学），其次是录相《西安事变》、《少帅传奇》。大陆同学几乎全部到场观看的录相片是《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式》。看完《国庆阅兵》及《风雨下钟山》等片，我觉得心里有一种自豪感，骄傲感。我们需要这样的东西，需要这种在我们看时并请朋友看时能使我们为我们的伟大祖国感到自豪与骄傲的东西！《国庆阅兵》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台湾同学来看的不多。后来我们借放《西安事变》的机会（那天台湾同学来得较多）又放了一遍，很多人一直看完才走（当时已半夜了）。有一个台湾来的教授（统计系的）到我们住处来看了国庆的录相带后，又借回家去放给全家人看。香港、马来西亚的几个同学还请求我们帮助他们转录，给他们在外地的亲友看。那位台湾教授在看阅兵式的时候对我说，“我不是左派。但大陆有两首歌我觉得写得最好，一首是歌唱祖国，一首是一条大河波浪宽。这两首歌我在加州（加利福尼亚）当学生时就能唱出来。这两首歌并没有什么政治、党派的说教，是只有一个蓬勃向上的民族发展时期中才能产生出来的。”类似这种的爱国歌曲我们这里是一盘磁带都没有。国庆节的文艺晚会也令我们失望，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许多受群众欢迎的爱国歌曲连国庆节的晚上都不能放一放？许多一流的中国演员不露面，却偏要请那么多香港人来唱一些与国庆毫无关连的《木棉袈裟》之类的歌？我们相信，正在向四化进军中的中国青年更需要能使他们振奋的艺术。当然，我不是说国内不应当放港、台音乐及迪斯科之类，而是说不要再走另一个极端。特别是在国庆节这种场合，晚会上应当有大部分是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记得前年七月四日晚上，我们在美国看电视的情景。那天转播的美国国庆文艺晚会是由一

个大交响乐团在华盛顿主演的，演奏的几乎全是《星条旗永不落》之类的传统爱国歌曲。秋天每个周末橄榄球赛，二百多人的大型军乐队（学校）总是要在比赛前演奏国歌，那全场六万人高声合唱的情景曾使我感动得流下眼泪。我们的国家还不那么富有，我们更应当振奋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对吗？我希望国内的文艺舞台真正是百花齐放。在美国迪斯科、摇摆乐是很多，港台音乐要想听也很易找到。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特别想看点、听点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提到中国味儿的艺术，也不要以为海外的朋友只想看中国传统节目（古装的）。现代的中国音乐以及表现中国人民奋发登攀的节目是很受欢迎的。我曾在一个美国朋友家放过一盘《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带子，那是我唯一一盘称得上爱国歌曲的带子，他们全家都十分喜欢。他们还请我和一个自费留学生唱中国国歌，唱完一遍又让再唱一遍，请我们去作客的那个美国学生的父亲特意去拿了录音机把我们唱的国歌录了下来。我希望我们的文艺园地真的是百花齐放。在允许社会上流行各种音乐的同时，宣传部门应当负起传播爱国音乐的职责。我建议（这已不是针对对外宣传工作，也许扯得远了一点）：（1）今后国庆、元旦，电视台组织爱国歌曲及音乐晚会；（2）春季至秋季，天气好的时候，每月以一个固定的周末的下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一次免费的爱国音乐演奏会；（3）凡有重大体育比赛，不论国内或国际赛，都要以军乐队奏国歌（全场齐唱）开始。一开始也许唱的人不多，可由团中央等组织一下，以后慢慢习惯了就不用组织了。（军乐队现场、列队演奏与放录音的气氛大不相同。）对于对外宣传品，应尽可能配上英文字幕与英文解说词，同时也应尽可能制作得好一些。希望能有一套质量好些的、带英文解说磁带的、介绍当代中国建设成就的幻灯片。中国近代史的片子不妨多搞些来。我在纽约碰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他说他们那儿的台湾同学甚至主动提出要看《红日》与《解放石家庄》等影片。另外，如有可能，每年或每两年能派一个青年艺术团体（十

几个人)来美国各校巡回演出一下最好,人数不要多,最好每人都能歌善舞,带一台丰富多彩以当代中国艺术为主的节目。这些人在美国的食宿可由各大学的中国学生联谊会解决(与我们同吃同住)。台湾每两年派一个青年艺术团,来威斯康星大学演出,团员是十几个大学生,一半男一半女,由台湾教育部集训几个月。整台节目轻松、活泼又富有朝气,在这里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其中有不少是大陆的民歌。看完后,我们是有点羡慕的,我们要是也来个艺术团,震一震多好呀!这几天听说中央慰问团要来,但表演节目的只来一个胡松华,不太可能在这里演一台节目,造成大的影响。这个意见望您们在组织明年慰问团时考虑,其实不一定要春节前后来,国庆时能来一个艺术团最好。若能来一个十几个人的高质量艺术团体,一定会在这里造成很大影响。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吃好住好的。

今后宣传材料还是请国内同志(如民航)带至美国再寄给我们为好。

此信是综合了周围一些同志的意见,抽一个晚上仓促写成的,意见不一定都对,建议也不一定都可行,仅供您们参考。信中的有些信息请能转到各个有关部门。

顺便提一句,我及我此信中所代表的人并不是思想保守的人,也不是看不惯新事物的老顽固。我们也是刚三十上下的青年研究生。我们认为不能把宣传爱国主义与极左混在一起扔掉,也不能一搞百花齐放就把爱国歌曲与音乐给埋没了,至少我们在海外的炎黄子孙想听。

关于学习胡耀邦同志的 重要批示和讨论出国留学人员 一封来信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人民政府文化厅（局），总政宣传部、文化部，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组：

胡耀邦同志最近就我出国留学人员的一封信作了重要批示。现将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和来信一起发给你们。请发给每个文艺团体一份，并且组织每个文艺团体的党支部讨论一次。

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对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各单位在学习时，应同邓小平同志三月七日关于要有理想和守纪律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深刻领会。文艺创作和表演要努力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振奋精神，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艺战线的同志，特别是共产党员的思想感情应该同我们的伟大事业息息相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对于整个思想战线，包括宣传、新闻、出版、教育等部门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请将这个批示和留学人员来信一并发给这些部门及所属各基层单位（教育部门发至中等学校），并按上述同样的要求组织党支部进行讨论。

请你们将学习、讨论的情况，及时报给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
文 化 部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总第56期 1985年4月10日）

关于党的新闻工作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在
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胡耀邦

第一，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这样一句话，当然不可能概括党的新闻事业的全部内容和作用。比如它还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和桥梁，又是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等等。但是，既然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工作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那么党的新闻事业要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就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既要使上情下达、又要使下情上达的作用，包含着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的作用，包含着在各方面满足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需要的作用。因此，从最根本的特征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这不但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是不能动摇的。

我们国家的新闻单位很多，听说现在有几千个，自然会有许多差别。比如《解放军报》应当是中央军委的喉舌，《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应当是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

全国妇联的喉舌，各省的省报应当是所在省的省委和省政府的喉舌，这就是差别。但是无论解放军、总工会、共青团、妇联还是省委、省府，总的说来都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都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的，因而这些差别并不影响、也不应当影响它们的报纸作为党的喉舌的根本性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因为这些差别而竟然影响了这些报纸的根本性质，那岂不是走偏了方向吗？至于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报纸，以及某些业务部门的各种专业性、技术性的报纸，性质有所不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也叫做“党的喉舌”，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总之，党的新闻事业的根本性质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对此，一些老同志可能淡漠了，一些新参加工作的缺乏基本训练的青年同志，可能还不很懂得这个基本观点。应当对他们耐心地做工作，并且帮助他们接受一点基本的训练。

最近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文艺必须有充分的创作自由。新闻工作能不能照搬这个口号呢？我认为不宜简单地照搬。当然，我们的新闻事业和文艺事业，都应当享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宪法所赋予的自由权利。一些同志说，这几年新闻工作的活跃和繁荣是从未有过的，我认为这个话是符合实际的。这也说明我们已经改进了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尊重了新闻单位应有的自主权力。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新闻和文艺的性质和职能，毕竟很不相同。党的新闻事业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虽然报纸、通讯社、电台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则报道不都是具有指导性的，有许多只是个人意见和个人的观察，但党的新闻机关的主要言论，有关国内工作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报道，应当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而不是只代表编辑或记者个人的。文艺就很不相同。文艺家所应起的社会作用，不是要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党和政府发表什么议论，指导什么工作，而是应当通过他们基于对生活的深入观察的个人文艺创作，来鼓舞和教育人民，对人们的灵魂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作用，也就是小平同志常常引用的那句老话——“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用。不错，党的作家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党性，党的作家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作家也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党的声音，但是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规定这个那个作家必须写什么东西。正因为这样，所以前不久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在作协大会上的讲话里，强调文学创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作家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自由，必须有创作的自由，这样才能写出有感染力的、真正起教育作用的作品。

提创作自由，并不等于说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于作家的不论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加以发表和出版。人们的自由或权利总离不了一定的责任或义务，没有无责任的自由或无义务的权利，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自由。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和任何个人都是如此，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和个人，责任或义务的性质和范围有所不同罢了。列宁一九二零年在同蔡特金谈到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创作自由的时候说：“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艺术家为市场而生产商品，他需要买主。我们的革命已从艺术家方面铲除这种最无聊的事态的压力。革命已使苏维埃国家成为艺术家的保护人和赞助人。每一个艺术家和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都要求有按照自己理想自由创作的权利而不管这种理想是否有点用处。这样你就碰到激动、尝试和混乱了。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列宁说：“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列宁还说：“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确实应该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因此，首先就得实施最广泛的民众教育和民众训练的工作。他们是文化的土壤……在那上面，将成长起一种按照内容而规定其形式的、真正新兴的、伟大

的艺术，一种共产主义的艺术。”很可惜，列宁在这个长篇谈话里所表达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思想，长期间没有受到我们党和我国文艺界的重视。这篇谈话对我们了解创作自由的意义，很有帮助。今天我们的作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创作，作家当然享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但是我们党仍然有责任在必要的时候向他们提出完全同志式的建议和劝告，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它的有关出版的各种法律规定。我们的刊物、报纸、出版社的编辑部也可以有所选择，有权决定发表或者不发表某篇作品。编辑部的决定也可能不正确，作家有权要求修改它的决定以至要求对编辑部进行改组，但是从原则上说，作家总不能以自己的自由来剥夺编辑部的自由。至于党的新闻工作应当受党的监督，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能不能把党的新闻工作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说是既然企业要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党的新闻部门也照样来办呢？我认为这种提法也是很不确定切的。实际上，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只是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不是所有制性质的任何根本改变。我们增强社会主义企业活力的目的，只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是不允许改变的。党的新闻机关就经营来说也是一种企业，但它们首先是舆论机关。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绝不能丝毫改变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改变这一工作同党的关系。所以，不加分析地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提法照搬到新闻事业上来，是不行的。

新闻事业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好不好？光彩不光彩？我认为应当明确地回答：好得很，光彩得很！我们党和政府经常要以不同的方式向全国人民，以至向全世界发表重要的主张，这就需要经过种种渠道，包括委托某些部门来表达。新闻部门，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和部门。代表党来发言，怎么不光彩呢？只有思想上、政治上水平很高，才能够胜任嘛！想当年，解放初期，多少人当不上解放军战士，当不上共产党员，他们出于羡慕，就穿上干部服，表明自己向往人民解放军和共产

党。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形象破坏了，使得有些人甚至觉得共产党的牌子不太光彩了。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经过拨乱反正，党的威信重新提高了。现在国内广大人民和国外各方面人士之所以愿意看我们的报纸，愿意收听我们的广播，首先是因为想要及时地知道我们党中央讲些什么。所以，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威信，首先来自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威信，来自党的新闻部门忠实地传播中央的声音。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能忠实地传播中央的声音，而是偏离甚至背离中央的主张，那么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怎么可能有今天这么高的威信呢？这种情况，难道不是生动地说明了党的新闻事业同党的关系吗？

这种情况，同时又说明了我国新闻事业同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的差别。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在新闻的写作、编辑、传播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当然必须认真学习，但是它们的资产阶级新闻工作的根本方针，就不能学，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听说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企业可以有个体和个体联营的，新闻也可以照样来办，为什么我们国家不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呢？我说这要作一点政治分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一般不大受欢迎，所以办报往往都以“非官方色彩”的“民办”面目出现。其实不少所谓“民办”，就是报团办的，而报团后边是财团。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报就是人民的报纸，并且依靠全党、依靠人民办报，这就使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有可能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离开这条道路，以为只有象个体经营或同人经营那样办报才算“民主”，那就很不恰当了。至于说到不同的声音，要看是在什么问题上的不同的声音。如果是在国家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问题上，那么，如前所说，我们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大家的声音相同是必然的和

自然的，硬要发表“不同”的声音就反而是不自然的了。如果是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大家的声音自然有许多不同，现在的报纸刊物上就经常发表这些不同的声音，许多好声音还受到党的鼓励和人民的欢迎。如果现在发表得还不够，那就希望大家更多地发表，这也就是我国人民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的一个表现。

听说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比我们多，政治制度比我们好。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是代表少数剥削者利益的人统治的，我们的国家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的代表管理的。这两种制度哪一种更民主，哪一种更好，难道还不清楚吗？当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做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因为有些事既是人民的需要，也是资本家阶级的需要。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党和政府也会办一些错事，这或者是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是由于党和政府里混进了一些坏人。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整个问题的实质。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里不同的声音更多，所以更“民主”。这种说法也缺少深入的分析。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着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而剥削阶级又分为利益不同的阶层和集团，这样，他们的声音自然不可能相同。实际上，就是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不同的声音一般也不能充分发表出来，因为除了少数进步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以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以至力量比较小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都很难拥有大量发行的报纸和出版机关，更不必说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等的了。

同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相反，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我们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党的新闻事业完全能够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呼声。作为党的代言人和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这是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不同，必须划清根本界限来说的。至于说到我们党和国家自身的曲折发展的历史道路，那就还要看到，如果中央路线正确，事情好办；而如果中央路线不正确，比如在

“文化大革命”中，事情就复杂了，就不能简单地作为中央喉舌和反映人民呼声是完全一致的了。但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例外情况。而且即使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仍然只能依靠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而不可能靠别的什么。这一点，不是也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吗？

还应当看到，新闻事业要能够当好党的喉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的声音并不是每天都有的。所谓直接的声音，除了我们的领导人代表党和国家的发言、讲话之外，还有文件。以文件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六年多来，中央正式发布的，最多的一年只有五十几号，去年二十几号；国务院的多一点，去年也只有一百七十几号，其中还包括某些只是针对个别问题的具体规定。中央的直接的声音不是很多，而新闻报道却必须每日甚至每时向人民讲话，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一定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工作的自主性。只有这样，才能不间断地用大量言论和事实，来强有力地宣传中央的主张。所以，新闻事业作为党的喉舌，同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根本上也是完全一致的。认为强调作党的喉舌就会束缚新闻界的积极性，是不对的。当然，在具体工作中，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矛盾。比如党委干涉过多，批评过重，或者新闻工作者违犯了纪律，等等。但是这些矛盾，只能通过改善具体工作的指导来解决，而不应当因此就要求在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松绑”。

在新闻事业要当好党的喉舌的前提下，我们需要的是大力发扬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不是束缚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不是要求各种报纸、广播、电视的面目完全雷同。各种新闻工具，报纸、电台、通讯社，应当互相协调，加强合作和分工。一些重大新闻、重要文件由新华社统一发布；同时，又应当各自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各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重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面貌。(对仲勋同志，不可能一致，也不要求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驳“舆论一律”》，那是在批胡风的时候写的。那时把胡风同志当作反革命分子，这个判断错了，中央已经为胡风同志平反。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社会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的那些道理，还是讲得好的，至今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和领会。不过他在这里所说的不一律，主要是指人民内部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这样一种情况，而没有说到角度、重点以至风格、面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很不相同，不但不需要一方克服另一方，而且恰恰应当大大地加以丰富和发展。

第二，新闻工作的任务问题

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新闻工作的任务。党的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和言论，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把人民的各方面的意见和活动，及时地、准确地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这里说的是大量的，不是小量的；是生动的，不是枯燥的；是及时的、准确的，而不是不及时的和不准确的。看一个新闻单位的工作好不好，就看它的这个主要任务完成得好不好。完成得好，工作是正确的；没有完成或完成得不大好，工作就肯定是发生了偏差。

我们党赋予新闻界的任务，是围绕着一个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为唤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在当前一个历史时期，在国内，是同心同德干四化；在国际，是加强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和合作。(万里同志：还有同心同德，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大家还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建党时没有报纸，更没有广播，有一个刊物叫做《向

导》。《新青年》晚期也曾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这里就不说了。《向导》这个名字很好，是带路的嘛！我们党的第一个通讯社，叫做“红色中华”，这个名字也很好，表示了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中华，而不是什么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中国！你看，一个《向导》，一个“红色中华”，鲜明地表达了我们党的新闻战线的性质、目的和任务。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就是在当年那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之下，以如此宏大的革命气魄，走上了历史舞台。完全应当这样说，从我们党成立的第一天起，党的新闻战线就同党的其他战线一道，担负起了引导人民群众共同认识中国、改造中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所以说，性质是明确的，目的是明确的，任务也是明确的。

我们新闻战线要担负起这个任务，是不轻松、不容易、不简单的。这不仅是因为提出的要求本身就很不简单，也不仅是因为前面所说的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的声音并不很多；而且还因为，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我们党的主张，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开始时有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怀疑，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一个主张接受了，尔后由于环境变化，党提出了新的主张，又会产生新的不理解 and 怀疑。再加上还有极少数人进行曲解和反对，情况就会更加复杂。因此，我们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善于宣传解释，才能使广大的人们信服。我们既要在人民之中，又要在人民之前。任何站在人民之上施加压力的办法都是极端荒谬和不允许的。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文化大革命”多少年，专门依靠辱骂和恐吓，依靠大话、空话和套话，依靠压人、整人、打棍子，管什么用？！那时居然还要强制大家唱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简直是笑话！当然，“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什么样的宣传手法都不可能说服人。但是，即令本身是正确的东西，要能够很好地说服人，使人理解，也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也需要付出艰苦劳动，并且要有高度的思想性，有高度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比如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正确政策见了效，特别是农村生产责任制见了效，许多外国朋友是佩服的。但是他们往往没有真正理解，不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向我们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个怎样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其他形式，使人们易于理解的问题。可见要说服人，确实很不简单。

除以上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主张，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往往还会遇到种种阻力和干扰。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改革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出现了几股不正之风。这些不正之风，不是搞活经济而是搞乱经济，不是促进改革而是破坏改革。（万里同志：不是为了国家富裕、人民富裕，而是为了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以权谋私。）这就要依靠我们的新闻界、舆论界，大声疾呼，揭露、批评。不是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大家都来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分清是非，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嘛！

总之，我们说党的新闻事业要作为党的喉舌，并不是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只能照抄照转中央已经说过的话。而是说，只要合乎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新闻工作者就有自由按照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正确理解，进行新闻报道和发表意见的广阔天地，就可以而且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很好的精神状态。没有勤奋精神不行，没有拼搏精神不行，没有进取精神不行，没有不断地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寻求真理、汲取新知，不断地磨练和提高自己本领的精神不行。请新闻界同志们想一想我国新闻史上的杰出代表邹韬奋吧。他毕生勤奋刻苦，对自己从不满足，总是“自恨学识浅陋，且做且学”，并且总是“聚精会神”地工作。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为了争取民主、传播真理，真是呕心沥血！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他平生最感欣慰的，就是“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为一体了”。

大家还记得鲁迅的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这是他的自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孺子牛”精神的一个很好的说明。社会所给予鲁迅的物质待遇是太少太少了，而他所贡献于社会的却大得不可比拟！鲁迅死得那样早，这同他在物质非薄的条件下过于劳瘁，显然很有关系。想到这些，我们的同志今天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和困难，就应当更加正确地对待。在我们队伍中，荣誉应当属于一切为人民事业努力拚搏，勇于献身的同志。而任何不负责任，不求进取，得过且过，甘于落后的精神状态，都不应有它们的地位。

第三，办好新闻的基本要求问题

这也是新闻界长期议论的一个问题。按照传统的和公认的意见，既然叫做新闻，那么无论什么社会条件下的新闻事业都必须具备若干要素，即所谓几个“性”，形成为带规律性的新闻规则。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新闻事业，大体上也把这些规则继承下来了。对这几个“性”，应当怎么看呢？

第一是真实性。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当然要讲真实，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和说明事物。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力戒虚夸，认为任何虚夸作风都是同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不相容的。但是究竟什么叫真实，从来就有争论。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我们认为，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方面是光明的，同时也存在着阴暗面，我们并不忽视阴暗面，但那究竟是次要的。我们这样的大国，今天如果有谁专门搜集阴暗面，每天在报上登一百条，容易得很！如果把这一百条集中到一张报纸上，可以整整覆盖四个版面，搞成一幅彻头彻尾的阴暗图画。虽然其中每一条可能都是真实的，但如果谁要说这就是代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画面，那就不真实了。当然，如果反过来硬要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到处都是光明面，实在好得不得

了，一点阴暗面也没有，一条缺点也没有，那也不真实。所以，去年我们就同新闻界的同志们说过，报纸上，大体应当是八分讲成绩、讲光明、搞表扬，二分讲缺点、讲阴暗面、搞批评。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整党，又合乎今天我们社会的实际。

这个问题，曾经是我们同一些作家长期没有争论清楚的问题。一些作家总是说他写的那些现象都是真实的呀，但是他们往往没有想到，究竟有没有在总体上把握了社会的真实，能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去创造新的生活？如果一位作家的作品，把我们的社会和我们人民写得毫无希望，毫无前途，能够说它是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和负起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吗？我想在这里引用马克思早年为批评当时普鲁士君主政府的书报检查令所说的一段话：“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在这里是批评普鲁士官方要求全国书报只准用一种色彩，即官方的色彩。我们现在没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官方，我们党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也就是要求多种色彩，而欢乐、光明的新生活 and 为欢乐、光明的新生活而进行斗争的色彩，当然是明朗、鲜艳而丰富的。我们要求讲光明面和阴暗面，而讲阴暗面的目的只能是教育人民起来消灭它，我们也有信心消灭它，因而我们的笔墨就在讲阴暗面的时候也不应当是黑色的。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报道，我们新闻界有些人觉得人家似乎比我们更加真实，更加敢于暴露。我看不能这样说。比如我国政局空前稳定，但是西方报纸、电台却经常要捕风捉影地造点谣，说什么中国政局如何“不稳”啦，什么“保守派”要推翻“务实派”啦，什么军队不听中央的啦，等等。这难道也是真实的？有时它们在显著地位发表一条不真实的消息，事后没法隐瞒了，却只在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发一个极小的更正。至于评论里所散布的偏见和谎言，那就连更正也没有。这就是他们的所谓公正。我

们的新闻工作中的大量的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西方的新闻界是根本不存在的。说是敢于暴露，这也要看什么题目。西方国家同样是严格保密的，谁要是泄露了，同样要追究责任。所以，认为西方新闻比我们有更大的“真实性”，这并不符合事实。

有关真实性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凡属涉及人的功过是非的问题，一定要格外慎重，反复核实，不要抢时间。前几年曾经说过，只要事实基本弄清就可以了。现在看来这个话不很准确，最好不用这种说法。还是应当强调核实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特别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个人，一定要遵照中央有关规定办理。因为报纸一登，等于向全国甚至全世界通报，比党内通报厉害得多，比“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影响大得多，一定要慎之又慎，决不能感情用事。“文化大革命”中先打倒、后定性的做法，制造了多少冤案？这方面的教训是够多够严重的了，我们不应当忘记。

第二是时间性。要不要时间性？当然要，而且我认为应当十分重视时效，讲求时效。现在我们许多事做得太慢，工作效率很低。小平同志很欣赏“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话，大概也是有感而发吧。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人习惯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缺少争分夺秒的时间观念。这是落后的自然经济和封闭停滞状态的一种反映。这对我们今天的事业来说，仍然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你看我们许多方面社会生活的节奏，都是慢吞吞的，开会、办事以至于走路，都是如此。我们大家背负的是现代化建设任务，但一些同志迈的是老牛拉破车的步伐，不懂得讲求时效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新闻工作，特别是对外宣传，不讲求时效的事很不少。“新闻”不新，成了明日黄花，远远落在人家后面，就会大大削弱以至丧失宣传的效果。

新闻工作应当讲求时效，但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要无条件地追求时效。（习仲勋同志：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急急忙忙。该今天发表的今天发表，该明天发表的明天发表，不能抢先。）不能把

讲求时效同匆匆忙忙混淆起来。某些重要新闻、重大事件，不考虑成熟，必须请示的也不请示，就急急忙忙发表，这往往会使党的威信遭受损失。反过来说，有些大事暂时不发表，反而有利。比如《邓小平文选》，其中有些很重要的讲话就是几年以前讲的，当时没有发表，后来发表出来，还不是大新闻？所以，讲求时效与急急忙忙不是一回事，重大新闻的时间性要服从于政治任务。该快则快，该慢则慢，该压则压，有些还要注意内外有别。如果把时间性强调过分，甚至认为一切别的东西都要服从这一条，连纪律都可以不顾，那就搞颠倒了，就会犯错误。

第三是知识性、趣味性。搞四化需要丰富多彩的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因此我主张报刊多介绍一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历史知识、地理知识、文学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等等。前不久有个电视剧《洛神赋》，不算坏，但是观众在知识性方面，就挑出了好几个毛病。比如曹植是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怎么成了次子？《洛神赋》是曹植在曹操死后才写的，曹操怎么能读到了？中国古人认为人的心脏才是思想器官，怎么能够让曹操拍脑袋说他脑袋不灵了呢？其实我们的许多作品，不只是文艺作品，还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东西，以及新闻报道方面的一些东西，由于缺乏知识出纰漏的，比比皆是，确实应当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没有知识性不行，没有趣味性也不行。你写的东西毫无吸引力，没人爱看，怎么行呢？当然，讲知识性、趣味性，总要有一个目的，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尤其不应当容许假借所谓知识性、趣味性来宣扬封建迷信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思想。例如最近不少城市不象样子的小报就泛滥成灾，胡启立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几个事例。对这种东西如果不加制止，就会毒害广大青少年的身心，涣散劳动人民的斗志！

这里顺便说一下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因为这个本来早已澄清的问题现在被一些同志弄得混乱了。大家知道，“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

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这是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三年九月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得到了全会一致同意的。其后经历了一个过程，到一九八四年五月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赵紫阳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全文引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的两段话。一段是说：“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去年举行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曾经指出思想文化领域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随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又进一步着重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另一段是说：“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以及党和政府规定的正确政策，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刹住了前一时极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我们就及时予以纠正。”请同志们注意，报告的这两段话，是经过中央常委反复推敲过的。这里有这样几点：第一，反对和克服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这个口号，中央一直是明确地加以坚持的，从来没有放弃过。第二，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央全会一致同意的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第三，在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上的缺点，也讲清楚了，而且讲得很有分寸，就是“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某些不恰当的作法”。那么这里的“我们”是指谁呢？就是指我们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嘛！紫阳同志的报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九八四年会议上一致通过的，总可以算是定论了吧。的确，党中央也曾考虑，“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

“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就当前说，在思想战线上，对于前面说到的那些有害的小报，难道不需要查一查？难道能听任它们去毒害青少年的身心，涣散劳动人民的斗志？（杨尚昆同志：现在有种空气，好象反对精神污染根本是错误的。）过去有一段时间，某些地方、某些同志把这个问题扩大化了，甚至查到群众的生活、衣着上去等等，这是错误的，但这是一些人的误解和曲解，早已纠正了。至于思想战线包括新闻战线，可不能搞那些不象样子的小报之类的东西！出现了那些东西，难道不应当抵制和反对？大家都要来抵制和反对！现在有几个省，那种小报特别多，一直影响到火车上的乘客。（邓力群同志：有些地方是大报办小报，小报养大报。）怎么能这样搞呢？这类问题，主要要从领导思想上，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局和某些报社的工作上去解决问题，不要又搞到社会上，搞到群众中去。总之，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党中央和人民已有定论，每个党员都不能离开这个定论自行其是！

一个真实性，一个时间性，一个知识性和趣味性，这些就是对于新闻工作的要求。但是我们党对新闻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要有鲜明的正确立场，要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用了“也就是”三个字，表明“党的立场”同“人民大众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为了在一切新闻工作中坚持我们的正确立场，为了使我们的^{一切}言论和报道能够真正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不但同党性和党的立场没有矛盾，而且正是党性的要

求。没有科学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者党性不完全。因此，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有把握的事情才说，一时没有弄清的，弄清之后再来说。有时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什么大事，我们一下子搞不清，不了解内幕，而别的国家又说话了，怎么办呢？可以先客观报道，随着真相判明的程度，再逐渐增加倾向性，这也应当算是有鲜明的立场。总之，坚持鲜明的正确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是最根本的要求。

最后一点，队伍问题

事是人做的，人和事有密切关系，所以历来论事的时候就要谈人，谈干部，谈领导核心。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大约三十万人的新闻队伍。总的来讲，这支队伍是好的。当然，不只是新闻战线，我们各条战线的干部几年来在工作上都有很大的贡献，在思想政治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作风有了明显好转或者至少开始有了好转，年龄和知识结构有了很大改善，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也大大加强了。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干部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干部队伍的问题还很多。还要付出极大的精力，采取更多的措施，花费必要的时间，才能够使我们的干部队伍状况有更多的改进，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干部问题上，当然，某些部门加点人，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各部门的人是多了而不是少了。即使那些需要加人的地方，也还有个更新换代的问题。有些干部不称职，而别的岗位对他们更适合，要下决心帮他们调换一下。同时还要看到，就我们干部队伍的基本状况来说，最主要、最普遍、最大量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要以极大的努力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这就要求我们每个部门的领导同志，都要认真考虑这个最主

要的问题。不只是一要使素质有所提高，而是应当积极努力，求得大的提高啊！现在有些部门虽然也讲到这个问题，但是就全盘情况来看，措施不得力，效果不明显。那么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来提高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呢？我认为，一要增强党性，二要增强业务能力，三要增强同志之间的团结。

增强党性，就是我们全党同志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服务。过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现在就要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积极拚搏，勤奋工作。对我们每一个党员来说，究竟是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到为国家富强、为人民富裕而奋斗上面？还是千方百计地只为个人利益奋斗，为小单位增加收入？这可是个大问题。共产党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党内究竟应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什么？整党当中必须鲜明地提出来！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鲜明的语言不行。当然，讲增强党性，不是要重复过去打棍子那一套。但是不打棍子，不等于该批评的也不批评，该处分的也不处分。

增强业务能力，就是要提倡学习，提高本领，并且赏罚分明。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有名的一批记者，现在应当继续努力，培养和造就新的更多的优秀记者。要重视人才，找到适当办法来检验和评比新闻干部的业务能力。要赏罚分明，奖励一切在思想政治方面、知识方面和技巧方面有优异表现和成绩的同志。

我想着重讲一下增强团结，这可能是我们新闻战线以至整个思想战线都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因此要多讲几句。现在发生一个问题：旧的疙瘩没有完全解开，是不是又在增加新的疙瘩呢？过去有句老话：“文人相轻”。我现在不想用这个话，但我认为这个话确实值得警惕。我还想说，有些同志的问题，首先不在“相轻”，而在“自轻”。自轻的结果就可能自损，自己损了自己。几年以前，有位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内历来就有这么一种人，不琢磨

事，专门琢磨人。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人呀？我就很佩服巴金同志，他今年八十一岁了，经常讲作家要集中精力搞创作。如果大家都这样办，流言蜚语、闲言碎语就没有市场了，团结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我觉得他这个话确实很有道理。

当然，我们讲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在党的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同志有了缺点错误怎么办呢？同他本人去谈，互相交心嘛。现在中央号召同心同德干四化，我们只有坚持团结才能站得住脚，才能有利于党的事业。谁都会有缺点，谁都会犯错误，没有什么一贯和绝对正确的单位和个人。要团结起来向前看！

最后讲几句结束的话。我们党已经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了宏伟的奋斗纲领，这就是翻两番，搞四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面前进的，但是我们的成就将比前人大大地向前跨进一步。可以断言，只要我们真正达到了这个目的，对全世界的影响将会十分巨大。我们必须奋发图强，尽一切力量达到这个目的。新闻战线上的同志们，应当在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竞争当中，发挥出自己必须发挥也能够发挥的光荣作用。这就是我对新闻战线同志们的希望。

（总第57期 1985年4月14日）

胡耀邦同志关于 当前文艺工作一些问题的讲话

（根据记录整理）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

第一个问题，讲讲为什么要开今天这个会。

前天看到一份简报，说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几位文艺界的同志提了个意见，指名要大会的同志向小平同志和我反映，希望小平同志或者我抓抓文艺问题，意思就是要我们讲讲话。其实近年来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讲过好几次话。一九七九年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向第四次文代会致祝词，一九八一年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讲话和一九八三年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思想战线不要搞精神污染，也都是对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讲的。小平同志去年八月已经满了八十岁啦，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或者特别重大的问题，就不要也不应该麻烦他老人家出台了。至于说我，在文艺问题上讲话的次数比小平同志还多一点，如果严格要求，还应当讲得更多一点，中央书记处是在第一线嘛。可是，要我多讲也确有困难。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是情况不大熟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和演出我都没看，也实在腾不出更多的精力来过问这方面的事情。第二，我对文艺这一行确实不甚懂得，讲不出多少有水平的东西。第三，对讲话确实有点顾虑。现在我们中央同志一讲话，风很大。这么讲一点问题，有些同志就会说“哎哟，解放

了，解放了，好办了”；那么讲一点问题，有些同志又会说“哎哟，不得了，收了，收了，形势不好”。当然现在比五、六年以前好得多了，但是这么一种刮风的情况确有，所以我们确实不大敢讲。不过，这次既然有同志提了意见，乘着人代会开会，把大家请到一起，就便讲一讲，也是个机会，而且形式比较轻松一点，即使讲不那么周全，通通气也好。明天我就要出国访问了，所以中央书记处几位同志商量，就在今天和同志们就一些问题比较敞开地谈一谈。原来我想多请一点党内、党外的作家同志来，但今天来的绝大多数是文化部门和文艺界的领导干部，这样就同我原来准备讲话的角度有点对不上号。这就是今天开这个会的缘起。

第二个问题，讲讲我们的政策变了没有？

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有时甚至在相当一部分同志中间往往有一种议论，说是政策又变了。这一点我想了一下：究竟我们的政策这几年在什么问题上变？在什么问题上没有变？变是什么性质的变？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有变化是应当的。历史在前进，事物在发展，政策、办法也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如果同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比，现在不晓得变了多少！这是一种前进中的变化。越变越完善，越变越符合客观情况，越变越适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这样的变，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变。当然，有一种变是不大好的，就是来回变。刚刚前进了，又倒回去，翻来覆去，就会造成损失。那么这几年我们这样来回变的事情有没有，多不多？在我看来，在重大决策上，在大的方针政策上，走回头路，往后变回去的情况，还没有。至于在具体问题上，在某些具体方针政策上，来回变了一下的，可能有一些，这五、六年可能有那么七、八件，十来件。这个当然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缺点，事先考虑不细密嘛。但是如果一定要说我们的重大决策也有

变回去的，我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我们在文艺工作方面的重大决策来回变，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就需要同文艺界的同志们一起来摆一摆事实，讲清楚。我想了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一九七九年小平同志在文代会上致祝词以来，在文艺工作方面，在三个重大决策问题上，我们是一贯的，没有变的。

第一，我们没有哪一年没有充分肯定文艺界的成绩，说明它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这个思想，没有来回变。一般来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绝大多数部门，绝大多数地区，成绩总是主要的，主流总是好的。但在错误路线下就不一定了，在那种情况下恐怕大多数都要跟着错，只是错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所以中央反复说过，陈云同志还着重讲过，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许多同志犯了错误，必须把“文化大革命”这个因素算进去，不算进去就没有说服力，不公平。几年来，我们一贯地充分肯定文艺界的成绩和主流，肯定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同时也指出了缺点和不足；而在讲缺点和不足的时候，一般地总是讲得比较婉转，比较留有余地。有些同志说，我们指出缺点和不足，往往轻描淡写，我想也可以这么说。这是因为考虑到，文艺是个复杂的精神劳动的领域，对缺点讲得比较婉转，留的余地比较大，较为有利。第一，这就可以比较充分地照顾到文艺工作的艰巨性、困难性、复杂性。第二，这还可以比较充分地照顾到特定历史条件给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带来的消极影响。一个同志由于感染得了病，你仅仅是批评他一通？你不安慰安慰他？因为以上这两条，就还可以有第三条，就是我们的批评能够为多数同志理解和接受，能够得到人们的同情，而不致脱离群众。所以，在讲缺点和不足的时候，适当留有余地，讲得婉转一些，是必要的、正确的。当然，如果讲得太婉转，留的余地太大，也确有不利益之处，就是往往会把尖锐的问题弄得模糊起来，不鲜明、不尖锐。这里用得着毛主席讲的话，钝刀子割肉，往往割不好。这样也就不容易使更多的人警觉起来、谨慎起来，甚至

会造成某些人的错觉，好象没什么，无所谓，结果也会达不到批评和帮助的目的。

第二，我们经常强调要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而不要对文艺过多干涉。这个思想，我们没有来回变。这就联系到前不久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胡启立同志在祝词中说到“创作自由”，这是不是变了呢？没有变嘛，宪法上就有创作自由这一条。应当说，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对文代会的祝词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个精神。小平同志援引列宁的话说：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并且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一次，胡启立同志在“创作自由”问题上略为展开一点，多说了几句，于是社会上就刮了一股风，说这是什么新提法，是又一次解放。创作自由，这不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主张吗？（胡启立同志，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提出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多年来我们一直提倡创作自由，前后一致，没有来回变。

第三，对文艺界、思想界同志们在创作和工作上发生的这样那样的偏差和错误，不要戴政治帽子、打棍子。当然，如果触犯刑律，任何人都要由司法机关来处理；但是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工作上的偏差、错误甚至严重错误，就给戴上政治帽子、打棍子，打成右派，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思想，我们也没有来回变。我在一九八〇年剧本创作座谈会上非常鲜明地提了这个问题，当场热烈鼓掌，有好几位同志还流了泪。六年来的事实证明了呢？我认为是证明了。有哪位作家被打成右派，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没有嘛！至于批评，文艺要发展就不能没有批评。就在一九八〇年我就讲过，要发展文艺评论。文艺评论这个

旗帜我们不要丢呀！我们内部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和偏差，不是用打棍子的方法去解决，而是用正常的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这是完全必要的。“文化大革命”把批评变成批斗，变成斗争，不讲道理，那是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歪曲了，是另外一个问题嘛。所以，文艺评论这个旗帜不能丢，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旗帜不能丢。这是保证我们文艺队伍的肌体健康所绝对必需的。应当说这几年对于文艺创作上发生的几次比较大的问题，我们都是有的批评的，而且批评是正确的。在这段时间里，第一个受到批评的是《假如我是真的》那出戏。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批评是站得住脚的，是充分说理的。事实证明，通过那次批评帮助以后，作者进步很快，陆续写了一些很好的剧本。后来是对白桦同志的批评。我认为这个批评也是必要的。可能在批评的方式方法上有某些缺点，但我觉得后来《文艺报》发表的那篇批评文章是站得住脚的，是充分说理的。而且对白桦同志的处理也是好的，他还是作家，还可以发表作品嘛。当然，事情也还会有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几年来某些地方在对待一些作家的缺点和错误时，也有考虑不周、说理不够的问题。但只要我们党中央一经发现，就立即帮助那些地方加以纠正。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对文艺界的批评或者对某些创作的批评，总的来说是正常的、健康的。如果完全否定这一点，我觉得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不妥当的。

以上三大条，说明我们在文艺工作的重大政策方针上，没有来回变。对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应当摆事实、讲道理。变就是变，没变就是没变，一切按事实说话。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或者用外交语言来说，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缺乏深思熟虑，他们一听到似乎有点什么新说法，就以为是变了。这个不好。今天我讲这一点，就是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澄清一下。因为事实是驳不倒的，历史是驳不倒的。我觉得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对统一大家的思想，统一文艺界的思想，有好处。不是要你们回去再算这个帐，追究哪个人说过什么。问题说清楚了，就不要再算帐了，

否则又要刮风。希望大家都要实事求是，不要瞎刮风。

第三个问题，希望文艺界的同志 珍惜文学艺术在我们伟大事业中的伟大作用。

文学艺术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作用，我们党历来是很重视的，几十年没有变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讲过，我们的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武器。一九八〇年我还引用了鲁迅的话，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一定要重视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发扬自己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在我们事业中发生的作用，可不能低估呀！小平同志说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这四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对于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的要求。在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许多优良的精神素质。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我们党建立后的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又培育和发展的许多新的优良的精神素质。这些我们都要十分珍惜，可不能使它们遭到败坏呀！世界上有好几个民族，精神素质是非常良好的，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华民族。我们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加上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发展和培育出来的优良的精神素质，我们都要十分珍惜。所以，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要建设两大文明，一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一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我们的思想界，不论文艺界也好，新闻界也好，理论界也好，都应当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程师、设计师，或者说都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全国人民的道德风尚好起来，或者说人人都有理想，人人都讲道德，人人都守纪律，人人都奋发学习，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好办得多。所以，一定不要轻视思想工作，不要轻视精神文明建设。不久前，我同一些同志酝酿过，感到可能明年的十二届五中全会需要专门讨论通过一个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这件事今年和明年上半年大约来不及，

因为要忙于改革和整党，而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究竟如何搞，也还需要认真做些调查研究。如果明年五中全会能搞出这么一个决定来，搞出一个充分说理的，有分析、有方针、有政策、有办法的指导文件，再经过五、六年的贯彻实施，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肯定能够取得巨大的进步，情况肯定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所以，先同我们所有同志打个招呼，在我们的脑子里，不能让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观念淡漠下来。许多同志到苏联考察后回来说，苏联许多大的城市都有大的塑像，叫“祖国——母亲”，几乎每一个乡村都有纪念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的塑像或纪念碑，青年人结婚都拿着鲜花到那里去，可见苏联的爱国主义还是搞得好的。我们许多同志也去过朝鲜，人家的青少年教育也搞得比我们好。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任务，要求我们文艺界的同志，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都不要忘记你们是站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荣的神圣的岗位上，担负着十分重大的责任。有了这种光荣感和责任感，具体工作就容易做好了。这种光荣感和责任感体现在具体工作上的要求，我认为无非是这么两方面：

第一、文艺界的同志在进行创作时，都要时刻想到为我们民族和人民当前的最大利益服务。当前最大的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我们的文艺工作就要紧密地结合这个最大利益并为之服务，就要团结人民、鼓舞人民特别是鼓舞青少年，为实现整个民族和人民的这个最大利益而发愤图强，积极向上，排除万难，奋斗不息。我们不应当限制每一个作家的创作自由，但是我们同时希望每个作家都要想到这个最大利益，也就是想到这个最大的主题。完全忘记这个最大的主题，对这个最大的主题没有感情，我觉得不对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有些同志讲，文艺界产生的好东西很多，但也确有一部分作品的质量不高，格调太低。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干四个现代化，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富裕而奋斗的壮丽图景，在我们文艺创作

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今天发给大家几个文件，其中一个就是我国在美国的留学生集体写给中央的信。他们在信中说，国内送到美国去放映的影片，一般思想格调不高。他们最爱看的是国庆节阅兵、《风雨下钟山》、《西安事变》、《少帅传奇》这类充满革命和爱国激情的片子，宁可整夜不睡也要看，可惜这类片子太少了。很多华人、华侨也有类似的意见和要求。现在世界上许多严肃的评论家都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本世纪内世界性的一件大事，可是我们有些人好象觉得四化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思路行吗？（胡启立同志：不少东西是琐琐碎碎，哭哭涕涕，儿女情长，家庭琐事。）有人说，现在有些文艺作品，内容无非是谈情说爱，插科打诨，兴妖弄神。有点谈情说爱我也赞成，但是如果都是这个，那怎么行？一九八〇年我就讲过这个话。后来我那篇《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的讲话，还专门引了匈牙利裴多菲的四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人家为了民族独立，一个爱情，一个生命，两个东西都可以牺牲，什么永恒的爱情主题压倒一切呀？这个不行嘛！讲到这里，顺便还要补充一句：历史题材的作品不能没有，而且应当成为整个文艺作品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类作品，同样也要力求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技巧，并且也不能和现实生活完全脱节。总之，题材多样，作家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总目标，不要忘记这个最大的主题。每个热情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脑子里都要想到人民现在在干什么，时代要求我们干什么，忘记这个东西可不行！文艺家要提高群众的精神境界，自己的精神境界就不能太低。自己太低怎么去提高人家呢？对于那些格调不象话的东西要进行说理的批评。现在有些同志，我不是单讲文艺界的同志，各界都有那么一些同志，只批评下级不批评同级，只批评别人不批评自己，更不解剖自己。我们应当把提高大家同解剖自己统一起来。要提高人家的精神境界，首先要提高自

己的精神境界。(宋任穷同志：要讲爱国主义。周信芳的儿子周少麟为了他爸爸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从美国回到上海。人家问他，“文化大革命”把你家里搞得那么苦，把你家里东西都搞掉了，你为什么还回去？他说，我还是要回去。我的家里有损失，国家的损失比我不晓得大多少，人家纪念我爸爸，我一定要回去。这件事，使人很感动。)这种例子多了。我曾经向青年团建议，把这些例子搜集起来，内部出个刊物，结果现在登的不是这方面的内容。青年团的同志来了没有？你们的那个内部刊物又是成了谈情说爱，离奇古怪。青年团要教育青年！

第二，一定要密切注意保护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使他们不受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我们的社会环境并不是一尘不染，还有旧社会的遗毒。再加上现在实行开放政策，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会进来一些。这种腐朽思想是“病菌”，会传染疾病，而且可能繁殖得很快。我们当然不能因噎废食，重新闭关锁国，但是对旧社会的遗毒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一定要经常保持警惕，防止和反对它们的侵蚀。这个方针，我们党中央历来没有放弃，没有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更是经常讲的。要向同志们讲清楚，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是一种传染病，要认真警惕。有的同志说，这个算啥，何必大惊小怪？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丧失警惕会带来严重的恶果。当然，哪些东西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哪些不是，需要细心地加以鉴别，并且用妥善办法加以克服，而不要用粗暴的方法乱斗一气，更不要扩大化。这就要求我们文艺战线上的领导干部，一定要细心地对待这个问题。最近出了好几件事情。一件是参加国际电影节，我们好的东西不拿去比赛，不大好的东西反倒拿去比赛。一件是外国电影回顾展，其中有些就不是什么谈情说爱，而是乌七八糟的东西。(宋任穷同志：完全是淫秽的东西。)主管机关也不看，这就是失职！诲淫诲盗的东西要禁止。还有那些内容很不健康的小报一下子出了几千种。还有黄色

的和其他低级趣味录像带。(宋任穷同志：有些小报的纸张很好，是大报给的，大报办小报，小报养大报，这是很错误的。)这些问题各级党委不管？文艺界的同志不管？新闻单位不管？现在有的同志有种想法，管了犯错误怎么办，由上面管吧。这种精神状态行吗？要讲政治责任心，讲主动精神，讲独立的鉴别能力。在党里面吃了几十年饭，这么点独立的鉴别能力都没有？还有，某些同志是不是有个想法，以为只有写点低级趣味的东西才能有读者，才能迎合读者的兴趣，我认为应当破一破这种糊涂观点。人们有多种多样的兴趣，不同的境界就会有不同的兴趣。在有些人那里，赌钱、打牌甚至抽鸦片才是兴趣，难道你也去迎合？所以，不是取消趣味性，而是要看是什么趣味，并且要加以引导。不能搞迁就，不能搞低级趣味，不要把某些落后的思想当作是正确的。(胡启立同志：有的把外国垃圾箱里的东西捡来了，拿给我们的青年。)我们讲学习外国，是讲学习它的先进经验，现在有的地方却盲目引进，什么“红包”等等都引进。花点脑筋想一想嘛！所有国家的管理经验都有两个方面，先进的和落后的，我们有些同志却不加分析，这不好。如果引导青年人打架，一下就打起来了。(宋任穷同志：五十年代拍了个电影《飞刀华》，小孩子就纷纷学飞刀，用来打架。)我们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要忘记引导群众前进的责任。只要我们坚持积极引导，正面的积极的东西多起来了，消极的东西就会逐渐少下去。我们的电视，我主张宁愿多播一些体育比赛，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定不要播。你说喜欢体育比赛的群众多，还是喜欢时装表演的群众多？我们有的同志的所谓“群众观点”是很狭窄的，甚至是很成问题的，只反映了某些落后群众的观点。道德可以培养，兴趣也可以培养，要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兴趣，提高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抵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同时还要采取各种适当措施，包括行政和法律的手段，取缔毒害人们身心健康的报纸、刊物和录像带等等。这是一件大事，是为整个民族的振兴和发展着想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具体工作的掌握上，究竟哪些东西才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需要仔细加以鉴别。为此，我建议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和宣传部门，要注意划清一系列政策界限。我们的工作要越做越细，不要一哄而起。无论对于思想问题，道德问题，兴趣爱好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社会现象，都要加以分析，加以引导，不能自流，不能任其自然而然地发展，而要把党的领导因素加上，并且发挥强大的作用，去感染，去潜移默化。文艺有个作用叫潜移默化。可以向好的方面潜移默化，也可以向坏的方面潜移默化，这就叫作染于苍者苍，染于赤者赤，或者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就要求我们发挥应有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先进的、正确的、健康的思想观点和感情的潜移默化作用和感染作用。（胡启立同志：这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作为国策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一个保证。如果对外开放以后，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根本抵制不住，弄得青少年把西方的东西不分好坏，统统接受下来，好的东西倒没有学来，到时候肯定会有人出来说：开放政策错了。这是对我们党是否成熟的考验。坚持开放政策，同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和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我们党成熟的标志。）

第四个问题，讲一讲文艺队伍、 文艺部门要不要改革。

文艺部门进行改革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从现在大家议论纷纷，或者说议论比较多这种情况来看，似乎有些同志很担心改革搞不好，有些同志甚至说文艺战线情况特殊，是不是不要改革。我的想法，不管哪个部门，都要搞适合自己情况的改革。小平同志讲，改革是我国的又一次革命。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本世纪有改革，下个世纪也有改革，所有的部门都有改革。不但经济、科技、教育要改革，我们的外事工作这几年也有很大的调整，我

们的政法工作有些也要改革。在当今世界上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改革，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个大队伍，有百万大军，从总体来说，是一支很好的队伍，是一支完全可以信赖的队伍，这个要肯定，但目前这种工作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少文艺团体反映，广大人民群众需要他们去表演，文艺团体的许多同志也愿意到群众里面去，可就是走不出去，吃大锅饭的情况严重。还有，文艺工作者的物质待遇一般偏低，又不能只靠国家加钱，不打破这种局面也是不行的。我们承认文艺工作和文艺部门有特殊性，但无论怎么特殊，文艺部门总是从事精神生产的生产部门，文艺工作者都是劳动者，都要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服务，就这些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多大的特殊性。既然是生产部门，就要讲究效益，也得要搞责任制，也得要搞按劳付酬，奖勤罚懒，高质量高报酬。所有这些方针都要讨论清楚，统一思想。怎么改革法，需要文艺界的同志们坐下来提方案，但有几条可以大致确定：

第一条，现在有些文艺团体中不适宜做文艺工作的人相当多，冗员太多，把他们调到其他岗位去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不是说这些同志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不适宜搞文艺工作。（习仲勋同志：这样一搞就有了钱了，现在文艺团体的经费，主要是作为“人头费”花掉了。）这个问题，请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同文化部门配合起来，并且请各单位党委书记亲自负责，下决心解决，不能再拖了，再拖就会把精神状态搞坏了。（习仲勋同志：一定要改，但怎样改，要有章法。）

第二条，必须坚定地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高质量高报酬，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怎样实行，要有具体办法，总之不能老是大家一个等级，有饭大家吃，也不能老是使搞得好的文艺团体和搞得不好的文艺团体一个样。

第三条，为了不降低并且逐步提高创作和演出的质量，我主张建立一种奖金制度，搞奖励基金。哪个文艺团体演了新戏、好

戏，国家发给一定的奖金，以资鼓励，这样就可以不致于完全看票房价值行事了。

科技体制改革的文件已经出来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文件五月份可以定稿，文化部门和文艺团体的改革今年八月份能不能拿出一个东西来，也用中央名义作一个决定。

最后一个问题，讲一讲团结问题。

我上次在讨论新闻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主要讲了有关增强团结的思想方法问题，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文艺界必须建立正常的党的组织生活。我认为现在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党员相互之间有意见，对上边有意见，包括对书记处的同志有意见，对总书记有意见，按照党章规定，都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来，不得打击报复。党员提了意见，应当转给中央的，要很快转上来。这样才能真正开前门，建立正常的党的组织生活。而在建立正常组织生活的同时，对于一切背后的非组织议论都要严禁，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在延安时期，这一条是抓得很紧的。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地方的党的生活，多少年都不正常，结果就使得本来应当和可以在本人所在的党组织中谈的问题，却不在本组织中谈，动不动就直接找上级党委直到中央的某一同志告状。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向上面同志直至中央常委告状，不是不可以，这在党章上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事无巨细，都要找上级党委，上级党委的同志就不胜其烦，而且会造成许多不正常的紧张局面。我的意见，要从建立正常的组织生活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需要，可以考虑就这个问题专门发一个通知，组织部、宣传部还可以专门在文化部门试个点。应当说，我们的拨乱反正，在建立正常的组织生活方面是不够的。在这方面，不少同志认为中央书记处大体还可以，一般能做到有不同意见当面说，同志之间有意见就互相谈心。同志之间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党员之间、同志之间有

意见是正常现象，但是必须强调经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开展健康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三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党内有种不好的做法，就是党内争论、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去找共产国际打官司。这样一直搞到一九三八年王稼祥同志回来之后，情况才有了变化，因为那时斯大林说了中国共产党还是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这种做法总不能说是很正常的吧！缺乏自力更生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党的生活不健全，会产生许多副作用，传播小道消息，非组织议论，不负责任，闹派性。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要专门为这个问题写个决定。党的组织生活不正常，党就还会有危机。所以，要把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作为搞好党风、加强团结、实现党的安定团结的重要一环，认真抓起来。

我主要讲这一点。有些问题本来还想多讲一些事实，因为在座的作家比较少，而多半是文化界的领导同志，所以就没有展开来讲。讲作家里面的问题，最好是当面同他们谈，提倡开诚布公，谈心交心，批评帮助，而不是批评打倒，同时还要注意我们自己的缺点。应当承认，我们许多老共产党员因为过去不干这一行，或者因为基础不够，一般地说领导文艺的工作做得不够好。讲个老实话，有些作家瞧我们不起，不是说只瞧不起各省的同志，还瞧不起中央书记处。对于这一点，我们就不要生气了。瞧我们不起生什么气？如果生气，岂不是只好打击报复了？要看到我们自己知识确实不够。不要忘记加紧学习，严格要求自己。随时严格要求自己，总不会吃亏，即使打倒了可能还有人把你扶起来。

（总第59期 1985年5月20日）

陈云同志指出 应该宣传英雄主义

二月初，中宣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及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发出通知。通知的主要内容是：

最近，陈云同志指出：“期刊和广告用女人、美人的像太多。我们国家应该是宣传英雄主义的。告诉中宣部，要特别严格的掌握这个问题。”耀邦同志看到陈云同志的意见后作了如下批示：“请中宣部要大家严格遵守。”陈云同志和耀邦同志的指示，应即认真贯彻执行。请各地宣传、出版领导部门督促各杂志社、出版社和广告等印制单位，认真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清理，坚决纠正滥登美女像的现象，今后应多宣传英雄模范形象。

（总第7期 1981年2月25日）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重要意见

今年八月十六日，陈云同志在给胡启立同志的信中，提出切实纠正评弹书目和表演中的不健康倾向问题。陈云同志的意见如下：

评弹是江、浙、沪一带的主要曲种。前些年，一些艺人在我们党落实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最近一个时期，虽然加强了演出的管理工作，但看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在设书场的单位很多，除了文化部门，还有一些工会、街道、茶馆、供销社、农村社队和个体户，而工商管理部门只负责向他们收税，对演出内容并不过问。因此，要切实纠正书目和表演不健康的问题，单靠文化部门抓是不够的，必须由江、浙、沪的省委和市委出面来抓才行。可以先召集各个方面开个会，制订书场管理的条例，规定什么样的书不准演，如果演了怎么办。然后派人抽查，发现违反的即照规定处理。我相信只要这样抓上几年，这股歪风是可以刹住的。

（总第39期 1983年10月7日）

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 要看对人民是否有利*

(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

陈 云

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就是好的。这要看它是多数群众喜欢，还是少数群众喜欢；是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还是不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旧社会的跳舞厅、妓院，有人喜欢去。那末，开好呢，还是不开好呢？如果再开出来，还是有人会去的，而且去的人，不一定是资产阶级。但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

书目中那些黄色的内容，过去很能卖钱，现在仍会有人欢迎，但危害是很大的，其害处不下于传播封建思想。所以，调情的、下流的、色情的都要不得，这种传统不能挖掘。群众欢迎，也不能要。这一点绝对不能让步。

传统书目中，有好的部分，有坏的部分，不能都肯定。过去，节目太政治化了，所以现在要轻松一点，但不是把什么都搬出来。挖掘传统的提法不够全面。传统书目都要记录下来是一回事，这我同意，但演出是另一回事。公演的要整理，去掉坏的，保留好的。

(总第45期 1984年1月6日)

* 这是陈云同志同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戏曲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在评弹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

陈 云

在杭州听了一些评弹，做了一点调查，有点数了。想了一想，有几点意见，开个座谈会吧，就把你们找来了。

评弹要象个评弹的样子。可以有所改进，但不要象张春桥那样的“大改革”。各种东西都可以改进，评弹也可以改进，但不能改掉评弹的特色。

我的心是很平的，要求不高，只希望评弹能象评弹。一九七三年，周总理问过我，评弹听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当时是听过了，就是没有讲意见。一九七五年我到了上海，不敢找你们。看见马天水，打打官话，今天天气哈哈哈。在收音机里听到评弹，已改得不成其为评弹了，很扫兴。我是听“戥壁书”^①出身，听《英烈》(阴立)的，小时在家乡章练塘^②。

我那时到上海，不好来找你们。看到报上李太成^③出来了，知道你们也能够出来。赵开生^④对我说，还有很多问题。我说，

① “戥壁书”，是过去流行在听众中的俗语。在书场听白书，一般都站在墙边，将身靠在墙上听书，所以叫听“戥壁书”，也叫听“站书”。由于是悄悄地站在阴暗处听的，因此有一个俏皮的说法，叫听“英烈”，即阴立的谐音。

② 章练塘，是上海市青浦县的一个集镇。

③ 李太成，当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④ 赵开生，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演员。

李太成出来才三四个月嘛，要慢慢来。打倒“四人帮”八个月来，评弹回到了自弹自唱，基本上象评弹了，是有了进步的，虽然有缺点，这样也就很好了。这些成绩要巩固，评弹要象评弹。

要说新书。你们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吧。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传统书目里也有可以利用的东西，但是现在要说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艺人对传统的东西是舍不得放掉的，要对他们讲明道理。以后，老书也可以说，不排除可以利用的东西。《四库全书》你们看见过没有？可以去看一看，浙江就有一部。一九二三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曾去看过一次。这次来又去看了一看，已经五十四年了。过去我曾经提出，要找一些老人对那些古书进行圈点。中国的古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好难看懂。如果圈点，就容易看懂了。所以我提出要赶快做，如果那些老人都死了，就难办了。我们从地底下发掘出来的几千年前的东西还要拿到外国去展览，博物馆还要开放，为什么到一定时期不可以把一些没有问题的、能起作用的传统书目拿出来演一演呢？不是全部，而是一部分，“古为今用”嘛。

政策方面的问题，比如下放问题、工资问题，我都绕开了。今天我不打算谈这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很难，牵一发要动全身，但迟早都会解决、改进的。上工不上工，做好做坏，都一样，我不赞成。应该按劳取酬。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差别不能太大。评弹艺人是革命工作者，眼界要放得远一点。不要老是只看到眼前的工资问题、转业问题，要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关于书场的问题。要城镇书场加农村书场。公社还是在镇上，要到农村去演。艺人能否适应？农民能否出钱？钱要收一点，但不能多收。生活上不要担忧。农民听到了书是高兴的，他们会炒鸡蛋给你们吃的。现在书场太少，要多开一点。书场要改善经营管理，关心艺人的吃、住问题。

过去我给你们说，江浙评弹听众可能有一千多万。现在江浙一带农村人口更多了，去演出非常必要。所以我提出，演出要城镇加农村。在农村，要参加一点劳动，深入生活也可以。不过农民也会体谅你们的，他们看你们演出了，你们多演几场，就不会要你们多劳动的。评弹比戏剧容易下乡，去农村说书要作为一个方向。

我的意见是：一要保持评弹特色，评弹要象评弹；二是说新书；三是城镇书场加农村书场。这三点是主要的。

(总第45期 1984年1月6日)

出人、出书、走正路*

(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

陈 云

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

要出人，出书。出人，不一定要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增加。过去，艺人大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

可以根据小说、电影、话剧等改编成新弹词。我很同意邱肖鹏^①的意见，改编不能只讲书情^②，还要组织“关子”。对原著要进行改组，把“关子”安排好。为了组织“关子”，必要时，可以把原著前后的情节移动、变换。组织好了“关子”，才能吸引人。

编新书要靠有演出经验的艺人。

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在就青年中去锻炼，出人才，出艺术。

在编说新书时，艺术上要有所改进，老的一套也要有所改

* 这是陈云同志同上海评弹团负责同志的谈话。

① 邱肖鹏，评弹作家，在苏州市评弹团工作。

② 书情，即书目的情节。

变。但不要歪门邪道，要走正路。当然，歪门邪道中如有某些可以利用的东西，经过改造，也可以吸收过来。

我们要用走正路的艺术去打掉歪门邪道，去引导和提高听众。要保持主力，保存书艺，提高书艺。出人、出书、走正路，评弹是可以振兴的。

（总第45期 1984年1月6日）

陈云同志与朱穆之同志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一日上午，陈云同志在中南海办公室听取了朱穆之同志关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筹建等情况的汇报。

当穆之同志谈到《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虽然主要讲的是评弹，但包涵许多带共性的问题，加上每篇文字不长，因此文艺界看的人不少时，陈云同志说：我的文章没有长的。

当穆之同志谈到鲁迅喜欢写短文章时，陈云同志说：鲁迅的杂感好极了。三十年代初，我见过他。那次是去他家接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出来。

当穆之同志谈到当前文艺界仍然存在党员文艺工作者首先是党员还是首先是文化人的问题时，陈云同志说：听说丁玲表现不错。萧军去美国访问时对人说，他是政治第一。

当穆之同志谈到乔木同志文章发表后，文艺界在大的思想问题上已得到澄清，但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写阴暗面问题上仍没有很好解决，你一批评，他就说你粉饰太平、维护既得利益时，陈云同志说：说你是思想僵化。

当穆之同志谈到现代题材的作品在创作上仍然跟不上群众需要，这方面倒是县一级比省一级做得好，省一级比中央一级做得好时，陈云同志说：这几年评弹出了许多新书，《真情假意》是比较成功的一部。我曾提议将这个剧本移植到其他剧种，但现在看，成功的不多。创作新作品，一次不成功不要紧，“失败乃成功之母”。世界上没有什么常胜将军，只有既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并且善于总结经验的人，才是最会打仗的人。

当穆之同志谈到文化部已经决定办中国北方曲艺学校，考虑

到演员艺术高峰往往在十几岁，因此以中专性质为宜时，陈云同志说：赞成这个意见。梅兰芳登台表演的时候就很小，我在上海时看过他演出。

当穆之同志谈到现在文化部管的单位太多，机构仍显臃肿，减下来的人没地方安置，人浮于事，效率低时，陈云同志说：这是个普遍问题。

（总第50期 1984年5月29日）

陈云同志关于 评弹管理工作和文艺演出团体 改革问题的谈话要点

一九八四年四月一日，陈云同志接见了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同志，并同他谈了话。陈云同志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陈云同志指出：这次你们上海开了有五百多人参加的评弹会议，我看了你们送来的简报，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主要是提高艺人的自觉，加强书场和艺人的合作，增进相互理解，这个做法是对头的。要使艺人加强责任感，做到自重，自爱；使艺人感到领导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并不是强迫他们。看来，会议是有成效的。

去年，发了我给胡启立同志的信，提出加强对评弹节目和演出的管理，由江、浙、沪的省市出面，抓几年。现在看来，抓了不到一年，在上海已收到了成效。当然，这和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很大关系。今后可能还会有反复，但基本上是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

你回去把上海的会议简报寄三份来，由这里转给江苏、浙江、苏州各一份。请他们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参照办理。只要抓紧，而且方法对头，持续抓上几年，各地都是能搞好的。

陈云同志还说：我那本《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中，谈扬州弦词、北方大鼓的部分都没有编进去。通过谈评弹，也可以对其他方面起到树立样板的作用。

最近，我给周良同志写信，对邱肖鹏他们编说新书鼓了鼓

劲。编说新书要放开胆子，失败了也不要紧，常胜将军是没有的。要经得起打败仗，打三次仗，两次胜仗，一次败仗，就是能干的将领了。

（二）（吴宗锡同志向陈云同志建议：评弹流行于江、浙、沪两省一市，相互之间有许多共同性问题，有些事需要互相协调、配合。最好能由两省一市的文化局共同组成一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有关评弹的方针、政策、计划、制度等问题，并负责督促检查。这样便于加强领导，统一管理。）

陈云同志说：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这个办法好。可请中宣部负责具体落实。

（三）（吴宗锡同志还汇报了评弹团和其他文艺演出团体的改革问题，说：如果适当扩大基层在财务、人事、业务等方面的自主权，将能调动其领导者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独创性和责任心。由于体制和规章制度的改革不够，一般单位有了奖勤的一面，缺乏罚懒的一面。有的演员不参加演出，但要扣除他们的奖金、附加工资和营养费等，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阻力，更不要说扣薪、停职了。在奖勤方面，也还有平均主义的做法，该奖的奖得不足，不该奖的也沾光。我们想通过试点，步子稳一点，在这些方面作些改革，希望得到各级领导的支持。）

陈云同志表示：文艺团体可以经过试点，逐步扩大些自主权。应该奖勤罚懒。对工作不好的，如果扣奖金不解决问题，还可以除名留用，发给最低的生活费。

（吴宗锡同志说到，有的搞行政的同志，认为演员拿得多了，超过了行政人员不好。）

陈云同志说：过去蒋月泉的工资就比我拿得多。

（总第50期 1984年5月29日）

中央负责同志 关于文艺问题的两封信

一、关于爱情描写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九日)

我一直感到我们有些作家和电影导演同志对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以及用什么艺术手段吸引最广大的观众，存在着一些糊涂的、相当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因此，在去年二月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特别提到这方面的一些意见。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有这方面毛病同志的注意。现在我要进一步指明：这不是一般的创作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带原则立场的问题。如果有人硬是把爱情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不可以把它写成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和我们现时代的电影？如果我们的同志竟然把爱情看作第一生命，那末我们这些自命为是共产主义的人，同那些“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民主主义者先驱来比，是否有个很大的距离？

当然，我也不主张给这些作家和导演同志戴什么帽子，甚至我也不主张也要他们作什么检讨，但我主张要这些同志总结点经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和导演出更能打动人心的作品来。我还主张写一二篇论文同文艺界同志讨论一下文艺作品中的爱情问题。这种论文，文联和总政文化部的同志都应该亲自编写。

二、关于文艺评论问题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

这篇小评论(按:即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评〈醉入花丛〉》),也许你们都看过了,如果谁还没有看过,请他看看。我对文艺批评能够健康地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文艺报》已经带了一个头,从这篇小评论也看出了一个好苗头。我不是说这篇东西写得很成熟,而是说它多少说了一点道理,并且根本没有打棍子。再进一步说,也只有报刊上,首先是各种文艺刊物经常有点文艺评论,才能真正带出一个好的文艺批评的风气来。坐而论道,什么恰如其份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艺批评风气,永远学不会,永远带不出。能不能向文联和各个协会的负责同志提出一个指标:每人每年亲自写两篇?当然可以评论好创作,也可以批评坏作品。能不能把这个指标看作是加强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一条重要要求?请你们议一议。

〔附件〕

评《醉入花丛》

华 铭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过去,我一杯又一杯……”
喝得醉醺醺的叶丽,唱着颓伤的歌曲,跌跌撞撞地在金色的田野上走着,恍恍惚惚地开始了回忆……

李剑同志的短篇小说《醉入花丛》(载《湛江文艺》1980年第6期),向读者描绘了女红卫兵叶丽十年来的悲惨遭遇。十年前,她在串联途中掉了队,不得不留宿于一个青年农民的家里。半夜时分,在这个农民的哀求下,她“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和他发生了两性关系。第二天,和他结了婚,成了实行“两个决裂”的“先进典型”。不久,她又被地委书记所奸污。她的农民丈夫因为她“不贞”,加上只会生女孩子,经常随意打骂和凌辱她。现在,她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醉卧在油菜花丛中,茫然而不知归宿。

这确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作者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阐述他对历史生活的回顾与思索,表达他对现代迷信和极左思潮酿就的“万吨苦酒”的憎恨,这样的创作意图,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品给予读者的实际效果却和这一创作意图相去甚远,人们从中感到的是一种不正确的创作倾向和不健康的艺术趣味,这就值得作些分析和研究。叶丽的悲惨遭遇是从那个掉了队的半夜开始的。那末,就让我们来看看作者的描写吧——

叶丽醒过来了。青年农民跪在地上,说:“俄(我)想亲亲你们城里的姑娘”,“俄今年三十五了,俄不知道媳妇是甚,俄是雇农……”叶丽的头脑中立即出现一段“最高指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她激动地把他拉了起来。青年农民继续哀求:“让俄亲亲……”叶丽又想起另一段“最高指示”：“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时,“她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贫下中农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贫下中农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急贫下中农之所急!”于是,“她脸红了。他发疯似地把她抱到炕上,‘呼’的吹灭了油灯……”第二天早晨,叶丽要去追赶队伍了,青年农民又向她跪下,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不,不让你走。”叶丽仍然想起了“最高指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她留了下来,和他正式结婚了,从此开始了凄惨的人生历程。

这段相当细致入微的描写，给人以极不真实的感觉。诚然，在“十年动乱”的初期，在林彪、“四人帮”拚命煽起并加以利用的个人迷信的蛊惑下，一些年轻人由于幼稚和偏执，干出了许多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事情。就如一些文艺作品所真实反映的，或对着恋人开枪，或喊着口号跳楼(《枫》)，或把“伟人章”别到皮肉上(《醒来吧，弟弟》)，可谓比比皆是。但这一切不论多么五花八门，却都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特定的人物可能做的，是生活中发生过或确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是真实可信的。唯其可信，才能给人以启迪。而《醉入花丛》却把现代迷信的狂热和女红卫兵献出“贞操”拼凑在一起，把“解放全人类”和满足贫农的“肉欲”拉扯在一起，从而编造出一篇污秽、邪恶的“情史”，这种既悖违生活常理，又不符合人之常情的故事，怎么能叫人信服呢？

文学常识告诉我们，为了更好地反映生活，一个作者有权虚构各种不落俗套的故事。但是，不管这故事多么离奇，都必须有充足的生活依据，都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和心理逻辑。《醉入花丛》所违背的，正是文学创作的这一基本规律。尽管作者在反驳别人的批评时曾强调说，他对“红卫兵运动的始末及其内部生活细节”是“深知其内”的，他是“忠于生活，在生活中探索”的，但是读完作品，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印象：作者“忠于”的，只是他的某种观念和情绪；他的“探索”，则是不顾生活真实地编造故事，为自己的观念和情绪作艺术图解。凭心而论，作者所涉足的这一领域，由于业经作家们的反复发掘，且又不乏佳作，继续表现这类题材确有难度，这就需要作者更严肃认真地研究生活，深入思考生活，去探求生活的底蕴。《醉入花丛》反其道而行之，恐怕是作品所以失败的致命原因吧？

《醉入花丛》的艺术表现也比较拙劣。作者对“意识流”手法作了探索，但作品给予读者的，却是模糊混乱的形象，怪诞晦涩的象征，牵强偏激的意念，迷蒙、颓伤、惘然混杂着“世纪末”式

的悲哀的情绪，杂乱的、重复或者矛盾的意识流动……一会儿人成了猪，一会儿人成了苗，猪吃了油菜苗，人又吃了猪，如此等等，光怪陆离，常叫人不知所云。可见，对各种艺术手法的探索，基本前提仍然是对生活的积累和提炼。脱离生活基础，任何艺术手法都不足以建筑起扎实的艺术宫殿。而倘若指望靠“新颖”的艺术手法来弥补或遮掩生活的不足，甚至以此诱惑读者，这就不过是一条引创作至死地的歧途了。

特别希望作者引起重视的，是这篇作品流露出来的那种庸俗低级的艺术情趣。作者不仅用露骨的暗示，来描写性的关系，如“红卫兵袖章上染上了血迹”，以及地委书记奸污叶丽的过程；而且，多次把笔触伸向人物的身体器官，或者是叶丽的“乳”，或者是地委书记“胸窝上的一缕黑毛”，这不禁使人感到，作者对此仿佛带有某种病态的偏爱。当然，揭露丑恶的现象是很难离开对“丑恶”的描写的，人们也难以规定什么许可写，什么不许可，而什么只能写到怎么个程度。但是，文艺作品要陶冶读者的情操，至少不能津津乐道地去渲染丑恶。即使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也都力求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丑恶众相的辛辣鞭挞中，去呼唤美，讴歌美，追求美。可见，对“丑恶”的描写，是应该而且可以把握在作品整个艺术美的境界之中的。象《醉入花丛》这样离开刻画人物的必要性，去渲染兽性、污秽场面甚至色情细节，尽管出发点可能全在揭露，但却叫人难以和欣赏“丑恶”划出明显的界限，同时也不免有以此刺激感官，招徕和诱惑读者之嫌了。作者曾声称他“坚持真实地描写细节”，而又把真实仅仅理解为如实描绘，这就很难说是符合既要求细节的真实，又要求典型化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是更接近自然主义了。从《醉入花丛》的这种“真实”描写中，同样“真实”地透射出来的，恐怕是作者美学观上的污垢。

忠于生活；通过艺术地反映生活真实，或给人以力量，促人振作向上，或给人以启迪，催人玩味深思；以美的境界陶冶人

的情操——这是社会主义艺术的崇高职责，也是每一个作者须臾不可或忘的神圣使命。以这样的要求来衡量《醉入花丛》，说它从思想到艺术都是失败的，恐怕毫不为过。它在读者尤其是大量青年读者中可能起到的消极影响，也就不言自明了。对作者来说，从两年前的《歌德与缺德》到今天的《醉入花丛》，历史仿佛对他开了个玩笑。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何在？希望作者深长思之。

以上看法，供李剑同志参考。

（载《中国青年》一九八一年第十九期）

（总第1期 1981年12月12日）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是否重提 “思想改造”口号的一封信(节录)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八日)

你主张强调思想解放的同时，也要强调思想改造。按理说，这是很对的。这几年来，中央反反复复要求全党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求知识界的同志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要求各阶层、各民族在四项原则基础上增强团结，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改革和完善，致力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这些都是着眼于整个民族思想境界的改造和提高。

但中央没有重提思想改造这个口号，更不准备专向党外朋友和知识界同志重新恢复这个口号。这是因为(一)由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个口号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弊端，多数人对这个口号很反感；(二)在当前的条件下，重提这个口号，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歧视、批判和排斥另一部分人的错误作法。这种考虑我认为

是正确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任意放弃对人们进行思想改造的原则立场。毛泽东同志一生传播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也要毕生地坚持下去，这就是：革命，不但要改造整个社会，而且要改造全人类；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许多革命者首先是一些领导者缺乏这种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明明是自己的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相脱离，

自己的设想、主张、意见、著作同革命实践、同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意志不合拍，甚至相抵触，而不愿意改正；明明是情况变化了，历史前进了，却仍然停留和坚持过去的主张、作法和经验上。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所说的思想僵化。僵化到似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要服从我的设想、愿望和意志，那就是极端的唯我主义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又是相通的。

我一直感到，这些年来，我们深入浅出地谈思想立场、思想认识、思想方法、思想作风(其实这是一个大范畴的东西)的好文章太少。许多哲学论文读起来使人感到同现时的人们的思想实际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也写不出什么东西，真是穷小子抱怨穷措大。

(总第2期 1981年12月18日)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大张旗鼓地 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批示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

请你们召开一个会议，专门谈谈如何大张旗鼓地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问题。现在，我们大家对这方面既发愁，又着急，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自己又小手小脚，打不开局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动员全国一切广播（包括电视广播）和一切报纸，每天都有各种各样（个人与集体，男人与女人，大人与小孩，军人与非党群众，民族与民族，归国华侨和在中国的国际友人等等）动人的好典型，也有小量的对错误思想倾向的批评和揭露。要贯彻这个方针，（一）记者和工作人员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中去了解。（二）要号召基层组织（首先是宣传干部）动手写这类通讯。（三）报纸要进一步减少那些专论文章，特别是那些长文章。把这些文章给各种刊物上去发表。（四）要坚持天天搞下去。不要怕人说单调，枯燥。鼓舞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振作精神搞四化，搞社会主义文明，这是最大的欢乐，最大的兴奋，让那一批精神空虚的人自己在另外的场所去追求另外的刺激去吧！我们别上当。

(总第3期 1981年12月28日)

中央领导同志 对谢铁骊代表两点建议的批示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谢铁骊同志的建议，中宣部要协同有关部门抓起来。宣传部要拿出多一点魄力办多一点事。既然是党中央的一个部，应该是很权威的。不能小看这个权威。

〔附件〕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代表谢铁骊提出两点建议。一、现在电视观众日益增多，而电视节目少，这个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全国电影制片厂不少，电影导演和演员人才济济，增产电视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国产电视片少的原因主要是体制问题。因为电影制片厂属于企业单位，而电视台属事业单位。去年长影曾拍了部电视片，成本两万元，卖给电视台，因电视台是事业单位，经费不足，只能出四千元。因此，电影制片厂不愿拍电视片。国外电视片，有些内容不健康的，以免费提供为名，趁虚而入。这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利的。建议把电影和电视事业统一起来，以解决这个矛盾。

二、对宾馆的闭路电视和录象带要确定专门单位加强管理和控制。前些时我到上海住在一家饭店里，内有闭路电视设备，放的是香港的武打片，看一次要付四元钱，旅游的港澳同胞及外宾并不愿意看，结果看这片的，大多是饭店内部的服务员。据说有

闭路电视设备的大饭店有30多家,还有些大学也有放送录象设备。电影片进口有专门的部门审查控制,而现在录象带进口的渠道很多、很杂,又没有专门机构管理,如任其发展下去,给全国的精神文明不仅没有好处,相反会受到严重的污染。建议国务院要确定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加强管理。

(总第3期 1981年12月28日)

中央领导同志对进口和转播 外国电视剧的批示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

进口和转播外国电视剧，必须按中央方针执行。这个问题已谈过并批评过多次了。我看没有执行，主要是我们一些同志迎合社会上一些精神空虚人的趣味，而这些人又造舆论，引诱一些青少年去追求低级的东西。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灌输，才能成长，而是不能自然而然地到来的呀！

(总第3期 1981年12月28日)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 文艺问题的一件批示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看来，要求一些作家和文艺领导干部具有健康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很不容易。但必须坚定不移地对这些人进行教育和帮助。

(总第22期 1982年5月29日)

中央领导同志谈如何对待 人性、人道主义

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最近几次谈到：对人性、人道主义要作具体分析。不要笼统否定、一概反对。我们批判的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抽象的人性。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讲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现在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不要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我们不要人道主义，不讲人性了，从此这两个词不能用了，更不要在两词前面任意加上“反动”的形容词。人性、人的价值问题，在一定范围、某些方面还是有它的作用的。问题是分析什么样的人性、人道主义。如在反法西斯主义时，我们是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搞过“统一战线”的。在战争年代，我们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是讲革命人道主义。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解放军进驻上海，睡马路、守纪律，这也是人道主义。在今天，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道德规范上。雷锋精神的出现和学习雷锋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活生生的表现。

(总第44期 1983年12月29日)

中央领导同志的一项建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四月二十七日向文化部党组发出通知。通知说：

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建议，今后各地文艺团体来京汇报演出时，演出结束后，不要请看节目的中央领导同志上台接见演员和照像。

通知还要求各有关单位做好思想工作，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个建议。这个建议的精神，也适用于其他演出活动。

习仲勋同志的一个批示

习仲勋同志四月二十一日对《丁玲同志在西安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的批示：

丁玲同志讲的好，真不愧是一位革命的老作家。青年作家应该向她学习。这也证明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精神，她是领会得很深刻的。

丁玲同志在西安谈文艺 创作自由等问题

著名作家丁玲同志最近去延安探亲访友，途经西安时，对当前我国文艺界一些敏感的问题，向记者谈了她的一些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作家要正确理解创作自由，正确理解党的号召与行政干预是不同的。当代作家只要真正同四化大业息息相通，创作就会有广阔的天地。近几年间，从总的方面看，党对文艺界并没有太多的行政干预。这两年有那么多的新人新作涌现，而且有不少是很好的作品，很有希望的作家。行政干预过多，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文艺领域的现实可以说已经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党对文艺的一系列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行政干预，确实非摒弃不可。但党的号召和行政干预不同。党号召作家走向生活，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群众干四化、搞改革的崇高思想，给作家指出最广阔的创作天地，

这体现了党对作家的关怀和保护。不难设想，我们的作家如果离开了四化、改革的沸腾生活，而只关心小院、小街、小窗里的琐事，那他的创作自由恐怕只能是狭小天地里的自由。至于你深入了生活，采集了素材，要写什么人物、用什么体裁，是没有人会去干涉的。

作家自己思想不解放，也不可能真正的创作自由。如果你一提起笔来，就想主编喜欢不喜欢，得奖不得奖，总想在这些方面找什么窍门，那你就难得自由。所谓创作自由，只有真正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真正掌握了时代脉搏、客观世界的本质，既懂政策，又善分析，那才能如鱼得水，无往不胜，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驰骋。你不熟悉水，你不懂游泳，你在水里就没有自由。球类运动员的自由，是在四条端线内的自由，出了这个框框就没有了自由，社会就不承认你的价值。

二、创作一定要百家争鸣。创作自由，评论也要自由，允许批评反批评。陕西省文联讨论作品，要求较严，有表扬有批评，这是繁荣创作的正路。作品不能批评，听到一句批评就跺脚，这样的作家不会有很大的作为。我们办的文学双月刊《中国》认真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搞宗派门户，不排斥任何人。老作家、老诗人、现代派的作品，我们都发表。有些人自称现代派，其实他不一定是真正的现代派，他写的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现代派作品。他们往往只朦朦胧胧知道点现代派的皮毛，就树起什么旗号来。我们可以让他们实验一下，给他们创造接受群众检验的条件。我相信他们在探索中会不断有所前进。

遇罗锦这个人走了点错路。但文字不错，文章有好有坏。《冬天里的童话》是好的，《春天里的童话》不好。不好的作品应该挨批，她自己现在也承认批评有益。问题是应该给她安排一条出路。《中国》最近发表了她的一篇东西，反响强烈，众说纷纭，但总的看来利多弊少，失小得大。遇罗锦最近到西藏去写东西，她若能真正在西藏部队里呆上两年，把视野扩大，深入生活，那她还是

有希望的。

三、作家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传统和中国气派。从体裁上说，章回小说就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都是章回小说，我家的年轻人都喜欢看这些。我们要有志于写出今天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来，只要你真正掌握了生活，能以传统的民族形式写出中国气派，那你写什么题材都可以，写战争、四化、恋爱都可以。外国人喜爱我们的艺术，视为珍宝，而我们有些人自己反倒瞧不起自己，丢掉自己的珍宝，去拣别人的东西。中国小说是讲故事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典型环境、典型语言，尽在故事中表现。写阿斗昏庸，只写司马昭宴群臣时与阿斗的一段对话，就把个“乐不思蜀”的庸主形象刻划得淋漓尽致。中国小说的这种传统手法接近中国人的习惯；西方的蒙太奇手法，跳动式的东西，用滥了，不合中国人口味。

（总第58期 1985年5月14日）

胡乔木同志在会见全国故事片 电影创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校补。中办秘书局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

我对电影界非常不熟悉，看的电影也很少，在座的人，我认识的没有几个，所以确实很难发言。最近因为耀邦同志说，要我参加跟大家会见，我感觉到很高兴，很荣幸，就匆匆忙忙看了几晚电影，当然还是看的很少。

就我看过的一些电影来说，我觉得，一九八一年电影成绩是很大的，确实出了好些部很有水平、很好的电影。象《子夜》、《西安事变》、《南昌起义》、《沙鸥》、《海囚》、《喜盈门》，这些片子都很不错(补注：讲话后又看了《牧马人》、《邻居》，还有以前看过而漏提的《苦果》、《小街》、《残雪》，这些片子都很好)，表明了我们的电影艺术事业是在蒸蒸日上。按照这样的势头，完成明年生产九十部到一百部质量比较高的影片的计划，我是感到有信心。大家都在努力，这样的计划是能够实现的。

电影工作也发生过一些问题，也有一些片子拍得不好，引起了批评。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的事业应该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间前进。这种批评，不是为了打击我们的电影事业或者整个的文艺事业前进的势头，而是为了帮助这种势头。如果结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犯错误了，就得检查了。我们希望，通过民主的精彩的兼顾思想和艺术的评论，也通过必要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能够使我们的电影更好、更快地发展。

现在，我对讨论中提到的有几个问题，稍微说几句。

第一个问题，是夏老对我在八月间的讲话里面有一个问题想不通。我的讲话稿子改了好几道了，不知是指的哪一稿？（夏衍同志：现在想通了。是指八月八日的讲话。）那次的讲话是有些话说得不周到。确实说话要说得周到，不是很容易，就如同电影要拍好也不容易。所以电影要有个样片来审查，我那个讲话稿最后发表的时候也经过了几次修改。（胡耀邦同志：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然要承认，八月八日的讲话，里面有些话是说得不妥的，后来付印的时候把有些话改掉了，有些话去掉了，有些话补充了。就是已发表的稿子也还有需要再推敲的地方。总之，我们就是要着重描写我们当前的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斗争，围绕着建设四化的整个新生活的斗争。这个斗争里面当然往往免不了要涉及到过去的历史。历史是不能割断、也不能遗忘的。这个问题不必再多说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爱情描写的问题。这个问题，耀邦同志曾经好几次讲过，也写过批语。我想，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爱情的描写在我们的电影里面有一些泛滥、过分。一方面是在情节里面占的比重过分；另一方面是关于爱情的一些描写，一些表现的方法、手法，有缺点。我前天同荒煤、陈播几位同志曾经说到，比方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是一部严肃的片子，可是这里面有个别的镜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不出现这样的镜头，这个故事可以照样发展。考虑到我们社会的风尚，也考虑到在这些方面的这种“解放”无益而有害，希望同志们认真注意这个问题。（补注：我赞成艺术家可以创作一些好的人体艺术作品，但电影的作用和艺术作品的作用有很明显的不同。）我就不相信，一部电影里面如果不出现半裸体的镜头，这个电影就拍不好。因为当前青少年思想的状况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呼吁一下。

有同志说，现在中央提倡《喜盈门》，其实《喜盈门》有什么？

不过是宣扬一种传统的、封建的伦理观念。我不能够赞成而且坚决反对这样的意见。《喜盈门》表现了在家庭关系上的社会主义美德。把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说成是封建主义的道德伦理，这是不可理解的。我听说有些美国人看了《喜盈门》，感到很大的兴趣，羡慕在中国能够重视这种家庭关系上的伦理，而在美国就不可能。在美国，老年人的生活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社会问题。我说这个话，不是因为我自己现在年纪老了，假如我现在是二十岁，我也拥护《喜盈门》。因为有前面说的那种议论，我想，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确实是值得我们艺术界认真研究和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我是拥护在文学艺术里面描写爱情的。怎么能不描写爱情呢？爱情是生活里面一个重要的现象，艺术特别不能离开爱情。爱情关系和家庭关系同样是社会主义伦理中的重要内容。但是，社会主义伦理决不以爱情关系和家庭关系为限。个人对社会的关系才是社会主义伦理的首要问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对于革命事业和人民幸福的任何献身精神，都是一种“爱情”，而且我想，这是我们的艺术家们首先需要描写的“爱情”。我看到报纸上登过一篇文章说，我们的作品里面写伦理写得不够，写得很少。我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我们的革命的作品，都是充满了革命的伦理，无论是《红旗谱》，或者是《保卫延安》，或者是《红岩》，这一类成功的作品，里面最重要的主题都是革命的伦理。如果把伦理解释成为只是家庭伦理甚至传统的家庭伦理，这就把范围说得太小了，而且也说得不大正确。我们是要提倡新的伦理，提倡社会主义的伦理，包括对家庭关系和爱情的社会主义伦理。按照社会主义伦理的标准来观察爱情，这是我们的艺术的任务之一。按照这个新的伦理，爱情的位置应该处理得适当。我们看了《零点起飞》这部电影，我跟耀邦同志说，这部片子还够不上爱情至上这样的评语，不过在这个片子里面，为了追求传奇性，爱情的描写确是有些泛滥，超过了适当的和可信的程度。不知道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对，

请大家考虑。荒煤同志在讲话里说，不能拿爱情作佐料。在文学艺术作品里是有这样的现象。从观众里面，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声，认为电影里面爱情的场面太多。有位中学生写过一封非常恳切的信，说能不能拍些适合中学生看的片子？现在这样的片子很少，看来看去常常是男女情人你追我赶。这方面确实是问题很多，把爱情搬到战场上去，搬到铁甲车里面去，诸如此类的情况是需要有个节制。不是说不能写爱情。因为上次的讲话曾经造成一种印象，好象说不让写三大运动，所以现在特别说清楚。生活里面就有爱情，怎么能够回避它呢？不是要回避它，而是要摆得适当，要把它用社会主义伦理的观点正确地表现出来。我们要提倡社会主义伦理。耀邦同志引了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就是一种进步的伦理。裴多菲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说的自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我们如果把自由的含义换成另一种，即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自由，那么，借用这首诗，就可以说这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对待生命、对待爱情、对待自由（就是对待我们革命的目标）这三者关系的伦理。这是一种新的伦理，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伦理。这当然不是说因为要争取自由，要争取社会的进步，无论是什么片子，无论在什么故事里面，都要用爱情来陪衬，来证明两者皆可抛，而是说我们应该向青年，向全国的人民，宣传这么一种人生观，这么一种世界观。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同志提出，有些我们认为是现实主义的影片，有些同志却认为它们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理想主义的。这里说的是《牧马人》。《牧马人》这个片子我没有看过，我现在不能够发言，但是我看过这个电影所依据的小说《灵与肉》；我认为这样的作品决不能称为理想主义，即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可以换别的例子，比方说《喜盈门》，如果说，这样的作品不是现实主义，那么我们眼睛里面所看到的现实就发生了问题。（补注：《喜盈门》和《牧马人》的故事都是有实际生活根据的，甚至人物也

有实际生活原型。)如果说，现实里面没有对光明的追求，没有为理想的奋斗，这就把我们的现实看得太黑暗了，太阴暗了。难道我们的会场上，这么多的同志，我们的精神世界能够用这样一种观点来衡量，来表述吗？我们在座的同志，以及我们周围所接触到的现实，决不能够说没有理想，没有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奋斗。如果是这样，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关门了，就垮台了。决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关门，没有垮台，而是在前进。前几天我听到辽宁省委书记郭峰同志说，辽宁省委和团省委为了要在青年中间进行教育，就在沈阳市各单位进行了这么一个讨论：在你们的工厂里面，或者其他的单位里面，究竟什么人是最好的，你们那里的好事是什么人干的，什么人最把公共的利益放在前面，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后面？经过大家反复地讨论，反复地比较，一个个地来数，数到最后，还是共产党员居多。这样，大家就心服了。把事实摆开，多数共产党员和群众中许多先进分子积极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公众利益所进行的努力，他们一天到晚所干的事，大家都看得见的，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光明和希望所在。有时候好象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但是只要大家认真地去调查评比一下，那么就比出来了。在我们的生活中，既有积极面、光明面，也有消极面、阴暗面，生活就在两者的斗争中前进。一般地说，积极面总是占主导地位，并且经过斗争愈来愈占主导地位。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在我们的导演、编剧、演员以及其他的电影工作者中间，要确立这么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空想，是以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的。那种认为描写了积极面、光明面的作品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理想主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信念。我希望大家能够坚定这样一个信念，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动摇。如果有谁在这个信念上发生了动摇，那么我们就要跟他争论。争论，当然是要用事实去说明，是讲道理，不是施加什么行政的压力。

还有一个社会舆论跟文艺创作相互关系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舆论，同样，也有各种各样的创作活动。创作活动总是要影响社会舆论的，而这种影响既有正确的情况（这是多数），也有不正确的情况。同样，社会舆论也要影响创作，有的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有的产生消极的影响。我们不能认为文艺创作永远正确，也不能认为社会舆论永远正确。有一些社会舆论是以一些人的庸俗低级趣味为基础的，另有一些社会舆论不理解艺术创作的规律，艺术创作的需要，艺术里面的真理。我们不能不承认有这样两种不正确的社会舆论。但是总起来说，舆论里面正确的部分，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对正确的舆论，我们艺术家要有勇气，要满怀热情地去接受。对于有错误影响的文艺创作，党要通过社会舆论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给以批评（补注：党的负责人对文艺工作或某一文艺作品发表的个人意见，应当重视，但是不能设想任何一级的任何一个负责人的任何意见都是正确的；这些意见的性质也是一种社会舆论，而不是什么“长官”的指令或法庭的判决）；另一方面，对于不正确的舆论，对于文艺的错误的见解，或者误解，党也应当来做工作，做宣传和解释工作，指明哪些舆论是不正确的，按那么一些想法，文学艺术就不能够进行健康的或正常的创造活动。同时，艺术家也要坚决地积极地进行这两方面的宣传。社会舆论永远会存在永远会影响艺术创作；艺术创作也永远会存在，永远会影响社会舆论。这种相互间的影响都会有正确的情况和不正确的情况。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做各种工作，发展正确的情况，纠正不正确的情况。所以，只是“无为而治”是治不了的（补注：陈毅同志一九六二年在广州会议上并没有主张无条件的“无为而治”，他是指特定的情况和方面；当然，对于文艺工作“管得太具体”也不对）。问题是对文艺创作和社会舆论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不同的和适当的对待。这也说明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少。文艺界也不必因为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不正确的社会舆论，就说我们多么悲惨呀，我们受了多大的压力呀，我们

简直是没有出路呀，不必说这种感伤的和愤激的话。我们应该有一种信心，就如同对于整个的革命和进步的事业有信心一样，对于革命的和进步的艺术事业一样有信心。

(总第5期 1982年2月2日)

胡乔木同志关于电影的一些意见

谈电影《牧马人》和《邻居》

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左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胡乔木同志会见了电影方面的有关同志。会见时，乔木同志就电影《牧马人》和《邻居》发表了如下意见：

我看了《牧马人》，这是一部比较好的影片，对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很有教育意义。有一些看法，本来我准备给导演谢晋同志写封信，写了一半，因为事情忙，没有写下去，今天借这个机会说一说，请你们转达一下。

《牧马人》应该说是一部很好的片子，但也有些不足。《牧马人》既然叫《牧马人》，就应该着重描写主角许灵均在多少年的牧马劳动中和劳动生活、劳动人民建立的深厚感情。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场面，但是很不够，而后来却是展示他的教师生活。这主要不是导演的责任（导演在选择演员和训练演员方面是很成功的），是编剧本身的不足之处。当然，我说这些意见并不是要求对影片进行修改。

从四川来的那个女孩子李秀芝是个小学生，她的思想发展过程有层次，但发展仍有些跳跃式，表现得不够充分、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看了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后，她向许灵均重复电影中瓦西里的一段台词：“面包是会有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作为李秀芝思想发生变化的根据不大可信，多少还有些概念化的东西。

我并不反对电影采用插来插去的手法。有些影片运用回忆、穿插的强烈对比，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是白的，多少使人有一种强加于人的感觉。我还是希望真正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他的命运而吸引住人。一个文艺作品要让观众或读者逐渐进入规定情境。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平铺直叙的手法过时了，我认为不一

定过时。从世界名著看，《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中国的《红楼梦》、《阿Q正传》、《子夜》都是用平铺直叙的方法，我们过去的一些成功的影片，如《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祝福》、《林家铺子》等基本上也都是平铺直叙的，这些作品并没有过时。国外的一些好影片也仍在使用这种方法。我并不反对倒叙、穿插的手法，但我认为最好不要滥用，不要只是以此求胜。

我认为《牧马人》是一部好片子，但由于还有一些缺点，它还不能成为第一流的作品，虽然它本来可以成为第一流作品。导演要上世界上夺魁的愿望是值得支持的。

《邻居》我也看了，这也是一部很好的片子。前面部分描写各种人物的生活比较细腻、生动；后半部粗了，好比象一幅画，前头是工笔的画，后边是大落笔粗线条的。

这是个人的意见，未经深思熟虑，更不是什么“指示”，仅供参考。

给陈播同志的一封信

陈播同志：

昨晚看上影影片《阿Q正传》，很好。但假洋鬼子家堂屋正面所挂对联上联似为“玉振金声遇(或于?)时为端”，此联出现两三次，此处端字显为瑞字之误。这个小疵很是刺目，何以上影竟未看出？（《西安事变》片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联应用孙中山手书体，不应随便乱写，也是漫不经心之过。）不知能否补救。请酌处。

胡乔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原载《电影通讯》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总第13期 1982年6月1日）

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

胡乔木

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践问题，一九七八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有些同志提出这么一个论点：共产主义是真理，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可见真理不一定都要经过实践检验，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话是不对的，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同志写文章反驳。这里要答复这个问题。

这个政治报告不是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加以答复，可是它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在实践中前进的。

共产主义是指什么呢？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种是指社会制度，一种是指共产主义运动。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共产主义一直在实践。现在说共产主义是“渺茫的”这种话，不仅有某些青年人，而且有些是老干部。政治报告中引了一位党外女干部的信中的一句话：一个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干部讲“共产主义是幻想”。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这种话，好象已经为许多人所公认。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的，是完全错误的。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从来不是靠空谈，而是靠实践。自有科学社会主义以来，指导我们运动的是什么？是共产主义。我们为什么叫共产党？因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干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不仅今天社会主义阶段所做的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就是在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在党成立以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我们所有的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团结在党周围的人所进行的斗争和干的工作，也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尽管当时和现在的运动还不是直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分田地，抗日，推翻蒋介石，建立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这些斗争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敌人也都认为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运动，不管我们在每个时期是实行什么制度。我们没有国家而有了根据地时叫我们“共产党地区”，有了国家，就叫我们“共产党国家”，根本不管你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的军队从来都被称为“共军”。说“共军”，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我们就是共产主义的军队。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领导我们的斗争，怎么能有八一南昌起义、粉碎敌人多次“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直接目的并不是实现共产主义，但这是共产党领导取得胜利的，也是共产主义的实践，都是我们共产党员在那里带头干的。所有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他每一天的革命实践，都是共产主义的实践，革命的一举一动，都是共产主义运动。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共产党在今天的任务，也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今天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恩格斯早就讲过，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不能把共产主义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始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时，就成立一个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为它而写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但是他们从没有认为，他们当时的任务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执政以后，都没有说可以立即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公有，相反，他们明确地说“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而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为此提出了“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的具体的初步纲领。

《宣言》一方面说，共产主义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另一方面又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所以，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并不等于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巴黎公社，也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巴黎公社运动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当然，巴黎公社的领导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认为，这是无产阶级的运动，无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就支持它。这些都表明，共产主义运动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后者只是前者的终极目标。世界上自有共产党起，就有共产主义运动，就有共产主义的实践。所以，说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没有经过实践，我们每次开会总结经验干什么？我们总结经验，就是总结我们实践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我们的实践已经非常丰富。从共产主义的小组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还不是伟大的实践吗？如果这种实践还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那它是什么实践？这种实践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那是根本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强的信心，不仅因为从理论上，而且因为从实践上证明共产主义运动是正确的。要不然，共产主义小组怎么能够发展，取得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那么多的艰险，我们不但坚持下来了，而且继续胜利发展。至于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我们还没有实践，我们现在不可能也不必要来讨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究竟会是怎么样的。马克思、恩格斯作过一些很简单的设想，这些设想正确到什么程度，能否照预料的那样实现，当然需要实践的检验，如同任何科学假说都需要实验来证明或修改一样。就连我们现在已经着手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怎样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可是，我们党从事的全部革命运动，本身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这一点是不能怀

疑的。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决不是为了拿薪水来革命的，就是说，我们决不是为了按劳分配来革命的。自有共产党起，没有哪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是为了报酬来革命的，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把他清除出党。这还不是共产主义精神？不是为了报酬，完全是为了实现我们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个理想不是空的，它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这个运动一步一步胜利前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在全党统一认识。由于认识不统一，造成不单单党外的群众，包括政治报告里举的那位老干部，都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空想”。我们要坚决地反对这种谬论。每天生活里面都有共产主义，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英雄模范，有那么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不顾身、牺牲一切的人？这些人难道都是空想家？不是的，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共产主义的实干家。我们决不是空想家，我们的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所以，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思想越来越坚定。为什么越来越坚定？因为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合乎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且一步一步接近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

这个问题，在这个政治报告里不可能详细说，但是我希望全党在这个问题上要团结一致地坚定地反对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错误观点，所有的党员都不能含糊。如果一含糊，就会在群众里造成思想混乱。要抵抗资本主义思想的袭击，单靠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抵抗不了的，主要要靠共产主义思想才能抵抗。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其中包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牺牲的所有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及所有的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男人、女人、非党员、非团员，他们能够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共产主义。在法卡山牺牲的人，在抗洪斗争中牺牲的人，他们为了什么？为了共产主义。没有共产主义精神，哪来的这种革命行动？我们在座的这些同志成天从早忙到晚究竟为了什么？

假如只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房子，那么共产党就完了。我们就是为了共产主义，不但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首先是为我们现在干的共产主义事业。共产主义的事业不等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陆定一同志：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光有社会主义不行，一定要有共产主义。）离开了共产主义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我们整党要靠共产主义，没有共产主义，我们就没有力量说服党里面计较“按劳取酬”的人；对违法乱纪的那些人，也就不好说你们背叛了共产主义，你们不配做共产党员。我们为什么要给共产党员提出这样高的标准？共产党员不是将来才为共产主义奋斗，过去就为共产主义奋斗，何况现在。自有共产党起，我们靠共产主义思想，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了国民党，最后把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推翻。那个时候还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那个时候的一切斗争就已经依靠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正在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因此我们现在就必须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总第20期 1982年9月5日）

本刊编者按：王任重同志在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这个讲话，虽然主要是讲整个理论工作的，但对于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工作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以及对这一工作如何进行领导，都有指导意义。这里发表的是这个讲话的摘要。

王任重同志在北京地区 理论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

(记录稿)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

理论工作的形势

粉碎“四人帮”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理论界在拨乱反正的斗争中，在批判“四人帮”反革命言论、批判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斗争中，做了很多工作。党中央已经给予高度评价。

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引下，理论工作在继续前进，成绩是主要的。

在前进当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不够有力，对资本主义思想和文化的腐蚀，缺乏应有的抵制和斗争，甚至加以美化和传播。还有很少数的同志，对我们必须坚持

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发表怀疑和否定的言论。这些虽然不是主流，也必须予以足够的注意。

一般说来，这些缺点错误是难免的，特别在探索新情况和研究新问题的过程中，出一些偏差，有些失误，更是不可避免的。别的工作都允许犯错误，难道理论工作就不许吗？不过有了缺点错误就应当改正，这也和其他工作一样。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有了错误就要改正，这就叫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其他工作有了错误都应当改正，难道理论工作就不应当改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中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及时批评这些缺点错误，是为了使理论工作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更健康地向前发展，也是从政治上对理论队伍的爱护。而且据我理解，这种批评主要是针对我们领导，首先是对中宣部的。因为“软弱涣散”并不是说文艺工作者或理论工作者本身软弱，而是领导软弱，也就是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在对理论工作、新闻工作、文艺工作的领导上有软弱涣散的缺点。

思想战线座谈会以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的工作都在批评和自我批评当中继续前进。整个说来，发展是健康的，批评是说理的，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不但没有打倒哪个同志，而且也没有围攻和强迫检讨。犯错误的同志大都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且继续投入工作。前些时候，我到南方跑了三个省区，找各方面的同志座谈了一下，情况确实是这样。大家的认识比思想战线座谈会以前有了提高。有些写过不好作品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有些作家修订了原定的写作计划，有些准备下去深入生活，以便写出反映我们时代的新作品。

理论工作的现状应当怎样估计呢？耀邦同志说，可以用三个字来表示：不适应。现在理论工作同实践很不适应。理论应该走在前面去指导实践，但是却落在实践后面，并且有相当大的距离。当然，这不是指某一个具体问题，是就整个理论工作而言的。这个问

题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讲过，他说，我们的实践经验很丰富，应该加以总结，使它上升到理论。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应该说，既解决了，又还没有解决。为什么说解决了呢？经过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的全面拨乱反正，我们已经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左倾的错误，已经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并且正在领导全国人民向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目标前进。为什么说又没有解决呢？六中全会的决议固然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作出的，它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而且决议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具有强大的理论力量。但是，它毕竟是党的决议，是党中央对历史问题所作的政治结论。其中的理论问题，也都是原则性的判断或结论。对这些经验的分析、研究和总结，写出深刻的理论著作，是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从这个方面说，事情还多得很，所以说问题又没有解决。特别是对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我们理论工作还不能很好地回答，所以说是“不适应”。

党对理论工作的要求

党对理论工作的要求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这是理论工作的根本任务。从马克思逝世到现在，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和现在的第三世界，也比马克思在世时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过时”。这些基本原理仍然是我们的指南。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思想体系。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上面，而是必须根据新的事实，用新的观点来丰富它和发展它。必须对一百

年来现实生活的变化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必须对我们在新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从理论上给以回答。

要把理论工作推向前进，要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条要“敢”字当头，振奋精神，继续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写，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风格。没有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不能前进。怕这怕那，怎么能有创见呢？毛主席以前讲过，要敢想敢说敢做。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敢做就是要敢写。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这个口号，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结果我们不少同志（包括我在内）头脑发热，变成胡思乱想，搞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浮夸风，“共产”风，犯了错误。现在我们有了经验教训，就不会那样了。敢想敢说敢写，不是乱想乱说乱写，而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要遵循四项基本原则。所谓解放思想，指的是从各种错误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下面“解放”出来。解放思想，“敢”字当头，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打破各种精神枷锁。只有真理在手，才能所向无敌。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不恰恰是走上邪路，要陷入错误的泥坑当中吗？当然，即使主观上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也还是会犯错误。因为不管是做党的工作的同志，还是做理论工作的同志，马列主义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有些片面性或失误，都是难免的。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有严肃认真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就可以减少或避免失误。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必须“敢”字当头，不能怕这怕那。近来有些搞理论工作的同志热心于搞古代和外国的，对现实没有兴趣，特别不敢接触重大的现实问题，怕担“风险”。什么“离当前现实越远越好”，“离政治越远越好”。我不是说古代和外国的事情不能研究。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不过，研究也要有正确的方法，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能以避开现实为目的，不能从书本到书本。这样的理论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没有创见，无

非是就书本研究书本。比如，马克思的书里有个名词，叫做“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解放前就有人研究，还争论不休。专门研究这样一个名词本身，能研究出什么结果呢？我看研究不出来。

第二条，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工作要研究新情况，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才能不落后来于实践，才能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如何了解实际情况，怎样研究实际情况，这个问题应当解决。有的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去作调查，开座谈会。其次也应当解决资料问题，搞理论研究需要资料。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如果不能掌握大量的材料，对新情况一无所知，那就决不会发现新问题，也就不可能提出新见解。

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理论宣传同样要联系实际。毛主席说：“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应当是我们理论工作的方针。理论联系实际，在中国，毛主席应该说是第一个模范。他那些正确的东西，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而不是重复书本上现成的结论。因此，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当然，说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的发展，也不妥当，因为这不是事实。毛主席自己也讲过，他的那几本小册子、那些书所写的东西，有许多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列宁早就讲过的。因此，不能说毛主席的那些著作都是独创，而应当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新观点、新见解，在某些方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

理论工作有了这两条，就有了希望，就能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这就是我们党对理论工作的要求和希望，也是我们理论工作必须坚持的正确方针。其实这就是三中全会的方针。

领导理论工作的方法

为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了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为了使理论工作队伍能够“敢”字当头，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在领导理论工作的时候，必须划清三种情况的界限。

第一是探索。有些理论问题是探索性的，就是说，还没有结论，不仅前人没有结论，而且现在也没有结论。对这种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一些不成熟见解，发表一些错误的观点，是很难避免的。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应当鼓励人们勇敢地探索新领域，大胆去研究新问题，敢于提出新的见解。在探索当中有了缺点错误，不应该受到批判，而应该得到关心，得到再接再厉的鼓舞和支持。

第二是争论。学术性理论性的争论，是正常的，不要把争论当作批评。你讲你的观点，我讲我的观点，你驳我的观点，我驳你的观点，这是争论问题，不叫批评，也不叫斗争。这不是组织上来给你作结论，理论只有在争论当中才能前进。毛主席也说过：“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斗争”这个词，在这里是可以用的。不过过去把它用坏了，一斗就是“斗倒斗臭”。其实不同观点的讨论或争论就是一种斗争。这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是为了探讨真理，既不是党内斗争，又不是党外斗争。不要把争论和批评混为一谈。

第三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公开发表与党中央不同的意见，违犯了党的纪律，才需要进行批评、自我批评。批评允许申辩，允许保留意见，允许反批评。当然，党组织对于坚持错误不改、违犯党纪的同志，必要时也要给予纪律处分，只要不是开除党籍，处分也是为了教育。

当然，批评要讲究方式，要注意效果。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要与人友善。要严肃认真地分清是非，不要望文生义，随意引伸，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开展批评是为了治病救人，增强团结，而不是为了整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必须坚持。

要求理论工作者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会不会束缚大家的积极性？不会。首先，中央现在的路线是正确的，它符合中国当前的客观实际。我们的理论是讲真理的。真理就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我们党的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的理论工作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做，不但不会妨碍理论工作，相反，正是理论工作发展的条件。难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还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吗？其次，“政治”指的是重大原则问题，并不是指所有的具体问题，“保持一致”，并不是要我们照抄中央的决议或文件，每一句话都去“对口径”，那样的话，理论工作可以取消。“保持一致”，指的是遵守党的决议，服从党的纪律，在原则问题上，要和中央一致。在这个前提下，理论工作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

对于中央的决议、指示有不同看法也可以讨论。在行动上服从中央决议的条件下，我们党允许党员保留意见。在党的会议上，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或者给中央写信，提出意见和建议。这种意见如果有道理，中央会接受；如果没有道理，也决不会受到打击。

总之，我们既要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又要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相信，如果我们对理论工作的领导，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前提下，区别上述三种情况，划清探索、争论和批评的界限，一定会促使理论工作健康地发展，一定会使它繁荣起来。划分这样三种界限，是耀邦同志和我谈的，如果说得不对，可能是我没有把他的意思说准确。

（总第11期 1982年4月28日）

邓力群同志关于 文化艺术改革问题的谈话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上午，邓力群同志在文化部汇报艺术表演团体和电影事业改革情况的时候，讲了几点意见：

第一，这一段改革是有成绩的。大家都关心改革，也改出了一些经验。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有的是难免的，发现了以后不这样做了，也是个成果。各项事业都要改革，文艺当然也要改革，这是无疑的。目前还只是开始；一种好的事业的开始，总是值得尊重的。

第二，要坚持中央确定的改革的总方向、总目标。文化事业改革的总方向、总目标，同样是小平同志、耀邦同志讲的“三有利”，即：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这三条既包括建设物质文明，也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这三条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条，是根本，是方向。改革要和十二大精神联系起来，不能离开十二大总的战略部署。对文化来说，特别要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且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摆在首要地位。无论是大改还是小改，是过去还是今后，衡量文化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要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标准。

第三，现在文化事业的改革偏重于基层、局部（艺术表演单位的改革偏重于管理体制方面）。今后的改革，基层、局部要抓，全局、总体也要抓。这两方面要结合起来，联系起来。调查研究时，同时要考虑这两方面。整个文化工作的改革要列入议程。有

些问题，单靠基层解决不了，要从总体上来考虑。全国文艺工作会议也要考虑这个内容。如整个文化队伍的工资改革不解决，靠一个演出队去承包，解决不了问题。又如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人材的培养、淘汰，艺术骨干、尖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问题，都要有个全盘考虑。靠基层自己去改，局部去想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文艺表演团体的改革，从全局来考虑，就有一个剧目改革的问题。现有的剧团中，演出传统剧目的队伍约占80%，反映现实生活的不到20%。这种状况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过来，但应当列上改革的日程。传统剧目要不要整理？封建主义的内容要改。对有些剧团，还可以要求他们从演传统剧目发展到搞一些新编历史剧。在改革中要给他们任务。一年要编演一两个有利于宣传爱国主义的历史剧。对这些剧目要给予资助、优待。老演传统戏，老年人、部分中年人愿意看，青年就不一定接受。这对传统戏本身也不利。不能使我国优秀的传统剧目到下一代自生自灭。改革中要考虑这些全局性、方针性的问题，不要改了半天，三年五年还总演这些老戏。剧团改革要打破吃大锅饭，改变平均主义，但改革不能只限于这些内容，要想得更多些。

电影、电视的改革，也要有全盘的设想，要考虑往什么方向前进。总体的、全面的改革要同基层的、局部的改革衔接起来。要有人考虑全面的问题，不仅是三年五年的事，甚至要想到本世纪末。

最后一点，要组织力量，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调查研究以文化部为主，吸收文联及各协会参加。可以先从北京开始，然后分片开些座谈会。希望在半年内作出电影、电视全局改革的设想和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方案来。文化队伍的培养以及工资、待遇等问题的改革，可单搞一个组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方案。到二十世纪末还有十七年了，前七年可有个较细的设想，后十年也要有个粗的设想，包括文化事业改革与建设的设想。要形成文字，向

中央、国务院报告。

对目前已搞改革试点的单位，不要去泼冷水。即使有点毛病也不要指责，提醒注意就可以了。文化部可对前一段表演艺术团体的改革工作小结一下。

（总第34期 1983年5月16日）

中央批准美协的一项建议

一九八二年二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向中央提出《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分别对这项建议作了批示。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要点是：

可以同意这个建议，此事不宜再拖。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开始第一步主要是搞好规划，先从几个点搞起，取得经验，逐步展开。这方面的老专家、老艺人已为数不多了。为了培养队伍，此事也不宜再拖。

应责成一个部门主要负责才好办。可考虑指定城建总局负责。

同意由城建总局和文化部、美协抓这件事，将来由城乡建设部去抓。今年只能拨少量的钱作筹备工作，明年可按要求拨给。

同意拨款五十万元筹办。

〔附〕

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 雕塑建设的建议

城市雕塑是一个文化的象征，既可以歌颂革命业绩，纪念历史人物，反映时代精神；潜移默化地教育群众、鼓舞群众；也可以装饰环境，美化生活，丰富城市面貌。古今中外的历史说明，

好的城市雕塑是一代文化的标记。正如我国汉唐文化以及古埃及、希腊、罗马的文化，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不少被湮没了，而硬质材料的雕塑却长久地留了下来，成为文化的瑰宝。

在当前我国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城市建设中，及时重视和充分发挥雕塑艺术的作用，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也对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和发展旅游事业大有好处。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怀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雕塑事业，胡乔木、谷牧、周扬等同志曾多次对此作过重要指示，全国雕塑工作者深受鼓舞，决心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过去对城市雕塑的建设工作，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没有固定的经费，没有全面的规划，各地虽然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水平不齐，考虑不周，重视不够等许多原因，造成了发展不平衡，有的雕塑艺术水平不高，选址不当，效果不好等问题。为了抓好建设城市雕塑的工作，使之尽快得到落实，我们经过研究建议采取以下两项措施：

1. 建议中央责成国家城建总局和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将这一工作抓起来。邀请美术界负责人和一些著名的、确有水平的雕塑家、建筑师兼职组成城市雕塑规划小组（设专职人员一人，负责日常工作），这个小组由城建总局、文化部、美协共同领导，附设于文化部艺术局，其任务为：

（1）研究制订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先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期分批地进行。

（2）对各地新建大型城市雕塑的设计方案以及创作、施工等有关情况，从思想性和艺术质量方面进行审查，把好质量关。

2. 从1982年度起，由财政部每年直接拨给城市雕塑规划小组一定数量的建设城市雕塑的专款。根据目前情况，建议每年暂定拨给人民币五十万元。（各省、市亦可视本地区的情况和需要，自筹经费兴建城市雕塑。进行重大的雕塑建设的计划和设计方案，应报城市雕塑规划小组备案。〔本刊编者按〕中央领导同志在此批

注：重要历史人物的塑像应报请中央有关部门批准。）

我们认为，有了以上措施，经过十年八年，我国一些重点城市一定会拥有一批优秀的雕塑，成为更美丽的、更有文化的、更有民族特征的、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城市。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总第15期 1982年6月15日）

中央批准《关于军事题材 文学创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一）中共中央批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总政治部《关于军事题材文学创作 座谈会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就批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总政治部《关于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发出通知。通知说：

中央同意这个报告中提出的看法和意见，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参照执行。

这次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进一步提高了作家们对军事题材文学重要意义的认识，鼓舞了创作热情，交流了创作经验，加强了军内外作家的团结，并商定了一些发展军事题材文学的措施。会议是开得成功的。

中央认为，军事题材文学作品是对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也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好教材。要充分认识发展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国防教育，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意义，把它摆在文学工作的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大力加以提倡和扶持。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和军

队各大单位党委以及它们的政治机关要把发展军事题材文学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切实加强和改善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大力加强军事题材文学创作队伍的建设，各军区、各军兵种应当继续保留适当数量的专业文学创作人员，同时要把军外一切可以并且愿意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力量很好地调动、组织起来。要采取积极措施帮助军内外作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史、军史，深入部队生活，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思想理论水平和艺术素养；并努力为他们做好服务性的工作，尽可能提供必要的创作条件，以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伟大时代、伟大人民和伟大人民军队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满足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二）关于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党中央：

为了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指示精神，推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中国作家协会和总政治部文化部于四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来自全国、全军的一百四十八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前，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当前文艺创作，特别是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现将座谈会关于发展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主要意见，简要报告如下：

一、要大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军事题材文学，首先必须充分估计它的重要意义，把它提高到用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高度来认识。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革命战争历史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其时间之长，斗争之尖锐，经验之丰富，战绩之辉煌，更是举世无双的。我们

的人民共和国是在革命战争中诞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队，在战争年代，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进行过英勇卓绝的斗争；建国以后，又继承和发扬了优良的革命传统，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立下了新的功勋。这是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源泉。

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由于它描写的是与整个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生死攸关的斗争，所以往往最能够表现中国人民高尚的情操、伟大的献身精神和坚强的革命信念，因而具有其它题材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优秀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可以成为对广大青少年和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成为进行阶级斗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国革命史教育的最好教材；成为进行战备教育的最好教材。总之，无论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着想，或是从准备反侵略战争着想，我们都应该大力提倡和发展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在整个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

二、为了推动军事题材文学的发展，应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认真总结建国以后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正确估计当前军事题材文学的基本形势，明确我们当前的任务。

建国初期，我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受到普遍的重视，方向、方针是正确的，尽管领导工作中有过一些简单化的缺点，但还是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在广大读者中产生过巨大、深刻的影响。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炮制“根本任务”论和“高、大、全”之类一整套反现实主义的模式，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事题材文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些描写革命战争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以描写部队现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佳作。

军事题材文学在新的形势下取得了新的成绩。

但是，应该承认，同新时期人民群众的需要相比，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前进的步子还显得比较缓慢，作品的数量不够多，质量也不够高，有些作品还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缺点；同时，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一些有错误倾向或思想、情调不健康的作品，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效果。

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曾多次指示要重视军事题材文艺创作，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并且指出：这是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于这些重要的指示，理解、宣传、落实得很不够，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在总结发展军事题材文学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今后如何更好地发展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军事题材文学创作。

三、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左”的思想影响，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上努力提高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质量。

对于军事题材文学的含义，要理解得广泛些。战争与军队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同整个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着的。凡是写与战争、军队有关系的内容，而在这个作品里面，人民解放军的军人是起着比较重要作用的，都属于军事题材文学的范围。军事题材文学作品要力求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表现军事斗争，而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去写战争、写军事。

要提高作品的思想境界，努力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应通过艺术形象表现革命战争参加者的成长过程，描写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和为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与崇高品格，以振奋民族精神，激发广大读者对党、祖国、人民军队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与信念，增强他们对敌人的警觉性和仇恨心。

要努力摆脱那种图解概念，或单纯描述战役、战斗过程的作

法，生动而深刻地塑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要特别重视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所谓“非英雄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敢于和善于描写革命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尖锐斗争和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表现广大军民如何在克服困难中前进，从而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当前，更需要强调的是，作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要充分认识世界观对于创作的决定作用，认识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作家自己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才能写出精神境界高的作品；积极投身于斗争生活的洪流，并认真学习党史、军史，具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历史知识，写出的作品才可能真实、感人。

四、加强和改善对创作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军事题材文学的关键。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宣传部门，各地区作协分会和部队各大单位政治机关及所属文化部门，切实地把军事题材文学创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重视、提倡，并狠抓落实。

繁荣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坚持两条战线斗争。要保证作家在选择题材和艺术创作上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希望各级领导重视专业创作队伍的建设，关心业余作者的成长，经常从思想上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作家并合理地解决他们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方法，希望认真抓好军事题材文学的研究、评论工作，加强对青年读者欣赏趣味的引导。要求报刊杂志、出版部门能以更高的热情支持军事题材文学创作，提供必要的园地，多发表一些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和评介文章。中央和军委的档案、党史资料征集部门以及军事科学院、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对于作家查阅必要的资料，可适当提供方便。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总 政 治 部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

(三) 关于成立军事题材文学委员会的方案

一、为促进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根据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的建议，成立推动、组织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工作机构。机构定名为：军事题材文学委员会。

二、军事题材文学委员会是属于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部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支持、协助下进行工作。

三、军事题材文学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若干人；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人员在作协内部调剂解决，不增加编制。

为便于开展工作，建议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人组成的此次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领导小组的成员，组成军事题材文学委员会，由巴金同志任主任委员，刘白羽、张光年同志为副主任委员，冯牧、朱子奇、葛洛、魏巍、张少庭、胡可、李瑛同志为委员。

四、军事题材文学委员会的任务：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协助军内外作家制订军事题材文学创作规划；

组织军外作家深入部队生活，组织军内作家到地方体验生活，并尽可能为军外和军内作家提供必要的创作条件；

组织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经验的交流；

推动有关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研究和评论工作；

推动报刊、出版社、文艺团体、电台、电视台、电影制片厂

重视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发表、出版、播放、拍摄和评介工作；
在可能范围内，协助作家与有关单位联系，查阅必要的资料；
在外国文学研究机构的协助下，提供有关外国军事题材文学情况的资料；等等。

（总第18期 1982年8月15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 的改革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人民团体：

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已经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原则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试行。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和领导管理工作存在许多弊端，很不适应艺术事业的发展 和 建设“两个文明”的需要，必须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近几年来，部分艺术表演团体在体制上进行了一些改革试验，已收到一定成效。各地要在前一段改革试验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认真搞好艺术表演团体的整顿、改革工作。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艺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创作和演出好的作品，培养新的优秀人才，努力探索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艺术表演团体的新途径，新形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艺术表演团体的整顿、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是一项细致的组织工作，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文化部要注意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推动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地可根据《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

改革意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扶植下，我国艺术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逐步建成一支拥有很多艺术品种，众多优秀文艺人才的文艺队伍，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艺术，团结和教育人民，鼓励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十年内乱的破坏，加上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复杂原因，我国艺术表演团体仍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在体制和领导管理上的弊端更为突出，严重阻碍了艺术事业的发展和提高，主要是：

布局不够合理。有些大、中城市专业艺术团体过多，同类艺术品种的院、团设置重复；有些艺术团体不适合当地群众的要求；有些地（市）、县设置艺术团体的数量超过了实际需要；有些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又缺少应有的艺术团体。

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截至一九八三年底，全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从业人员达二十二万三千余人，较之“文革”前增加近五万人。大量人员是在“文革”中吸收的，而且业务水平较低。近几年由于安排子女顶替、以及走后门等原因，又增加了不少非业务人员。估计中央、省和地（市）一级艺术表演团体中不适于继续从

事艺术工作和不需要的人员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人员进出渠道阻塞。不少艺术团体人员老化，后继乏人。

领导体制和经营管理不适应艺术生产的需要。领导部门管得太多，统得过死，艺术表演团体缺乏必要的自主权，艺术人员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又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存在着软弱涣散的问题。不少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队伍思想混乱。整个艺术队伍的思想、文化、艺术的素质亟待提高。

艺术表演团体在分配上存在平均主义，人人捧“铁饭碗”，吃“大锅饭”。

艺术创作、艺术评论、艺术研究等方面缺少骨干力量，工作薄弱。鼓励、发展艺术创作的制度、办法不健全。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建设应当遵循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体制上和领导管理上进行较大的改革。

一、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性质和方针、任务

艺术表演团体是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由艺术工作者组成的，从事艺术创作和表演活动，以精神产品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独立性较强的社会文化团体。

艺术表演团体应该高举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要发挥各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努力创作和演出好的剧目、节目，满足人民多方面的艺术爱好及审美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要注意克服在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导文艺创作中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

艺术表演团体要努力建设和发展我国的民族艺术，无论是对

传统艺术的整理加工、继承革新，或创作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艺术作品，都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为发展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社会主义的民族艺术作出贡献。

艺术表演团体应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在满足城市观众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要多到农村、工矿和边远地区为群众演出，并辅导业余文艺活动，开展文艺的普及工作。艺术表演团体还担负着国际文化交流任务，向国外宣传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和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成果。

艺术表演团体要树立良好的风气和职业道德。艺术工作者要增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者的社会责任感，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重视精神产品的社会效果。

二、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

要逐步改变不根据群众需要和实际情况，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政府主办的艺术表演团体和盲目发展表演团体的状况。根据目前全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数量过多、布局不够合理的现状，应对现有艺术表演团体进行必要的调整。

(一)在大、中城市，专业艺术表演团体要精简，着重提高质量。在同一城市，省与市，地区与市(县)，同类艺术品种的院、团设置重复的，有的可合并；有的可考虑调整或撤销。中央一级只设少数具有实验性的艺术表演团体。

(二)各地应注意发展和提高具有地方特点、深受群众喜爱的剧种。对于那些离开本剧种土壤，在当地缺乏基本观众，经济上主要靠国家补贴的戏曲剧团，应回到本剧种流行较广、观众较多的地区，或予以撤销。

(三)地(市)、县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设置要注意艺术力量和艺术水平。对艺术力量弱，行当不齐，需要国家较多经济补贴的，可加以压缩、合并或撤销。县级剧团同类艺术品种一般只设一团，

也可二、三个县设一团。

(四)内地的地(市)、县级综合性文工团和歌舞团,办得较好、确有专业水平、受当地群众欢迎的,可继续保留。办得不好、艺术质量差的,可考虑合并或撤销。有的也可根据演员的条件,改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团体。

(五)对群众业余剧团应予鼓励,对农民或艺人集体经营的职业剧团也应给以支持,但一律不得转为由国家给予固定经费补贴的专业剧团。

(六)大力扶持和积极建设少数民族的艺术表演团体。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加强省、自治区一级少数民族艺术表演团体的建设,充实少数民族业务骨干。自治州、县(旗)一级可办一些人员精干的综合文工团、队(如牧区的“乌兰牧骑”)或建立民族歌舞团、戏剧团,并逐步作到以少数民族成员为主。大力提倡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和演出,以发展本地区民族艺术、培养民族艺术人才。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经济基础薄弱,文化条件较差,在人员编制和经费上应给予特殊照顾。对长期深入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广大群众服务做出成绩的艺术团体应给予奖励。

(七)大力扶持和鼓励以演出现代戏为主的剧种、剧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地区戏曲剧种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些剧团以创作、演出现代题材戏曲为主,并在演出任务、经济等方面予以照顾,为他们搞好现代戏创造必要的条件。应积极加强话剧团的建设,努力提高话剧的质量,演出更多更好的现代题材剧目。

(八)扶持带有实验性的表演团体,如歌剧、舞剧(包括民族舞剧和芭蕾舞剧)、民族音乐、交响乐等。文化主管部门要在工作条件及经济上对这些艺术表演团体给予支持,使其在创造民族的新歌剧、舞剧,促进民族音乐的发展,以及芭蕾舞、交响乐民族化等方面作出更好的成绩。

(九)对直接为少年儿童服务的艺术表演团体,应从人力、财

力上予以更多的扶持，使其在教育少年儿童、满足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活需要方面作出更多贡献，并在发展业余儿童戏剧、儿童歌舞等活动中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十)在调整艺术表演团体时，对某些古老稀有的艺术品种(如昆曲)，观众面虽较狭小，但具有深厚艺术传统和较高艺术水平，应予以保留和扶持。要抓紧发掘传统剧目和表演技艺，加以革新和提高，以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的艺术。

(十一)建立设置艺术表演团体的审批制度。今后县以上国营或依靠国家固定经费补贴的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增设，应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艺术表演团体的设置，由当地党、政府批准，报文化部备案。

(十二)对各地小城镇和农村中由艺人组成的职业剧团、演唱小组和零散艺人的演出活动，要加强领导管理。确有演出条件的，允许登记，由县级文化主管部门发给演出证。无证不得演出。要定期检查他们的演出活动情况，进行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教育，表扬好的，批评不好的。如坚持演出坏节目，经教育不改者，吊销其演出证。这类演唱组织分别归口由文化部门或委托文化馆、站领导管理。

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调整，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主管部门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劳动人事部门密切配合下，提出切实可行的调整方案，报请党委和政府批准后实施。

三、确定编制，精简人员

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必须解决好人员精简的问题。

(一)各地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和事业调整方案定下来后，文化主管部门应根据各类专业艺术团体的方针任务及各个艺

术品种的不同情况，与表演团体领导及主要艺术人员共同研究，科学、合理地确定人员编制，要与编制主管部门共同拟定暂行编制标准，并报经当地政府批准。艺术表演团体的机构编制应充分考虑艺术发展的实际需要，努力做到阵容整齐，行当齐全，但人员要力求精干，不得超过编制。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剧院、团，也应精简机构，减少层次，确定编制，精减冗员。

(二)各地文化主管部门要通过对艺术表演团体的演职员的考核、鉴定，坚决地、有步骤地、妥善地把艺术表演团体的精简工作做好。

精简工作要认真走群众路线，在广泛听取群众特别是主要艺术骨干的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工作需要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定人员去留。一些已搞经营承包责任制并取得成效的团、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现有人员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调整、精简。

(三)安排精简人员可采取以下办法：

1. 已届离休、退休年龄，或虽未届离、退休年龄但长期患病休养的，应按离休、退休、退職办法办理离休、退休、退職手续。对已届离休、退休年龄的少数艺术造诣较高，在社会上有影响且尚能工作的艺术家、老艺人，可适当延长离休、退休年龄。一般可退出行政领导职务，继续进行创作、导演等业务工作；有的可安排在艺术研究或教学部门，从事研究或传艺。

目前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专业剧团经济上十分困难，自身无力安置离休、退休人员，需要国家给予经费补贴。因此，现有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剧团人员的离休、退休、退職，可参照国务院国发〔1978〕104号《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暂行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主管部门会同劳动人事、财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离休、退休、退職的经费，报经同级文化主管部门单独核拨；有的省(市)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其他办法解决。

2. 在文化系统安排。根据实际需要和本人条件，安排到其

他文化单位(如艺术馆、文化馆、剧场、影剧院、放映队、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工作。

3. 转业外调。文化系统确实无法安排,可在当地党委及政府统一领导下,与有关部门联系安排。如本人自有去处,组织上应积极予以协助办理。

4. 广开生产门路。由文化主管部门或艺术表演团体举办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艺术服务公司、工厂及其他服务行业,予以安排。

5. 根据社会需要和本人条件,进行职业培训,经一至三年学习后,考试合格者可另行分配适当工作。艺术表演团体的一些中、青年演员,由于某种原因失去艺术表演条件的,各地文化部门应主动与教育部门联系,联合举办定向培训班,培训成为中、小学艺术师资。

未列入编制而一时不能安排的人员,可由艺术表演团体或文化主管部门另行组队管理,与演出队严格分开,并视情况逐步安排他们的工作。

(四)建立艺术辅导组织,吸收从表演团体调出的有一定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人员,开展各项艺术辅导活动。文化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少数具备条件的地、市)文化厅、局应成立艺术辅导组织。可采取两种形式:艺术表演团体下设辅导队(组),自行开展辅导活动;或在文化主管部门下设辅导中心,集中管理各院、团转作辅导工作的人员。辅导中心或辅导队(组)均单列编制,单拨经费。

(五)人员精简是一项艰巨繁重、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请各地党委和政府加强领导,劳动人事、财政等部门大力予以支持。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艺术表演团体的领导,决心要大,工作要细,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确定去留人员必须根据条件和条件,领导干部不得利用职权营私舞弊,打击报复。如有此类事情发生,应进行严肃处理。另作安排的人员要识大体,顾大局,服从组织

分配。对于经再三说服仍不服从分配，超过半年期限的扣发工资。拒不服从分配，超过一年期限的，按自动离职处理。

四、改革艺术表演团体的领导体制

目前艺术表演团体的领导体制很不完善，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行政领导职责不明；艺术人员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没有很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等问题。

(一)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可选择一些条件成熟的艺术表演团体作试点，在领导体制上改变党委领导下的院(团)长负责制，实行院(团)长负责制，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1. 艺术表演团体中的党委会(总支、支部)的任务，是保证和监督院(团)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演职员的思想觉悟；教育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完成各项任务；发展党员；领导共青团、工会等群众组织。院(团)的艺术生产计划、生产安排和指挥、经营管理、人事安排，由院(团)长负责，党委会(总支、支部)不要包办代替。在方针、政策或其他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时，院(团)长应尊重党委会(总支、支部)的意见。如不能一致，业务行政工作仍应由院(团)长负责处理，不同意见可由党委报请上级主管部门解决。

2. 各院(团)可试行演职员大会或代表会议制，由各院(团)的党委和院(团)长共同主持或上级文化主管部门主持下选举代表组成。演职员大会或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推荐或选举院(团)长，并经上级主管部门任命；讨论、通过本团重大的业务、行政工作计划；审定规章制度、财务计划及其执行情况；讨论、决定有关生活福利及其他重大问题。院(团)长与各部门负责人应定期向演职员大会或代表会议汇报工作。

3. 院(团)长的职责是领导制订和执行本院(团)艺术生产计

划；决定剧(节)目并组织排练和演出；领导本院(团)艺术委员会工作；负责人事安排；掌握财务开支，实行经济核算和按劳分配原则；管理基本建设和物资添置工作。

在院(团)长领导下建立院(团)务会议。院(团)务会议由正、副院长(团)长，党委(总支、支部)书记，艺术委员会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重大问题要经院(团)务会议讨论决定。

4. 艺术委员会(以下简称艺委会)是院(团)长领导下，指导艺术生产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讨论和确定上演剧(节)目计划和重点剧(节)目的导演计划；采取各种措施改进艺术生产，促进艺术革新，提高剧(节)目的艺术质量；指导艺术创作经验的总结工作；指导艺术人员的业务学习，培养新生力量。艺委会由艺术修养较高，具有一定声望和成就的艺术家组成。本院、团如设有总导演或艺术指导，可由其兼任艺委会主任。如院(团)长(包括副职)系由主要艺术家担任，也可由他兼任艺委会主任。艺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院(团)长提名，经院(团)务会议讨论决定。

(二)健全艺术表演团体的领导班子。

1. 院(团)领导班子原则上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同志：主管全面业务(行政)工作的院(团)长；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工作的党委(总支、支部)书记；分管艺术工作的副院长(团)长(有的可兼总导演或艺术指导)；负责人事安排、经营管理和行政事务工作的副院长(团)长。

2. 按照党的干部政策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院(团)长人选由演职员大会或代表会议协商、推荐或选举产生，并报上级机关任命。院(团)长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院(团)长任职期间，如本人提出辞职要求或半数以上演职员提出罢免要求时，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免去职务。

3. 副院长(团)长、总导演、艺术指导由院(团)长提名，经演

职员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讨论通过。院(团)的下属艺术、行政管理机构的负责人由院(团)长提名,经院(团)务会议讨论通过后,由院(团)长任命。

4. 今后,院(团)下属团、队的领导成员也应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

五、扩大自主权,改革和完善管理制度

必须扩大艺术表演团体的自主权,切实贯彻责、权、利三统一的原则。主要内容有:

(一)改进对上演节目的管理,艺术表演团体有上演节目的自主权。

除政治性晚会、招待外宾、出国访问演出和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节目需在上演前由主管部门进行审查外,各艺术团体可自己决定演出的节目。有关领导部门对艺术团体的创作及演出节目有意见,可向艺术团体和创作、表演人员提出。涉及重大政治内容的问题,领导部门可提出修改原则和作出决定;一般问题如何修改由艺术团体决定。创作、表演人员应以对国家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注重节目的社会效果,并不断进行修改、加工和提高。

(二)改革人员管理制度,扩大用人权。

艺术表演团体的人员管理和进出渠道,应按照艺术工作的特点加以改革和疏通。

1. 艺术表演团体招收一切工作人员均应进行德、智、体全面考核(包括大专院校毕业生),对录用者必须实行一定的试用期和实习期。期满合格者,方可转为正式人员。

2. 艺术表演团体退休人员的子女安排问题,应按照国家院国发〔1983〕137号文件规定执行。如分配到艺术表演团体,需经表演团体考试合格方能录用。其他退休人员一概不实行子女顶

替。

3. 文化主管部门或其他部门不应向艺术表演团体安插一切不需要、不合格的人员。如有这种情况发生，艺术团体有权拒绝接收。

4. 为了不失时机地吸收特别优秀的艺术人才，在编制范围内，艺术表演团体有权自行吸收演职人员；在取得所在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和人事部门同意后，可跨省、市(除边远省、区)招收业务人员。

5. 艺术表演团体可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实际需要，聘用临时工作人员。

6. 建立正常的人员流动制度。为扩大地区、剧种间的艺术交流，经本人和双方单位协商同意，可订立合同，进行艺术人才的相互交流。合同期满后仍回原单位，也可经过双方协商调动工作。跨地区的须经劳动人事部门同意。

7. 艺术表演团体有权按照国家规定对演职人员实行奖惩。对在艺术创造上或工作上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可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可以批准提级。对犯有过失的人员，可给予扣发奖金、记过、降级直至开除等处分。奖惩均应经过院、团领导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开除人员应报上级机关批准。

8. 艺术表演团体应建立正常的考核制度。每隔一定时间对所属人员进行一次考查，决定人员的升降去留。对调离人员，若在本系统安置，应在当地党政领导的支持下，由文化主管部门解决。若调离本系统，由文化主管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协商解决。

(三)改革经营管理制度，下放财权。

艺术表演团体应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根据实际情况，经过试验，逐步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

1. 国家对各类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依照其艺术品种、任务、分工，以及所在地区的不同情况，有的可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补贴，有的可长期给予补贴，有的则要求完全自给。今后，要求多数剧团应逐步提高自给水平，以至达到全部自给，以减少国家的财政补贴。经费补贴核定后，三年不变。艺术表演团体实行独立核算，对各项经费开支有权自主管理、合理使用。艺术表演团体有按质论价、优质优价的票价决定权，但定价要适当。

对减少国家补贴，特别是不需国家补贴，做到经费自给自足、艺术方向正确、作风健康的单位，应给以表扬和必要的物质奖励。

2. 按照责、权、利三统一，国家、集体、个人三有利的原则，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应向所属院、团，院、团向所属团、队提出具体要求，实行承包责任制。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剧团的收支节余，应按一定比例建立事业发展基金、职工集体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有条件的还应提取适当的后备基金，避免分光吃光。

3. 实行按劳付酬的分配办法。艺术表演团体或下属团、队可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种工资分配及奖励办法，如：（1）基本工资加奖励；（2）基本工资加浮动工资；（3）完全按艺术水平高低、贡献大小分红，冻结基本工资；（4）实行岗位责任津贴。实行上述工资分配及奖励办法，超过核定的工资总额部分，在奖励基金中开支。

4. 艺术表演团体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财经制度。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充分挖掘内部潜力，改进经营管理。坚决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不计成本、不算经济帐的铺张浪费现象。同时要防止和克服不顾演员健康，艺术上粗制滥造，单纯追求演出场次，以及只顾演出，忽视新剧目的排演和演员的培养等现象。文化主管部门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出较为完善的经济管理办法。

六、繁荣艺术创作

繁荣艺术创作和演出是艺术表演团体的中心任务，也是艺术事业全面改革和建设的主要目的。要把是否为人民群众提供又多又好的艺术作品，作为衡量文化主管部门和艺术表演团体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志。

(一)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和有条件的县的文化主管部门以及艺术表演团体，要组织创作力量，建立创作机构。主要任务是为本地、本单位提供作品。艺术表演团体的创作人员的编制和开支可由文化主管部门直接负责，也可包括在艺术表演团体的编制数及定额补贴当中。文化主管部门和艺术表演团体还应积极依靠社会创作力量，同更多的作者建立联系，签订合同，鼓励和扶助他们进行现代戏创作和整理、改编传统剧(节)目。

改变创作人员终身制的作法。各专业创作机构的成员，在一定的年限内创作不出达到上演水平的作品时，应考虑另行分配工作。

(二) 文化主管部门和艺术表演团体应保证创作人员的创作自由，鼓励创作人员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艺术见解可以自由讨论，允许批评和反批评。要制订法规切实保障创作权益不受侵犯。要给好的和较好的作品提供上演或发表的机会、条件。列入艺术表演团体编制的创作人员，除完成本部门适用的作品外，应允许和支持他们创作其他形式的作品。凡是艺术作品上演、出版、广播、改编移植、拍摄电影电视，都要注明原作者姓名，并按规定或合同付给报酬。对于抄袭、剽窃他人作品者，文化主管部门应予以严肃处理。

(三) 文化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有条件的地、市)文化主管部门要设立艺术创作基金，主要用于鼓励和扶植反映现实生活或其他重大题材的创作，以及进行艺术革新和实验的创

作。

(四) 建立艺术创作和表演的评奖制度。文化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县文化主管部门，要采取不同方式，对优秀的艺术创作和演出进行评奖，有突出成就的给予重奖。

(五) 文化主管部门和艺术表演团体要拨出专款，帮助作者建立生活基地，解决作者深入生活的实际困难。要鼓励和支持艺术创作人员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创作出反映我国人民建设“四化”的伟大实践，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新的历史时期创业者的英雄形象，鼓舞各族人民革命和建设热情的艺术作品。特别要鼓励戏曲及其他传统艺术形式的表演团体积极创作、上演现代题材的作品，并努力提高质量。

(六) 各类艺术表演团体都要通过艺术实践不断积累优秀的保留剧(节)目。要特别重视现代题材剧(节)目的锤炼、加工，使其成为优秀保留节目。有条件的艺术团体要恢复和建立保留节目轮换上演制度。

(七) 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应拨出专款，组织专业和社会力量作好民族传统艺术遗产的继承和抢救工作，编好“民间音乐集成”、“舞蹈集成”、“戏曲志”等专集。特别要抓好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工作。对有突出成就的老艺人及某些中青年优秀演员的表演艺术，代表性剧(节)目的音乐唱腔等，要组织人力有计划地及早进行记录整理和录音录像。要支持和扶植民族题材作品的创作，同时要抓紧对少数民族艺术遗产的继承和抢救工作。

(八) 提高艺术创作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创作人员的思想艺术素质，其根本途径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深入生活和学习创作技巧。文化主管部门要为他们创造学习条件，如实行轮训，或定期脱产学习。对创作人员参加会议、阅读文件、听报告等，应提供更多方便。

(九) 加强艺术评论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工作。要逐步改变艺术评论、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实践脱节的状况。省、自治

区、直辖市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必要的艺术研究机构，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员，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艺术评论工作，并且要很好地组织社会上的艺术评论力量，建立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有较高文艺素养的艺术评论队伍。各地艺术院校和艺术研究机构应通过举办进修班、研究生班和组织学术讨论等办法，培养研究人才。

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

文化主管部门要和计划、教育、劳动人事部门一起，从现在起就作好艺术人才培养的总体规划，为今后艺术事业的建设和艺术水平的提高准备好充足的后备艺术力量。

(一) 我国现有的中、高等艺术院校是培养艺术人才的主要基地。院校的设立要合理布局。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关心艺术院校的工作。艺术教育要改革，院校培养人才要符合艺术表演单位的需要。艺术管理部门要和艺术教育部门共同调查、了解艺术表演团体需要艺术人员的情况，解决培养与需要对口的问题。特别要加强对戏曲编、导，舞美，史论等方面人才的培养。现有高等艺术院校应当积极多办一些专业培训班，重点培训全国各艺术表演单位中的业务骨干和有希望的“苗子”。省、市级中等艺术学校也要办一些中、短期专业培训班。

(二) 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艺术事业的需要，文化部各直属院校及各地高等艺术院校除了在招生中特别注意吸收少数民族学生外，还应继续开办各种艺术专业的民族班、进修班等，以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艺术人才。

(三) 协助教育部门改进中、小学美育教学，发展业余艺术教育。有条件的艺术院校、艺术团体和艺术辅导组织可以开办各类中、小学美育师资训练班、业余艺术学校或业余艺术训练班，这是普及群众文艺，提高群众文化素养，培养和发现人才的一条有

效途径。

(四) 有计划地培养艺术管理干部。文化部办的文化管理干部学院要分期培训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领导干部和艺术表演团体的骨干。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酌情举办这类学校或在党校增设文艺领导干部班，培训省、地、县各级艺术表演团体的管理人员。要组织已离休或退居二线的艺术领导干部总结经验，编写艺术管理教材，并聘请他们讲学。

(五) 地、市、县级剧团自办的培养业务人才的学员班要整顿、提高。现有学员班要严格执行考试、淘汰制度。学员不要列入剧团正式编制；期满结业考试合格者方可定为正式演员，列入编制；不合格的不予吸收。剧团学员班有根据艺术品种特点选择招生地区及确定招生年龄的权利。今后地、县级剧团的艺术人才应逐步由各类艺术院校负责培养。

(六) 文化主管部门和艺术表演团体要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对艺术人员的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艺术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素质。要组织文化学习，特别是戏曲、舞蹈、曲艺、杂技等方面的演员，文化程度太低的，要进行文化补课，文史知识要达到高中毕业程度。要组织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学习和基本功训练，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通过不断地艺术实践和观摩学习，提高艺术素养。艺术表演团体每年要有一定时间集中进行思想业务整训。

(七) 抓紧挑选和培养从事民族艺术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的专业干部。高等艺术院校、艺术机构及有条件的艺术表演团体，可招收一批青年学生或由现有艺术人员改行专门从事戏曲(曲艺)传统剧(曲)目、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等的整理、研究工作。对确有成绩者要给予奖励。

(八) 文化主管部门和艺术表演团体要重视艺术档案工作和各种艺术资料的积累，要有人专司其事，以利于总结经验，促进艺术事业的发展。

八、加强和改善对艺术表演团体的领导管理

对艺术表演团体的领导，要改变统得过死，管得过细的弊病，要发挥艺术表演团体的主动性、创造精神和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同时也要纠正放任不管，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偏向。为了加强和改善对艺术表演团体的领导，文化主管部门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制定各种条例、规定和章程，对艺术表演团体执行方针、政策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艺术表演事业和干部队伍建设、发展进行全面规划；决定专业演出单位(包括剧场)的布局 and 设置。

(三)指导创作。加强对优秀作品和演出的评奖。与有关协会和研究部门配合，加强评论工作。监督与检查上演剧(节)目的内容，对那些宣传反动政治思想、宣传色情淫秽的上演剧(节)目应坚决禁止；对那些坚持演出坏戏，拒不改正的表演团体应予改组或取缔。文化部有权明令禁戏。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市、县文化主管部门有权停演坏戏，但需报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思想工作领先，保证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巩固改革的成果。

(五)关心艺术团体的工作人员，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六)对院、团领导干部进行教育培养、考核监督和奖励处分。

(七)对艺术表演团体给予经济补贴和资助，并监督其开支。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参照试行。

文 化 部

一九八五年一月

(总第60期 1985年5月27日)

中央宣传部召开电影创作座谈会

中宣部于10月26日至11月3日召开了电影创作座谈会。与会同志学习了中央30号、39号文件和胡耀邦同志在鲁迅诞生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以及9月25日同文艺界领导同志、10月2日同宣传口领导同志的讲话，并围绕胡耀邦同志提出明年生产一百部影片的任务，展开了热烈讨论。

参加座谈会的有北影、八一厂、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学院、电影研究所等在京人员25人；外地邀请上影6人，长影4人，共35人。其中有水华、武兆堤、王炎、史超、李俊、陆柱国、叶楠、石方禹、吴永刚、赵焕章、辛显令、王家乙、张天民、张暖忻等。赵守一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讲了话。贺敬之、陈荒煤同志就电影创作问题讲了话。

这次会开得严肃认真、生动活泼。与会同志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逐步加深了认识，中央领导同志对创作人员的爱护，使大家深受感动。有的同志讲了几年不愿讲的心里话，有的同志消除了疑虑，不少同志严肃地作了自我批评。许多同志表示，今后要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深入生活，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继续解放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为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影片而努力。

肯定成绩，纠正错误

会议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电影创作发展很快，去年完成82部，估计今年完成90部左右。在今年完成的影片中，就有一

批得到好评。如《喜盈门》、《陈毅市长》、《沙鸥》、《南昌起义》、《楚天风云》、《月亮湾的笑声》、《伤逝》、《绿色钱包》等。电影创作人员后继乏人、青黄不接的状况有所缓和。

与会同志也清醒地看到了电影战线存在的问题，认为在电影界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以《苦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同志对我们的电影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持怀疑态度，认为艺术就是艺术，电影创作纯粹是个人的自我表现；有的否定、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有的宣扬抽象的人性，把人性说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有的不赞成我们的电影应有社会主义精神；有的反对提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作品的社会效果，等等。与会同志认为电影创作中庸俗化、商业化倾向和某些不正之风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时期以来，这些错误倾向没有得到及时批评和纠正，同电影领导部门的涣散软弱有关，也和电影评论的专业队伍力量薄弱、思想混乱有关，必须予以纠正。

会议提出要总结、继承和发扬三十年代以来我国电影创作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吸取外国影片的长处，创作具有我们自己民族特色的优秀影片。只有这样，我们的影片才能为国内外广大观众欢迎；那种认为电影是“舶来品”，谈不上什么民族风格的民族虚无主义的鄙薄态度，是很错误的。

努力描写社会主义新人和开拓电影题材领域

会议强调描写社会主义新人，强调电影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鼓舞人民奋发图强、为“四化”建设献身；要高高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振兴中华。有的同志认为，写我们时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塑造出代表我们民族向上精神的典型形象，更是我们电影艺术家的重任。

前不久，有些同志对中央七号文件提出少写反右派、反右倾

和十年内乱的作品，思想不通，担心电影题材会越来越狭窄。经过学习，不少同志认为胡乔木同志对这个问题讲得透彻，能够理解和应当接受。来自农村的业余作者、影片《喜盈门》编剧辛显令反映，农民说：“家里死了人不能总哭。”现在农村变化很大，农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他们不愿再看悲切、凄惨地反映十年动乱的影片，希望多看一些能给人欢乐、希望和鼓劲的影片。老导演吴永刚说，我们不能老沉湎于所谓“伤痕文学”，我们要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影片。不少同志谈到电影题材非常广阔，“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我们有光辉的斗争历史，有丰富的现实生活，电影题材的领域很宽，亟待我们开拓。

争取明年生产一百部影片

胡耀邦同志提出明年生产一百部影片的任务，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一百部影片可以完成，关键是提高影片质量。目前影片的数量和质量相比，群众更不满意的是质量。如果数量上去了，质量不高或下降，群众会更不满意。因此，有些同志主张明年以不规定生产百部影片为好，产量可保持在90部左右，腾出手来进行休整，为今后提高影片质量做好准备。另一种认为，今年完成90部左右，明年完成一百部是可能的，每个厂不过增加一两部影片的任务。目前一些老厂导演很多，明年生产一百部影片，不一定都质量不高。同志们建议文化部总结建国十周年和三十周年抓重点影片的成功经验，明年拍出20至25部好的和较好的影片。

提高电影质量的几项措施

会议认为，提高电影质量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电影工作者的奋斗目标。会议就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建

议。

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电影制片厂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议文化部制定一个摄制组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严格贯彻执行。也有些同志提出各制片厂党委要充分发挥艺委会的作用，团结和支持有实践经验的老艺术家把住影片质量关。文化部审查影片时，对质量低劣的影片，不要轻易开绿灯通过。

二、改革电影体制，解决制片厂的企业自主权问题。现在，拍摄影片越多、利润越大，地方财政卡得越紧，严重影响着电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调动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各制片厂应大力改善经营管理，厉行节约，降低成本，反对浪费。

三、由文化部和制片厂定出电影创作人员深入生活和学习的规划。电影创作人员可分为若干梯队，第一梯队拍摄影片，其他创作人员深入生活或学习。

由电影协会和电影局举办多种形式、各种不同内容的训练班、学习班或读书会。时间长的可以几个月，短的一、两周也好。训练班或学习班可选读一些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请党政部门和研究单位的同志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艺等情况；请有创作实践经验和有理论修养的同志讲课；选读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放映观摩一些国内外影片等。

四、与会同志对长期未能解决观摩资料影片问题，很有意见，希望文化部订出放映观摩制度。在北京可找适当的放映场所，发给电影创作人员观摩卡片，每月放映两次或数次资料片。应尽快建立电影资料影院，供创作人员经常观摩。对外地的电影工作者，可组织资料影片到各制片厂巡回放映。

国家应建立艺术资料博物馆，为拍摄影片和舞台演出提供文字的、形象的、实物的资料，包括市井风俗、古代建筑、服装道具等。目前许多老一辈电影工作者还健在，应在他们指导下，着手积累资料。

五、有的电影创作人员提出，希望北京图书馆提供方便，以便经常借阅图书，阅读资料。

六、电影导演的考核晋升，应恢复过去由文化部选拔批准的制度，改变目前从其他岗位转为导演的人数过多和只进不出的状况。此外，要解决电影创作人员阅读文件和住房困难等问题。创作人员的奖励制度和导演报酬，也应作适当调整提高。

七、会议提出，电影和电视最好统一起来。电影制片厂拍电视片的潜力很大，有些中青年导演可从拍电视片进行锻炼。

会后，文化部留下参加座谈会的四个制片厂厂长，对明年影片的产量作了研究，认为明年作为国家下达影片生产指标以90部为宜，这样各制片厂有产可超，明年生产一百部影片，还是可以做到的。

（总第1期 1981年12月12日）

中央宣传部召开文学创作座谈会

为了贯彻落实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和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对文艺工作指示的精神，中宣部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召开了文学创作座谈会。到会的有在京的老、中、青作家和有关负责同志冯牧、葛洛、袁鹰、韦君宜、陈模、徐怀中、臧克家、草明、曲波、冯宗璞、玛拉沁夫、邹荻帆、邵燕祥、孟伟哉、金近、李国文、雷加、刘绍棠、林斤澜、从维熙、刘心武、陈建功、李英儒、苏策、张澄寰等五十三人。赵守一、贺敬之同志以及李英敏同志出席并讲了话。座谈会先用三天时间，分组学习了胡耀邦同志在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二日同文艺界、新闻界负责同志的两次谈话，学习了中央批转的胡乔木同志在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用三天半的时间进行了集体讨论，发言的有二十三位同志。到会的同志表示，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情况作了科学的深刻的分析，既肯定了成绩，又敲了警钟，体现了中央对文艺界的关怀和期望。中央提出文艺界要鼓劲，大家很受鼓舞，表示一定要鼓为人民创作之劲，一定要用创作去鼓人民之劲。有的同志表示，会将马上深入到生活中去，向工农兵学习，写出受工农兵和广大群众喜爱的作品。有的同志说，一定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努力给人民提供良好的精神食粮。座谈会上谈到下面几个主要问题：

一、关于文学创作的形势

会上谈到，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于文艺工作的成绩，已经作了多次明确的肯定。文学创作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共发表长篇小说三百多部，中篇小说五百二十部，短篇小说近八千篇，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儿童文学、科学文艺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都有了很大发展。无论内容、形式和风格都更丰富多彩了，出现了许多反映群众现实生活、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好作品。一大批文学新人正在作家队伍中茁壮成长。几年来的文学创作，对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几年来文学创作发展的主流。在任何情况下用任何借口否定这个主流都是不对的。

同志们说，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文学创作中也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其他错误倾向。除了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以外，还有极少数作品，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轨道的错误思潮，例如叶文福同志的部分言论和作品就是突出的代表。有的作品，不能正确表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对现实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有的作品，否定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歌颂剥削阶级和敌对分子身上的“人性”。有的作品，艺术趣味庸俗低级，胡编乱造，甚至追求刺激性的和色情的描写。此外，创作上的雷同化、概念化，艺术上的粗制滥造，以及短篇不短，长篇过长的长风，也都是需要克服的。

会上谈到，文学创作中的这些问题，对于文学的繁荣发展，对于充分发挥文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重要作用，都是不利的。同志们说，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以后，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评，有了初步成效。但是，文艺界还有少数同志，态度

不够鲜明，有的甚至仍然怀疑自由化倾向的存在，这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简单化扩大化，要区别主流和支流，区别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评自由化的目的，在于促进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和健康发展，进一步调动作家积极性。

二、文学创作的任务和作家的责任

社会主义文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它要求在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同时，必须保持鲜明的社会主义的倾向性；在继续解放思想的同时，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特别是党员作家，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文学的党性原则。

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正确认识和深刻反映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问题。同志们谈到，对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作家有责任加以真实的描绘。要用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塑造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鼓舞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关于创作方法，与会同志认为，我们一方面应当在政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允许各种创作方法的存在和探索，但同时应着重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应继续坚持它的根本原则并用新的创造促进它的发展。对革命浪漫主义也应重视，不能因为过去这方面有过教训就根本废弃或轻视它。正确运用革命浪漫主义方法是符合文艺规律的，也是时代精神所需要的。

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是当前的重要问题。思想开掘的深刻性，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都需要加强。特别是艺术典型的塑造，还有待作家们的努力。要使更多的典型人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进入新时期的文艺画廊。艺术上要精益求精，对于语言、结构以及细节描写等方面也要刻意求工。艺术创新应

该受到鼓励，创新的目的是更好地反映生活，是为了使人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

三、繁荣创作的主要措施

为了使文学创作更加繁荣、更加健康地发展，会上建议采取下面一些措施：

（一）加强学习

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近几年来，在一部分青年作家当中，存在着轻视马列主义理论的倾向。有的甚至要“突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原则，有的说吃亏就吃在“坚持”这些基本理论上。有的盲目崇拜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观点。这种情况是造成文学创作中出现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家建议，今后要有计划地组织作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马列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精神，应该继续坚持。对于年轻的作家，还要组织他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近代史，使他们了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为了提高艺术修养和写作技巧，还要组织他们学习中外古今文学名著，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发扬革命文艺的战斗传统。

为了加强学习，大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有的同志说北京市委分批组织作家进市委党校学习，是个好办法。有的同志建议中央党校能办文艺班，轮训文学艺术工作者。有的同志建议文联、作家协会以及有关学会，举办读书班、读书会。还希望能加强作家协会的文学讲习所，使它的条件得到改善，以便作好培养中青年作家的的工作。大家还希望党委宣传部，能经常向作家传达中央文件和党的政策，使作家们直接听到中央精神；能经常请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和实际工作者，向作家介绍各条战线的成绩和问题，使

作家们了解四化建设的形势发展。同志们还要求有关部门办好图书馆、资料室，给文学工作者们提供学习上的方便。

（二）深入生活

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艺界有些同志曾经忽视深入生活的必要性，个别人甚至提出要废除“深入生活”的口号，这显然不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要根据作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有的可以走马看花，有的可以下马看花。但是，一切年轻力壮的专业作家，都应该用较长的时间，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参加“四化”建设，向社会学习，与群众相结合。有了自己经常蹲点的“根据地”以后，又要点面结合，力争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对于自己过去熟悉的生活，也要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了解生活发展的新形势。会上还提到，希望有关部门帮助作家解决在深入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提供政治思想和物质条件方面的支援。

（三）积极开展文学评论

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真切健全的文学评论。到会的作家们，热切地希望文学评论能够进一步开展，发挥“剪除恶草”、“灌溉佳花”的作用。那种把一切批评都说成是“打棍子”的观点，把开展文艺批评说成是“收”的观点，都是不对的。如果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反批评，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那还有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那种听不得一句“逆耳忠言”，认为自己的作品一个字都不能改的作风，怎么能不断提高质量、提高写作水平呢？大家希望，文学评论要经常化，要克服软弱迁就和一味吹捧的缺点，也要警惕那种无限上纲、乱扣帽子的现象。要努力作到“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恩格斯语），帮助作家总结创作经验，掌握艺术创作规律。作家和评论家之间要建立亲密的友谊，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四）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学工作的领导

座谈会认为，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文艺界的一系列重要

指示和疏导工作，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树立了榜样。活生生的事实又一次证明，社会主义文艺没有党的领导必将一事无成。任何企图削弱、摆脱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倾向都是错误的。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是坚定的、一贯的，认为党的文艺政策“变来变去”，是不符合实际的。大家要求党的领导部门，经常督促有关单位认真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要克服涣散软弱、放任自流的现象，也要克服简单粗暴、主观片面的作风。要实事求是地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大家希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使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和文联、作家协会等群众团体的关系更加协调。文联、作家协会等组织要防止和克服机关化、衙门化的影响，密切联系和广泛团结老、中、青作家，更好地发挥组织指导作用。大家要求政府文化出版部门改善文学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不能只顾经济收益，而不顾社会效果。

现在文学期刊很多，它们对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繁荣文学创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需要加强刊物编辑出版工作的管理。编辑选用稿件，决不能搞“关系学”。对于一些编辑力量很差、作品质量很低的刊物(包括一些刊登翻译作品的刊物)要切实加以整顿。稿费制度，要有利于提高作品的质量，鼓励写作的精练，要真正按质计酬，不能只看字数多少。文学评奖，也需要总结经验，加以整顿和改进。

(总第3期 1981年12月28日)

中央宣传部召开戏剧创作座谈会

中央宣传部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三日召开了戏剧创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吴雪、赵寻、胡可、刘厚生、侣朋、金山、舒强、吴祖光、石羽、梅阡、凤子、刘佳、所云平、邢益勋、王正、刘树纲、凤眠、梁秉坤等五十余人。贺敬之同志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讲了话。与会同志学习讨论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以来中央有关文艺工作的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这次座谈会开得活跃，通过认真、严肃的学习、讨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有些同志消除了疑虑，振奋了精神。不少同志说，中宣部直接召开戏剧创作座谈会，为戏剧创作鼓劲，并希望通过戏剧创作的新繁荣鼓全国人民的劲，使大家更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会上，同志们畅谈了对戏剧形势的看法，探讨了新时期戏剧创作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进一步繁荣戏剧创作的建议和措施。老中青剧作者之间、军内外戏剧工作者之间、文艺领导与作家之间、剧作家与评论家之间加深了相互理解，增强了团结。

对戏剧创作形势的基本估计

会议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戏剧很快地恢复了“革命性、群众性、战斗性”的传统，创作空前活跃，走在其它姊妹艺术的前面。话剧舞台上出现了《于无声处》、《丹心谱》、《曙光》、《陈毅出山》、《西安事变》、《未来在召唤》、《报春花》、《向前向前》、《权与法》、《救救她》等一批反映人民心声、

激起观众强烈共鸣的好戏。近两年来，在振兴中华精神的鼓舞下，又创作出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时代风貌的作品，如《血总是热的》、《金子》、《谁是强者》、《天山深处》、《灰色王国的黎明》、《迟开的花朵》、《原子与爱情》、《落凤台》、《张灯结彩》等，反映的生活面较前几年更宽广了，工农业题材的作品开始多起来了。在反映历史和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的作品中，题材的广度和主题的深化都有所发展，不仅塑造了众多革命领袖人物和历史人物形象，而且在人物艺术典型的塑造上有了新的突破，如《陈毅市长》、《北上》、《一代英豪》、《平津战役》以及《孙中山》、《一代风流》、《秦王李世民》等。

与会同志还谈到，戏剧领域也同文艺的其他领域一样，曾出现过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一九八〇年二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对《假如我是真的》等几部有争议的作品展开了民主讨论，中央领导同志对新时期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由于对座谈会精神的宣传和贯彻很不得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及其在创作中的反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在一个时期内，戏剧界出现过一些和中央精神相抵触的错误言论：把剧本座谈会说成是“开了变相禁戏的先例”，错误地认为“提出‘社会效果’论本身的社会效果就不好”，甚至把注意社会效果说成是“棍子”、“框子”；提出剧本创作座谈会“到底是功是过，还不能定论”。有的刊物集中地宣传了同剧本创作座谈会精神相对立的严重错误观点，鼓动艺术家要长几块“反骨”，要“大唱反调”，并继续改编、上演、鼓吹《假如我是真的》第三个有错误倾向的作品。这一股否定剧本创作座谈会的潮流虽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有些言论也曾受到抵制，但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却突出地污染了戏剧界。此外，近年来，戏剧演出单位受经济压力的影响，追求票房价值的商业化趋势也有所发展，一些作品脱离生活，靠编造惊险离奇的情节、展览资本主义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来招徕观众，甚至不惜用“美人计”等陈腐手法来歪曲我党地下斗争，或用庸俗、

低级趣味迎合某些观众。座谈会认为，在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其他不健康倾向的同时，仍然要注意和防止对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干涉。

新时期戏剧创作面临的几个问题

座谈会就繁荣戏剧创作面临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同志认为，正确地认识和深刻地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表现新时期的时代风貌、时代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戏剧创作面临的新课题。在一段时间里，由于有些反映现实生活的剧目出现了一些失误，有些作者不敢接触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有的同志曾担心戏剧会不会走上回避矛盾、粉饰生活的“无冲突论”的道路上去。座谈会认为：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剧。无冲突论不符合戏剧创作的规律，也不符合生活的实际，生活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冲突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问题在于剧作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社会现象，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为指导，研究新时期的社会矛盾，认清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时代特点，把握住矛盾的对立双方——正面与反面、主流与支流、光明与黑暗、新与旧、是与非的界限，才能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揭示新事物一定能战胜旧事物的社会本质。

大家谈到，正确地认识和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首先要深入生活。近年来，剧作家对待深入生活的重视程度比不上战争年代和十七年的时候了。有的是由于年迈体衰，想深入生活却力不从心；有的受经济条件限制下去有困难；也有的在认识上仅仅把深入生活等同于搜集创作素材；有的甚至否认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会议强调剧作家深入生活一定要参加到群众变革现实生活的斗争中去，同群众相结合。

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现实社会生活给戏剧创作提供了题

材的宽阔天地。剧作家在看到题材无限广阔的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话剧便于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话剧如果不表现或很少表现新的时代生活，作品的现实感不强，就会日益减弱它的社会作用。座谈会呼吁剧作家在把创作活动的重点转移到反映当前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上来的时候，要重视军事题材和儿童题材的创作，要用战略眼光来看待这两种题材的深远意义，不能仅仅看成是部队剧作家和儿童剧作家的任务，各剧院团都有承担这方面创作的义务。

戏剧事业的发展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我们的戏剧事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其目的和任务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生产戏剧形式的精神产品。因此，制定和掌握戏剧事业发展的正确方针，主要的依据应当是社会主义的艺术规律，而不应当把经济收益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更不能把资本主义商业化的经营方式误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否则，就会导致创作方向、剧团方针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大家认为，在剧团的经济体制还不可能很快解决、物质条件还不可能得到充分改善的情况下，剧作家仍应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建设高度精神文明为己任去进行创作，决不能因一时的经济利益迷误了创作方向。

新时期的戏剧观众也有新的特点。青年是观众中的绝大多数，他们的艺术趣味和鉴赏能力比起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要了解观众的思想感情，通过作品来引导、影响他们，给他们以健康的思想感情的感染、美学上的享受和情操上的陶冶。应该认识到在观众中，不仅有思想倾向的不同，也有美的趣味的争夺，在创作中要准确地把握住时代感和时髦、尖锐和尖刻、通俗和庸俗、轻松和轻浮、创新和猎奇、借鉴和抄袭之间的区别，对某些观众的一些不健康趣味要引导而不要迎合。

繁荣戏剧创作的建议和措施

为加强戏剧创作队伍建设，改善戏剧创作条件，进一步繁荣

戏剧创作，与会同志提出了以下建议和措施：

一、加强对剧作家和评论家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领导，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除不定期地举办创作座谈会、读书会和剧本讨论会、评论会，提供观摩学习和查阅图书档案的方便条件外，建议由文化部和中國戏剧家协会共同创办戏剧进修班，对专业和业余剧作者和评论工作者进行轮训，使他们能集中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文艺方针政策，研究当前创作动向，并讨论修改作品。

二、鼓励和支持剧作家深入生活。各文化主管部门和剧院、团要作出剧作者深入生活的规划。剧作者深入生活的费用应由上级文化部门拨专款。对因深入生活而发生经济困难的剧作者，要酌情给予补助。

三、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剧协，除了加强对创作的方针政策指导，还要加强对创作的组织工作，对各类题材的比例加以调节和平衡，并对基础较好的剧目进行重点帮助。要鼓励剧院、团上演新创作剧目，通过评奖和观摩评比等方式鼓励新创作剧目。对积极上演反映现实的新创作剧目的剧院、团要给以补贴和奖励。

四、为保障剧作者正当权益，提高剧院、团对上演剧目的责任感，要迅速恢复上演报酬制度，并适当提高剧本的稿费标准。

五、设立戏剧创作基金，鼓励创作高质量的作品，对扶植新剧目的剧院、团和优秀作品进行奖励。

六、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戏剧评论队伍，剧协、戏剧研究单位、艺术院校和有条件的剧院、团，要注意培养戏剧评论人员，要为戏剧评论工作者提供学习、观摩和深入生活的条件。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总第6期 1981年2月9日)

中央宣传部召开 群众文化工作座谈会

中央宣传部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在北京召开了群众文化工作座谈会，讨论了贯彻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即中央1981年31号文件)的情况与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分管群众文化工作的副局长，出席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部分代表和特邀代表，以及团中央张道诚，文化部周巍峙、仲秋元、徐光霄等负责同志，共六十余人。中宣部王惠德、李英敏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当前全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方兴未艾，形势很好。目前全国已有县文化馆2902座，图书馆1544座，公社文化站27281个，农村集镇文化中心3780个，农村集镇影剧院19677座，农村电影放映队88074个，面向农村的专业、业余剧团48700个，并且拥有一支100多万人的农村文化艺术活动骨干。

与会者还着重讨论了中央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指示下达前后，农村集镇出现一大批文化中心的重大意义，认为农村集镇文化中心的兴起与建设，是我国农村文化工作在新时期的新发展，将对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作用。当前，以兴办农村集镇文化中心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文化工作，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适应了广大农民对文化生活的多种多样的需求，加强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当前农村文化工作的蓬勃发展，是与全党重视群众文化工作分不开的。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同时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说明了中央对农村文化艺术工作的高度重视。中央(81)31号文件下达后，各级党委十分重视。有的省委书记或宣传部长都亲自抓31号文件的传达贯彻工作，有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到农村文化中心视察工作。

会议还总结了近两、三年来，我国农村文化工作蓬勃发展的主要经验。

第一，中央提出的“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讲求实效、稳步前进”的发展群众文化工作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十亿人口中有八亿农民，离开了农民，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一句空话。我国农村基础差、底子薄，文化建设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水平，必须根据农民群众的需要，进行积极的引导，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而不能强人所难。

第二，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主要依靠集体经济，依靠群众，才能办好。与会者认为要迅速开展农村文化工作，迎接广大农村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一定要破除依赖“官办”的思想。两、三年来的实践证明，依靠集体经济、依靠群众力量，是能够迅速发展农村群众文化事业的。安徽滁县地区这几年党委重视群众文化工作，发动群众破除了依赖“官办”的思想，依靠集体经济力量和广大农民自愿集资，建成社、镇文化中心134个，占全区社、镇的50%以上。湖南南县八百弓公社从社办企业的盈利中拿出40多万元建设影剧院、电影队和花鼓剧团，建成了设备齐全的农村文化中心和布局合理的文化网点。广西有48个县，依靠集体经济办文化中心的钱比国家的补助多四十倍。许多地方的农村文化事业，还创造了各种“半工半文”，“半农半文”，“以文养文”的办法。

第三，抓住文化中心，作为推动农村文化工作的中心环节。农村文化中心是符合群众愿望、适应历史潮流而产生的新生事物，

它一般由影剧场、电影队、剧团、图书馆(阅览室)、游艺室(俱乐部)和体育场组成，集文化、艺术、教育、科普、体育于一体，在满足农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生活的需求、建设农村精神文明方面，担负着多方面的重大责任。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能使农村文化工作顺利开展起来。上海南汇县新场镇党组织将镇上原有的文化馆、俱乐部、体委、少年之家和公社所属文化站、图书室合在一起，办成一个文化中心，广泛开展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每天都有三、四千人参加，被群众誉为“歌咏镇”、“体育镇”、“科学镇”，做到电影说书日日有，演出比赛月月有。

第四，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调动各方面力量通力合作。与会者认为，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涉及到许多部门的工作。各地文化部门只有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主动地与共青团、妇联、农委、民委、教育、科学、文联各协会、广播、出版、体育、卫生等有关部门密切合作，才能搞好农村文化工作。安徽天长县郑集公社党委把原来由文化站、电影队、剧场、剧团负责人参加的“文化中心站”，改组为“文化中心建设委员会”，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吸收共青团、妇联、民兵、教育、卫生、农技等部门参加，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统筹规划，使文化中心的建设，从文化部门的活动范围，纳入党委的全面工作规划和集镇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从而使文化中心设施齐备，组织健全，活动内容也丰富多彩。

第五，以民族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与会者认为，要尽量提倡那些新的、上进的、健康的、富有思想教育意义的文化活动。同时，也应该允许那些没有什么坏处而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具有娱乐作用的文化活动，让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去占领农村文化生活阵地。要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有害活动，防止城市中某些不健康的东西影响农村。只有这样，才能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把农民群众引导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轨道上来。

为了巩固成绩，进一步推动农村文化工作，与会同志提出今

后应着重解决下列问题：

第一，要继续提高各级党委和文化部门对农村文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党委，把农村文化工作仅仅看作是文化部门的事，圈圈一画，推给有关部门了事。这种思想如不克服，必将阻碍农村文化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第二，农村文化工作发展不够平衡，“山边老少”地区、贫困省份急需国家重点扶持。与会者希望国家能拿出专款，发展“山边老少”地区的农村文化工作，迅速改变文化上“有边无防”或防线薄弱的状况。

第三，社会各方面支援农村文化工作不够。与会者认为，搞好农村文化工作需要各方面的支持、配合。目前对影片、戏剧、书刊需要很迫切。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的体制，急需改革，应将社队电影队划归公社文化站所有，以便调动社队办电影的积极性；许多省的同志建议，农村图书的发行代销工作，也应划归公社文化站。

第四，要解决文化站工作人员的待遇问题。中央31号文件提出，可参照民办教师办法管理，这还不够明确。现在公社文化站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社办公助，集体编制。因此，人心不太安定，队伍不太巩固，希望能从现有国家职工中调整解决。

第五，加强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需要成立一个群众文化学会。有十多个省的同志倡议，要求成立一个学术性的群众团体，以促进群众文化工作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

(总第9期 1982年3月15日)

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 批准《关于召开军事题材文学创作 座谈会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就关于召开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问题，向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请示报告。这个报告，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张光年同志和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刘白羽同志共同签发的。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批准了这个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军事题材文学创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重要方面。发展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革命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用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教育部队和广大青少年，鼓舞斗志，加强战备观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国以来，我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曾出现过比较繁荣的局面，但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这些年来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却比较缓慢，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不多，军事题材作品的发表、出版和获奖数字也都低于其他题材的作品。这一现状，与我国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需要，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很不相称。近几年来，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曾就发展军事题材文学创作问题多次作过指示。为贯彻这些指示精神，推动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和总政治部文化部的负责同志多次共同研究，建议在一九八二年上半年联合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

谈会。现将召开这次会议的设想和有关事项报告请示如下：

一、会议的目的：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宣传发展我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号召和鼓励作家积极从事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交流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经验，进一步增强军内外作家的团结；研究当前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中需着重解决的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为军内外作家深入部队生活和进行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创造条件。

二、会议的组织：座谈会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总政治部文化部联合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初定为一百五十人（包括工作人员），主要是有战争经历的老作家和有志于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中青年作家，以及部分文艺评论家和有关报刊、出版社的编辑、记者。座谈会拟于四月十五日前后在北京召开。会期十天左右。会议地点拟在京西宾馆。

三、会议的领导：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总政治部文化部有关负责同志组成筹备小组，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会议开始后筹备小组即为会议领导小组。

经协商，筹备小组拟由以下十人组成：

组 长：巴 金（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副组长：刘白羽（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张光年（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成 员：冯 牧（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朱子奇（中国作家协会常务书记）

葛 洛（中国作家协会常务书记）

魏 巍（中国作家协会书记）

张少庭（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胡 可（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李 瑛（解放军文艺社社长）

四、请领导同志讲话和接见：座谈会拟采取大会和小会相结合的方式。除开始时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同志讲话和总

政文化部部长刘白羽同志作主题发言外，会议后期拟请中央、中央军委、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到会讲话。会议结束时，请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接见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人员。

五、会议的宣传：全国性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鉴于发展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重大意义，建议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的主要报刊及时播发座谈会的新闻和会议主要讲话，以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

六、会后的工作：这次座谈会是加强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开端，会后要做大量的组织落实工作。总政文化部和作家协会商定，今年将组织五十名军外作家到部队深入生活，这对军内作家深入生活也将是一个推动。条件成熟时，中国作家协会将和总政文化部共同协助作家拟订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规划，并尽可能为作家提供必要的创作条件。

(总第8期 1982年3月8日)

中宣部召开西北五省(区) 文艺座谈会

中宣部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在西安召开了西北五省(区)文艺座谈会。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主持。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西北五省(区)党委宣传部及文化局、文联、作协的负责同志共二十七人。会议从十一月十五日开始至十一月十九日结束。座谈会结束时，贺敬之同志作了讲话。

西北地区属老、少、边地区，战略上居于重要地位。这个地区，不仅有着优良的革命文化传统，也有着悠久的古代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特殊意义。较为系统地、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地区的文化建设状况，对于贯彻十二大精神、开创文艺事业的新局面，是必要的。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首先汇报了本省(区)文化艺术系统学习十二大文件的情况，提出了本省(区)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的打算，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设想、意见和建议，还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

西北五省(区)在困难的条件下，由于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努力，近几年来，作出了不少成绩，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也产生了一些好的作品，如《丝路花雨》、《西安事变》，以及最近创作的《仿唐乐舞》，等等。

与会同志在座谈会上作了有准备的发言，主要谈到了下列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应当重视文艺，把它当作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大家还建议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应有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二、对在老、少、边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文艺事业的重要性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对他们的特殊性和困难应予照顾。

三、某些地方严重存在谁占领文化阵地的问题。有的地方党支部开会要请喇嘛去号召，党支部的话甚至没有喇嘛的话灵。有的共产党员退党，说什么前半生信仰马列主义，后半生要信佛爷。

四、知识分子“内流”（即纷纷往北京和内地调动）问题相当严重。北京和内地的某些单位，向西北五省（区）地区挖墙脚。如甘肃培养的三个“英娘”（《丝路花雨》中的女主角）都在北京找了男朋友。

五、经费问题。文化经费太少是西北地区存在的普遍问题。有的省的文化经费在全国总平均数以下，有的县今年文化经费只有两千元，有的县全县上小学的孩子只有九个。

随同贺敬之同志前往参加西北五省（区）文艺座谈会的还有中宣部文艺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国文联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大家认为，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地方上召开文艺座谈会，这种工作方法是好的；参加西北五省（区）文艺座谈会，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教育，开了眼界，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西北地区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了解了这个地区的特点和长处，以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对于根据十二大精神开创文艺工作的新局面，是很有好处的。

贺敬之同志根据十二大精神，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座谈会结束时发表了系统的讲话。

（总第26期 1982年12月15日）

关于文艺界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总政文化部，中央宣传文教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经陈云同志校阅，即将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编选了陈云同志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八三年有关评弹的谈话、文稿和通信共四十篇。陈云同志的这本著作，不仅对我国评弹艺术在建国后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而且对党和国家的整个文艺工作，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如：关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衡量作品的好坏的根本标准是对人民是否有利；文艺要反映现实斗争、要跟上时代要求，现代题材的作品应当占主导地位；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加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加强文艺评论，克服单纯追求票房价值的错误倾向；要正确对待传统书目，既说新书，又努力保持传统书的精华；重视文艺队伍的建设，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著作，要深入生活，要提高责任感，要出人、出书、走正路等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都作出了精辟论断。这本著作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它在一些重要方面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艺战线的整党和反对精神污染，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生活需要，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希望你们在整党和反对精神污染中，结合学习《邓小平文选》，结合学习中央〔1983〕36号文件和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重要讲话，组织所属文艺单位的同志认真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深入领会精神实质，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通过总结经验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思想水平，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把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推向前进。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可组织若干谈学习体会的文章和有质量的评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把学习逐步引向深入。组织学习的情况，请告知我们。

中央宣传部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总第45期 1984年1月6日）

本刊编者按：为了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指示精神，使文艺评论工作在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文艺方针指引下，更加健全地、有效地发展起来，以推动社会主义文艺进一步繁荣，中共中央宣传部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河北涿县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这里摘要发表贺敬之同志、陈涌同志在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贺敬之同志在文艺评论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这次会议的小结。再一个是讲这样一个问题：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

先讲第一点。这次会议很重要，虽然开得晚一些，也还算是及时的。为了贯彻小平同志四月三号的讲话和在此之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中宣部召开了这次座谈会。会议比较认真地学习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三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讨论，同志们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这次会是有成果的，是开得好的。

我们研究了当前文艺评论工作方面的问题，对于如何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组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对于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性和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三中全会以来文艺评论工作的成就和今后应该明确

的指导思想、任务、方法和措施等问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也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原来中宣部文艺局起草的《关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意见》(讨论稿)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比较好的文件。另外，会议对《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讨论稿)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有些意见讲得很正确、很深刻，十分有助于这个文件的修改。这对于文件的形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冯牧同志作了一次发言，同志们认为讲得很好。这个文件，还要在文化部和总政文化部的一定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讨论。要把冯牧同志的讲话整理出来，供有关部门讨论时参考。

我们这次会也有一些不足。首先是时间稍嫌短了一些。其次，这次会议还可以多请一些有创作实践经验的同志和对文艺组织工作有经验的同志同我们一起讨论，就会更好一些。有些受到邀请的同志因故没有能够到会，今后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

第二点，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

耀邦同志提出，要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耀邦同志的号召，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人的要求，也是我们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同志奋斗的目标，更应该是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文艺评论工作者和文艺的组织工作者，在这次会议结束的时候，再想一想耀邦同志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的文艺队伍中，并非每个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也不能提出这种不切合实际的要求。一个文艺工作者只要他在政治上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尽管他在世界观上还不是或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同样要团结他，帮助他，和他一起前进。在文艺界还存在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作为知识分子队伍一个重要方面

军的文艺界，绝大多数同志正如中央所估计的，已经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存在什么还要转移立足点——也就是转变政治立场的问题。但是，就哲学思想和世界观方面来说，就思想意识来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既要做团结的工作，也要做宣传的工作，批评的工作，教育的工作。另外，即使对于不仅是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世界观上也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这样一些人来说，我们也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是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理论的彻底性和坚定性，并真正有所作为。

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队伍是好的，多数是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并能自觉地以这种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的。虽然如此，我们今天讲这个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要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很不容易。人们常说自己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但要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就要付出长期的努力。象我们这样的老一些同志，参加革命比较早，是搞马克思主义的，过去做过许多工作，在“四人帮”时期或在此之前也受过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连命也几乎丢掉；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腰杆挺起来了，受到了尊敬，也发出了我们的光和热。但是，能不能说这些年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我觉得完全不能这样说。在新的、复杂的情况面前，我们有时就不那么坚定、不那么清醒甚至是很不清醒的，至于说“有作为”那就更谈不上。我们绝不能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应该采取比较谦虚的态度。因此，对我们来说，提出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谓“坚定”，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们的旗帜是不能模糊的。十年动乱时期，马克思主义遭到极左路线的歪曲和反革命的严重破坏。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批判极左

路线、提倡思想解放的时候，在对外实行开放的条件下，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思潮，即怀疑或否定我们的旗帜，怀疑或否定我们的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总的来说是坚定的，但有些人有些时候就不那么坚定。在少数同志中，反映出一种思想，好象不应该再讲共产主义，不应该讲纪律性，一讲就是“左”，这是什么逻辑呢？这几年有些同志“言不及义”，不“及”马克思主义，不“及”社会主义，一听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认为是老一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我们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的、教条的、歪曲的解释，清除“左”的影响的时候，一定要坚信我们的旗帜和方向，不能动摇。所谓“坚定”的第二方面的意思是，我们在拨乱反正的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缺点错误的时候，要坚定地相信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要坚定地相信和肯定主流，坚定地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是必须发展的。如果不发展、不前进，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对于前进中的缺点错误，当然要纠正，不纠正是不行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天要塌了。在这种情况下，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应该说，有些缺点错误的确是不可避免的，绝不能因此就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方针，不能一碰到新的问题就走回头路，就想回到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左”的一套的老路上去。在我们文艺评论工作中，上述两方面的情况都有所表现。不久前，中央提出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态度应当是：一要坚持，二要发展。这样两个方面都要求我们有坚定性。有这两个方面的坚定性，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的完全的坚定性，真正的坚定性。

我们要坚定，还要清醒。从整个形势和历史潮流来看，要保持头脑清醒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大胜利和大挫折，都容易造成人们头脑不清醒，即所谓胜利冲昏头脑或失败吓昏头脑，我们是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因此，我们要能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避免片面性，避免夹

杂个人的、主观的因素，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很不容易的。在如何看待成绩的问题上，我们的一些同志常常不能有比较一致的语言，这与思想上的主观性、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头脑不清醒是有关系的。有的人只想到自己“过五关斩六将”这一面，而不愿谈“走麦城”的那一面。有的人摆出一副一贯正确的姿态指责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说自己从来主张如何如何，这也是一种片面的、不清醒的表现。几年来的成绩是显著的，是党中央领导的结果，有人就是看不到这个主流，这也是不清醒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是不是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了界限，对这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不是有了正确的认识呢？有没有象小平同志所批评的那种“漫无边际”的、没有道路、没有目标的所谓“思想解放”的情况？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也有不清醒的时候呢？很值得想一想。

这次文联全委会期间有些同志提到，象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有部分文艺期刊编辑搞的那次会议那样的情况，我们的一些同志要引为教训。参加那次会的有许多老同志，但所表现的思想情绪能说明他们是坚定的、清醒的吗？我们大家都应当记取这个教训。现在看来，去年在中央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期间，严肃地指出这种错误思想情绪发展下去会达到什么程度，指出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的危险性，是多么必要。象有些人提出要“突破”一切，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提出“可以和中央唱对台戏”等等，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能不是危险的吗？对这件事，不管是文艺界内部还是外部，多数同志（包括干部和群众）是很不满意的。有的老革命家，多年来一直是为文艺界讲话，并且尽一切努力保护文艺界同志的，在知道这些情况时也很痛心，很生气，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的。

关于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中央很早就讲过，而且不断在讲。但在实际上，我们有一些同志却是不赞成的。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单打一，只看到或只强调一方面的倾向性问题，看不到或

不愿看另一方面的倾向性问题。这边有的人不承认有什么“左”的问题，那边有些同志则用各种办法否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存在及其危害性，这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讲：“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有些同志就不同意，但我是同意的。可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决不能够低估，从已经表现的情况来看，低估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会犯严重的错误。如果说“左”的流毒用“根深蒂固”来形容，那么，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恐怕也必须用类似“源远流长”这样的词句来形容。要看到这个情况，有历史根源，有国际的条件嘛！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肃清封建思想，我们还有这项任务，但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轻视。两条战线斗争不是很容易的，我们要经常清醒地看到两种倾向，自觉地进行必要的、有效的斗争，这不是件小事。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防止主观片面性。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就有过很大的片面性。党中央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有的同志就是接受不了。乔木同志在文联全委会最后一天的茶会上讲了这个问题，讲得很好。他讲话的基本精神已被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所接受。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了？也不一定。现在就有这种情况，有的暂不发言，有的采取保留态度，也有人继续持反对态度。即使在赞成的人中间，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如果有人把乔木同志讲话精神理解为文艺是可以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那是绝大的误解。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但也不赞成文艺脱离政治。这是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1980年初正式讲话中说过的，也是乔木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一致的意见。乔木同志这次讲话中还特别提到“我们文学的主流要拥护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利益，要表现强烈的政治主题”。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来说，当然也不能是脱离政治的。我们是坚决反对庸俗社会学的，一定要讲艺术规律，但我们也绝不主张并且也不认为有什么“纯美学”，有什么与社会生活、

与意识形态绝缘的美学。更不认为有与政治根本无关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在党对艺术的领导这个问题上，在强调艺术规律、反对简单粗暴的同时，也要注意从另一个片面来做的曲解。列宁的原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的重新译本和解释的文章大家已经看到了。狭隘地把文学这种广阔的社会现象理解为只是党的工作的齿轮和螺丝钉，是错误的，这是多年来文艺上“左”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现在到了必须纠正的时候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完全不是认为党对文艺工作不必进行领导或者不能进行领导。完全不能认为党员文艺工作者不应该首先是个党员，其次才是文艺工作者。现在，偏偏有些党员文艺工作者口头上讲文艺是党的“螺丝钉”，而行动上却根本不遵守党的纪律，没有党的观念。党对文艺工作的各个方面的领导，都有一个既要加强，同时也必须改善的问题，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领导也是如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能借加强之名恢复过去“左”的一套，有时也要注意借改善之名削弱或否定领导。党对文艺评论工作必须领导，党领导文艺评论工作是实现党对整个文艺工作领导的重要方式。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对。有同志担心现在我们这样提法会不会影响争鸣的积极性，也就是影响双百方针的执行？不，不能这样看。党委对文艺评论工作的领导，首要的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党的领导不仅不会妨碍双百方针，而恰恰是为了纠正那些妨碍贯彻双百方针的错误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大家一定会这样认识：双百方针不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执行双百方针恰恰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也就容易求得比较一致的这样的认识：党的领导在坚决贯彻双百方针的同时，必须组织和壮大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队伍；在发挥争鸣、各抒己见的同时，必须对重大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问题有计划地组织具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文章。在去年批评白桦同志的时候，中央及时地作了一系列指示，直接地领导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这次批评是方针正确、

具有相当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一次成功的批评。总之，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防止出现主观片面性，特别要防止在观察、分析问题时常夹杂个人的情绪，个人利害的考虑。夹杂了这种因素是不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的。

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容易被对方激怒。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犯错误。在我们的国家里，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采取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文艺评论也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我们要警惕一怒之下犯错误的可能。有时做文章专攻一点进行夸大，就把问题的另一面给忘了，甚至离开了我们原来的阵地和出发点。如果我们不清醒，这种斗争就无助于提高水平，也无助于增强团结，甚至使我们的文艺评论从正面走向反面。在我们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时候很容易被人认为是“和稀泥”，受到两面夹攻。在这种情况下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全面地看问题，和折衷主义不是一回事。折衷主义表现为既是这样，又是那样，既不这样，又不那样，不分是非、不分正确错误地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我们是要分清是非的，这决不是什么折衷主义。

我们还要做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我们的文艺界，我们这支马列主义的文艺评论工作队伍是有希望的，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且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要想有所作为，不仅要有正确的立场、坚定的信心，还要有坚实的基础。这首先是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坚实的马列主义哲学基础。我们想要做到坚定而不动摇，清醒而不迷乱，并且真正有所作为，有一个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美学基础)是头等重要的问题。现在应该看到，我们有的同志之所以发生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失误，绝大部分并不是因为立场问题或动机不良，而是世界观方面没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另外，还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不仅搞创作的，而且搞文艺评论的和做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的同志，也都应该了解社会生活。完全靠书斋里的东西是不行的，要

走出书斋，了解社会。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社会主义的文艺是群众性的文艺，社会主义的文艺评论也是群众性的活动。我们现在搞评论不是很简单的事，而是关系到一个十亿人口大国的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我们作为一个评论工作者，写文章、办刊物，都要考虑它的群众性问题。

我们还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好作风。优良作风的锻炼和坚持，也应该是我们要求的坚实的基础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家的作风问题是很重要的。这里可以提到的有两点，一是精神状态问题。我们有的作家同志过去受了委屈，事情已经解决了，就不应该老是心有余悸，遇事过于敏感，稍遇挫折就悲观失望，牢骚满腹。这样的精神状态是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的。我们的评论工作者同志们是否也有这种情况呢？二是要发扬三大作风，首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现在文艺界有些同志不大能够听取批评，另外有些人不仅自己不接受批评还要盲目地替别人打抱不平。有的同志也讲开展批评，但他只能批评别人，而他自己则老虎屁股摸不得。《文艺报》在批评白桦同志的问题上曾作了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效果也是好的，证明做自我批评是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的。我们要树立起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作风。文艺评论工作者是评论别人的，其中有表扬，有批评。既然要批评别人，首先自己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若能在文章中做诚恳的自我批评，在“本刊评论员”一类的文章中对本刊物的问题作自我批评，这正是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表现，是有出息的表现，而决不是示弱的、丢面子的表现。

今天我讲的，是一些肤浅的、不成熟的看法，讲错了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我坚决相信我们的文艺工作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文艺评论工作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家正在形成一支坚强的队伍。我们要加倍努力，为开拓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评论工作的新局面，贡献我们的力量。

（总第19期 1982年8月29日）

贺敬之同志关于起草《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的谈话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我讲这么几点：

一、起草《关于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的必要性。这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也是挨骂的事情，但是不搞不行。这是中央交办的事，我们已经拖了两年，当然有客观原因。但是我们抓得不紧，应该抓得更紧一点。做这件事的必要性，至少有三点：第一、就是正确总结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二、在重大的文艺历史问题上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第三、有助于加强文艺界的学术研究，使文艺界在一些历史问题上的学术研究少走弯路，可以更健康地发展，而不是给学术研究以限制。至少这三点，说明有必要搞。现在也有条件起草这个文件，十一届六中全会开过了，公布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艺界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应该说比过去也好了。那种认为搞这种东西没有必要，会妨碍百家争鸣，甚至说由中宣部这些人搞，只能代表一派的意见，都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有点志气，发挥我们的能力和干劲，把这个工作赶快抓起来，做好。

二、我们起草这个文件，不是写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是总结党怎么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把一些历史上成为问题的那些问题弄清楚。即使是搞党领导文艺的那些问题，也是着重关键的问题，重大的问题，以及现在还有争论、需要有一个结论性意见的那种问题。贯彻“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也就是这

个意思。

具体的可以包括哪些方面，需要排一个队，大体上说，可分三个方面：

1. 党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口号，以及重大的理论问题，应当弄清是非，作出正确的评价。

2. 在这些方针、政策、路线、口号、理论的指导下，革命文艺运动中一些主要的、全局性的重大事情的功过是非。谈这些问题，都是从党的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象文学史那样什么都谈。

3. 涉及一些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难，但回避人是不行的。怎么写？恐怕还是写文艺界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性的、领袖性的人物，或者有重大争议的代表性的人。首先在这个方面要有选择。如何写也要考虑。有的是在谈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中提到这些人，起了什么作用，不需要列出一个名单，专门对每一个人写一段鉴定书式的东西。另一种写法，就是在谈文艺论争时，叙述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写到这些人，包括党对他进行了什么批评，是否正确等等。比如大家争议比较多的冯雪峰同志，还有胡风等同志，不过他们的问题好说，中央都有了文件。

三、要形成一个文件，问题要比较概括，不能太多的论证和引用大批的材料，那写一本书也写不完。我们的目标，还是送中央批准的一个文件。文字上要简明扼要，当然要比科学，比较准确。有些问题和材料可以考虑：一是加注，一是必要的时候搞个附录。

总的来说，就是明确我们起草的这个东西的目的、要求、指导思想。它不是一本书，不是文章，是一个文件，搞完文件之后可以搞书。

概括起来，有这么四句话：

弄清关键史实，分清主要是非。

正确总结经验，团结一致向前。

（总第38期 1983年9月10日）

贺敬之同志关于文艺的革命化、 民族化、群众化问题的一封信

龚定平同志：

你的来信并耿风阁同志文《一幅好宣传画》^①已收阅。因忙未及时复信，歉甚。

我的确喜欢你的这幅《优生良育》。当然也喜欢此次画展上其它获奖作品。那天参观时，对你的这幅画我是说过耿文中提到的那句话的。

我和许多同志的看法一样：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并需尽最大努力提倡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斗争生活，表现十亿人民向四化进军的阔步雄姿，足以给人信心和力量的作品。这当然不是说不再要多样化，更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所谓“放弃”双百方针。要百花齐放，同时也要有重点，即或者贯彻始终或在某一时期应当侧重提倡的东西。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是文艺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仍然必须坚持自己鲜明的革命性、民族性和群众性。说坚持，当然是和发展分不开的，因之也就必然是和时代性相一致的。在五十年代，周总理对音乐舞蹈提出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我一直认为，这同时也是适用于其他艺术部门的。可以肯定地说，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指导原则。

^① 耿风阁同志的文章发表在《新观察》1984年第1期。

无数事实早已证明：艺术家自觉地实践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通过艺术真实和艺术美的创造，直接或间接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作宣传(其中有的甚至是直接宣传当前任务，如宣传画)，这样做并不是对缪司女神的亵渎或贬斥，而恰恰是对艺术自身的品格和价值的肯定和提高。这一点不仅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是对中外一切进步文艺传统的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发展。当然，这决不是要求所有形式的作品都必须表现同样的内容并实现同样的宣传目的。也决不是“悄悄地同意”恢复过去曾流行过的图解政策、机械配合、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做法，更不是“拐一个弯”又回到有些人走过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老路上去。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所要求的，向来是、也只能是社会目的和艺术方法的一致，思想和形象的一致，内容和形式的一致；概括言之，即政治与艺术的一致。

毛泽东同志在三十年代就提出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问题。他以后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时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的特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对民族化、大众化问题更进一步作了论述。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耀邦同志在一次同文艺工作者谈话时重新肯定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个著名的公式。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经验已充分证明了以上这些论断的正确性。近年来关于“走西方现代派的道路”的争论，从反面又作了再一次的证明。这里还可以再补充一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这一要求，至今看来同样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把它看作一条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今天尤需加以贯彻实行。当然，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老百姓在精神、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已有空前的提高，这是自不待言的。而“喜闻乐见”并不是

实现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当然不是说只能搞“通俗文艺”或称“通俗形式的文艺”。但无疑发展通俗形式的文艺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对此重视不够，这是应当改进的。在今天重新提起鲁迅重视连环画的往事，对我们是极有教益的。他说过连环画作者中可以出米开朗琪罗，我确信这是至理名言。由此可以引申，我想也可以说，宣传画作者中也能出达·芬奇或顾恺之，正如在通俗话本的基础上可以出施耐庵和赵树理一样。

由于看到你的作品和读到你的来信，引发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以上这些与作品本身无直接关系的话。班门之外，实有求教之心，并无弄斧之意。所说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祝你创作丰收，取得更大成就。

敬礼。

贺敬之

二月十五日于北京

(总第47期 1984年3月18日)

贺敬之同志

看塘沽版画展览后的谈话(摘要)

(一九八四年三月三日)

我对版画艺术是个门外汉，但是，我很喜欢。前几天接到秦征同志给我的信，今天又看到蔡若虹同志在《北京日报》发表的评介文章，很想来看看。看后很高兴，感到今天下午生活得很充实，谢谢同志们。

现在，文学艺术如何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表现工业题材，是很大的问题。我感觉文艺界在这方面突破的不多。值得高兴的是，文学方面，天津的蒋子龙同志有了突破。现在，艺术方面，又出了个塘沽版画。你们身在生活之中，将塘沽的生产、建设用版画艺术表现得这样令人神往。在短短的时间里，这个展览使观众进入一个新的天地，新的世界。虽然画面多半是表现建设场景和劳动场面，刻画人物的不多，但每幅画都表达了人物的感情，表现出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士兵改天换地的豪迈性格和英雄气概，而且表现得这样美。特别是这些作品都出自业余作者之手，令人感到版画很有发展前途。

我们提倡文艺的题材、风格要多样化。但是要多表现新的生活，表现新时代的主人，表现他们的豪迈性格，表现他们昂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不能整天“伤痕”啊、悲悲切切的，不能老是这样。听说天津市委、你们塘沽区委的有关领导部门都注意坚持这一点，并作出成绩，这是很好的。

专业与业余是两个方面军，不可能截然分开。要特别注意支

持业余作者，培养工人艺术家，秦征同志在信中谈了你们的情况，你们这支队伍非常可爱，很值得注意，是大有希望的，对开创文艺工作新局面很有意义。对此，天津市委十分重视，这也很好。文艺需要有党的领导，对艺术的领导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你们党委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是成功的，既敢于领导，又善于领导，这是一个好经验。

最近大家都在学习胡乔木同志的文章，要认真学习。你们的作品就没有“异化”！版画表现出工人阶级先进的思想感情，主人翁的感情，是有觉悟的工人的形象。上次看全国宣传画展览，感受很深，这次看版画，又有新的感受，不说篇篇好吧，大多数的作品都好。过去看过苏联的版画展览，也没有你们这样集中。表现工业题材难度很大，这方面你们有新的开拓。对此，要多加注意和宣传，报纸上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作品也要选发一些，还要到全国巡回展览，特别是工业城市。

诚然，创作要有技巧，不掌握技巧是不行的，但生活更重要。现在你们已经掌握了基本的东西，今后还需要更大胆一些。直接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作品还可以多搞些，有些作品有点雷同，要不断创新，新而又新。我相信，你们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你们市里谁来过了？（答：“市委常委白桦、萧元及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都来看了。”）请你们回去向白桦、萧元等同志汇报一下情况。

粉碎“四人帮”以后，整个文艺界的工作都有了很大发展，近一、二年，我们除表扬成绩以外，也开展了一点批评。有些同志担心开展批评会挫伤积极性，从这一年多的情况看，并不如此。事实上，思想健康了，方向正确了，路子反而更宽了，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看了几个美术展览，都有新的内容，都是很好的。中国美协很注意这方面的工作，提倡的很对头，路子很对，做了应该做的工作。

（总第50期 1984年5月29日）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 关于电视问题的谈话

（一九八三年五月）

最近到有的县看了一下，看见竖起的收看香港电视的鱼骨天线越来越多。对收看香港电视如果不认真的管，我觉得是个问题。我们先不评论香港电视有多大的毒，什么下半夜有黄色片子等等，但也不能说它没有问题，它毕竟是资本主义的电视，它宣扬的是资本主义，而不可能宣传社会主义，不可能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现在有几项工作是难做的，一个是计划生育，二是拆鱼骨天线，还有个物价和奖金封不封顶问题。特别是计划生育、拆鱼骨天线这两件事更难做。

拆鱼骨天线反复多次。顺德的群众说，不久前，为了看世界杯足球赛，很多人收看香港电视（我们的电视没转播那么多），从那以后，鱼骨天线又多起来了。县委领导说，香港电视不象人家说的那样坏，看一看没什么了不起的。看来，收看香港电视之风停不下来，主要是县委态度不坚决。一些领导干部家里也看香港电视，这样还怎么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有的同志在打听“任书记对鱼骨天线有什么说法”。我能有什么说法呢，我的说法是按省委的文件办（省委〔1981〕74号文件）。前一时期，广州市认真做了工作，把鱼骨天线都拆下去了，最近开始又有反复。我看，不能放任自流，还是要管。

先不必争论香港电视有多么大的毒。但是，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特别是作为党政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你每天看香港的电视，而不看我们自己的电视，党中央和我国政府通过电视传播的声音你听不到，国家大事你不知道，我们的电视所介绍祖国的风光、面貌你不知道，我们电视介绍祖国的历史、文化你不知道，四化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经验你也不知道，你就知道香港那些事，这样日久天长，能不落后吗？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不成了政治问题吗？还有，一些地方，特别边境地区，全家老少都看香港电视，天天给青少年和儿童灌输香港那套东西，这对他们会带来什么影响，不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吗？有的地方，农民靠党的政策富裕起来了，买了电视机，但却不看我们的电视，天天看香港电视，白天劳动，搞社会主义，晚上就到香港去了（看香港电视），这不是问题吗？宣传党的政策的内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劳动致富的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情，香港电视里是没有的。

有些人说我们的电视节目不丰富。节目丰富不丰富，这也要分析。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上来说，香港电视都远远不如我们的电视。我们有些党员、干部、群众由于艺术欣赏水平不高，对粗俗、无聊、打斗、花花绿绿的东西津津有味。当然，香港电视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例如他们播出时间长，技术上先进，画面清晰等。应当指出，我们广东省电视播出时间在全国是最长的，节目也比较丰富活泼，邻近几个省的群众都给我们的电视台写信热情赞扬。中央有些领导同志来广东看了也称赞。

省委早就决定（省委〔1981〕74号文件），领导机关、党员、干部要带头不收看香港电视。身为党员、干部，组织决定了就要执行。党员对组织的决定，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执行。个人服从组织，这是纪律，每个党员、干部都要遵守。难道不看香港电视就憋不住了，就过不了日子了？如果一个县委、一级党组织，连教育党员不看香港电视这点都做不到，还有什么战斗力！党员、

干部都应听我们的广播，看我们的电视，关心国家大事，天下大事。过去，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我们没有电视，没有报纸，靠开党小组会还要讲讲国内外形势。现在我们有了报纸、电视天天讲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党员、干部都要收听收看我们自己的广播和电视。对党员也可以搞个关于国内、国际大事的测验。

宣传部再想几条道理，不要光是简单地讲香港电视有毒、黄色，还要讲更多的理由，要讲得更有说服力。不收看香港电视还是要从领导机关、干部、党员、团员做起。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嘛！

总之，我们对收看香港电视，不能束手无策。党员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如果思想不通，在组织上也要服从。不看香港电视问题，对群众，不便于搞立法，可以由群众自己订公约。顺德有一个中学为了保证学生的学习和休息时间，规定每周只准看一次电视，效果好。要调查一下，总结推广这个做法。

我们并不一概排斥外来文化，包括电视。中央电视台也转播外国电视台的节目。香港电视如果有什么好的节目，必要时我们也可以引进，转播。历来是这样做的。但是，家家户户直接收看香港电视是不行的。

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把我们的电视搞好，要延长播放时间，增加频道，丰富内容，提高清晰度，进一步搞好字幕。能不能锦上添花，搞得更好点，时间更长点，晚上播到十二点（现在是十一点半）早晨七点就开始播放？能不能增加一个频道？“黄金时间”节目要弄得特别好。还要提高清晰度。

党员、团员要带头收看我们自己的电视；下定决心搞好微波传输，使群众收好看好；对台湾的反动广播，要进行干扰。

对于收看香港电视问题，过去省委发的通知要继续执行。要从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高度，进行正面教育。不是理屈词穷，而是要理直气壮。不能只用简单化的办法禁止收看香港电视，还要用积极引导的办法，提倡看我们自己的电视、听我们自己的

广播。报刊上要造舆论，要宣传收看我们自己的电视、收听我们自己的广播的好处。

（总第39期 1983年10月7日）

同心协力，辛勤创造， 为开创社会主义儿童戏剧的 新局面而奋斗

——在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闭幕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

周 巍 峙

在党中央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在共青团中央、总工会、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国剧协等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下，我们于八月十日至二十日、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十三日，在长春、南昌分别举办了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大会北方片和南方片的演出。全国有二十二个省、市推荐了六十余个儿童剧剧目，从中选出了三十四出，组成了二十三台晚会，参加演出。另外有九台参加录像观摩。南北两片共演出了八十二场，观众十万余人次。这是建国三十三年来全国儿童戏剧工作者的首次盛大聚会。

这次观摩演出，在创作上、表演上、评论研究工作上都是一次大丰收，对发展儿童戏剧事业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剧目创作上，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呈现出儿童剧五彩缤纷、丰富多采的兴旺景象。共有社会主义现实题材二十四、革命历史题材七个、古代历史题材一个、童话、寓言、神话题材七

个。

这次观摩演出在体裁、样式、风格上也是丰富多样的，除了话剧、神话剧、童话剧之外还有歌剧、舞剧、歌舞剧。特别是出现了京剧、吉剧、豫剧、川剧、蒲剧、谐剧等地方戏曲的儿童剧。戏曲反映现代生活较难，反映现代儿童的生活难度更大。我国戏曲团体数量很多，和人民文化生活的联系最广泛、最密切。全国的表演艺术团体有三分之二是戏曲团体，如果每一个戏曲剧种，每一个戏曲剧团，都能动员起来为本地区的儿童服务，对教育儿童、丰富儿童的文化生活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戏曲创作和演出儿童剧，开了戏曲历史的新生面。

这次观摩演出的评论工作，树立了实事求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取长补短的好风气。许多同志反映：没有走过场，所有与会同志都以平等的态度、认真探索的治学精神，相互探讨，相互磋商，相互启发。大家带着一颗“童心”，以诚相见，说真话，表真心，真正进行了艺术分析，学术争鸣。各种评论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出现了“文人相亲，文人相敬”的动人局面。一致认为评出了水平，评出了质量，评出了信心和团结，真正起到了交流经验、促进创作、锻炼评论队伍和提高质量的作用。当然在座谈会的发言中，不可能每个看法、每个评价都那么准确，那么全面，但总的风气是好的，应该充分肯定。

这次观摩演出，检阅了我国儿童戏剧工作者的队伍，如同办了一期儿童艺术创作和表演的短训班。大家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感到眼界开阔了，路子宽了，办法也多了。不仅老的儿童戏剧工作者有如此感觉，特别是那些在这次观摩演出期间，刚参加到儿童戏剧事业行列里来的许多新生力量，更感到受益不浅。通过这次盛会，壮大了儿童艺术工作者的队伍，提高了为儿童服务重要意义的认识，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重视，推动了儿童戏剧事业的发展，为开创社会主义儿童戏剧新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志们，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制定了振奋人心的战略目标和行动纲领。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的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在十二大精神的鼓舞感召下，今天的祖国一派生机，全国各族人民豪情满怀，意气风发，信心倍增。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强调，“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已作为一个战略方针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并明确指出，是否坚持这个战略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能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又能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胡耀邦同志的这些论述，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根本方向。

全国少年儿童有三亿六千多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在我们学习耀邦同志的报告、特别是上述论断时，可以充分体会到党中央对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关注。一个人的童年时代，正是长身体、长知识、打基础、确立方向的时期。童年的启蒙教育影响深远。邓小平同志说：“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所以，教育少年儿童是百年大计，是千秋万代造福后人、意义深远的大事。儿童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根据党中央领导同志报告讲话的精神，有三点特别和我们少年儿童工作有联系，我在这里强调一下。第一，耀邦同志讲，社会风气好转的一个基本措施就是在全国青少年中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纪律教育。也就是说，我们教少育年儿童的工作，和社会风气的根本转变有密切的关系。这里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由于过去“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后果，有少数少年表现不健康，有的犯错误，有极少数甚至还犯了罪。我们要加强教育，使犯了

错误的得到改正，使误入歧途的走上新路。这些方面已获得很大成绩。另一方面要在少年儿童当中进行五讲四美教育、优良品德教育、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现在有很多优秀少年儿童，学雷锋、做好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表现使人感动，使人兴奋。也可以说，少年儿童在没有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之前，就已经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小兵出现在我们面前。第二，我们教育少年儿童，也可以说，是为了实现我们伟大的战略目标。为我们的国民经济翻两番作人才准备，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不断投入合格的有战斗力的后备队。第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我们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前程，我们从少年儿童教育工作做起，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新人，这是最大的人力投资，也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

因此，从上面一些情况来看，如何针对少年儿童的思想实际，进行有战斗力的、有说服力的、有吸引力的思想教育，丰富他们的知识，充实他们的文化生活，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就显得十分迫切、特别重要。下面提出八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首先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儿童艺术事业的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要加强对发展少年儿童艺术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的认识。我们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更自觉、更勤奋地为孩子们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种籽。精心培育和灌溉，让祖国花朵开得更艳丽，让幼苗健康成长，成为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材。

第二，必须重视儿童文艺创作的时代精神。儿童艺术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对孩子们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美德教育，陶冶孩子们的心灵，把他们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可靠的接班人。我们要真正成为少年儿童的灵魂工程师，在儿童戏剧创作和表演中，努力去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今天儿童

的现实生活，塑造八十年代各种各样儿童的典型形象。尤其是要着力塑造真正能够成为儿童心目中楷模的、真实、生动的英雄形象（包括现实的和历史的）。

第三，儿童处在成长时期，天天向上是孩子的本性。他们有着强烈的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和广阔的审美要求。儿童艺术要尽可能地满足孩子们多方面的精神需要，也包括儿童的文化娱乐的需要。因此，必须提倡儿童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在题材、体裁、格式、风格上要丰富多彩。既要有现实的，也要有历史和童话、寓言、神话的题材。这里要强调一下农村少年儿童生活和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生活题材的创作。因为大部分少年儿童生活在农村，有其特殊环境。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少年儿童应得到我们的特殊关心。一切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思想进步、文化享受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活动，都要提倡、鼓励。

第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必须和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儿童文艺必须和新时代的儿童结合。毛泽东同志指出：了解人、熟悉人，是文艺工作者第一位的工作。邓颖超同志希望所有儿童文学家、儿童戏剧家要深入到儿童世界中去生活。只有了解儿童熟悉儿童才能打开儿童心灵的窗户。

第五，要发展儿童文艺的评论和理论研究工作。目前儿童文艺的评论、研究工作是薄弱的一环，落后于创作实践。评论和理论工作是指导创作、促进创作发展和体现党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式之一。邓颖超同志为这次观摩演出写的《祝贺与希望》中着重提到：“儿童戏剧评论工作是发展、繁荣儿童戏剧创作的重要一环，希望我们的戏剧理论家重视儿童戏剧的研究工作。”

第六，要扩大儿童文艺的队伍和阵地。为了繁荣儿童文艺创作、开展儿童文艺活动，为三亿六千万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要大造舆论，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关怀，取得各界人士的支援。同时必须要有组织措施。全国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在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恢复或新建、扩建了儿童剧团或儿童

演剧队，有的正在筹建。我们相信在会演以后还会有一些新的儿童演剧机构的出现。

第七，关于儿童剧的对象问题。过去有些传统的看法，似乎儿童文艺、儿童戏剧只是给儿童看的，这个问题我们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儿童剧的对象主要当然是少年儿童，但是不是仅仅限于少年儿童呢？儿童剧是否与成人无关，和学校的老师、家庭的长辈无关？少年儿童的思想情绪、性格、习惯等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和成人的思想作风有密切联系的，所以儿童剧也可以说是一种教育儿童的剧。那么谁来教育儿童呢？是全党，是全社会，是学校的老师，是家庭的长者。在生活中，成人对少年儿童有好的影响，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不好作风的污染。对少年儿童有善于教育的，也有不善于教育的，还有那种不教育的，甚至还有唆使儿童做坏事的，所以说儿童剧所表现的儿童生活常常和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的成人有各种联系。儿童剧不仅是为了教育少年儿童，对我们大人也会起到启发的作用，有的内容可能主要还是教育成人的。

第八，如何加强对少年儿童戏剧工作的领导和扶持。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奖励创作，今后还会采取不同形式的调演和观摩演出。二是要鼓励演员，培养新的人才。另外在事业的发展、经费等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将由少儿司负责同志和各省来参加观摩演出的文化局长和儿童戏剧工作者商量一下，对发展儿童戏剧提出一些措施，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发到各地参照执行。

（总第31期 1983年3月25日）

高扬重视文化艺术和 出版发行工作

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从一九八二年到职以来，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及时调查研究、解决文化艺术和出版发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全省文化战线开始出现新气象。

总揽全局，纠正轻视文化工作的偏颇

前些年，河北省各项工作在全国都比较落后，再加上省委领导不是“工业书记”就是“农业书记”，文化工作挂不上号，致使这些部门问题成堆。如文艺上出现了一些象《醉入花丛》等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坏作品，说坏书、唱坏戏的现象在不少地方屡有发生，曲艺人才青黄不接，书店少、布点不合理，广大青年缺乏精神食粮的问题严重，等等。面对这种情形，高扬同志指出：“党的十二大已经明确规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进行。对地市县委领导来说，不但只注意农业忽视工商业是领导思想上的一种偏颇，而且只注意农工商业而忽视教育、忽视卫生、忽视人民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样也是一种偏颇。偏颇就不能总揽全局，而一个地方党委的领导责任却应该是总揽全局的。”他不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这样做，而且自己率先作出榜样。

高扬同志在抓文化艺术和出版发行工作的时候，特别强调服务方向。他认为，文化艺术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坚持为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而在目前，根据形势需要和河北省实际情况，则应强调为振兴河北、建设四化和为农民服务。高扬同志非常关心四化建设的生力军青年们的学习和进步。最近他写信给省文化厅厅长安耀光，提出对图书发行工作应搞大改革，以适应城市中广大青年急于求知的新要求，并要他们组织人摸清全省图书发行的现状，群众的要求，拟一个改进图书发行工作的方案报省委。

高扬还特别强调文化艺术和出版发行工作应当面向农村，积极为占河北省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服务。

狠抓整顿，改革文化艺术管理体制

高扬同志在抓文化艺术工作时，积极支持一些艺术剧团对不合理的管理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以改变过去躺在国家身上吃补贴、靠吃“大锅饭”混日子的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和按劳分配制度。一九八二年，省直剧院团六个单位多数演出场次很少，全年演出收入只有三十八万元，而国家补贴了一百四十七万元。各剧院团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一部分人整年不演出，却照拿工资、补助和奖金，被群众称为“老爷剧团”。高扬得知这一情况后，提出要抓紧整顿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的意见。去年年初，省委书记邢崇智在深入剧团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方案。高扬在有关材料上这样批示：“看来，省直剧团的改革非咱们亲自抓不可。”省歌舞剧院歌剧团向高扬写了他们准备深入农村为农民演出的信后，高扬写了批语：“赞成这个队去闯路子，在经济上给予保证，个人收入不低于去年，否则，影响闯劲就因小失大了。”后来，这个团排演了歌颂计划生育的歌剧《为了明天》，创作并演出了歌剧《柳林三姐妹》，后者参加了太原华北五省“晋阳之秋”音乐节，受到好评，被誉为“民族新歌剧创作的一颗硕果”。由于高扬的支持，河北的剧院团改革取得了一定

成绩，这些剧团出现了多演戏、演好戏的新气象，得到了文化部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

注重培养中青年艺术人才，建立一支过硬的文艺队伍，这是高扬在抓文化建设时非常注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高扬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专业队伍的建设，二是业余文艺队伍的培养。去年七月以来，河北曲协通过保定市曲艺队组织了一支小型青年新书试演队，带着现实题材的中篇鼓书《莲花魂》等书，下乡为农民演出，所到之处，深受农民欢迎。省委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成绩和经验。去年十二月底，全省专门召开了曲艺工作座谈会，高扬听取了省曲协关于送新书下乡情况的汇报，鼓励他们说，说书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我们过去没有重视它，今后要搞好。河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专门发了振兴河北曲艺的文件，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解决目前曲艺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扶植培养尖子演员。

发现典型，以点带面

在培养群众性的业余文艺队伍方面，高扬倾注了满腔的热忱，关怀“朝花”农民诗社的成长，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沧州地区泊头市尹圈大队“朝花”农民诗社，是这个大队一群热爱文学创作的青年农民组织的一个文学团体，从一九八二年七月开始油印出版诗歌双月刊“朝花”，其中有省内外著名诗人的歌吟，更多的是农村青年们的抒怀，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占领农村青少年思想阵地作出了贡献。今年一月六日，高扬在写给团省委书记的信中，给予这些年轻人以热情鼓励，并提出希望。高扬要求他们做农民诗人，首先做先进农民，要“写出农民的心声”，少些“洋气”，多些“土气”；少些“学生腔”，多些“传统的民族风格”。高扬写信热情鼓励“朝花”农民诗社的事儿在报上刊登后，对青年人鼓舞很大。

在各项工作中，高扬总是注意用典型引路带动一般，抓文化

工作也是如此。行唐县南桥公社东市庄大队女社员周喜俊，今年二十五岁，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业余曲艺创作者。一九七八年以来，她先后在全国及省文艺刊物上发表了故事体裁的作品约八万字，各种曲艺段子二千五百多行。一九八〇年，她被吸收为中国曲艺家协会河北分会的会员。为了使周喜俊更好地发挥特长，为四化建设服务，团省委向省委领导作了反映，并提出录用她为国家干部的建议。高扬很快批示同意他们的意见，并要求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在社会科学领域录用人才的相应制度和政策的建议。省文化厅迅速录取了周喜俊到县文化馆工作。在去年十二月初团省委等单位召开的自学成才座谈会上，高扬见到了周喜俊，关切地询问了她的学习和创作情况，鼓励她在创作中保持自己的独特风格，坚持写新人新事。

全省文化艺术战线开始出现新气象

在高扬同志的直接过问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河北省文化工作最近几个月来有了明显起色。春节期间，省群艺馆艺术辅导中心派出数十名艺人分头深入山区、老区，为农民说唱新书；省歌舞剧院，话剧院组织了两个小分队，深入工厂为节日坚持上班的工人演出；唐山、邯郸、保定等地区的曲艺创作出现了新的繁荣，创作出一批受到农民欢迎的现实题材曲艺节目；省作家协会最近作出决定，号召并组织作家深入农村、山区和工厂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出版发行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不仅新华书店门市部有较多增加，而且涌现出一批象石家庄市燕赵文化书社那样生气勃勃、热心为读者服务的集体所有制书店。

（总第49期 1984年5月12日）

国家民委关于宣传报道和 文艺创作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 习俗问题的通知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最近就宣传报道和文艺创作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习俗的问题发出通知。通知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在民族问题上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拨乱反正，大力宣传民族政策，在增进民族团结，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近几年来，有些报刊杂志，在宣传报道和发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的某些文章和作品中，接连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小说、剧本、电影、曲艺、美术、杂文等文艺作品，对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作了不恰当的评述，有的丑化了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有的仍沿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某些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语言、称谓。这类问题的发生，在少数民族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引起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不满，在个别地方，甚至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对政治安定和民族团结极为不利。

我们党历来重视并经常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并把这看作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改善民族关系的重要一环。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曾起过重要作用，在今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希望引起重视和特别的注意。望各省、市、自治区民委通过党委

和政府，并会同有关部门，向新闻、报刊以及文艺界的同志打个招呼，希望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学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正确对待民族关系。同时，鼓励他们继续加强民族方面的宣传报道，深入生活，创作更多更好关于民族题材的文艺作品，为增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

（总第34期 1983年5月16日）

关于利用电视片 进行爱国主义宣传问题

一月间，在《文艺报》、《电视文艺》联合召开的电视剧座谈会上，有两位同志的发言，都提到了利用电视这一有力的宣传工具，通过生动的影象资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

一位同志提到，美国和香港都曾利用旧的历史纪录影片资料和文物资料，剪辑和拍摄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连续电视片，每种都达几十小时之多。他认为，这件事我们应该尽早着手进行。要充分利用国内已有的历史电影资料，并出一笔钱到国外购置关于中国历史和外国侵略中国的纪录影片资料，编辑近百年中国革命史的电视连续片，用生动的活的影象来展示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程、新旧中国的对照、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等。它的教育意义，不下于看一本小册子、听一堂课。有的同志认为，仅仅把解放前旧北京的电影资料加以搜集、剪辑和解放后新北京发展的电影资料加以对照，就可以产生一部十分有趣、生动而富有教育意义的连续电视片。对于这些变化，许多青年是没有什么感性认识的。与此同时，关于上海的变迁、广州的变迁（包括旧上海、广州外国租界、赌场、跑马场、交易所等等历史资料），都可以成为十分重要的爱国主义生动教材。至于日本、美国侵华的资料，那就更为丰富了。如果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加以认真搜集，国家花不了多少钱，也花不了多少功夫，就可以产生一系列有意义的历史电视影片，可以大大丰富电视节目，提高电视的质量，使电视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

还有的同志认为，国家应尽早着手筹建历史影象资料馆，来搜集、纪录、整理、保管、利用用影象记录下来的活的历史资料。这不仅对现代的青年进行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子孙万代都会是功德无量。我们有了电影和录相这一历史纪录手段，却没有自觉地把它利用起来。历史不断发展，时间一过，是没有办法加以补拍的。

另一位同志指出，在利用电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应仅限于利用旧有的历史资料影片，而且可以有计划地大量拍摄新的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电视连续片。他认为，我们电视中应有一个《可爱的祖国》的专题节目，这个节目可以把中国历史上和现代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种不同领域中，一切可以引为骄傲的、精彩的东西，用各种艺术手段系统地连续地反映出来。其中可以包括：（1）在中国版图上最富有光彩的历史遗迹、革命圣地、优美的风景名胜；（2）中国人民对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创造和贡献；（3）各民族的独特的、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艺术；（4）历史文物；（5）工艺、园艺；（6）中国的建筑、水利；（7）当代英雄、模范、能人、巧匠等等。这种节目的来源是极为丰富而多彩的，并且是引人入胜的。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包括各电影制片厂、各省的电视台，统一规划，分工拍摄，源源不断地在电视上播映。一个省拍摄本省最具有特色的东西，拿出一百部、两百部，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为了鼓励、促进这个节目的丰富和不断提高表现质量，并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还可以通过电视进行群众性评比，对其中优秀作品，给予定期奖励。办好这个节目，将会给现有电视增加光彩，将会为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最生动、最丰富的影象教材，其中许多资料也将会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从而扩大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建立这样的节目，也可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电视的特性和方向，为社会主义电视的发展开拓广阔的路子，发挥其巨大的教育作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了搞好这个节目，可以考虑召开专

门的会议，制定统一规划，在制作上给以指导，解决必要的人、物、财力。只要认真抓起来，一、二年内就可大见成效，使电视面貌大为生色、改观。

注：此件已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广播电视部研究、落实。

（总第34期 1983年5月16日）

·短论·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指导

党中央号召我们，一九八二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要争取一个较大的进展。要做到这一点，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做文化艺术工作的同志，必须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

少奇同志说过：“我们的同志都有热烈的革命精神，但一定要加上真正的务实精神，才能切实推动工作与革命。……只有革命精神与务实精神的结合，才能肃清空谈作风，克服官僚主义。”

为了把新时期的文化艺术工作做好，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从中央到地方主管文艺的同志，一定要广泛接触各种作家和作者，广泛涉猎各种新作品，并通过各种渠道，例如，开座谈会、个别交谈、写信、打电话、写短评等等，给予指导。指导时，要讲真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如不好，希望作者从什么地方去修改，去加工。各级文化艺术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如果能有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同志经常能用三分之二的时间看作品和有关材料，三分之一的作指导工作，那就不知道可以解决多少问题，就能很快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指导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指导中心啊！但是，这种中心是要在实践中去形成和建立的，而不能靠上级扶持。希望有志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团结党外的志士仁人，共同努力，大胆实践。

（总第9期 1982年3月15日）

哈尔滨话剧院党总支坚持艺术 生产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哈尔滨话剧院在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六年中，演出中外古今剧目四十个，场次达三千零九十一场，观众三百一十万人次，经济收入一百八十五万元，连续被评为省、市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受到省、市人民政府的表彰和嘉奖。他们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成绩，重要原因是注意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艺术生产的保证作用。

第一，确定办院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提出了“以艺术生产为中心，以提高艺术质量为重点，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宗旨”的办院指导思想；明确了剧院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认真贯彻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保证生产出更多更好的话剧，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做贡献。因此，话剧生产是剧院工作的中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中心，保证这个中心的实现。由于思想明确，艺术生产连年高产，经济收入逐年增加，艺术质量不断提高，上演了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富有教育意义的优秀剧目，如《于无声处》、《神州风雷》、《救救她》、《谁是强者》等，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第二，加强上演剧目的监督。他们实行党总支领导下的院长分工负责制。剧院上演的每个剧目，都由总支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象《骗子》这样的剧目，尽管一开始就有不少人寄来剧本，推

荐演出，但总支委员会讨论后，认识到它的错误政治倾向，决定不排。为了向观众介绍一些优秀的中外古典名剧，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党总支还决定从一九七八年起，排《阴谋与爱情》等剧目，连续演出一百多场，还在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全国电视节目中播映。

第三，充分调动艺术骨干的积极作用。他们除吸收了几名党员专家进入总支班子外，还注意吸收艺术骨干入党。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他们分两批发展了八名党员，其中多数是艺术骨干。所以，既懂政治又懂艺术的骨干越来越多，他们在政治工作和艺术生产中起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显著。

第四，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艺术生产的每个环节中去。排演话剧《救救她》时，他们组织演员去收容所参观，请公安人员做报告，帮助创作人员提高对加强青少年教育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演出这个剧的现实意义，使该剧的演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排演话剧《保尔·柯察金》时，由于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不少共青团员和青年演员早来晚走，争做好事，刻苦练功，认真排练，决心象保尔那样把一切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在角色分配时，演员的思想波动最大，他们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前头。各党支部首先统一党员的思想，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并估计可能发生的各种思想问题，做好全团的思想动员工作。对于演员中出现的思想问题，全党动手，人人去做。导演不仅是艺术生产上的组织者、领导者、创作者，而且又是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一九七九年剧院创作的话剧《间隙与奸细》进京参加调演，为了保证演出质量，主要角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由于及时做了过细的思想工作，有五名曾担任主要角色的同志被替换下来，有的同志由担任主角一下子改成了扮演群众。但是，他们情绪稳定，毫无怨言，认真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第五，有针对性有重点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把做中、青年演职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点。剧院四十岁至四十五岁

中年演职人员占全院百分之二十五，他们艺术上已趋成熟，政治上有一定基础，是舞台上的挑梁人物、艺术生产中的依靠力量。但是，他们当中一些人好讲哥儿们义气，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较重。针对这些情况，他们先从干部、党员着手，通过抓典型事例的方法教育全体同志。例如，过去打架吵嘴破坏工作秩序的现象经常发生，他们就抓住两起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打架的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并以处理这类事件为引线，进行团、队小整风，收到了明显效果。由于重视中年演职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有四人入了党，有十一人当选为文化局的先进工作者。

剧院的青年演职人员占全院演职人员的百分之三十。他们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从学校、农村或是社会上的闲散青年中招收的学员。文化水平多数不到初中，缺乏理想。院党总支采取多种办法给他们补上知识、理想这一课。如组织他们参加各种政治教育活动，听李燕杰同志关于理想、道德、情操的录音报告，院的领导同志还给共青团员和青年们上团课。一九八〇年起，剧院每年拿出两千元经费，外请教师为青年演职人员开办了大学、高中、初中的文学班、数学班，及舞台美术业务训练班。两年多来收效显著。他们勤奋好学，刻苦认真。每当演出结束后，在化妆室，在宿舍，到处可以看到青年人认真读书的动人情景。

（转自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宣传工作》）

（总第33期 1983年5月12日）

首都部分演员和剧场工作人员 座谈职业道德问题

市文化局在“文明礼貌月”活动中与市剧协、《戏剧电影报》于三月十八、十九日两天以“演员和剧场工作人员应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为题，分别召开了两次职业道德座谈会。

十八日召开的演员座谈会，由市剧协副主席夏淳同志和《戏剧电影报》负责人杨毓珉同志主持。到会者近三十人，有老、中、青三代演员。会上发言踊跃，一致表示就职业道德问题举行座谈十分重要，这个会开得及时。如马泰说：“谈演员的道德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几年来都在思考，盼望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快些恢复‘文革’前好的风气。”李慧芳说：“开这个会我特别高兴，该抓这件事了。”总政话剧团冯光辉说：“衷心感谢市文化局、市剧协、《戏剧电影报》召开这个会，会开得及时，正是向雷锋同志学习二十周年和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时候，开这个会，将会对北京文艺界产生很好的影响。”

座谈会上比较多地谈到演员应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的问题。

大家首先谈到“演员对工作要尽职尽责”。李慧芳说：“演员首先应该尽职，要懂得自己是干什么的，要对观众负责，对艺术负责。”马祥麟说：“演员演好戏是应尽的义务。”马泰说：“演员每场戏面对上千名观众，演出时应想到对得起对不起他们。小时候老师对我说，上台不能糊弄观众，人家花钱只买到两寸长的一张纸(票)，除了看戏，什么也得不到，你不认真演对不起人。”叶少兰说：“演员的职责是演好戏。五十年代就批评过雇佣观点，

解决为谁服务、为什么演戏的问题，那时精神面貌很好。旧社会不好好演戏没有饭吃，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有保障，自己不要把自己降低到雇佣地位上。”

当谈到“演员要有心灵美”时，马泰说：“我收徒弟时，先谈做人后谈戏，一个演员没有心灵的美，就没有艺术的美。”茹绍荃说：“演员不能台上演岳飞，台下象秦桧。”

大家在会上谈到北京文艺界出现的新气象和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作风。有的同志举例指出：杜澎获得“五好家庭”的荣誉；李双江尊敬老人；侯宝林热爱艺术，立志“为民求乐，其乐无穷”；吕齐不管大小角色都严肃认真，无论主角、配角都能与同台演员密切合作，经常提前到排练场打扫卫生；茹绍荃身患中枢神经痛病，发扬“救场如救火”精神，忍住病痛代替得病的演员演出，使上千名观众按时看上戏。有的同志还谈到，很多老演员的好传统是七点开演，六点到后台，化完妆不聊天，小声复习台词。青年演员应当继承和发扬这种好的传统。孙毓敏说：“我定下几句话约束自己，要克制私欲，安全礼让，学会辩证，承认事实，科学计划，奋起直追，演出认真，不断创造，积极承包，不当财迷。”

大家在会上也指出了目前还存在着的一些不良现象，如：文人相轻，互不服气；争名夺利，互相拆台；演出质量差，对观众不负责任；后台秩序乱，不按时候场；台上笑场抢戏，演出迟到误戏；排戏不积极，私自演出抄肥，一味“向钱看”等等。

在座谈会上，有些同志对某些领导的软弱状态提出了批评，呼吁加强对文艺队伍的道德教育。许多同志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有些同志说：“十年动乱，破坏了演员职业道德方面的优良传统，现在应大力恢复，大家共同努力在戏剧界树立起良好的道德风尚。”有的同志批评说：“有些领导干部对好人好事不敢表扬，不去了解，对不良现象不敢批评，表现软弱。”马祥麟说：“领导也可能是在‘文革’中被整怕了，心有余悸，对青年不敢管。”大家一致倡议在这次座谈会的基础上制订首都文艺工作者文明公约，

掀起学雷锋、优质服务的活动。

十九日召开剧场、影院干部座谈会，到会三十九个单位近四十人，由市演出公司副经理吴伯华、《戏剧电影报》负责人杨毓琪主持。会上发言踊跃，大家认为剧场、影院是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的重要阵地，是宣传“文明礼貌”、“五讲四美”的窗口，一定要搞好“三优一学”活动。

不少同志在会上介绍了本单位在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中涌现的好人好事。吉祥戏院吴鸿志同志说，“演员是用剧中英雄人物形象教育人，剧场要用自己文明服务的实际行动感动观众”；他们给自己规定要急观众之所急，想观众之所想，自找麻烦，为观众方便，同时把剧场工作人员十条守则写在大牌子上，让观众监督。剧院为方便带东西的观众，专设了免费存放处，得到观众特别是外地来京观众的好评。他们认为剧场不仅应是观众之友，还应是剧团之家，所以在接待剧团时热情服务，为演员创造良好的演出条件。

首都电影院的同志谈到：“演电影场次不能翻番，但服务态度可以改变。”他们千方百计改进服务工作，为方便观众，他们延长售票时间；为方便有孩子的父母，开设母子专场，每周三次。

长安戏院为了方便外宾或少数民族观众看戏，让青年学习外语和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用语，目前已有懂英、法、俄和维族语的青年。有一次有个外宾的夫人看戏时得了病，懂英语的职工马上帮助她找来急救车送进医院。杨清环同志说：“剧团通过艺术形象教育观众，剧场要通过服务员的形象和文明服务影响观众。”因此他们抓紧对青年职工的教育，促进后进青年的转化，出现了不少好人好事。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明星、珠市口、崇文地下影院、人民剧场的同志，他们都介绍了剧场、影院职工中出现的新气象，大华影院的同志建议，这样内容的会议应开大些，让更多的职工听听，受教育。

（总第33期 1983年5月12日）

·短论·

堂堂正气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向文艺战线上的全体共产党员推荐北京作协党支部《一次热情而严肃的会议》这篇文章。文章介绍了北京作协支部讨论从维熙同志入党的情况。会议是热情而严肃的会议，文章是热情而严肃的文章。

文章通篇充满着正气。这是文艺界的气，文艺界党员和党组织的气，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气。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这股正气就是共产党的党性。

大衍之年的从维熙，一九五六年提出了入党申请，第二年，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改。五九年又被打成“极右分子”，继续劳改二十年。但是，贯串从维熙这二十多年劳改岁月的，是顽强地追求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是强烈地要求加入党的组织。他不曾对党有过任何怨言，一九七九年重新拿起笔来从事创作，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好的。他注意维护党的形象，并不单纯揭露“伤痕”。把党的过失同党的事业、党的组织、党的传统区别开来，揭露党的过失又维护党的整个形象——这就是正气。

北京作协支部讨论从维熙入党问题，到会的有二十名党员。二十人一致通过接受从维熙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有位列席会议的非党同志曾经想，“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会前准备好了，会上评评功，摆摆好，一通过完事儿”。事实使他认识到完全不是象他所想的“那么回事儿”。到会的共产党员们，不怕“得罪”从维熙，没有单纯“评功摆好”，而是尖锐地指出他有点“不那么谦虚了”，“有些计较个人得失了”，并提醒他“注意捧杀的问题”。大家还希望从维熙注意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而自幼形成的“个人

奋斗的思想”，“要加强党性锻炼”。在党的会议上，“不留情面而又满腔热情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正气。

凡是正确的东西，凡是真理，就会掌握群众。党心、民心，终归是向着正气、憎恶歪风的。北京作协支部大会的正气，也使列席会议的非党同志受到教育。刘心武同志说自己参加这个会的“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如饥似渴地需要党组织对我的严格要求、尖锐地批评和热情地帮助”；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要求入党是不对的，“应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一切共产党员、一切志愿加入党组织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把自己首先看成是一个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战士，其次才是作家、才是文艺工作者、才是文化人。——这也是正气。

文艺战线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思想政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文艺战线的状况，影响着社会主义艺术的性质和方向。文艺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不论成就大小、职位高低，都不应该把自己摆在特殊的地位上，都应自觉地增强党性锻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克服不正之风，都不要忘记自己在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那种把增强党性锻炼同提高艺术修养、发挥艺术才能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有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其次才是文艺工作者、才是作家的人，才不愧社会主义时代“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让我们在文艺战线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

（总第35期 1983年6月15日）

一次热情而严肃的会议

——北京作协党支部讨论从维熙入党会议情况介绍

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的共产党员聚集一堂，讨论从维熙同志的入党问题。到会的党员(二十人)一致通过接收从维熙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这次会议发扬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用共产党员的条件衡量从维熙的思想和行动，既热情肯定了从维熙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及其它优点，也诚恳、坦率地批评了他的缺点和不足，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次会议在作协机关党内外群众中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

一

五十岁的从维熙经历了一条超乎寻常的坎坷的道路。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四岁丧父，十岁离家，依靠寡母给人当保姆的微薄收入度日。师范毕业时，他主动要求分配到远郊区任教。基于对党的感情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九五六年，他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随后在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降职降薪，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一九五九年，领导号召向党交心，他出于对党的信赖，谈了自己对大跃进、援外等问题的看法，结果又被打成“极右分子”，先后被送到团河农场、茶淀农场以及山西省的曲沃、晋城、长治、永济等许多地方劳改，做过挖煤、化工、车工、铣工、插秧、烧砖等重体力劳动。一九七九

年平反以后，他重新拿起笔来，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日以继夜地写作，写出不少较有影响的作品，两次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一九八二年，他再一次向党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

大家回顾了从维熙所走过的道路和他的一贯表现，深深为他忠贞不渝地热爱党和追求党的顽强意志所感动。

刘绍棠介绍了从维熙被错划右派以后的一贯表现。他说：五七年反右以后，我和从维熙之间经常秘密来往，还不时通信、谈心，接触中我没有发现他对党有丝毫怨言。平反以后他也从未纠缠历史旧帐，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他在作品中批判极“左”，歌颂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在政治上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刘厚明介绍说：从五〇年到五三年，我和从维熙同在师范学校读书，那时他就自觉地要求进步，主动地接受党的教育，初步树立了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生观。被错划右派以后，他对党的信念没有动摇，对革命事业的前途没有失去信心。记得有一次，他从山西回北京，偷偷地找我，打听文艺界的情况，强烈地表示要重新拿起笔。经过二十一年的坎坷，他对我们党的事业的艰辛认识得更深刻了。他的作品不是单纯揭露“伤痕”，而是在揭露“伤痕”的同时，注意歌颂光明，维护党的形象，基本倾向是好的。

邓友梅发言时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说：我与从维熙交往有三十余年，深深感到党对他的考验是比较充分的。尽管他受到的委屈比我们谁都大，走过的道路比我们谁都艰辛，他却始终顽强地追求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强烈地要求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他受到那么严峻的打击，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不是很顽强的话，那是很难熬过来的。我曾经一度担心他“毁掉”，但他经受住了考验，更坚定、更成熟了。林斤澜叙述了他对从维熙的印象，他说：五六年，我们俩人一起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从维熙比我开朗，能吃苦，有朝气，就在那个时候，他提出了入党要求。到一九六六年，他见到了我，谈的还是他要写这个、要写那个，个人

的委屈只字未提，这是很不容易的。

一些老作家、老同志也纷纷发言。张志民说：从维熙所受的委屈，不是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家长”的失误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埋怨母亲，对母亲的感情更真挚了，对党的认识也更深刻了。雷加也赞扬了从维熙虽然受到那样不公正的待遇，但却没有消沉，而是更坚强、更敏锐了。

张洁深有所感地说：从维熙走过的道路，充分地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党的感情很深、很深，虽九死而不悔。通过对从维熙的评论，到会的同志都很受教育。

列席会议的文联党组副书记王慎之同志十分激动地说：象从维熙这样一个同志，没能象一些老同志那样十五岁入党，而是五十岁才入党，这对我这个党的工作者来说也触动很大。我们要汲取这一教训，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及时吸收所有符合党员标准的好同志入党。

二

这次会上，发言的同志实事求是地肯定了从维熙同志对党的信任、追求和深厚感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作风正派、工作踏实努力等优秀品质的同时，也对他的缺点开展了同志式的、严肃坦率的批评和帮助。

一些同志批评从维熙近几年产生了骄傲情绪，诚恳地告诫他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邓友梅列举了一些具体事实，尖锐地指出：从维熙在其作品有了影响以后，一段时间不那么谦虚了，不大能容人了，对不同意见不大能听得进去了，也有些计较个人得失了。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做一个在道德上尽可能高尚的人。骄纵、放任自己，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不能允许的。作为共产党员，更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严格要求自己。要学会听自己不爱听的意见，要勇于否定自己。张志民指出，过了桥，走上了平坦

的道路，更应戒骄戒躁。未来的天空不会是一块云彩也没有，也可能有河、有桥，我们要把自己锻炼得更加成熟一些。林斤澜指出，从维熙在别人批评或议论自己作品时，有时不够冷静，有些过于计较。他说：关于作品的毁誉问题，要正确对待，人家怎么说，那是人家的事，自己对自己应当有个要求。作为党员不能斤斤计较这个，更不能为此伤了别人。计较别人对自己作品的毁誉，实际上是堵了自己前进的道路。鲁迅说过，有打杀，也有捧杀，极“左”没有把你打杀，现在要十分注意不要被捧杀。江风也指出，有了成绩以后，在一片赞扬声中，更要注意捧杀的问题。

刘绍棠分析了家庭、社会对从维熙的影响，指出他要加强党性锻炼。他说：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从维熙自幼形成了个人奋斗的思想，“让歧视者知道我不低于你们”。我们共产党员是集体主义者，要注意克服自由散漫、自以为是的思想和表现，加强组织纪律性，增强党性。党性强，我们就会比较快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比较自觉地执行党的决议；当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坚决而愉快地服从党的利益。到了党的队伍中来了，就应当更多地做党的工作，更勤奋地多做一些社会工作，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三

这次支部大会在作协机关党内外群众中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

一些党员同志反映，参加这个会，心情很激动，真正感到是党的会议，是党内同志之间开展诚恳的、热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会议的气氛说明，党内党外是不同的，如果不是在党的会议上，从维熙可能听不到这样中肯的意见。

列席会议的非党同志反映，这次会与“文革”期间的“纳新会”完全不一样。有位同志说：原来想，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会前准备

好了，会上评评功，摆摆好，一通过完事儿。可今天的会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既充分地肯定了从维熙同志的优点，又尖锐而中肯地对他提出批评，气氛严肃而热情，体现了真诚的友爱，很受感动。一位非党青年同志反映：我不是对一些新党员有什么成见，我觉得五十年代的党员对党的感情和觉悟水平与后来入党的新党员就是不一样。他们受党的教育时间长，马列主义理论基础比较好，听了他们的发言受教育。从维熙同志对党那样坚贞，对共产主义事业那么坚信不移，这是他接受党的长期教育的结果。虽然我觉得自己条件还不够，没有申请入党，但我感到我们党有一大批这样的好党员，党风好转是大有希望的。

非党青年作家刘心武列席会议以后，连夜给党支部写了思想汇报，谈到“通过这次发展会，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我体会到我们党是伟大的、有力量的。在这次支部大会上，党员同志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发出了炽热的革命激情。特别是许多党员同志不留情面而又满腔热情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深受教育；作为一般作家，不一定能听到这样严肃尖锐而又深刻的批评。这种批评对于一个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作家来说，该是多么可贵、多么必要啊！我参加这个会，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我如饥似渴地需要党组织对我的严格要求、尖锐地批评和热情地帮助。通过这次会，也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党的十二大以后，党把知识分子看成自己人，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说话是算数的，这更增强了我入党的信心。”会后刘心武同志又给文联党组领导同志写信谈到：八一年十二月我向作协支部递交申请书时，还把自己当作一个作家，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应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战士。

（总第35期 1983年6月15日）

·短论·

领导干部要关心文艺

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亲自批示向省直机关推荐小说《围墙》，以及这个批示、关于小说《围墙》的座谈在河北省直机关和文化系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又一条令人高兴的好消息。

我们的各级领导，都应当关心文艺事业、关心文艺创作和批评。文艺战线，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没有这条战线的配合和协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在文艺战线上，有多少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夜以继日地进行呕心沥血的劳动啊！他们的劳动成果，又几乎是每日每时地同千百万群众发生着联系，在千百万群众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中起着作用。对于具有如此广泛的群众性的事业，我们的领导怎么能不关心呢？从另一方面说，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经常地、大量地反映着广大群众思想和情绪，传递着各种社会思潮的信息，表现出艺术家们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和创见。关心文艺，就能吸收其积极的思想成果，掌握群众的心理、情绪和要求，了解各种社会思潮的动向，这对于作好领导工作，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

关心文艺事业、尊重艺术家，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作风。我们应当向老同志学习。邓小平同志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就得关心文艺工作。不关心文艺，只是站在文艺队伍和文艺运动之外冷眼旁观，或者放任自流、涣散软弱，那是怎么也领导不好的，那是放弃领导，

是一种失职。

我们希望各级领导都来关心文艺，领导好文艺。

(总第38期 1983年9月10日)

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 推荐小说《围墙》

（一）高扬建议河北省直工作人员 读小说《围墙》

《河北日报》五月二十五日一版以显著位置刊登消息，报道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建议机关工作人员阅读短篇小说《围墙》，同日四版全文刊登了这篇小说。

《围墙》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第二期，作者陆文夫。小说写了一个建筑设计所修围墙的故事，主要写了马而立这个人物。小说概括地介绍了马而立来设计所前的情况，他年轻，干练，而且任劳任怨。然而他有一张年轻堪称美丽的脸，始终衣冠楚楚，使领导怕他吃不了苦，办事不稳。在房管局当办事员，第一年大家对他存有戒心，深怕这个眼尖手快的人会出点什么纰漏；第二年发现他很能干，但是得抓得紧点，因为能干的人往往会豁边；第三年上下一致叫好，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压到他的头上；第四年所有的领导人都认为马而立早就应该当个副科长，工资也应加一级。可惜，副科长的位置已挤满了，加薪的机会也过去了两年。老局长看到马而立在本机关难以提拔，便把他推荐给设计所吴所长当行政科长。于是，倒霉的马而立又开始了第二道轮回。修个什么样的围墙，在吴所长主持下，所里三派——“现代派”，“守旧派”，还有一派也说不准是什么派，他们总是表现为取消主义，取消不了便调和折衷——展开一场无休止无结果的

争论，吴所长以再考虑为名，决定暂时搁浅。会后，马而立追问所长围墙如何修。所长说经过讨论已经有了原则，如何修“以你为主”。马而立欢喜不迭，动手操办起来，经过他两天两夜的忙碌，星期天一个突击，围墙奇迹般地修起来了，而且还周到地考虑了多方面的意见和要求。星期一上班时，人们惊呆地对着突兀而起的围墙，快得叫人毫无思想准备，因而总觉得不踏实，太扎眼。吴所长没有说“好”，于是三派从各自的角度，纷纷议论，各种责难都来了。这年冬天，设计所作东道主召开建筑学年会。外地几位专家一来便被围墙吸引，赞不绝口，要求作一个学术性的总结。于是吴所长和三派又争着提出自己在建筑中的贡献，而马而立只是为会议忙得飞飞。

高扬在建议中说，小说中所描绘、刻画的人物群像，我们大家都“似曾相识”，这些人好象就在我们身边走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领导干部、专家们和其他工作人员们，在用人行政、看人看事等方面，应该从这篇故事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很值得深思；象马而立那样的干部，大概哪里都会有，他们的处境如何，也值得各级领导者负责检查一番，不要让诗人再发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的叹息。

（二）河北省文化厅党组关于召开小说 《围墙》座谈会的情况报告

高扬同志关于小说《围墙》的批示下达后，在我省文化系统中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在大家普遍学习的基础上，于六月六日召集了一次有厅长和各处、室、馆、院负责干部及一般干部参加的座谈会。现将座谈讨论的情况简报如下：

与会同志首先对高扬同志批示的意义谈了自己的认识。一致认为，批示使人们看到改革的前景、改革的希望，从而增强了工

作的积极性。

大家对小说《围墙》的思想意义进行了讨论，认为《围墙》是一面镜子，让我们都来照一照自己是属于哪一类人物：是以吴所长为代表的“空谈家”，还是马而立那样的实干家。我们要改革机关作风，必须坚决反对空谈，提倡实干、苦干。要反对空谈家，鼓励实干家。小说描写的某设计院关于重修围墙的“碰头会”，生动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空谈风气。一些人往往空谈原则，从不考虑如何去实行。参加讨论会的不少同志都讲到自己所在单位就有这种现象：互相扯皮，空对空；许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致造成干部队伍疲沓，障碍着“四化”的前进步伐。大家要求我们厅的新领导班子，一定要脚踏实地干，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坐在那里空发议论的现象。

大家还指出，作为领导，衡量一个干部决不能看表面现象（甚至以貌取人），重要的是看实质，看他是否一心一意地干工作。小说《围墙》中的马而立的“遭遇”是很发人深省的。而现实生活中，象马而立这样的人在基层是大量存在的。这是一个人力资源，作为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应当挖掘。

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干的干，看的看，而阻力则往往来自“看”的人。这些人确实象小说中揭露的：“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他们自己不干，也不让别人干。一旦别人干成了，他们要么指手划脚，评头论足；要么争功诿过，打击实干者的积极性。这种现象如不纠正，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正常发展。

参加讨论的同志，联系实际畅谈了学习马而立工作不讲条件、不讲价钱的实干精神。有些搞创作的同志说：“我们搞创作，要让作品照亮名字，而不让名字照亮作品。”也有的同志联系实际检查说，有时工作不顺利，就产生抱怨情绪，马而立却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从始至终勤勤恳恳工作的精神令人感动，值得学习。

参加座谈的不少是编剧、导演和编辑。在谈到《围墙》对创作

的启示时都感到，应当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一篇好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戏剧)与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密切关系。我们文化战线上的广大专业、业余作者要多创作《围墙》这样的好作品。

(总第38期 1983年9月10日)

·短论·

要理直气壮地提倡学习 马列主义文艺理论

读了《贵州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情况》一文，的确使人高兴，也使人振奋。我们希望各地宣传文化部门、文艺领导机关的同志们认真读读这篇文章，并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座谈一次，看看贵州文艺领导机关和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问题在自己单位、自己的思想中是否存在，看看贵州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作法对我们有些什么启发。

贵州的文艺工作者中，有人从认为“马列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学说，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到认识到“学习马列对认识时代和生活十分重要。我的作品比较平庸，缺乏思想深度和高度，原因就是自己的思想理论修养较差”，这是一种多么可喜的重大变化！然而，更重要、更有决定意义的变化是：某些领导干部从“不能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到“采取具体措施，理直气壮地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原来，领导思想上担心学习马列的活动“难以组织”，“出人意外”的是当学习马列的计划一经同群众见面，便“立即得到一些青年作者的支持”。这件事很耐人寻味，很发人深省。我们的的确确要相信群众，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相信群众会欢迎和接受这个真理，相信这个真理会掌握群众。如果怀疑这一点，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一切文艺工作，都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叙述过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

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过程。他们学习西方的“迷梦”被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一百四十多年过去，难道我们还要掉进那个“迷梦”中去照搬西方的存在主义、现代主义吗？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这个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唯一能够使中国走向富强、实现现代化的真理。我们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断然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一百多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六十多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三十多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七年多来的经验和教训，都在证明着这一点。

要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理直气壮地组织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习。

(总第39期 1983年10月7日)

贵州组织文艺工作者 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情况

自八二年三月以来，贵州省作协、音协、摄影协等组织先后举办了六次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讲习会或读书会。这些讲习会和读书会每期为时十五至二十天，参加人数十五至三十人不等。在我省文艺界，开展这样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活动还只是开始，但确已显现了初步的成效。

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这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在一九八一年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召开之前，贵州曾出现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很活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也很活跃的情况。一方面，新人辈出，创作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另一方面，省内的文学刊物又发表了一些倾向不好的作品，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批评。出现后一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省文艺创作队伍中年轻人居多，他们思想活跃，才思敏捷，但在接受马列主义的文艺观上却是不清醒的、迟疑的，甚至是抵触的。有的人在会议上公开说：“马列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学说，可以信，也可以不信。”有的人公然对我省一位著名的老作家说：“艺术上我们可以向你学习，思想上你得向我们学习。”有的人声称自己的创作不受任何理论指导，创作的目的就是让人乘火车的时候看了笑一笑。较多的人则认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等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都成了伟大的作家。而我国自建国以来，却没有出现什么伟大的作家。总之，这部分同志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是不清楚的，有的是反感的，而对资产阶

级的文艺却是很崇拜的。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人带着很大的盲目性。面对这种情况，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无可奈何的畏难情绪，不能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致使一些错误的文艺主张和文艺见解不能得到澄清，反而不断扩散。

一九八一年九月，贵州省委宣传部召开了全省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之后，文联各协分会又分别开了理事扩大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了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的精神，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针对领导工作中存在的软弱涣散问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种种表现，开展了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识有所提高。大多数同志认识到，我们的一些作品之所以热衷于揭露甚至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或者对社会生活的消极面作了不正确的反映，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没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观察客观实际。大家由此深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于是各协会决心在这一点上下力气。当时下这样的决心是不容易的。领导思想上主要担心这样的学习活动难以组织，如果参加者寥寥，反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但结果是出人意料的。如作协分会在去年初的理事扩大会议上提出这项计划征询意见时，立即得到一些青年作者的支持。事实说明，并不是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反对学马列，他们当中有的已自觉地开始了学习。形势发展的需要，作者的要求，坚定了领导的信心，有组织地学习理论的活动就按计划开展起来了。

我们举办理论讲习会或读书会的作法大体是这样的：

一、制订学习计划，明确学习目的，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两个问题。如作协分会去年十一月举办的理论讲习会，我省近年来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基本上都参加了。鉴于当时现代派文艺思潮已开始在我省产生影响，这些作者中的多数对于社会主义艺术的性质和特点认识又还比较肤浅，有的甚至缺乏正确的理解，所以，在拟定计划时便确定这次学习着重解决文艺

的方向道路问题。学习分为三个单元，一是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创作与人民、与时代的关系；三是文艺创作与作者世界观的关系。又如该会今年六月举办的另一次理论讲习会，参加的多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便开始写作的老作者，他们中的多数受极左的文艺思想影响较深，作品中理念大于形象，共性多于个性的问题比较突出，所以在拟订计划时，便确定这次学习着重解决掌握社会主义文艺的艺术规律问题，学习也分为三个单元，一是文艺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思想与形象的关系；三是典型化的问题。作协还举办过两次主要由文学理论研究人员参加的理论讲习会，一次着重学习和讨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精神，一次着重学习讨论现实主义问题和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音协分会和摄影协分会举办的读书会，则是针对我省音乐和摄影工作中理论建设比较薄弱的问题，着重学习和讨论音乐和摄影艺术的美学问题。

二、学习中以读马列主义的原著为主，以自学为主，结合组织专题讨论。

学习中反映出一些青年作者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的论述是读得很少的，有的虽读过大学中文系，听过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课，但多缺乏深刻的理解。特别是摄影作者，由于摄影技术性较强，钻技术胜过钻政治理论。中年作者过去对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接触多一些。但读经典著作也少，读第二手、第三手的文章多，别人错自己也跟着错。因此，大多数参加学习的同志都深感读原著的必要，而且不少人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按专题分小组和大会讨论，讨论中强调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创作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参加学习的同志对读书和讨论都很认真，对一些问题争论很热烈，这种争论往往又反过来推动更认真的读书，认识也就逐步加深了。

三、搞好辅导，组织经验交流。这六次理论讲习会和读书会都根据学习的内容请有理论准备、研究有素的专家上辅导课。他

们在上辅导课前，都做了较充分的准备。音协和摄影协会举办的读书会，参加辅导的同志始终认真地同大家商讨切磋。作协分会举办的创作人员理论讲习会上，还组织作家同与会者之间交流学习理论的心得，由作家介绍自己通过学习理论解决问题的经验。

总的看来，这六次理论讲习会和读书会是办得好的。首先是与会者基本上按计划到齐，坐得下来，学得起来。这在我省文艺界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而且，大多数与会者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不少人要求延长学习时间，或再次参加这样的学习。其次，由于学习有一定的针对性，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绝大多数与会者便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作家何士光是讲习会的参加者，他说：“作家要了解人。了解人的过去和人的未来，就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凭情绪冲出来的作家，都在面临着考验。”纳西族青年作者和国正参加讲习会后说：“我原先不愿意学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阴影。通过学习，才发觉学习马列对认识时代和生活十分重要。我的作品比较平庸，缺乏思想深度和高度，原因就是自己的思想理论修养较差。”其三，通过学习，进一步调动了与会者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引上了正轨。参加音协和摄影协会举办的理论读书会的作者，根据自己学习的心得，写出了近二十篇文章。参加作协分会去年三月举办的理论讲习会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近十篇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章，并已陆续在省内报刊发表。先后参加理论讲习会的五十多名中青年作者，是我省文艺创作的主力军，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基本上都保持了良好的创作势头，我省今年上半年发表的十二部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出版的七个集子，大部分出自他们的手笔。有些作者还出现了新的更好的势头。更重要的是，从他们已经发表的大量作品来看，倾向基本上是健康的，没有发现大的问题，有的作者还致力于反映我们伟大的时代，唱出生活中的主旋律。其四，现在看来，开展这些学习活动的意义，决不止于这些活动本身，它对全省的文艺形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协会采取

具体措施，理直气壮地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而且有许多文艺骨干参加了学习，学习的情况又通过报刊及时传播。这一事实便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说服力。就当前全省文学等战线文艺思想状况来看，可以说正气正在上升，邪气正在下降。一些过去能够纵谈无忌的错误言论其传播的市场大大缩小了。最后，这些学习活动能顺利开展，与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省委宣传部的主要负责同志很重视，几次到这些讲习会或读书会了解情况和讲话。与会的同志多数是业余作者，有的还担任着重要职务，而有关部门的领导得知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会，大多数支持他们前来学习。这些都使与会的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

这六次理论讲习会和读书会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如时间短，不能系统深入地学习；有的讲习会和读书会计划性和针对性还不强；有极少数人学习态度不够端正，遵守学习纪律较差；参加学习的多是业余作者，专业文艺工作者如编辑、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得少等等。对于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理论这样一件大事，省文联和所属各协会还缺乏一个长远的计划；学习方式也还不多样，更不经常，还仅仅局限于举办讲习会或读书会。这些都是亟需加以改进的。

贵州省文联党组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三日

(总第39期 1983年10月7日)

统一思想的锐利武器

近年来，文艺战线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混乱。这不仅表现在有少数作品和文章背离了社会主义轨道，艺术商品化的倾向一度泛滥，而且表现错误思潮的影响使一些坚持正确方向的作家在有的问题上也发生过迷误，走了弯路。用什么来澄清混乱，统一人们的思想呢？天津市作协的材料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统一思想，必须有正确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能用抽象人道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吗？不能。能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想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吗？不能。天津市作协的材料以生动的事实证明，只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也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混乱，统一人们的思想。而《邓小平文选》则正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的建国大纲，因而也是澄清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混乱、清除精神污染，统一和提高人们思想认识的强大精神武器。象天津市那样组织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是文艺战线的一个当务之急。

这里，认真二字是很重要的。所谓认真，第一是学习要联系实际，不能搞空对空。第二是要系统学习，认真领会，不能搞断章取义，搞实用主义。有的同志也在“学”《文选》，并且发表了文章，但却根本抹煞文艺领域确实存在的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事实，根本不提《文选》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关于思想战线上

的问题的谈话》等一系列著作，单单只谈一篇《祝辞》；而谈《祝辞》又根本不提其中关于也要反对右的错误倾向的内容，只抓住一句“不要横加干涉”任意曲解，只许批“左”，不肯批右。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是我们坚决加以反对和批评的。只有象天津市作协的有的同志那样联系文艺战线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系统地学习钻研，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使自己的思想认识大大提高一步。

我们的文艺事业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和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应当是十分鲜明的，毫不含糊的。面对错误思潮，模糊我们的旗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是涣散软弱的表现，是根本无法澄清文艺领域的思想混乱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和澄清思想混乱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许多事实告诉我们，能否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关键在领导。各级有关的领导部门和领导干部首先自己要旗帜鲜明，要理直气壮地用《邓小平文选》去统一本部门本单位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只要各级领导部门认识是明确的，旗帜是鲜明的，真正把组织文艺工作者学习《邓小平文选》这件事抓好，文艺领域的思想混乱是不难澄清的，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也是不难统一的。

（总第40期 1983年11月8日）

天津市作协 组织作家学习《邓小平文选》

作协天津分会于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三日在蓟县举办读书会，组织作家学习《邓小平文选》，联系天津文学战线和作家本身的思想实际，总结近几年文学创作的基本经验，进一步增强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参加读书会的有作家袁静、孙振、鲁藜、鲍昌、阿凤、柳溪、蒋子龙、冯骥才、吴若增等二十人。

作家们在过去通读全书的基础上，又用三天时间精读了文选中《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和《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同时，结合学习了陈云同志《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和赵紫阳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艺术的部分。学习结束时，大家都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作家们学习态度最认真的一次，也是学习效果最好的一次。学习中，有的同志说：文选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进行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一个记录，我们是这个转折的亲历者，是党在这个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的实践者，是伟大的三中全会路线彻底解放了我们，我们又是党的三中全会的受益者，所以读的时候感到非常亲切。通过学习，作家们都认为找到了一个判断文艺是非的标准和指导创作的理论依据。蒋子龙、冯骥才、柳溪等同志发言中都谈到：这几年，文艺上一些问题争来争去，一学习才知道这些问题小平同志早已讲

得非常明确。现在不能不深信小平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已被证明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指针。为了能使作家们在创作上与党中央方针政策保持一致，隔一定时期就进行这样一次再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作家们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创作实际，回顾了这一段走过来的道路，并就文艺创作和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蒋子龙回顾了近一两年的创作道路，认为有追求也有苦恼，要想寻找一个新突破口。但是，这个突破口究竟向哪里去找？是思想上、生活上的提高是主要的，还是形式技巧上的提高是主要的？有一个时期主要考虑在技巧、方法上突破，读了一批外国作家的论著，思想上也跟着他们绕来绕去，并写了一些有现代派味道的小说，读者和朋友都大不以为然，自己也感到沮丧，越弄越糊涂了。最后下决心回到生活中来，在新时代生活本身的启示和激励下，写出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作品。这一段弯路的教训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提高分析、认识生活的能力，这才是作家创作上能够不断有新的突破的主要途径。他说：通过学习和总结经验，我要努力做到对文学负责和对生活负责相统一，对自己负责和对党的事业负责相统一。

冯骥才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曾一度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几篇东西发表后，读者来信一下子减少了百分之八十，这使他十分震惊，于是下决心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他说：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是在把握创作方向上有自我矫正的能力，为此就要掌握思想武器。过去自己的这种矫正是不很自觉、不很明确的。现在通过学习，认识到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是在新时期的复杂思想斗争的形势下衡量思想是非的标准和理论依据，也是作家及时自我矫正创作方向的一个指示灯。他还对他所写的《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一文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写这篇东西，当时意图是想说明随着我们生活步调发生变化，人们

审美的形式和要求也要发生变化，所以文学需要新的现代形式。虽然我所说的带引号的现代派不是西方的现代派，更不是说要吸收西方的哲学思想，但是没有看到当时一些青年人思想混乱、崇拜西方文明的情况，没有认真、严肃地考虑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可能产生的消极社会效果。这件事给我的教育是：提出任何艺术形式上的问题时，都不能不考虑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作家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一定要有严肃的政治责任感。

《翡翠烟嘴》的作者吴若增，曾主张写“国民性”。通过学习，他总结了这一段创作的经验，检查了自己提出写“国民性”问题时，思想认识上一些不准确、不全面、不成熟的地方，他表示在写出老一代农民的儿子千年沉重负担的同时，还要努力写出新一代农民崭新的精神面貌。

鲍昌、柳溪、袁静、孙振等同志，都在学习中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检查了与时代、人民要求的差距，并对文艺战线上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以及一些作家思想跟不上时代的现象开展了批评。大家一致认为，回顾几年来的创作道路，联系思想实际学习《邓小平文选》，有利于及时矫正创作的方向，自觉地纠正错误倾向，有利于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自觉地与党中央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有利于增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路线、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的决心和信心。

在学习期间，作家们朝夕相处，增加了相互交流思想感情的机会，有的同志间原来存在一些思想隔阂，通过学习，增强了彼此团结和相互学习的愿望。孙振、柳溪、鲁藜、阿凤等老作家都在与新一代作家共同生活、学习中，看到了他们学习认真、视野开阔、观察敏锐等特点，也看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差距，表示要勇于向青年一代学习。蒋子龙、冯骥才、吴若增等新一代作家则在与老作家共同生活、学习中，看到了老作家所具有的政治立场坚定、生活基础深厚、写作功力扎实等特点，从而认识到自己努

力的方向，表示要虚心向老一辈请教，继承他们的好传统。市委宣传部领导同志也分别与部分作家谈了心，开诚相见地就如何加强和改善文艺领导问题交换了意见，增加了作家和领导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总第40期 1983年11月8日）

· 专 论 ·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 谈话和通信》一书出版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编选了陈云同志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八三年有关评弹的部分谈话、文稿和通信，共四十篇。一九五九年以来，陈云同志利用工余休养时间，以他一贯的实事求是、认真细致的作风，对评弹艺术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和见解。《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文献，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又一范例，它将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思想武器，对当前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左”的思想露头 and 恶性发展这段历史时期内，陈云同志关于评弹艺术的意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加以创造性地运用，这一点尤为可贵。

一、贯彻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了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围绕这个根本问题，陈云同志发表了许多原则性的意见。一

九七七年《在评弹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以前和以后，陈云同志还多次指出，评弹“演出要城镇加农村”，“去农村说书要作为一个方向”，“搞四个现代化，农业放在第一位”；文艺“要对多数人负责”。

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当然要为群众欢迎，为群众喜爱。但是，我们的文艺要真正代表群众，仅仅以群众喜欢不喜欢作为标准、以群众的兴趣为转移，是不够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应当看到更本质、更深刻的方面。陈云同志说：“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就是好的。这要看它是多数群众喜欢，还是少数群众喜欢；是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还是不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调情的、下流的、色情的都要不得”，“群众欢迎，也不能要。这一点绝对不能让步。”陈云同志提出好的文艺要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要为大多数人欢迎这个标准，在反对精神污染、建设精神文明的今天，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出人、出书、走正路”，这是陈云同志为更好地贯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而指明的正确途径。没有人才、没有作品、文艺战线充满乌烟瘴气，那是不可想象的，那将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将对社会主义经济起破坏作用。杰出的艺术人才和优秀的作品，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重要标志。培养人才要由少到多，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要鼓励他们钻研艺术。要在青年中培养人才，不要青年就评弹，而要评弹就青年，“在就青年中去锻炼，出人才，出艺术”。走正路，就是要以正派的艺术打掉艺术上的歪风邪气，从而引导和提高群众。陈云同志说：“出人、出书、走正路，评弹是可以振兴的。”作到“出人、出书、走正路”，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也是可以振兴的。

从以上关于文艺方向问题的一系列意见中，充分显示了陈云同志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和创造性。

二、开展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

科学地、实事求是地防止文艺工作和运动中出现的不良倾向，是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文艺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注意的重要课题。学习陈云同志关于防止不良倾向的言论，使我们深受教益。

关于反对不良倾向的问题，陈云同志提出应当“不偏不倚”。陈云同志在一九六一年《要研究评弹的历史》一文中，分析了评弹发展的全过程，指出解放后评弹的“斩尾巴”运动，是对抗日战争前后评弹艺术的商业化和庸俗、黄色噱头泛滥的不良倾向的否定。现在不能再重复“斩尾巴”的简单化做法，要有噱头；但是，又不能搞过了头，一搞过头就要走老路，回到过去的不良倾向上去。“不偏不倚，这是要掌握的。”这就是说，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在处理新书和传统书的关系问题上，陈云同志极力支持发展新书。他多次指出：“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要以说新书为主，但不排斥老书，“只有既说新书，又努力保存传统书的优秀部分，才是百花齐放。”

关于政治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的关系问题，陈云同志指出，“说书是教育人的”，“书目要对群众起积极作用”，“在政治上必须是正确的”。同时，陈云同志又反复强调，“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听众“首先是为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间，陈云同志针对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性而忽略娱乐性的偏向指出：“曲艺是一种群众的娱乐。人们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而当一九六一年出现全盘肯定传统书目和滥放噱头的倾向时，陈云同志又说：“过去，节目太政治化了，所以现在要轻松一点，但不是把什么都搬出来。”一九八三年八月，陈云同志

又对评弹演出中的商品化倾向提出了批评，指出“要切实纠正书目和表演不健康的问题”。

同其他一切工作一样，文艺工作、文艺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向或倾向，是必不可免的。出现了不良倾向并不可怕，问题是要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倾向性问题能及时发
发现、及时纠正。陈云同志及时地、实事求是地批评各种不良倾向的原则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运用分析的方法

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在《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中，这个方法是一以贯之的。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及其运动，就是着手解决矛盾。

评弹发源于苏州，至今有几百年的历史，积累了近百部传统长篇，是江南人民群众喜爱的说唱艺术。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怎样对待传统书目和新书、怎样处理两者的关系，就成为评弹艺术存亡续绝的关键问题。陈云同志说：“传统书目中，有精华，有糟粕，还有中间的即无害的部分，应作些分析。”对无害的部分暂时保留，不必要的枝节和繁琐说表，要大刀阔斧地砍去。总之，应当留其精华，去其糟粕，保留无害部分，去掉繁琐的地方。对传统书目“原封不动”或“全部否定”，都是不对的。陈云同志多次强调“以说新书为主”，这样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能跟上时代。当然，新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又有自己的特点。新书有生命力，但有时“难免不象样”，艺术上粗糙。因此，要大力扶持新书，同时又要提高新书的艺术水平，要花大力气，长期琢磨，使新书不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艺术上也能保持评弹的特点，站得住脚。

陈云同志说，“多种形式的文艺，都各有质的规定性。”说给

人听的和写给人看的不同，评弹和小说、戏剧不同，评弹的长篇和短篇也有不同。对这些特殊之点，都要考虑到，要根据这些各不相同的质的规定性来发展评弹艺术。

解放初期，在剔除封建糟粕的过程中，艺人们提出“割封建主义尾巴”，停说了全部传统书目。这是一种粗暴的作法。到了一九六四年，又出现了都说新书的一刀切现象。陈云同志在谈到这两次简单粗暴的作法时，不是以简单化对简单化，没有用一刀切对一刀切，而是进行了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陈云同志首先肯定简单粗暴是不好的，不能再搞了；但同时又指出“割尾巴”运动是对前一时期不良倾向的否定，有积极意义；之后出现了很多新编长篇，也要肯定。一九六四年说新书也有功绩，否则不会出现几部新长篇。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连新长篇也不让演这件事，陈云同志都作了分析：一方面，“耽误了很多人的艺术青春”，另一方面，“物极必反，使现在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需要恢复传统书的优秀部分”。

客观事物都是复杂的，要准确地认识它、掌握它的规律，一定要作具体分析。对精神领域、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问题和现象，尤其应当这样。不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一刀切方法，使我们吃过不少苦头。《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的辩证思想和方法，表明我们党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是我们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更加成熟的重要体现。我们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学会分析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使自己不断成熟起来。

四、坚持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

怎样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怎样才能领导好文艺？在一定意义上说，《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记录。陈云同志通过听书、听录音、谈话、看材料、座谈等等方

式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又通过交谈、通信、发表讲话、亲自写意见和批示等等方式，进行指导。陈云同志对评弹工作中的各种不良倾向，都及时地、旗帜鲜明地提出批评，但总的来看是以鼓励和引导为主。为了发展评弹艺术、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陈云同志不仅就指导思想、方向、方针、路线、方法、措施、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等方面发表了带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就连书目情节和细节的真实与否，琵琶不能用钢丝弦之类的具体问题，都提出中肯的意见。

陈云同志说：“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评弹艺人及其事业都是属于人民的。”要把评弹事业，把培养艺术人才，都看作是人民的事业，党的事业。从事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一举一动，都要符合党的政策。”文艺领导者要摆脱事务工作，“陷于事务工作，是不能加强领导的”。

早在一九五九年，陈云同志就说过：“对于茶楼书场，文化局要参与管理，至少有关演唱业务方面的问题要管。”一九八二年他又一次指出：“要加强管理。对书场和艺人都要管起来，文化部要有一个规定。”一九八三年针对评弹演出中的商品化倾向，陈云同志再一次指出：“要切实纠正书目和表演不健康的问题，单靠文化部门抓是不够的，必须由江、浙、沪的省委和市委出面来抓才行。”

在文艺领导工作中，陈云同志一贯倡导民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而且以身作则。他说：“我们的工作要照顾群众，不脱离群众，才能发挥领导作用。”“对的意见要听，不对的意见也要听，当然不是照办。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的思想就会闭塞。……如果我们有缺点，错了，我们就改。”“听反面意见是少犯错误的保证之一。”

传统长篇小说《玉蜻蜓》中的金张氏这个人物，陈云同志曾经认为可以全部否定。后来一想，否定了金张氏，“金家书”（《玉蜻蜓》中的一段）就不能说了，艺人和群众很难接受。陈云同志因此

说：“人的认识是发展的，会变化的，我们不要怕改变自己的认识。”关于《珍珠塔》的整理工作，陈云同志发表过许多很好的意见。但是他明确表示：希望反复钻研一下《珍珠塔》的整理工作，不要因为我说了这些意见，使整理工作受影响，各方面的意见都应该考虑。

陈云同志多次指示，要根据不同对象进行工作，布置创作任务，要根据具体对象的条件。新书目的创作和改编，应当主要靠中、青年演员。老艺人可以帮助中青年加工、提高；还可以把有经验的老艺人集中起来整理传统书目，可以买些沙发，不坐长板凳，泡一壶浓茶，让他们聊，不要老拖住他们开会。陈云同志还说，不根据不同对象进行工作，往往吃力不讨好，这种做法要改进。不要搞“四人帮”那一套歪门邪道，要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内容十分丰富。要言不繁，切中肯綮，是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我们相信这本书会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领导干部的欢迎，并将在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

（总第45期 1984年1月6日）

北京市文艺界深入学习 胡耀邦同志的重要批示和讲话

根据中央的要求，最近，北京市认真组织市属文艺单位和全市群众文化工作干部，学习了耀邦同志对留美学生一封来信所做的重要批示和四月十一日关于当前文艺工作一些问题的讲话。五月七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召开部务会议，听取了市文联、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出版社、市文化局负责同志的专题汇报。五月十三日至五月十六日，又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召开了全市群众文化工作会议，市属各区县、工青妇、有关院校、市属各部、委、办、局等有关单位主管文化工作的负责同志共三百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学习讨论了耀邦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批示，进一步端正了群众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了今后工作的方向。这两次会议之后，市委、市政府以及市委宣传部领导，对继续学习、贯彻耀邦同志的重要批示，提出了要求。

从目前情况看，全市文化部门的领导对这次学习是重视的。四月上旬，前述四个文艺单位的党组织在收到中央关于学习耀邦同志重要批示的通知后，立即组织了学习，并且下发通知，要求所属单位的党支部认真组织党员学习讨论。到目前为止，以上四个文艺单位的业务部门党支部，均已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自全市群众文化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各区、县也相继动作起来，到六月上旬止，全市所有区县已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传达到基层单位的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同志中去。

学习中大家感到，耀邦同志的重要批示澄清了少数文艺工作者头脑中的混乱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时代的、历史的社会责任。通过学习，对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市文联同志反映：北京市专业作家中，有些同志在学习之初存在着“中央精神又变了”等错误认识。通过学习，作家们认识到党的文艺指导思想是一贯的，虽然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有所侧重地强调了某个方面，但绝没有来回变过。大家谈到，最近确有不健康的小报、港台歌曲出现；但就全市的文艺创作而言，主流是好的、健康的，当然也存在创作与四化建设挂钩不够，专业作家的文学创作直接反映四化建设的作品不多等问题。作家们还说，文艺工作始终要注意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不尊重创作规律等“左”的倾向，也要警惕把“创作自由”理解为不受四项基本原则指导的绝对自由化的右的倾向。

市广播电视局在学习讨论中，还结合学习了耀邦同志最近对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开始，电视台有些同志对这次学习的意义认识不足，认为观众反映北京电视台春节的节目较好，因而存在这次学习“与自己无关”的思想。但是深入学习之后，大家的认识有所提高，认为耀邦同志的批示和讲话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即：究竟让什么样的文艺节目占领屏幕的问题。他们主动按照中央的“新闻单位要成为党的喉舌”的要求检查了电视台的工作，认识到电视台的工作仍有与一些中央要求不相符合的地方。比如：在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偏向，去年也曾搞过所谓广告性新闻；也曾出现广告片过多过长情况；也曾组织过“春节武术有奖表演”节目。又如：在一些节目中，也有迎合少数群众欣赏趣味的趋向，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舞会、时装表演等节目后，北京电视台也播放了交谊舞教学录相节目。一些同志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引起的波澜，使我们从反面看到了电视节目的巨大影响，作为“党的喉舌”的一个部门，责任重大，应该为党、为人民把好电视节目的关。

北京出版社结合编辑出版业务，着重讨论了“创作自由”与编辑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家普遍感到，强调“创作自由”之后，编辑的责任更重了，编辑的职责与向党、向人民负责是一致的。大家赞成耀邦同志关于文艺方针“三个没有变”的思想，认为这同他重申“防止精神污染”的讲话，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

市文化局机关和下属艺术院团，在学习中普遍认为，耀邦同志的批示和讲话，既批评了一些格调不高的文艺创作，又划清了同“左”的文艺方针的界限。讨论中，大家结合前段时间音乐舞台上几乎是港台流行音乐一花独放，个别表演团队和艺术团体的演员中出现的不顾艺术质量，不讲格调高低，“一切向钱看”，以及北京市一些剧目创作跟不上时代、创作满足不了演出的实际情况，认识到耀邦同志的讲话和批示非常及时，十分必要，对于指导当前的文艺创作、繁荣首都的文艺舞台有着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评剧院编导人员在学习中说，“我们文艺界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激发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的爱国热情，不能单纯地追求票房价值，而不顾戏的内容质量。我们要继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文艺理论水平，苦练基本功，尽力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提高剧场上座率。”

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同志们感到：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群众文化活动越来越具有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趋势，因此，群众文化工作以什么为指导思想，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成了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大事。耀邦同志的批示和讲话再次重申文艺要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要为我们民族和人民当前的最大利益服务，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指导方针，分清文化艺术活动中哪些是应该提倡的，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该禁止的。不要把允许的变成提倡的。要因势利导，使群众文化活动朝着内容健康有益、形式丰富多彩的方向发展。

讨论中，各单位和各方面的同志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有的单位提出：目前，有许多思想艺术性较高的节目、书刊，票房价值和发行量并不高，而流行歌曲和武侠小说却十分走红畅销。对精神产品的特殊性以及精神产品同商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有的单位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是不完善的，那么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和文艺为总目标、总任务服务这些提法，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区别是什么？对那些不是直接反映并直接作用于现实生活，但又具有“抚慰人心、净化灵魂、陶冶性情”的作品，应该给予怎样的地位与评价？也有的同志提出，在理想纪律教育和用必要的经济手段搞活文艺工作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三者之间应如何统一等问题。大家认为，这些问题，有待今后结合艺术实践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以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逐步地加以解决。

在听取了文联等四个单位的汇报并召开了全市群众文化工作会议后，市委、市政府及市委宣传部对深入学习耀邦同志批示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认为：（一）要把这次学习作为一项长期的学习任务坚持下去。学习中，可以自由讨论，但不要刮风。（二）这几年，北京的文艺队伍情况较好，但切忌飘飘然。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文艺这支队伍难带。我们的领导要真心诚意地做好思想工作，通过加强学习带好这支队伍，把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上来。要搞清楚什么叫群众观点，四化是不是最大的群众利益。领导在这个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善于把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引导到为四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三）学习讨论时，一定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自身工作上来，着重讨论怎样改进自身的工作，不要总是强调客观条件。艺术团体的学习，要把功夫下到提高自己的创作、表演、导演的艺术质量上来。市文化局要认真总结经验，要加强对艺术家的思想工作，加强艺术家之间的团结，要求他们同心协力为繁荣首都的文艺事业继续做贡献。（四）剧团的改革承包试点不要轻易退，要积极而又慎重地开展下

去。艺术生产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但不能因此就把艺术生产完全商品化，而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今后，我们对艺术质量好的剧(节)目，该补贴的财政上还是要补贴。(五)市文联要把深入学习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批示的工作，做到各协会会员身上去。

在提出这些要求之后，作协北京分会于五月三十日召集四十余名会员和非会员业余作者，传达讨论了耀邦同志的重要批示。与会者一致认为，“批示很有针对性，所谓‘创作自由’是以保证文学事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前提的。”表示，要把提倡民族的东西，提倡爱国主义的东西，贯彻到文学创作中去。在讨论中，不少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古往今来，爱国主义一直是文艺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社会主义文学更应是这样。我们提倡爱国主义绝不是一时之需。有些人的民族自尊心所以淡薄，与多年来的宣传分不开。“四人帮”时搞极左，把我们的历史批掉了；另一方面又把外国说得一无是处。现在一开放，有些人思想上出现了混乱，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我们的作品必须加强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讨论中，大家还认为胡耀邦同志的批示是很全面的，在提出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献身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又提出不要回到老路上去，不要搞“左”的那一套东西，这就提醒我们不要忽“左”忽右。有的同志说：“我拥护批示，一方面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振奋精神；另一方面还是百花齐放。一定要避免片面性。”

(北京市委宣传部供稿)

(总第61期 1985年6月27日)

进一步发挥文艺在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伟大作用

——《作品与争鸣》编辑部召开学习胡耀邦同志关于当前
文艺工作一些问题的讲话座谈会

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关于当前文艺工作一些问题的讲话,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理解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正确地坚持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坚定地进行文艺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文艺界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认真学习、理解和贯彻胡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的精神,《作品与争鸣》杂志编辑部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七日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央宣传部文艺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红旗》杂志编辑部、《光明日报》编辑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央电视台、《文艺报》编辑部、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作品与争鸣》编辑部的负责同志、文艺评论家共二十人。他们是(按姓氏笔划为序):丁振海、齐兰珍、刘玉山、刘锡诚、成志伟、杜元明、李准、陈志昂、郑伯农、张炯、林文山、徐非光、梁光弟、顾骧、秦晋、唐达成、谢宏、谢永旺、鲍昌、蔡毅。

积极反映四化建设的壮丽图景

到会同志就文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唐达成:耀邦同志的讲话,听过录音,这次又读了原文。这个讲

话很恳切、很全面，对文艺工作作了很好的估价。特别是讲到文艺与时代的关系，讲到文艺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个最大利益服务，指出“中国人民在轰轰烈烈地干四个现代化，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富裕而奋斗的壮丽图景，在我们文艺创作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我觉得这个提醒很重要。我最近和作协一些同志到广东特区参观，走了深圳、珠海、东莞等一些地方。我的印象是那里形势非常好，生产欣欣向荣，群众情绪高涨，社会生产力有了相当大的发展。那里经济上的优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的奋斗，对国家的贡献，很值得描写。如果一时构思为小说来不及，那么写成报告文学，写真人真事，也会很吸引人、很有魅力的。不然，确实就辜负了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中央领导同志号召文艺界的同志要时刻想到人民现在在干什么，时代要求我们干什么。这是很对、很及时的。我们搞文学的也好，搞艺术的也好，应当对这个号召作出积极的反应，这是责无旁贷的。

林文山：我们并不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写改革，但是否还得有更多的作家去写四化建设，去写当前的改革？当然，这里有个文艺如何反映时代变革的问题。除了不要图解政策之外，还有一个怎样才算正确理解和表现改革中的矛盾冲突的问题。生活中有象东莞县里那样的时代新人，也有一些走过坎坷道路的斗士，有先进的东西，也有落后的甚至丑恶的东西。因此，应当鼓励作家深入生活，进行探索，写出一些也许不那么成功的东西，通过讨论来达到提高的目的。在这方面最好不要强求一律。当然，我们还是要提倡写新的先进的事物。

鲍昌：我认为应当对时代、作品的时代感和时代精神有个正确理解。我们处于改革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改革带有试验性，因此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这个时代，就不会对此感到惊慌失措。文艺如何反映生活？我认为，

一是反映时代前进中的光明面；二是要反映时代前进中的困难面、阴暗面；三是要反映时代的群众审美的多方面的心理变化，不然文艺就会陈旧、落后于时代。文学如同一个座标系，要认识我们国家的历史，有一个纵向的轴；也要看到时代是开放的，中西方是相联系的，有一个横向的轴。

陈志昂：文艺必须倾听时代和人民的呼声，必须适合时代的需要。对这一点，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争议，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就在不久前的几年，还有一些人主张：艺术不是时代的反映，而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与人民大众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的问题不是文艺要不要反映时代，要不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是什么样的文艺才适合时代和人民的需要？或者说，时代和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是五花八门，很不相同，甚至根本相反的。薄一波同志在谈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什么样的音乐时，非常鲜明地指出：文艺首先要适合时代。他认为适合时代的便是五·一晚会这样昂扬蓬勃的节目。

为什么都说要适合时代，而做起来却是这样不同呢？我想，这主要是由于对时代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个性解放的时代，还有人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享乐的时代，从这样一些理解出发，有些人就认为只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艺术才适合我们时代的需要，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东西被认为已经过时，共产主义的旗帜要收拾起来；有的人甚至下决心不让自己的作品里出现“共产党”这三个字。《大路歌》不唱了，专唱自己那条小路。前几年是哀叹生不逢时，现在又在吟咏个人的渺小幸福了。尽管人民群众在那里轰轰烈烈地大干四化，有些人却死拖住“永恒的主题”不放，什么爱呀、死呀。还有西方的侦探文艺，也有人吹捧说是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尔虞我诈。其实，这种暴露是很有限的。高尔基曾经分析侦探文艺被资产阶级欢迎的原因：资产阶级既可

以从中看自己如何巧妙地犯罪，也可以看到忠实的鹰犬如何机警地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所以可以得到双重的满足。还有人热衷于引进和模仿西方和港台的夜总会那一套货色，办晚会要请港台歌星主持或压轴，甚至创作歌曲要请香港的配器匠来配器。由于同香港唱片商订了合同，有求于人，受制于人，节目的安排要听人指手划脚，不能完全自主。列宁说，摆脱了对钱袋的依赖的文学是最自由的文学。现在又出现了钱袋的依赖，它所取得的自由又要丧失了。上海解放以前也曾流行这一类庸俗低级的东西，解放大军一到，一切烟消灰灭，革命的健康文艺取而代之。现在有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还没有接管香港，香港的庸俗东西倒已先来“接管”我们了。

一个时代的特点，是被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同社会生产力尚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依靠十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因此，高举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振奋民族精神，鼓舞人民为民族振兴、为中华崛起、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拼搏，而献身，而开拓前进。这就是时代对文学艺术的要求，这就是时代的命令。

文艺要成为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

座谈会上发言的同志认为，当前的文艺形势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要看到确实存在着一些有待正视和克服的问题，而文艺的完全商品化即“一切向钱看”的倾向特别值得警惕。

郑伯农：胡耀邦同志最近就文艺问题作了好几次讲话，需要深入地加以贯彻。文艺界的大团结要有个目标，就是耀邦同志讲的为民族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就是小平同志讲的共产主义理想。大鼓劲首先是鼓人民的劲，鼓建设“四化”的劲，而不是鼓文

艺工作者个人发财的劲，鼓争名利、争席位的劲。这几年的文艺有了很大进步，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耀邦同志就赴美留学生来信所作的批示下达后，引起许多同志的思想震动。近一个时期，模仿港台的东西有所收敛，健康的东^西多起来了。前些日子举行的华北音乐节的会演，有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受到不少同志的好评。当然，也要看到，我们确实存在着必须正视、必须克服的问题。文艺的商品化，就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去年有一个省开讨论会，座谈文艺与商品的关系。据报道，多数人认为文艺就是商品；少数人认为不是；还有人认为既是又不是。认为文艺完全等同于商品，就会模糊社会主义艺术生产的日的，实践起来就会产生混乱。音乐界有一个现象，叫“走读”，就是私下串演赚钱。“一切向钱看”，不仅会使文艺商品化，还会使人心、人格商品化，弄久了心就收不回来。胡耀邦同志讲到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时，提出了两点：一是要求时刻想到为我们民族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务，二是注意保护青少年，使他们不受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这两条做好了不大容易，但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做工作。工作中有缺点，吸取教训就是了。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不敢做工作。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既有低级下流的，也有高级精致的，理论形态、文化形态的，如什么虚无主义的人生观、社会观，个人主义的人的价值观，什么反理性主义、唯我主义等等。后者比较复杂，需要细致分析。但从原则上说，对这两种东西都需要抵制。邓小平同志在科技会上强调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要提防那些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东西冲击我们的革命理想。不久前看到一篇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文章，说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讲的是老一套，没有新东西，而且一直没有在社会实践中取得过成功。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产生于十九世纪，它所指导的共产主义运动虽然遇到过许多挫折，但决不是没有取得过成功。上述那种看法是难以令人同意的。百家争鸣有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如果不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问题就会越来越难解决。总之，

形势很好，问题存在，必须解决。

刘锡诚：在新的形势下，有些地方领导人的思想也乱了。又是文艺的东西，又是生意的东西，怎么管？管不好怕犯错误。对大量非法进口的录像带，他们认为只要不是太差的就放行。（谢宏：据说，个体户还听话些，集体的、国家的单位放录像反而难管。）录像机才几千元，很容易弄到，滥放录像堵不住。录像片几乎取代了文学和电影，这个势头还有加剧的趋势。广大群众需要文学这种精神食粮，但现在文学却下不到群众中去，群众不大读文学作品。（唐达成：我与广东同志讲，我们能不能自己制作些录像带，把好的群众爱看的影片翻作录像出售，如《董存瑞》、《保尔·柯察金》、《百万英镑》等等。）现在，民族的纯朴的东西受到冲击。我遇到了几个搞科技的同志，他们对文学状况很不满意，认为离生活远、瞎编。搞社会主义要有理想、有信仰。群众需要文学鼓舞他、帮助他。但现在有些作品却没有理想、存在着自然主义的倾向。这几年讲文学的结构、层次，讲得多，讲文学的理想讲少了。鲁迅讲文学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理想很难前进。社会主义文学要批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才能在生活中起好的作用。

谢宏：我这次去了四川、云南，到过藏族、羌族、白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那里的生活都开始好起来了，群众性的文化生活也在不同的层次上出现了新局面。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需要严肃对待。比如，一方面是广大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饥渴，一方面，真正吸引他们，适合他们文化水平和欣赏情趣的文艺作品、文艺演出很少，致使一些不健康的小报和录像乘虚而入。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精神食粮问题是个严重问题。再比如，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也随之发展起来。商品意识相对于小农意识来说是个进步。但是，这个在我们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发展着的商品意识，不能不使我们保持另一方面的警惕，即要防止其消极因素对于党

和人民的侵蚀，防止金钱交易的原则侵入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侵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我们时代一个很深刻的矛盾。要反映这个时代，就要正视这个矛盾，很好地把握这个矛盾。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比《创业史》、《李双双》的时代活跃得多，也复杂得多了。这种复杂，从总体上讲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作家艺术家们从现实生活中提炼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意识，则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谢永旺：耀邦同志的讲话很重要，读了很受启发。这是针对文艺界的实际讲的，不论是谈我们党文艺政策的重要性，还是讲文艺界不要忘记自己对时代对人民的责任，都有现实意义。我们要很好地宣传。文艺形势到底怎样？讲文学创作，我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发展的。例如小说的题材更广泛了，小说里描写的人物更加多样了，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艺术表现手法也有一些新的尝试。作为一个过程看，是对过去简单化、单一化的反拨。创作的基本调子是健康的。多样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但人物形象塑造得丰满动人、有高尚情趣、给人以鼓舞力量的比较少一些。我们的文学应当多样，但其中反映时代的前进，使人感奋的作品又应当是主要的部分。这是要突破的，否则不能在群众中发生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陈志昂：为了表现我们这个奋进的时代，有些人要把西方一度流行的迪斯科当成时代的新声，把它的节奏当成我们时代的节奏，这纯粹是一种误会。我并不反对人们跳迪斯科，也不反对从中吸取一些节奏和音调来丰富我们的创作，但如果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声，那就大错特错了。迪斯科尽管起源于黑人的民间歌舞，但在西方确实已经变成夜总会里供资产阶级娱乐的东西。去年我访问了美国，所得的印象更使我深信这一点，它的确不象有的同志说的那样是表现了人的彻底的解放，绝不能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新声。

要寻找真正的新声，只有到沸腾的现实生活中去。反映时代，

不是要把文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要表现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丰富多彩的性格，通过这些来体现时代的精神。

新闻界对文艺界的问题要注意研究，慎重地发表意见，不要帮倒忙。

关注通俗文学 加强报刊管理

发言同志认为，对通俗文学的盛行要加以分析研究，扶植好的，批评坏的。对各地不健康的报刊要切实按党的政策加以整顿和管理。

鲍昌：我赞成通俗文学的存在。因为通俗文学在历史上就存在。有些东西假借通俗文学之名，却根本就不是文学。要制定一个政策，对黄色的东西全部查抄，毫不含糊。对消极、阴暗的东西加以处理。同时，要对青年进行正规的生理教育，中学上性教育课，不让它神秘化。最后，要有信心。我在新疆看到一位搞人工授精的青年，他案头上就摆着《人民文学》、《十月》。他说“我不能没有精神食粮”。因为文学到底有些电影、电视夺不走的東西。据我了解，南方小报印数在下降，录像上座率也在下降。

谢永旺：纯文学(或称高雅文学)是有读者的。而社会上更多的人愿读通俗作品。过去不重视，现在一下子多得到处都是。但这些作品中新创作的少。有很多是旧的东西，重印，或者改头换面。《神鞭》是新写的好作品，还有一些作家在努力。新写的也有庸俗的、迎合低级趣味的东西。光查禁不行，还要有高质量的通俗作品去满足那些读者。此外，对有些现象要区分。有的是创作上的问题，有的是管理上的问题，不分开，对文艺形势估计就不客观。如小报的出现，与文艺界有关，因为有的就是由文艺团体、文艺报刊编辑出版的。也有的作者写了些不健康的東西。但小报的泛滥又有许多是属于管理上的问题，而不是创作问题。编小报的有各种各样单位的人，小报的内容也大多说不上是文学创作。

这属于文化管理，应当解决。据我所知，编小报的同志相当多的人不认为这就是正道。他们是要解决一点收入。真正搞文学的人编小报、搞歪门邪道的东西少。问题大的是那些想捞一把的人。

秦晋：对小报，开始有些地方不敢管，等到问题成堆后就往上报，等上面表态。管理上缺乏中间环节，怕犯错误，如耀邦同志讲话中所指出的：不讲政治责任心，不讲主动精神，不讲独立的鉴别能力，有的问题推给上面去管。还有一些本来是可以透过法律加以解决的。如到底什么叫“黄色”？根据什么标准去查禁？对小报应按正常的程序办理。首先要拿来分析。看有多少是不太健康的，有多少是一般的，有多少是淫秽的。通过分析研究，然后作出决策，制订法规，或法办，或查禁，或进行思想引导。如果没有一定的法规，虽然查禁了，到一定时候又会冒出来。应该象耀邦同志所说的，工作要越做越细，必须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文化管理工作科学化、系统化、经常化。

贯彻文艺政策 加强文艺评论

发言同志就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大力加强文艺评论的问题，发表了以下意见。

鲍昌：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贯彻问题，我用一个形象说法——写好两篇文章：第一篇就叫做举社会主义旗帜。翻翻我们的作品，包括得奖作品，感到宣传爱国主义的还不多。我从看苏联影片中受到启示，他们几十年一直搞爱国主义教育。第二篇文章是创作自由。最近看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列宁论创作自由》，很受教育。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提倡创作自由有利于作家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出有独特个性和风格的作品。同时它是文艺自身的规律。要写出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正确宣传创作自由。要出好作品。政策既要保持连续性、坚定性，但随着情况的变化，政策必须做些小的调整。这是正常的。因为

根据文艺发展作些调整，是合乎规律的。如果把这看成基本政策也变了，那要说服。贯彻政策，要重视文艺评论。靠理论批评促进创作繁荣。近年来出现一批中青年评论家，很有才华。但是也还有人在介绍国外已经过了时的东西，往往从二手材料整理、发挥一番，因为原版书并未翻译过来。一些青年评论家自视甚高，认为我们这一代人过时了。但我们仍要学习，他们看的书，我们也熟悉一下。理论批评要加强，要改进，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郑伯农：批评与自我批评还要有。批评的旗帜不能丢。现在批评也难。要引导。要有与人为善的空气。但历史证明，批评不等于居心不良，也不是捧场的都好。批评需要做得更仔细，但该说的还得说。

谢永旺：对当前出现的优秀作品，加以深入评论的不是很多，对于有争议的作品，争得也不是很透。结合实际发展评论是急迫的事情。评论要充分说理，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绿化树》的讨论是做得较好的，但最近收到读者来信，指出讨论还不充分。在文艺问题上，平等地讨论，争鸣，批评，反批评，就是评论自由的应有之举。我们的评论还是要坚持一些基本观点：如文学要讲真实性，要创造形象，要有思想性、艺术性的统一，等等。关于理论问题，现在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做为一个过程，青年同志在开放之后对原有的东西不满足，介绍新的理论信息，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思想活跃是好事情。问题也在于要对话，要引导，要争鸣，要把口头的评议变为说理的文章。相信青年人对实际接触得多了，思想会有发展。有些文科大学生，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到高年级读书多了，又渐渐转过来，认为还是马克思主义最科学。探索精神是压抑不得的啊。我们也要从中学习、进步。

秦晋：理论上的沉默不是好现象。如创作自由问题，中央一再肯定，宪法上也写了，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理论探讨和争鸣是很必要的。评论上的活跃，有利于贯彻中央精神，有利于引导文艺

健康发展。

在座谈会上，一些同志还就文艺的改革和组织领导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

（《作品与争鸣》编辑部供稿）

（总第62期 1985年7月15日）

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心中飘扬

湖北省歌舞团

反映中华民族古代灿烂文明的《编钟乐舞》，自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武汉问世以来，先后到北京、湖南、广州、深圳、上海、杭州等地演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广大观众和外宾的热情赞扬和欢迎。特别是今年五月赴日本，参加筑波国际科技博览会“中国日”庆典演出，使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朋友对我国民族文化惊叹不已，赢得了国际声誉。

当我们回顾《编钟乐舞》的创作演出实践乃至本团多年来的前进道路时，全团同志由衷地体会到，是党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引导着我们，是人民的乳汁哺育着我们，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我们，才使得我们这支年轻的文艺队伍能够不断成长，为传播和发展民族文艺贡献了力量。

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振兴民族文艺事业

我们这个团筹建于一九五九年，正式建团是在一九六四年，当时名为湖北省民间歌舞团。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关怀下，我们多年来坚持把继承发展民族民间文艺奉为建团宗旨。二十多年来经常组织采风组，收集整理民间艺术遗产。同时加工创作具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艺术作品为群众演出。演员们曾多少次挑着道具翻山越岭，拉着板车冒雪下乡。为了采集一首首民间歌曲和一段段民间舞蹈素材，创作人员踏遍了

湖北的山山水水。长期的积累使创作人员对我省丰富多采的民间歌舞艺术，由知之甚少到有所了解，并逐步加深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感情。演员们也因此掌握了一定的民族歌舞的表演技能，初步形成了作为一个民族文艺工作者的气质和风格。这些都为创演一部大型民族艺术作品作了不可缺少的准备。

在我们致力于开拓发展民族艺术的历程中，我省考古史上的一次空前发现，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从而促使我们的文艺创作进到一个新阶段。

一九七八年八月，在我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距今二千四百多年楚惠王时期的大批无价宝物。尤其是其中的编钟、编磬、排箫、建鼓、篪、竽、琴、瑟等一百二十四件古乐器，组成了一座宏大壮观的“地下音乐殿堂”。这对研究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具有重要价值。它的出现充分表明我国数千年前在音乐文化和金属冶铸等方面的高度水平。在当时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如古希腊，曾经创造出辉煌的音乐文化，但由于他们的乐器是竹木制作，早已腐烂而不复存在了。我国的青铜编钟虽历经二十多个世纪，依然风采灼灼卓立于世。难怪外国著名音乐家也发出慨叹：“曾侯乙编钟是世界第八奇迹。”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唤起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触发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激情呢？于是在一九八〇年，我们着手创作一部表现战国时期文化艺术的舞剧《古墓钟声》。三年之内，三易其稿。这台晚会的创作使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促使我们的思路伸向了探索古文化奥秘的领域。到一九八三年九月初，文化部文物局主持的曾侯乙编钟复制鉴定会，肯定了复制工程的成功。雄浑的钟声使我们产生“灵感”。对！应当光复旧物，编钟可以重现于现代舞台，要让观众直观地领略它的风采。省文化厅领导对我们也寄予了希望，二月份，我们设计出《编钟乐舞》的总体构思，在听取省文化厅、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领导同志的意见后，迅即投入节目编排。

《编钟乐舞》的创作蓝图使剧团党委和部分同志满怀信念与憧憬，但怎样统一全团同志的认识，动员大家同心同德地投入这场艰苦繁难的战斗，这在一九八三年年初的客观形势下，存在着诸多不利的因素。

当时，团里有一个演出队正在河南省巡回演出，经济收入还比较可观。团党委在省文化厅指示下，决定中断他们的演出，把队伍调回来创作排练《编钟乐舞》。那个时候文艺界正纷纷议论改革，在家的同志也在热烈地讨论本团的各种改革方案。到底什么是改革的本质与真谛呢？人们似乎一下子还没有来得及深究。于是不免出现了某些对改革精神的误解和行动上的偏差。如有的自发组成的班子互相拉人，发生不团结的现象；有的同志只在演一场可以分得多少钱作算计；还有个别同志甚至提出不要党员、干部参加班子。在这种局面下如果放任自流，《编钟乐舞》构思的实施肯定是遥遥无期了。团党委根据中央关于文艺改革的精神和剧团实际情况，决定首先抓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大家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邓小平文选》和胡耀邦同志对文艺界的重要批示。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讨论会和党员读书班。当时针对实际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向前看”与“一切向钱看”的实质区别，文艺的社会功能是什么？要不要努力为人民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剧团领导同志在会上会下也畅谈自己的认识体会：我们这个团多年坚持走民族民间道路，这是正确的，还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目前一些流行于舞台的节目，一味模仿照搬港台的演出，究竟是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团肯定要进行改革，当前要围绕《编钟乐舞》的创作，出作品，创风格体现改革精神。在议论社会上某些单纯为追求票房价值而上演的低级庸俗的流行曲及挑逗性的肉麻表演时，有的同志说：“如果要我在台上这么献媚，唱那些歌子的话，我宁肯脱离舞台另谋职业。”经过反复学习讨论，大家明确地认识到：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改革，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不能改，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不能改，用“一切向钱看”

的态度对待文艺改革必将走入歧途。归根到底，改革的目的是出作品、出人才，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

本着这些精神我们开始了初步改革，提出了《编钟乐舞》创作承包责任制。这个方案实行三级承包，即团部向省文化厅承包，各队向团部承包，演、职员向队承包。承包责任制中对任务、要求、奖惩、期限各项都作了具体规定。省文化厅很快批准了承包方案，一九八三年五月四日，厅团双方隆重地签订了承包议定书。文化部周巍峙副部长对此表示了赞赏：“在青岛开会时，听你们的韩局长讲，对这台节目搞了创作承包，不是搞钞票，而是搞文化，表现了雄心壮志，发展民族文化就是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省委宣传部及时给予我们巨大支持。韩光表局长在我团干部会上激动地说：“不搞出《编钟乐舞》，愧对祖先，死不瞑目。”领导同志的鞭策更加增添了我们的勇气。

崇高的革命理想，排除了各种干扰杂念；严明的纪律要求，消除了散漫松懈。全团同志为振兴民族文艺事业而拼搏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大大发挥起来了，背水一战，决战决胜，创作《编钟乐舞》的热潮掀起来了。

用爱国主义精神创作爱国主义作品

通过查阅学习数百万字的文史资料和屈原的作品，我们确定以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以编钟为主体，用古老的“歌、乐、舞”溶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反映古楚灿烂文明。特别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发出的《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中的一段话：“中国各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使我们祖国成为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对东方以至世界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给了我们强烈的印象和启示。

文艺作品的立意深浅与格调高低，取决于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准。我们感到，《编钟乐舞》不能搞成一般化的歌舞晚会，它必须

有一个魂，就是爱国主义。抓住了这个魂，古代乐舞才能产生巨大现实意义，使现代观众引起共鸣，达到鼓舞人们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社会效果。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编导者们从浩繁的史籍中精心选材。选定了屈原的不朽诗作《桔颂》、《国殇》等，前者歌颂“独立不迁”、矢志不移的挚爱祖国的高尚情操，后者激荡着卫国保民的壮烈旋律。《采桑》和《耕耘》组合成的农事组舞，表现楚人开拓家园的劳动生活，及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奋斗精神。其他的节目也是这样，我们尽量选择那些对今人有启迪作用的内容，使之既能反映历史风貌，又可古为今用，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

从《编钟乐舞》公演后的效果来看，观众除了对其艺术性感兴趣外，对其思想意义也有强烈的反映。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发表观感：“看了演出精神振奋，你们把古代灿烂的文化搬上舞台，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以鼓舞，使人们沿着民族的崇高精神和优秀文化前进、发展。”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说：“你们把二千四百年前的文化艺术搬上舞台，很有创造性，你们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让大家看看古代文化，让全国人民开开眼界，为精神文明多作贡献。希望你们能走向世界的前面，这是全民族的骄傲。”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贾作光说：“《编钟乐舞》是一台极为引人入胜的楚乐楚舞，是一个伟大的继承和创造。它富有历史感、时代感、真实感，有中国气魄，是民族风貌美的集锦。这台节目，不仅使民族文化宝库中有了珍贵的贮藏，而且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使人增强了民族自豪感。”《龙的传人》的作者侯德健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宏伟的古代乐器，祖国的古代文明太伟大了，你们把它搬上舞台，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作为音乐工作者和中华民族的一员，我应该感谢你们。”

文艺作品产生出这样的社会效果，作为编导者和表演者，全国同志既激动又感到十分欣慰。回忆起《编钟乐舞》初创时的日日夜夜，不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激情推动着大家奋力工作的吗？那是

八三年的七、八、九月，正当武汉的酷暑季节。同志们在四十度高温下坚持一日三班，常常排练到深夜二、三点钟。舞蹈演员每天在排练厅不停地跳跃、旋转，汗水象雨点般浸湿了地板。歌唱演员练习古代女子的跪姿，膝盖肿了破了也不做代替动作。舞美队自己动手制作服装一百三十五套，衣、裙、袄、袍、帽、腰带二百零八件，头饰一百多件，道具一百多件，灯具二十多套，音箱十二个，为国家节约开支近万元。乐队的工作量更大，除了排练之外，他们在兄弟单位援助下，把编钟、编磬、簠、箏、古琴、埙、建鼓、虎座鸟架鼓等古乐器都仿制出来了。尤其是磨磬小组的同志们，主动请战奔赴襄阳山区选取石料，请老石匠按尺寸开出石坯，然后，将平均重达十余斤的石坯放在水池里，来回不停地磨了三十八天。据计算，每块磬片要来回磨上七、八万次。跨有两个半八度的三十二块光洁如玉、音质优美的磬片，就是他们用汗、血和着水磨成的。这些同志当时根本没考虑什么报酬啦、钞票啦，只是一心一意地为艺术而苦斗。这也就是后来人们称道的“磨磬精神”。《光明日报》曾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要作艺术的主人，不作金钱的奴隶》。报道了那时全团的精神面貌。剧团党委及时表扬推广了磨磬小组的事迹，要求全团用磨磬精神进行创作排练。因为这种精神包含着爱国主义热情，包含着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文艺工作者才能在社会主义文艺领域有所作为，为人民创作出有价值的健康的精神食粮。

在上级领导关怀启发下，我们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因为对于创作古代题材的节目来说，不懂历史是无从下手的。不懂就问、就学，我们先后请省博物馆、湖北艺术学院同志来团作专题报告。先后求教了省内外三十多位专家学者，特别是一些年事已高的老专家如匡亚明、沈从文、阴法鲁、张肖虎等，他们热爱民族文化的执着情感和渊博的学识，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

创作排练期间，我团资料室陈列了大量文献资料，求知的人们络绎不绝，一本珍贵的书籍往往十几个人争相阅读、传抄。文

学资料组的同志日以继夜地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寻觅，一旦从几万字的文章中查出几行字的依据资料，就高兴得拍案叫好。有些家庭里，丈夫查资料，妻子协助翻词典，孩子帮着抄材料。通过学习，大家共同感到头脑比以前充实多了。《光明日报》一位记者同志经过半个月的采访后感慨地说：“我在歌舞团不论找谁采访，他们都能根据本职工作的范围谈出一些道理来。”

一九八三年八月七日，《编钟乐舞》在武汉首次公演。这台大型古典歌舞从构思到问世，不过半年。不少同行对此颇感惊讶，认为是个奇迹。按照常规一台大型晚会，搞两年也不算长。从这个角度看，乐舞的创演确是有些奇，但我们的心理是清楚的。对于个中的甘苦及因果关系，我们后来总结出三句话，即“二十年的积累，三年的准备，半年的突破”。

通过《编钟乐舞》的创作演出实践，我们深深感到，文艺队伍的思想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队伍的思想作风直接关系到文艺创作的成效。特别现在党对文艺界提出搞好改革的要求，提出文艺创作和表演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发愤图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献身。对此，我们要进一步学习领会提高认识，最近打算在全团普遍进行一次思想教育，拟定了十一道学习讨论题，其中有两道是：怎样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意义？如果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任务，将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总之，我们一定要不断结合新形势、新情况，努力抓好思想政治工作，要使文艺工作者成为有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爱学习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当五星红旗升起在国际舞台上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还想谈谈不久前，《编钟乐舞》演出团奉文化部派遣，赴日本参加筑波国际科技博览会“中国日”庆典演出的感

受。

演出团出国前夕，五月七日下午，省委和省委宣传部同志来我团住地，为演出团送行并讲话。黄省长说：“我曾经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提起过《编钟乐舞》，他表示欢迎你们到日本演出。希望你们这次到日本拿出最好的演出水平，打响第一炮。要表达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传统友谊。大家是湖北人民、中国人民的友谊使者，要使日本人民从你们身上看到文艺工作者的气质，要有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气质。最重要的是要有理想、有抱负、有文化、守纪律，做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的青年。”陈部长说：“你们肩负着全省人民的委托，代表湖北人民出国演出，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希望大家通过演出增进友谊，宣传我们的伟大国家、伟大民族和光辉灿烂的文化，为国争光。思想作风要好，要表现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工作者应有的风貌。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厚望，激励着同志们满怀信心和勇气冲向国际舞台，为祖国争光。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中国湖北省歌舞团《编钟乐舞》访日演出团一行六十六人，在博览会“中国日”前后(五月十六日至二十日)演出四场，接着到鹿岛郡波崎町、东京昭和女子大学、调布市、长野县长野市、上田市和厚木市演出八场，于五月二十八日回国。

由于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这次访日演出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日本人民对有浓郁民族特色、别具一格的《编钟乐舞》表现了巨大热情，每个节目演完，场内掌声雷动，气氛十分热烈。特别是五月十七日“中国日”的庆典演出，在观众流动出入的情况下，来看中国演出的日本朋友和几十个国家的友人，连后座矮墙周围都站满了围观的人群。演出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人群的移动，场内秩序井然，除了钟磬乐器的演奏和歌声，便是振耳欲聋的掌声。演出结束，演员三次谢幕，观众迟迟不肯离去。博览会人士高兴地说：“博览会自开幕以来，举行过十三个‘国家日’庆典演出，从

没有出现过象‘中国日’这样的盛况。”负责接待歌舞团的外崎俊彦先生说：“这是博览会开幕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演出。”《筑波卫星新闻》迅速作了宣传报道，称赞“沉睡了二千四百多年的编钟，音色质朴、明彻，低音部如大地深处涌出，显得如此庄严。”认为“《编钟乐舞》重新演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王族诸侯喜闻乐见的宫廷交响乐，使二千四百年后的观众不需要说明就能领会。”不少日本青年学生边看边发出感叹：“看这样的节目，才有意思。”一位日本老人激动得老泪纵横，特地委托中国留学生专程送来他亲笔写的观后感，他说：“只有人民中国才能拿出象《编钟乐舞》这样精湛的艺术品。中国，是梦一样美好的国家。”他还要求全体演出人员签名，留作永久纪念。曾经参加过中日青年联欢的两位日本青年，到武汉时看过《编钟乐舞》，他们得知湖北省歌舞团到了筑波，特地从北海道赶来又看了两场，并把他们亲手制作的精美木雕赠给我们，祝贺访日演出成功。在此期间，日本广播协会记者还适时赶到不同的演出点，进行多次采访，为向全世界播放《编钟乐舞》演出实况预先作准备。

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方毅同志会见演出团的同志时，高兴地说：“我坐在主席台第一排看，你们演得很好，很成功！我看你们这个团是大有希望的。”中国展览馆馆长也说：“你们的精采演出，为中国馆增添了光彩，来参观的各国朋友越来越多了。”

这些评价和反映，使我们联想到，现在有部分青年觉得好象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对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民族文化不感兴趣，甚至鄙薄非议，这种盲目崇洋和妄自菲薄的思想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应该引导青年分清良莠，正确欣赏外国优秀文艺，同时更要多创作出高水平的民族文艺作品，帮助他们了解认识民族文化的伟大价值。我们确信，随着民族文艺的逐步复兴和国际文化交往的日益扩大，我国民族文艺必将在国内外观众的心目中，闪耀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在整个访日演出期间，同志们时时想到自己是友谊的使者、

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因而充满了热情和干劲。在日本半月，先后演出十二场、转台十次。通常是每天清早起床，饭后登车出发，一到剧场就抢着装台、对光、试音响和走台。演出一完就又忙着拆台、装箱，常常工作到深夜，平均每天只能休息五、六个小时。在生活不习惯，身体极度劳累的情况下，全团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始终情绪饱满地按期完成了原定的演出计划。外崎俊彦先生感慨地说：“在我接触的剧团中，象你们这样劳累而又埋头苦干，不发一句怨言的剧团，是不多见的。”另外，严密的组织纪律，为访日演出的顺利进行作了组织保证。初到日本，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家都想多了解、多看看以增长见识。少数同志有亲戚朋友，需要时间探访。然而，紧张的转场和繁重的演出，几乎占用了全部访日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以纪律约束自己，自觉服从工作安排，没有一声怨言，仅有的一天参观博览会，也坚持了集体活动。

《编钟乐舞》访日成功，其因素是多方面的。大家一致认为，为祖国争光的高度爱国主义热情是最基本的因素。尤其是当举行“中国日”庆典的舞台上奏起庄严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同志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作为伟大中国人民使者的荣誉感、自豪感和责任感一齐涌向心头。此时此刻，人人百感交集，仰望着红旗，想起了许许多多：想起了党和人民的嘱托，想起了歌舞团二十多年来一步一步的历程，想起了文艺工作者对人民应尽的责任，想起了崇高的理想、伟大的事业、今后的道路……

我们深知，《编钟乐舞》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是由于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只是在继承方面做了一点工作。我们的思想水平还不高，节目的艺术质量也比较粗糙，距离党的希望和群众的要求仍然相差很远，这使我们没有理由满足现状而松懈起来。一切从零开始，思想的提高无顶峰，艺术的发展无止境。我们愿意永远这样勉励自己。

(总第64期 1985年8月23日)

在改革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安徽省杂技团有演职员一百七十九人，分两个演出队，一个学员队和一个乐队。在改革过程中，他们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出人、出戏、走正路”的方针，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促进了杂技艺术的繁荣，培养了一批艺术新人，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贡献。几年来，这个团先后派出七批人员出国，到马里、希腊、比利时、西德、瑞士、西班牙、奥地利等十六个国家和地区，圆满地完成了出访演出任务；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两年，组织演出队，深入厂、矿、农村演出七百一十二场，观众约达七万人次。

他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坚持了以下几点：

坚持“出人出戏”，端正改革方向。当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戏剧界有一种说法，“改革就是承包，承包就是捞钱”，这种趁机“发改革财”的思想对杂技团也有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团党支部和团领导认真学习了党的有关文件，反复领会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进一步弄清楚社会主义艺术的性质、艺术工作者的责任、改革的根本目的等。同时认真分析演职员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开展学习和谈心活动，提高广大演职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责任感，使大家认识到杂技团的改革，是为了繁荣杂技艺术，更好地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作为人民的杂技艺术工作者，要用美的艺术陶冶人的心灵，决不能见利忘义，以低劣的产品污染舞台，糊弄观众。有的同志表示，人家捞钱不眼红，钞票面前不动心。防止了“捞钱”思想在团里传染。全团上下，一门心思地抓杂技艺术的提高和创新，制定出节目的高、难、

新攻关目标，经过几年的刻苦训练，已经初见成效。一九八四年全国杂技创新节目会演，他们的《大跳板》和《女子高台定车》荣获铜牌奖。今年《大跳板》又前进了一步，加了“侧空翻三周转体九十度落三节人”这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动作。节目的出新，寄希望于青少年。几年来，他们招收了四十二名小学员（最小的只有6岁），挑选了一批业务骨干，以很大精力，抓了小学员的培训工作，先后排练了《大跳板》、《高台定车》、《女子排椅》、《三人顶碗》、《钢丝跟斗》、《滚环》、《敦煌造型》、《晃板顶技》、《女子集体车技》等，今年八月已进行了结业演出。中国杂协书记处书记刘平看了学员的演出撰文称“小演员表演的‘三节人双开花’的最新技巧为高台定车技巧出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大跳板的演员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他们不但掌握了高水平技巧，而且勇敢地向世界高水平冲刺，他们象征着杂技艺术的明天，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法国“明日杂技节”节目主持人莫克来尔也对学员队的演出给予高度评价。学员队演出的部分节目已选入今年十月赴西德、瑞士等国进行商业性演出的内容。

坚持改革体制，加强完善团队的建制。在改革中，进一步调整充实了团队建制，在团部下设两个演出队，试行了在团部领导下的队长负责制和经营承包制，演职员在两个演出队的范围内自由组合，坚持两个演出队对外演出，保持整台节目的完整性和一定的演出水平。既有利于调动广大演职员的积极性，克服“两个大锅饭”和人浮于事的弊端，也避免了“跑单帮”，降低演出质量的现象。在处理收益分配问题时，他们注意了团、队、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一段时间，个别人对收入分光和无钱不干事的做法表示欣赏。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一面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领导以身作则，党支部和团队领导不参加分成，带队演出的队干部自觉不拿高分，装台、拆台、脏活重活干部带头去做。在领导的带动影响下，全团出现了比干劲、比事业、不争奖金，不在“钱眼里转”的好风气，顺利地实现了团里得大头，队里得中

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原则。个人所得的“小头”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评定的原则有演出质量、技巧难度、劳动态度、遵守纪律四个方面。

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保证出国演出任务的完成。近几年来，这个团先后七次、一百九十六人出国在国外演出四百七十三场，观众达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人次，为国家创收外汇二十多万元。同志们对出国的积极性都很高，因此工作任务也就更加繁重。他们一方面选拔出国的合适人员，进行严格训练，提高节目艺术水平，同时在全团普遍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把爱国主义教育贯彻于出访工作全过程，使每个同志认识到出访演出是党和国家交给的光荣政治任务，意义重大，要把最好的节目和拔尖的演员推上去，去与留都要服从任务的需要。出国的同志肩负着全团同志的委托和祖国人民的期望，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每场演出，把演出效果和国家的荣誉联系起来。中华民族传统杂技艺术和新的高超技艺征服了国外观众。新华社记者《内参》中撰文，评述一九八二年“安徽杂技团到西德等五国访问演出轰动了这个马戏杂技发达的地区”，西方新闻界称我们在“维也纳国际杂技马戏节”上的演出是“这次国际杂技马戏节之冠”，一九八四年三月，我驻瑞士大使馆文化处发表文章说，安徽杂技团在瑞士的合作演出“征服了瑞士的每一个观众”，受欢迎的“气氛之热烈是笔者在瑞士工作三年多未见到过的”，瑞士的一些报纸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这次演出是“超级表演”、“神话般”的“催人泪下”。这个团在马耳他演出期间，受到总统巴巴拉女士四次接见和宴请，我国大使说：“你们才是真正的外交使节，你们是友谊的使者，你们做了我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

逐步形成一支以党员为主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这个团有一个党支部和一个团总支，两个演出队和学员队都建立了党小组和团支部，共有十八名党员，三十六名团员和一批骨干分子。为

了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在部署工作、安排演出时，首先召开党团组织会议和骨干分子会，向他们交待任务。为了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他们坚持党课制度，抓了党性教育和党风党纪教育，教育党员遵守党章，争做优秀党员，密切党群关系，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鼓励骨干积极分子坚定信念，争取加入党的组织。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团团结一致，刻苦练功，向新的艺术高峰攀登，蔚然成风。随着党组织战斗力的增强，党的威信不断提高，要求入党的人越来越多，党支部及时将八名符合条件的同志吸收到党内来，同时选派十七名骨干积极分子担任团、队级领导职务，给他们压担子，进行锻炼，抓紧培养。目前又有三十七人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报告。学员队的教师汪景侠交了入党报告后，严格要求自己，去年她带学员期间，发现乳腺癌，已到晚期，在医院里编制学员训练方案，手术后医生建议休息两年，她一个多月后就上班了，一心扑在培养杂技新苗上。她教的《滚环》和《晃板顶技》已选入今年十月的出国演出节目。

(安徽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供稿)

(总第67期 1985年12月17日)

甘肃歌舞团抵制 “一切向钱看”的倾向

以创作和演出《丝路花雨》而闻名中外的甘肃省歌舞团，几年来注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学习十二大文件、《邓小平文选》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解决各种思想问题。还结合出国演出的实际体会激发大家的爱国精神，通过“五讲四美三热爱”、“三优一学”、文明礼貌月和学习张海迪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为业务整训和搞好全团各项工作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该团曾多次受到文化部、对外文委的表扬，并于1982年11月被省人民政府授予甘肃省模范单位称号。今年在第二个文明礼貌活动中，受到了省文化厅的表扬奖励。兰州市政府也授予该团“三优一学先进单位”称号。

1983年该团全年演出任务110场，已完成55场，占50%。此外，还有一个30人的小型演出队，下到农村、工矿为群众演出音乐、舞蹈节目。这个队指导思想明确，节目健康，演出严肃认真，不抬高票价，不私分收入，效果很好，深受群众欢迎。开始组织演出队时，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在团内也有反映，当时有两个承包队，互相争演员、争乐器、争设备、争分红，搞宗派、搞小动作，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支部及时发现问题，认为演出队不能由个人拼凑，必须在党支部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经过做工作，两个承包队组织成一个演出队，节目，排练，演出，角色由团里统一安排，严格审查，经省文化厅审查批准后公演。演出队以群众喜闻乐见为前提，努力提高艺术质量，给观众健康

的美的享受，不去迎合低级趣味。演员既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观众负责，不把艺术当商品。演出队5月中旬到甘肃庆阳、平凉、长庆油田等地巡回往返44天，演出36场，观众达56,000人次，收入10,900元，完成小分队全年经济任务的91%，场次的60%。庆阳文化局和剧场的同志说：“你们的队伍精干，思想作风好，节目质量高，富有战斗力，晚会内容丰富。这个剧场演过的节目中你们的上座率是最高的，一台节目连演八场也是空前的。”长庆油田指挥部的领导和职工说：“你们把我们年产140万吨原油的目标写在你们的报幕词里，对我们石油职工鼓舞很大。”还感谢演出队替他们“消了毒”。因为在这之前不久，陕西有一个临时搭班的小型歌舞队来这里演出，节目低级下流，台风很坏，完全是为了骗钱。陇东的群众称赞演出队的作风好，生活艰苦朴素。演出队同志住五角钱一天的旅店、住后台，移动地点时共同卸车，共同装台。因为不服水土，最多时有20人腹泻。但大家坚持演出，说：“石油工人日夜苦战在工地上，为了看我们的演出花那么大的代价造土台子，我们这点病算得了什么。”回团后在总结时27人中有15人表现突出，受到全团表扬。

《丝路花雨》剧组1981年访朝回国后，7月份到天津演出，时逢华北地区几十年来罕见的酷热，有时气温高达40°C左右。演出地点没有冷气设备，演职人员全部住在后台。剧场同志讲，以往每逢暑期没有空调设备的剧场一般是不营业的。由于广大群众争先恐后购票，剧组欣然坚持演出了22场。演职员汗流浹背，每场下来衣服都能拧出水来，不少同志长了痱子。剧场不少工作人员一直以为大家毫无怨言，可能是为了挣钱分红。当他们知道，剧团每场只给演员发两个冰棍而从不发钱时，深有感触地说：“这几年我们接待过不少文艺团体，象这样不怕苦不怕累的剧团还是不太多的。”

这个剧组去年到法国、意大利演出，将节约的4万法郎伙食费全部上交国家。兄弟省市艺术团体学演《丝路花雨》，无论是来兰

州还是派人出去辅导，都以诚相待，从不收费。该团先后接待过煤矿文工团，上海、广东、沈阳、河北等省市歌舞团。有人说：“你们不要报酬不收费是傻瓜，一个好的舞蹈教给别人了，将来有吃不完的苦头。”该团同志并不后悔，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总第44期 1983年12月29日）

一次会风好的文艺评奖会

由广播电视部主办的第五届(一九八四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评选会,于六月四日到十四日在北京举行。这次评选会,除了评选目的明确,评选态度严肃认真,评选结果反映良好外,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会风好。

这个评选会共开了十一天,在此期间要审看全国各地推荐来的候选剧目二百九十五部(集),工作量很大。为了对人民负责,与会的评选委员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连续审看电视剧并展开讨论,工作时间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十点多钟,有时更晚。星期日照常三个单元工作。十一天内,没有安排一次外出参观游览活动,没有安排一次看戏看电影之类的娱乐活动,也没有放一次假。从上海聘请的译制片专家毕克同志和美术片专家张松林同志,从下飞机后报到直至会议结束,十一天内没有出过招待所大门,也没有为探亲、办事请过一次假。招待所只有晚上供应洗澡热水,但供热水时,评委们正在审看电视剧或讨论,许多同志连续好几天洗不上热水澡。只有一次,在晚上破例放了一小时假,让大家洗了个澡。招待所下午五点开饭,会议规定下午六点半就开始晚上的工作,此时,住在招待所的其他客人正在院子里散步聊天,而“飞天奖”的评委们却走进了会议室,连管理会议室的招待所服务员都奇怪地说:“没见过象你们这样,六点半就开会的。”

这次会议的工作班子比较精干,无关人员都没有参加。安排日程和审看节目、调片子、放录像、编简报、管录音、印选票、安排生活、买车票机票、财务会计等许多工作,只有九人承担,工作量很大,但工作人员不辞辛苦,服务态度好。有的同志经常

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但没有怨言，受到评委们的称赞。

在财务开支上，工作人员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少花钱多办事，会议期间没有另外租车，由艺委会的车辆兼顾，仅此一项，就节约开支几千元。为了酬谢评委们的劳动，会议发给评委同志一点纪念品，但打破了纪念品人人有份的陈规陋习，工作人员没有发放，严格按原则办事，树立了良好的新风气。

（中国电视剧艺委会供稿）

（总第62期 1985年7月15日）

上海京剧院演员孙爱珍 写给院领导的演出情况汇报

四月六日在上海签订个人承包合同后，我们八日去蚌埠，十日赴淮北市，十一日开始在淮北矿务局朔里矿区，张庄矿区，岱河矿区演出，二十三日至五月一日在淮北市演出，十七日经蚌埠回上海。在淮北、怀远县演出33场(我主演了24场)，总收入5,920元，纯收入1,620元，其中800元归演出队分配作奖金，我得35元，郭仲丽25元，蚌埠京剧团同志20元左右。

走出上海的第一个演出点是淮北市。我从来没到矿区为矿工演出过，这次能有机会使我特别高兴。可是，我也有些担心。据蚌埠市京剧团同志讲：淮北观众爱看梆子戏，泗州戏，京剧“不卖座”，矿工绝大部分是年轻人，青年京剧爱好者更少。剧团领导甚至作了如果演出效果不好就提前结束的打算。到了淮北后，矿区负责同志讲起：要是演出质量不高，矿工不爱看就会中途退场。有时包场，为了对演员礼貌，把剧场门关起来，即使这样，矿工不爱看，也会从窗户爬出去回宿舍睡觉。我完全理解这一点，矿工很辛苦，我们应当给矿工艺术享受，不能浪费他们的时间。四月十一日首场演出《玉堂春》，当天上午响排后，我在下午又过了一遍戏，比往常更早更仔细化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尽最大努力为矿工演好戏”。当晚演出时，有一千五百多座位的剧场坐满了观众，不时传出掌声。演出结束后，矿区领导告诉我：今天没有中途退场的观众，你们演得好，唱得好。我激动得流下了泪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涌了上来，“谢谢矿工同志的鼓励”，这种幸福感

是在大城市剧场中感受不到的。以后在张庄、岱河矿区演出也受到了同样欢迎。四月二十三日起，在淮北市演出连场客满，反响热烈。应观众要求我加演了三场戏，“五一”节在淮北为矿工演出，使人兴奋。

怀远观众爱看京剧，京剧团去演的很多。徐州市京剧团刚刚去过，前台经理讲：《玉堂春》演得太多了，是否可以少演不演。按照原来安排，首场演出仍是《玉堂春》，结果爆满。县广播站播放了实况录音，许多农民特意进城来看戏，远郊龙亢公社几个农民散戏后赶不回去，就先在旅馆定下床位再来看戏，这些情况使我十分激动，连演四场《玉堂春》连满，前台经理告诉我这是少有的，观众座谈会上的热情鼓励很感人。说实在的，连演四场三个多小时全部《玉堂春》，我还从来没有过。散戏后过了十二点还很兴奋，靠服安眠药入睡，演出很累，可是想起农民的热情鼓励，自己感到平时在城市里总说没有机会为农民演戏，现在农民特意进城看戏，我就是拼命也要把戏演好。领导考虑我太累，第五场戏换了《凤还巢》，那里观众有点戏习惯，剧场根据观众要求提出剧目，我还演了《贵妃醉酒》、《宇宙锋(代金殿)》双折、《锁麟囊》等戏。

一个演员期望的就是观众能赞赏自己的演出，淮北矿工、农民能爱看我们演出的京剧，怎能不使人激动万分呢！矿工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说明京剧是能有青年观众的。不少同志都问起我个人承包后的报酬，我深深感到矿工、农民的热情鼓励是给了我最高报酬。体制改革，个人承包，不光是为了钱，如果要“向钱看”，我们就不来淮北矿区、农村演出了，因为票价低于大中城市，同样是满座，每场收入只有在蚌埠演出的一半左右。当然，通过联合演出，国家剧团增加了收入，我个人也得了35元奖金，但是，淮北矿工、农民给我的“报酬”是无法用金钱估计的，将使我终生难忘。

淮北矿工、农民给我的另一“报酬”是对我的教育。淮北矿区有条件优越的剧场，座位近二千个，设备很好，可是很少有剧团

去，矿工下班后只能听梆子戏、喝喝酒，迫切希望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怀远农民也希望送戏下乡。作为一个演员，我怎么能捧着大锅饭，闲在大城市，而不努力争取去为矿工多演戏、演好戏呢？在三十多天中，我几乎不间断地演出了二十三场。我在矿区食堂和矿工一起吃饭，由于伙食不适应，我呕吐了，矿工们说这里条件差，你演出辛苦应该吃小灶。我说：你们也很辛苦，不是也坚持劳动吗？想到矿工每天下井要走几十里路才到达采煤区顽强地劳动，我虽然呕吐了，仍然坚持演出，这是矿工对我教育的结果。招待所女服务员对我讲：你穿得朴素大方，不象她们看见过的有些演员搽口红、喇叭裤……。矿工对个别演员演出质量低劣来矿“捞一把”，在后台为分钱大吵大闹深恶痛绝，反感到极点。这些使我感触很深，成千观众不仅在台上看着你，而且在台下也注视着你，一个演员既要在台上演好戏，又要在台下严格要求自己。

院领导要我们深入到工农中间去为他们服务。除到淮北矿区剧场演出以外，在朔里矿区，我们放弃午休，中午一时到矿井井口为将上中班的矿工义务演唱。面对身穿矿工服头戴安全帽围成人圈的矿工，在露天演唱，越唱越有劲，在热情的矿工欢迎下，一连唱了四段。本想在怀远送戏下乡，因天气已热，农村开始忙了，我们没能去成。

院领导要我们加强团结，搞好协作演出。蚌埠京剧团主要演员贾美君老师五十多岁了，艺术水平较高，因我们的演出点有些观众看过她演出，对“卖座”有些影响，我就提出为贾老师唱开锣戏，先来《醉酒》，后面再由她主演《大英杰烈》，贾老师很高兴，后来在我演出时帮我打幻灯字幕。郭仲丽同志的演出，院领导曾讲过：郭除了配戏外，也要有些实践机会。针对演出实际情况，在我演全部《玉堂春》前，加演郭的《霸王别姬》，在我演双出折子戏时，中间加郭的《柜中缘》。

总之，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感到自己在淮北、怀

远演出收获是大的。自己要更努力、积极地投入体制改革，多演戏，演好戏，为人民服务。

孙爱珍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转自文化部《文化工作简讯》）

（总第41期 1983年11月11日）

京津部分作家艺术家参观引滦 工程并访问英雄人物

一

十月中旬，中国文联、天津文联组织作家、艺术家参观了引滦入津工程，访问了引滦入津建设中的英雄人物。在三十多名参观者中，有中国文联在京、津的全国委员和中国文联、天津文联负责同志、中青年文艺工作者：李建彤、于蓝、袁静、魏喜奎、夏义奎、石磊、于是之、姚经才、白晓朗、方纪文、丁元、李铎等。在短短的七天参观访问中，全团参观了“引滦入津工程展览”、大黑汀水库、进水枢纽闸、潘家口水库和发电站，访问了铁道兵五十二团，最后在天津同英雄人物座谈。参观访问结束后，大家心情振奋，都认为此行不虚，收获甚丰，受到了一次革命英雄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体会到应当更多更好地反映英雄业绩和英雄人物的迫切性。

这次参观访问，大家共同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得到了一次净化，始终为引滦精神所激动，对引滦战士们创造的奇迹钦佩不已。引滦建设者们以一年零四个月的艰苦奋斗，一洗天津人民缺水之愁，为我国重点工程建设树立了楷模，高速、优质、低耗，堪称奇迹。在施工中，解放军冲锋在前，有二十多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访问五十二团时，书法家李铎挥动如椽之笔写下了“气吞河岳”四个大字，以志战士们在引滦建设中表现的英雄气魄。中国文联全委、著名演员于蓝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进行任何一项

事业，都要有一个崇高的理想，金钱不是根本的东西。为了引滦，五十二团战士说“死也心甘”，这不是假话，他们每次进洞都有牺牲的危险。人就是要有理想，文艺工作者更应如此。有理想，就不会把眼光放在钱上，就会有创作的力量。大家都表示，引滦工期一再缩短，战士们不过春节，不探亲，不请病假，连老工程师也和战士们一块战斗。他们有多少奖金，有多少加班费？这一切是靠钱能买到的吗？这是一种精神，是无价之宝！在今天存在“向钱看”的思想、存在精神污染的情况下，这种精神就愈见其可贵。作为一个以反映时代精神、塑造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宣传美好理想为己任的作家艺术家来说，只有具备和努力具备这种精神，才可以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才可以激励自己不断攀登艺术的高峰。大家认为，引滦精神可以教育青年，可以帮助我们整党。中国文联全委白晓朗同志说得好：通过参观访问，我感受到了一种勇气、正气、豪气和悲壮之气，文艺工作者就应当用这“四气”去反对一切精神污染！

二

在同五十二团战士们联欢的时候，中国文联全委、著名曲艺演员魏喜奎同志激动地说：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放声歌唱，把你们的英雄事迹到处传扬！那么，要宣传这些英雄精神，首先就要了解、学习这种精神。生活是创作的丰富的源泉，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可以说是大家的另一个深切体会。

中国文联全委、著名演员于是之同志说，目前我们的现代戏太少了，戏剧为什么不多反映现实生活呢？参观了引滦工程，使我感到这里蕴藏着丰富的东西，如果作者们下来，在任何一个角落挖下去，都可以发现感人的东西，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于是之同志讲的正是大家的感受。感人的作品应该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热爱、感受和深刻的理解。天津文联副主席方纪

文同志说：生活中有写不完的东西，作家搞创作，如果不是在生活中有所感受，有所启发，坐在家里为写东西而写东西，是不会有成绩的。他说，现在天津作家中，中年作家多写历史题材，青年作家虽多写现实生活，也有一定水平，但要再爬一爬坡，就困难了。怎么办？这就需要到生活中去！到生活中去，这是时代对文艺工作者的召唤。

感受时代的脉搏和时代精神，使心灵在生活中向更高的境界飞升，这是深入生活的一个重要目的。在潘家口水库大坝上，大家放眼望去，三面群山环绕一泓碧水，远处就是明将戚继光曾在此抗敌御侮的燕山要塞喜峰口，莽莽山峦之上，长城隐隐盘旋，烽火台高高耸立，在阳光下有一股苍郁之气；而眼前，水波粼粼，山影倒映，脚下大坝巍然。看到这一切，知道我们的指战员和工程师曾经怎样在这里拚搏的人，都会体会到我们民族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崇高的英雄气概。中国文联全委、作家李建彤同志在大坝上感慨地说：看了这些，真叫人感动，这就是英雄主义，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是的，假如我们不到生活中去，不去了解生活是如何在前进着，如果只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我们怎能知道时代的脉搏是多么有力地跳动？怎能写出引人向上、给人以力量的作品？

三

要写出引人向上、给人以力量的作品，那么，歌颂革命的英雄主义，是文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大家在参观后深切感受到的。大家认为，我们艺术作品反映这种崇高的精神还是太少了。生活中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面对这些，文艺工作者决不能无动于衷。在引滦建设中，感人的事例俯拾皆是。在同英雄模范座谈的时候，李建彤同志与被誉为“津门好汉”的营教导员王津汉交谈起来。王津汉在施工中身患重病，但他忍着

胸、腹部的疼痛，坚持奋战在隧洞中。李建彤同志关切地问他，疼的时候怎么办？他笑着说，把风枪顶在胸上，风枪一震就不觉疼了；要不就喝口洞里冰凉的渗水，也可以镇疼。他又说，军人，就必须具备“两不怕”精神，否则就不配是军人。参军，就得准备牺牲！这平常无奇却掷地有声的话使大家深为感动。过后，李建彤同志说，这个小鬼太可爱了，我真舍不得他。他说在施工中，妻子给他写了一封感情深挚的长信，感情非常丰富。我们应该多表现这种青年军人的爱情。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感受。参观后，大家感慨于目前我们的文艺中有那么多描写恋爱的作品，但大多是杯水风波、柔弱无力的东西，与这种战士的爱情无法相比。文艺工作者应用这种纯洁、美好、催人奋发的爱情代替那些充斥在一些作品中的华而不实的东西。文艺作品应该给人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而不应使人消沉，或耽溺于自我陶醉之中。所以，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就是要发现和歌颂体现着时代精神的英雄主义，塑造新时期忘我奋斗、创造着新生活的英雄形象，用以激励人民，增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

四

参观访问之后，大家深受启发，也颇多感慨。很多同志都说，引滦工程所以高速、优质地完成，一是因为目标明确，二是从上到下决心大，三是有科学的头脑。假如我们进行各项工作都能这样，四化建设就成功在望。魏喜奎同志说，引滦工程建设与“一切向钱看”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看看这些，我对“翻两番”有了信心。文联全委、摄影家姚经才同志说，这次由于党中央英明决策、天津市委的正确领导、施工人员的拚搏实干，使滦河水很快引入津门，解决了天津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看来搞社会主义事业既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更要有高尚的精神力量，“一切向钱看”是不行的。大家说，解放军的形象在“文革”中受到了损伤，

通过参观可以看到，解放军继承了老传统，依然是伟大的，他们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中都是生力军。文联全委、总政军乐团顾问石磊同志说，通过与部队英雄模范人物的座谈，可以看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很出色的。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写出歌颂时代的优秀作品，把那些不健康的東西挤出去，以免它们继续污染人们的灵魂。

在参观中，李建彤同志还曾感慨地说：看了这些，确实叫人感动。可是如果我们写成文章，就会有人不以为然，说你是唱高调。可这都是真正的现实。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军队是怎样的军队，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来的。这不应当是李建彤同志一个人的感叹，也应当引起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深思。怎样才能使我们作品中的人物和感情令人信服、使人感动呢？除去深入生活，真挚地反映生活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增强思想和艺术修养，了解新时期的审美需要，了解青年们在今天的生活和思想，以充分发挥艺术表现能力的问题呢？如果我们具备了对生活、特别是对时代特点的理解，具备了艺术地表现生活的能力，那么我们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一定会与广大读者、观众，特别是青年们的思想感情合拍的。也许，这正是文艺工作者在今天需要努力的吧。中国文联全委、老作家袁静同志曾对陪同参观的一位工程师说：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如能反映出你们这种精神，就很不容易了。表现英雄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我们自己和广大人民，是文艺工作者一项艰巨的使命！

五

这次参观，大家认为收获不小。袁静同志还说，英雄们的奋斗精神使我很受感动，我虽然年纪老了，我还要学习，写作也要拚搏。袁静同志准备收集一些材料，以引滦工程为题材写一个科普童话，把这些也告诉孩子们。李建彤同志也准备再搜集一些材

料，写出文章来。于是之同志表示回到剧院后要宣传引滦精神，动员作者们下来深入生活，反映英雄业绩。魏喜奎同志也准备以引滦为题材创作几个曲艺段子。

此次参观访问在天津文联精心安排、工程指挥部大力支持下，参观访问十分顺利、充实，不仅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增强了建设“四化”的信心，而且激发了大家深入生活和创作的热情，也密切了艺术家之间、中国文联与天津文联之间的关系。在参观访问时，参观团与战士和英雄模范们进行了联欢，魏喜奎、于是之、白晓朗、迪之和空政歌舞剧团的崔新国、梅红等同志表演了节目，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这次活动不足的是，时间太短，去的时间晚了一些，如果在工程进行中组织作家、艺术家前去参观访问就更好了。大家希望有条件的文艺工作者，能再花点时间，深入下去，写出有分量的，反映共产主义精神的文艺作品。

（转自《文联简报》）

（总第44期 1983年12月29日）

总政邀请十八省市的 作家艺术家深入部队生活

为繁荣军事题材文艺创作，增进军内外艺术家的团结，让更多的军外作家、诗人、评论家、戏剧家深入人民军队保卫祖国、建设四化的火热斗争生活，总政治部今年继续邀请了35名文艺家到部队参观访问。应邀的作家艺术家以高度的生活激情，努力潜身于部队基层，与各级指挥员和战士结交朋友；军营的深刻变化，当代军人锐意改革的精神，激励、催促他们写出和正在创作一批展现我军指战员时代风貌的作品。

应邀的35名作家艺术家来自18个省市和中央直属机关系统。他们分九批分别前往武汉军区、济南军区、乌鲁木齐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沈阳空军、东海舰队和总后驻青藏线部队。作家艺术家们不辞辛苦，不顾危险，长途跋涉来到部队，争先恐后地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有的到了中苏、中蒙边境，住进了座落在渺无人烟的茫茫戈壁上的边防站；有的忍着头晕和呕吐，来到北海、东海、南海的驻岛部队；有的不顾缺氧缺菜，登上了天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和长白山；有的还到了被称作“生命禁区”的海拔5300米以上的永冻层地带哨卡，看到战士们在大雪封山长达半年以上的艰苦环境中自觉地坚持学习、训练和执勤；有的到了驻守在侨乡和特区的部队，感受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新风尚；……指战员们的顽强斗志和高尚情操，使作家们深受感动。他们一致反映，收获十分丰富。

到了部队，作家们最突出的感受是大变革、大起飞的时代给

军营带来的巨大变化。在沂蒙山区驻军体验生活的三位作家说，这次山东之行，感受颇深，学到了在地方学不到的东西，我们要努力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将广大指战员们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振奋精神，勇于改革的事迹反映出来。话剧《于无声处》、《血，总是热的》的作者宗福先来到福州军区采访。他了解到某师参谋长降职为副参谋长后愉快上任的消息，很受启发。宗福先同志愉快地答应了总政话剧团的约请，试写一个有关部队干部体制改革的戏。他说：以往，对部队生活、当代军人我几乎完全不了解、不熟悉。现在我才明白，和平时期的军人们仍在作出很大牺牲，只不过是默默的、不流血的，这些情况近年来一些优秀的军事题材文艺作品向社会揭示了不少，但应当承认，还不够。正如部队干部战士一致要求的那样，应当有更多的作品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方面，我愿努力。

通过参观访问，作家艺术家们对三中全会以来部队的深刻变化和八十年代军人的崭新风貌有了更多的了解，思想上有很大触动，对军队有了全新的认识。剧作家陈继秋说：我在50年到53年当过兵，时隔三十年再到部队一看，最使我吃惊和叹服的是，改革正在军队扎实有效地实施。有的同志原来觉得部队可能保守一些，谁知一看，竟在许多方面走在前头。主要是军人的——特别是干部的年龄和文化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时代开始结束，兵本身已经变成秀才，我们接触的军、师、团、连四级干部的文化素养和知识面，在我们这些文化人面前毫不逊色。从他们的谈吐、藏书、业余爱好上，都充分反映出来。特别是院校出来的“学生官”，在连队一滚，他们的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就非以前的干部可同日而语了。我感到，他们代表了人民军队的未来，是军队的希望所在。

作家们在采访过程中，努力扎到基层去，和战士们一道摸爬滚打，耳濡目染斑排的新鲜气息。宁夏作协秘书长刘国尧来到海军某基地不住招待所，直接登上某护卫舰，和水兵们同吃同住，

一齐出操，一道训练，打油漆，搬炮弹，拉家常。在和水兵们相处的日子里，他逐渐熟悉了十八九岁战士们的特征和他们心灵世界的变化，搜集了两部中篇小说和四个短篇小说的素材，其中一部中篇小说已完成了初稿。各部队在接待工作中也注意创造条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作家们接触艰苦环境中奋战在第一线的干部战士。在总后驻青藏线部队的三位作家访问了沿线的十七个兵站。漫长的高原运输线上，气候恶劣，地高缺氧，险情不断。汽车兵们不怕艰苦，以扎根高原、保卫大西北为荣的动人事迹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家们还随车队跨越被人们视为畏途的昆仑山、唐古拉山，到达西藏。组织一批作家随车队越过唐古拉山口，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艺术家们在深入部队的过程中，开拓了视野，积累了素材，激发了创作激情。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顾笑言和广东省文学院作家杨羽仪同志在采访北疆四个边防站的过程中，开了十九次座谈会。常年守卫在祖国第一线的战士们以苦为荣，以卡为家的爱国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们。杨羽仪同志已开始创作一部约6万字的散文集，顾笑言同志准备写一部约五万字的连续性报告文学集，歌颂哨卡的英雄战士。

军外作家艺术家的访问也促进了部队建设。他们下到基层后，有的认真辅导业余作者的创作，有的为干部战士作“怎样成才”的报告，有的帮助部队举办业余文艺讲座，讲书法研究、写作知识、文艺理论和诗歌创作等辅导课，有的挥笔作画、赋诗题字，留作纪念。部队各级干部在接待艺术家的过程中，加深了了解，结交了朋友，对知识分子有了更具体、全面的认识。一些作家艺术家还坦率地指出了部队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对军队建设也是有力的推动。

（总政文化部文艺处）

（总第55期 1984年12月26日）

为了军事文学创作的再突破

——一九八四年夏部队作家赴云南前线深入生活小结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

为贯彻余秋里主任的指示，我部于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二日，组织全军二十三名作家赴云南前线深入生活。在总政领导的关怀重视和昆明军区指战员的大力支持下，这次活动已圆满结束，并取得较大收获。前线生活不仅使作家的思想感情受到强烈的震动，而且积累了大量素材，激发了创作热情。有的作家说：“这两个月所感受到的东西，三年也写不完。”大家认为，这次活动对于我军文艺创作的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基本情况

余秋里主任七月二十四日在解放军艺术学院84届学员毕业典礼的讲话中，号召部队作家到云南前线深入生活，用艺术作品表现八十年代指战员的英雄事迹。为落实余主任这一指示，刘白羽顾问、李瑛副部长同文艺处同志一起对人选逐个进行了反复研究后，从全军范围抽调了一批年富力强、创作力旺盛的中青年作家（平均年龄约35岁），并通知其所在单位下令他们迅速奔赴云南前线。八月九日，刘白羽、李瑛还为即将赴前线的部分在京部队作家送行，并就此行的重要意义、任务、要求和注意事项等问题

谈了话。

来自全军十四个大单位的中青年作家于八月十三日分抵昆明集中报到后，组织他们学习了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关于发展军事文学的指示和余主任及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并请军区作战部、英模报告团和政治部创作组的同志介绍了前线作战的全面情况和指战员的感人事迹，还看了老山、者阴山战斗的展览、录像，参观了“越军俘虏管理所”。然后，根据作家们提出的采访线索，编成四个小组，分别到各部队生活、采访。近两个月中，作家们冒着敌军的炮火和四十度的酷热，足迹遍及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扣林山前沿和前线各指挥所、炮兵阵地、野战医院以及边防村寨。作家们同战士们一起住在潮湿、多蚊、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地窖、帐篷、猫耳洞里促膝谈心。他们共访问了数以千计的基层干部战士、各级指挥员和支前民兵、广大群众，记录了几百万字采访笔记，收集了大量作战情况、战斗英模的资料。前线军民的动人事迹，常常使这些多数未经历过战争的作家感动得流下热泪。作家们深切认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法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所能想象到的。必须身临其境，去看，去听，去感受，去思索，才能进入创作。

作家们在前线同指战员共度35周年国庆佳节后，于十月五日结束了在战区的采访活动，集中昆明进行五天时间的小结。经余主任批准，刘白羽、李瑛二同志赶赴昆明，传达了杨尚昆副主席听了英模报告团报告后关于运用“两山”英模事迹对部队进行教育的重要指示，听了每一个作家含着热泪汇报自己深入前线的情况、感受和创作打算，又分别同十几个作家具体研究了创作构思，最后，就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和如何创作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军事文学作品等问题，同大家交换了意见。作家们一致表示，决不辜负中央、军委和总政领导的期望，一定以前线指战员攻克老山、者阴山的大无畏精神，努力创作出一批高质量的作品。

二、主要收获

第一，作家们在硝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许多作家谈到：战争是军人的舞台，也应该是军事文学作家的舞台。在硝烟弥漫的前线阵地，聚集着新一代优秀军人，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时代的精神风貌。在这生与死的边缘上，战士们的爱与恨是那么强烈，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战争生活，应该成为开拓和培育军事文学的主要土壤和园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一直是我国现代军事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产生过许多优秀的作品；现在，要把军事文学推向新的高潮，仍然离不开战场。因此，部队作家的最重要生活位置，也应该在战场，在前线。济南军区青年作家李延国说：“作家应该和战士一起站在战壕里！前沿阵地上不应该只有罐头盒和小人书，应该有文学的呐喊和歌声，应该有文学工作者跳动的爱国之心……”东海舰队中年作家闵国库谈到：“一个军人的位置在战壕里，而作为部队作家的位置在哪里？我辗转于前沿各个阵地，在炮火中体验、采访，也在不断地思索和寻找。我终于领悟了：部队作家的位置也应该在战壕里。一切有志于军事文学创作者，必须到这里来寻找自己所要表现的人物，获取感受，到这里来突破。”大学毕业后入伍的空军作家韩静霆说：“我曾以自己在十年浩劫中的五年大学生连的劳动‘锻炼’为苦，自以为是经历过坎坷。可比起战场上那些喝着‘猪血味’的脏水，防御在寸方之地——潮湿的猫耳洞里的战士，算得了什么呢？战士们从雷区走过了，在生死场上穿过了，在血里洗涤过了，只有这种经历才能使人成熟、坚强、勇敢……作为部队文学工作者，我觉得通过两个月的前线生活，在硝烟里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硝烟里踏过，是不易再迷路了。”

第二，作家们在血与火中认识了战争。

绝大多数作家都深有感触地说：虽然军装已经穿过几套、十几套，甚至几十套了，但是，却从来没有上过战场，“战争”这个字眼对自己来说，是陌生而又遥远的，只是老一辈人的回忆和艺术家的再创造；这次终于观察、体验和感受到了战争的实况，耳闻了炮弹从头顶上划过时的尖啸和地雷从竹林里传出的炸响，聆听了士兵们平静地讲述战争中的艰险和胜利的滋味，拜谒了麻栗坡城郊烈士陵园里一座座掩埋着忠骨的坟茔，也看到过惊魂未定的越军战俘们在我革命人道主义感化下的表情……因而开始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军旅生活的严峻、庄重、热烈、激昂和悲壮。认识到军人的份量，认识到战争中生与死、苦与乐、荣与辱这些对人生有根本意义的重大主题。使自己的心灵同战场同步震颤。沈阳军区青年诗人胡世宗说：“在前线，战争的机器和生活的车轮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转动，使你感到战争的壮丽和生活的美好。……我从这样不断重复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中，真正认识到了我早在小学读书时就会写的两个字：战争，以及战争中我们的战士和人民那种可敬的美好的心地。”乌鲁木齐军区青年作家李斌奎说：“战场上的一切，最激动人心。这里有炮火，血肉，牺牲，当然也有眼泪；这里聚集了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人民的精萃，这里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神魄。战士们用血写出来的业绩，我们要用笔把它记下来。”

青年时代参加过战争的作家，这次到前线对战争也有新的感受。海军作家叶楠说：“在解放战争中，我没流过泪；这次在战区，我却终日以泪洗面。是脆弱了吗？不是，怕是年岁大了阅历多了的缘故。青年时代在战争中，虽然也有悲戚的时候，但对战争与人的理解、认识是不够的。这次我却认识得深刻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得以生存，人民要付出多少的代价啊！战争最能显示人民的力量了。”

第三，作家们在战地上密切了同战士的感情。

作家们谈到：战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严创作素材，而且洗涤了我们身上的污泥和思想上的软弱。战争严峻地检验着人的品质、意志和素质，浓缩了人生的历程，它把人迅速地推向成熟。那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追求的年轻指战员在战争环境中昂扬起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建树着标示我们中华民族道德水准的丰碑，极大地教育和感染了这些作家，使他们思想感情上缩短了同基层部队的距离，加深了对青年战士的爱，有的甚至觉得自己不仅仅是采访者、旁观者，而是这个战斗过的部队的一员，内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军人的神圣感。总政歌剧团编剧王受远说：“当我踏上战区的土地，才真正体会到一个军人的使命是多么神圣而严峻。在隆隆的炮声中，使我认识到‘战士’这个字眼的深刻含义。我面对一个个十八岁的战士，突然感到自己是那样渺小。我虽然当了二十三年的兵，但从未经历过战火。在他们面前，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新兵。听着他们讲述什么是战争，什么是理想，我又好似是一个小学生。”空军青年作家乔良写道：“我空着手爬上过一千五百公尺的老山主峰。当我气喘吁吁地擦着汗，回身俯望山下时，简直无法想象，四月末的那个夜晚到清晨，我们的战士们是怎样负重几十公斤，冒着炮火，踩着地雷，穿过丛林，夺下这样险峻的高地！”二炮中年作家朱春雨在总结时激动地说：“能够在阵地上度过两个月的时光，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在这里，我补了人生的课（我是中年从戎又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也找到了我心中的珍珠。有什么能比战争更精确地检验一个民族的情操、能量和创造力呢？在这打过仗并且还在继续打仗的大山里，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在搏动，它不是一个人的脉息，它是从辽远的历史长河流来的我们民族魂魄的律动！要告别这里，我却久久不肯离去。是依恋？是感慨？不错，我与战士结下了深情厚谊，但我的收获却非感慨可以系之的。想来想去，恍然明白，我的心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这里，留在吴钩舞硝烟、流弹飞乱云的地方，它赐我的启迪，将作用于我今后的人生。我想，这是生活的力量左右了我。

我要高呼：生活万岁！”

第四，战场生活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

作家们都谈到：这次老山、者阴山战斗表现出来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牺牲精神和凝聚力，近年来我军进行的一些重大改革在战争中显示出的重要作用和威力，战场上的硝烟和热血，一定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表现，为死去的烈士树起丰碑，为活着的人增强信念。这是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责任。我们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有几十年党的、军队的传统，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路线，有这么好的军队和人民，我们有条件去塑造八十年代军人的新的典型人物，创造出能够产生巨大心灵震动的艺术作品，以不辜负广大指战员的期望。快满二十周岁的作家庞天舒说：“带着同龄人给我的启示，即将迎来我人生的第二十个春秋。我想，在这个年岁里，如果能够把那沉重、坚定、凝聚着鲜血的战场生活，表现出万分之一，这难道不是对战士的最好怀念吗？”空军青年作家刘亚洲在来信中写道：“前线的生活，是我感受最深的一段日子。一种新的气息，一种新的经历，包围着我，冲击着我。每当我经过烈士陵园时，我总感到烈士们在看着我。我似乎可以听到他们的呐喊。有的同志说：‘这两个月感受到的东西，三年也写不完。’我不敢这么说，但我每时每刻都处在激动中。”广州军区青年作家雷锋写道：“没有战士，就意味着将失去祖国，学生们将只能上都德式的《最后一课》。所以我敢说：‘战士’这个词就象‘祖国’那样崇高、神圣而纯洁。是的，我要用笨拙的笔，表达我对战士无穷无尽的敬意。”福州军区作家胡正言说：“作为部队的一个专业创作员，我应该写出无愧于我们英勇战士的作品。我也有信心塑造好我们的战士，用血，用肉，用全副力量。当然，前面还有许多困难，但比比攻克老山、者阴山的战友，还有什么不可攀登的高峰？”前线战争生活，给作家带来了强大的创作冲动。两个月中，他们边采访、边思索、边写作，有些作品已陆续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上发表。

三、经验和建议

大家一致认为，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全军作家（以中青年为主），到前线深入生活，是推动军事文学创作继续突破的关键，是部队文艺方面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今后仍然要坚持做下去。这样既可以抓出一批作品，又可以锻炼全军的作家队伍。

今后，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大家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 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一场局部的战争，因此组织作家上前线，成员应力求精干。要抽选思想作风好、组织纪律好、身体好、吃苦性强，有一定创作成就的作家，特别要多选中青年作家。

2. 今后进行自卫反击战时，建议事先通知该部所属的专业创作人员随部队一起行动，最好能自始至终地体验一次战争的全过程。

3. 作家到前线深入生活，可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这样，既可以掌握战争全局情况，又能深入了解指战员的心灵。

4. 作家到前线，要尽力把自己当作部队的一员，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在思想感情上、生活上同战士打成一片。可能时还可为业余作者做些辅导性的工作。

5. 作家在深入生活之前，集中学习、讨论领导的指示、要求；从前线归来，再拿出一定时间进行总结，交流深入生活的收获、体会，探讨军事文学创作问题，这对于提高认识，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是很必要的。

6. 在总结的基础上，要求作家把深入前线的感受和思考写下来，并选择其中一部分在内部或公开的刊物、报纸、杂志上发表，以便使更多的作家从中受到启发，更踊跃地投身到时代斗争生活的洪流中去。

（本刊略有删节）

（总第55期 1984年12月26日）

·评论·

到第一线去

《关于报告文学的思考》，是女作家陈祖芬给《十月》编辑部一位编辑同志的信。我们转载这封信，是希望有更多的文学家、艺术家，能象陈祖芬同志那样，自觉地投身到四化的第一线去，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我国人民当前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为改革和四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优秀人物谱写颂歌，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文学艺术家的光荣而崇高的时代使命。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取得了不少新的成绩，总的形势是好的。也有不足之处，其中突出的一点，是直接反映四化、反映改革的作品还不多，有的艺术质量也不够高。文艺创作当然要题材广阔、品种多样，不应该有什么限制，但广大读者要求读到更多更好的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反映改革的作品。因为，广大人民最关心的，还是今天的时代，今天的国家，今天的社会生活，今天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文学家艺术家要真正做到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做到有益于两个文明的建设，就不能不考虑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不能不关注十亿人民所献身的四化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业绩。

陈祖芬同志在这封信中说得多好啊：“经济改革是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的课题，也是最大的难题。唯其难，才更有写头。”现在谁都懂得，不进行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各项革新，我们的四化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改革是一次伟大的试验，是清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革命性变革，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其间将会遇到的艰难曲

折，是不待言的。然而，正因为它难，参加这场伟大变革的人们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演出威武雄壮的时代活剧，产生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这正是文学艺术家创作的最新鲜最生动的素材。用这些素材提炼加工成的优秀文艺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应和着人民的心声，最能感染群众、鼓舞群众，最能激励人民更加积极勇敢地投入改革和建设的洪流，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忘我奋斗。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艺术家，应该意识到这一浅显而重要的道理，勇敢地去揭示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为改革和建设中的英雄闯将树碑立传。当然，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式，采用什么艺术手法来反映，文学艺术家可以自由地充分地加以选择和探索，可以百花齐放、各显神通。这些方面希望能得到各级文艺领导者的理解和支持。

胡启立同志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日广州召开的衡广铁路复线建设现场办公会议上说：“希望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到第一线去，为工人阶级唱颂歌，为他们树碑立传；给我们那些总工程师、总设计师，为那些真正为中国人民办事情的人鸣锣开道，热情地支持他们。”我们殷切期望广大文艺工作者都能这样做，到四化的第一线去，到改革的洪流中去，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的文学艺术史诗，做一个真正具有改革精神的社会主义文学家。

（总第57期 1985年12月17日）

关于报告文学的思考

陈祖芬

××同志：

您好！

现在报告文学的行情，似乎趣味性、情节性的东西在看涨；关于歌星、影星、球星的种种轶闻，正在升值。

但是，我要继续写报告文学的“硬通货”——写改革，写经济改革，写改革中的人的观念的变化。中国不搞改革没有出路，报告文学不写改革就脱离了时代的大趋势。

关于报告文学，我有我的“市场预测”——如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一样，报告文学必将摄取更广阔的生活面，容纳更多的信息，与经济学、社会学、科技、哲学、心理学等等广结良缘。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希望从报告文学中看到现代人的活动，从而获得更多新的信息、新的思想、新的哲理、新的情绪。报告文学要全面走向社会。这是我关于报告文学的“市场观念”。

所以，我不想绕开改革、绕开经济和人——绕开人人感受到的这最大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有一点使命感，一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因为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

《挑战与机会》——感谢《十月》给了我这样一个题材，这样一个启示，这样一个领域。从此我有了豁然开朗之感。第一篇写了北京的一组单位。第二篇——《全方位跃动》，写了从深圳、广州直到扬州、北京、辽宁的一组单位。《经济和人》是第三篇，写一个

中小城市——安庆，从那里的新事物——窗口经济，写到人，写到改革的环境和环境保护。从一个会议写起，会内会外地结合，有详有略地写了十几个人物。写人在经济改革中发展自我，经济在人的发展中日趋活跃。

改革，一方面要冲破各种合法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方面又必须得到领导的支持。安庆搞得那么朝气蓬勃，不能不使人羡慕安庆人有这样一个领导班子，他们既有见地，又有胆识。我在《经济和人》一文中，写了这些领导，写了安庆改革的支持者们。领导的支持，是改革的前提，是改革的必要的氛围！正是在这样一个改革的环境中，才能出现孙超、王峻这样的改革者。

改革，诱发了大部分人身上的积极因素，也必定要诱发小部分人身上的消极因素，乃至诱发同一个人身上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方面。的确出现了一些令人痛心的坏风气！从卖假药、假酒到发假记者证，一时好象全是问题，“洪洞县里无好人”了。有的搞改革的厂长被撤职了，有的搞改革的厂长被搞得灰溜溜的。唉，改革真难。

但我认定问题不在改革，而在于人民的素质。哈佛大学的经济专家珀金斯访华后都认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坚持下去，继续改革，直到一切走上正轨。”他说得对。因为进行任何经济体制变革的时候，总会产生一个时期的不协调。改革中的问题，只有在继续改革的过程中得到解决。

这几天关于四中全会的报道提到中国不搞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要创造改革的环境，改革的措施要配套等等。我看了兴奋极了。因为类似的话我在《经济和人》里也写了，四中全会的文件和精神真正符合人民的心愿。

“七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报告文学如何把改革放在首位，这也许是报告文学作者如何把握时代、如何把握自己的一个重大课题。

您问及我《经济和人》的写作过程。我常常觉得一个报告文学

的作者得到的东西真多！有一次我和安徽省的一位领导同志谈话。他的视野很开阔。他对我讲《士敏土》，讲徽商，总之，从商品经济辐射开去，古今中外讲了许多。我获益甚多。我兴奋极了。我冷静下来后，细细地思索，列了一系列问题，向安徽的同志们请教。他们帮助我查阅、复印了不少资料。我从心里感谢他们。

在写作《经济和人》之前，我用了相当多的时间，阅读了《论社会主义经济竞争》、《论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关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的效应》等等等等。包括摘读了《资本论》——没有时间都读，只能读一点点，而《资本论》——是无比美妙、精彩绝伦的巨著。我现在一时记不得我都读了些什么，很多资料都已打成捆。我只是深信我读这些文章，不仅对写《经济和人》有用，对写今后的报告文学也有用。我几次听到人讲现在写改革的人少了，那我更要写下去。没有经济基础，就不会有相应的上层建筑；《参考消息》上讲到没有意识形态的更新，经济大转折便不能出现，讲得非常好。同时，没有经济的改革，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改革和更新。

经济改革是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的课题，也是最大的难题。唯其难，才更有写头。我在写的过程中也充实了自己，坚定了自己。

（总第67期 1985年12月17日）

刘兰芳在党支部帮助下继续前进

鞍山市曲艺团党支部

刘兰芳同志是鞍山曲艺团的评书演员。一九七九年四月，鞍山市电台广播了她说的评书《岳飞传》之后，全国六十多家电台交换了这部书，从七九年十一月，刘兰芳开始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她每到一地，无论是大剧场，还是体育馆，场场座无虚席。

刘兰芳同志在艺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思想觉悟也有很大提高，政治上也成熟了。她积极要求进步，靠近党的组织，听党的话，服从领导，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尊师爱友，受到了群众的赞扬。她这些进步，是她自己主观努力的结果，但是也是领导与群众帮助的结果。

名声越大，越要谦虚谨慎

刘兰芳出名初期，见到群众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很受感动，满含热泪地表示：我一定不忘群众的鼓励。但是，随着声望的提高，党支部及时注意到她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市委宣传部和文化局的领导，也及时提醒我们，要我们引导她不断前进。

今年“七·一”，市文化局安排她到农村演出，她有些想法。文化局领导和党支部书记多次找她谈话，使她认识到荣誉是人民群众给的，心目中没有群众，不为他们服务，自己就什么也不是。经过帮助，刘兰芳提高了认识，听取了意见。她下乡到台安演出，

顶着日头说书，群众很受感动。大家怕她晒黑了，热坏了，派代表给她打伞，希望多听几段书。刘兰芳热情地谢绝，并说：“大家能顶着日头听书，我为什么不能顶着日头说书呢！”以后她每到一地，都要争取到农村去。

不能一花独放，要“三芳”争艳

我团有“三芳”：单田芳、张贺芳和刘兰芳。刘兰芳未播《岳飞传》前，“三芳”间关系很融洽。单主动给刘说《明英烈》的书梁子，有时还一句一句地教她，刘对此十分感激。但从刘出名之后，“三芳”关系日渐紧张了。起因是刘播讲《岳飞传》结束前，我们向电台推荐单田芳和张贺芳，刘不是热情支持。党支部认为，正确处理好“三芳”的关系，首先要做刘兰芳的思想工作，同时在艺术上要让“三芳”都能充分发挥各自的艺术才能。我们多次找刘兰芳谈心，要她记住全国曲协主席陶钝同志的话：“鞍山不能只出一个刘兰芳，不能非你刘兰芳上台不可，别人上台就不行。要是这样，你是有功，还是有过？”经过多次谈话，刘兰芳的认识有了提高。同时我们主动争取宣传部和电台领导的支持，播完《岳飞传》之后，又播放了单田芳的《隋唐》等书。鞍山电台评书节目安排较紧，我们就安排张贺芳到通化一带演出，并争取通化电台播放了她的《呼杨合兵》等书，使她在通化一带有了影响。这样做，并没有象有人说的那样“谁夺了谁的饭碗”。相反，听众认为她们各有千秋，贯彻了百花齐放的方针。于是，“三芳”在艺术实践中，各自争相显露了自己的艺术才华。

帮助她处理好师徒关系

刘兰芳的入门老师是孙慧文，“文革”中她们之间发生了一些隔阂，师徒关系很紧张。刘兰芳成名之后，曾一度强调自己是家

传艺术。刘兰芳去北京演出，很多曲艺界老前辈，对刘兰芳的演出给予很高评价，但也指出她在艺术上的一些缺欠，如语言功夫不到家，技巧上还未达到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热而不汗、冷而不寒的程度。为了不断提高刘兰芳艺术水平，党支部帮助她认识教会一字，终生为师的道理。经过帮助，刘兰芳感情有了变化，当即向老师承认了错误，检讨自己成名后对老师不够尊重。孙慧文见徒弟有了进步，谅解了她，师徒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顶住歪风，支持刘兰芳

评书《岳飞传》的出现，引起社会的强烈共鸣，一方面是评书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与刘兰芳在艺术上的成就分不开。她嗓音宽厚，口齿清楚，刻画人物声情并茂，在舞台上善于同观众交流感情，创造了独具风格的评书艺术。但是，刘兰芳出名后，有一些新老艺人吹冷风，不服气，嫉贤妒能，讥笑、讽刺等言行，时有发生。有的说：“刘兰芳就是机会好，赶上浪头了，这部书给谁说都能红一气儿！”还有人写匿名信、写挽联、画漫画、威胁、恫吓和谩骂刘兰芳，妄图掐尖子。刘兰芳遇到这些问题，一度情绪很消沉，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我们坚决支持她，鼓励她，让她沉住气，并多次在全团大会上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态度，坚决支持刘兰芳，对那些掐尖子、压制人材成长的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树立了正气，抵制了歪风，刘兰芳本人也很受感动和教育。

帮助她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刘兰芳有三个男孩，大的十七，小的才七、八岁。她们夫妇经常到外地演出，有时一走就是一两月，家里大孩管小孩。孩子们吃饭不按时，学习没人管，衣服脏了没人洗。为解决刘兰芳同志的实际困难，消除她外出演出的后顾之忧，我们把她爱人的父母

从辽阳农村接来照顾孩子。刘兰芳一家七口，老少三辈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里，有许多困难。对此，宣传部、文化局有关领导都很关心，曾帮助她找市里领导同志，今年夏天给她解决了一个单元三间的住房。

刘兰芳同志不到两年演出了三百多场，收入十几万元。她自己曾认为：“我一人挣钱养活大家。”对待这个问题，我们除向她做思想工作外，同时，多次向上级领导部门联系，征得同意，采取了按演出收入提成的办法。提成的比例：刘兰芳每年净收入四万元以下，提成百分之五，超过四万元提成百分之十。去年她演出收入六万五千多元，提成四千多元。今年估计也能提三千多元。这个办法实行后，刘很满意。

所有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使刘兰芳深受感动，一再向组织表示感激的心情，积极性更高了。我们计划，明年安排她到农村或部队生活一段时间，并准备让她说一部新书，使她在艺术上不断提高。

培养刘兰芳入党

刘兰芳出身贫苦，能吃苦耐劳，在外地演出一天两场，还要参加各种活动。但她在百忙中一天要写四、五千字的录音手稿，经常忙到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早晨五点多钟仍坚持跑步、舞剑、练身段，有时嗓子哑了还坚持演出。一九七八年百分之二调资时她调了一级，七九年调资，不少人认为她准能长两级。在评资会上，刘兰芳主动表示只要一级，不占别人的升级面。群众反映：这次评工资，刘兰芳姿态高，有觉悟。

刘兰芳能虚心接受党组织的批评帮助，注意改造世界观，并用实际行动克服缺点，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外地演出，给党支部写思想汇报和入党申请书。我们除热情鼓励她争取进步外，并向她指出：“吸收你入党，是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你，不

是因为你出了名。”在吸收刘兰芳同志入党的党支部会上，同志们一方面满腔热情地肯定她的进步，同时也希望她要联系群众，端正思想，戒骄戒躁，继续前进，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刘兰芳深受教育。

刘兰芳成名之后，除了我们支部做她的思想政治工作外，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市广播电台，省、市委各级领导同志和中国曲协的负责同志也给了她多方面的帮助教育。

（转自辽宁省委宣传部《宣传动态》）

（总第12期 1982年5月15日）

歌声美，心灵更美

——记于淑珍同志的几件事

于淑珍是天津歌舞剧院女高音独唱演员，是全国音乐界和广大听众所熟悉的优秀歌手。她不但歌声美，而且心灵更美，因此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和爱戴。

严肃从艺，勤奋学习

于淑珍是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歌唱家的，她没有进过专业学校，也没有得到过名家的专门指导。决定她成长的因素，除了党的关怀和哺育外，就是她自己的严肃从艺，勤奋学习，在实践中磨炼，在探索中提高，多方求教和孜孜不倦的努力。

二十多年前，于淑珍在一家化工厂当工人。一九五六年天津市职工业余文艺会演时，她演唱了一首新疆哈萨克族民歌《美丽的姑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后来，她被调入天津歌舞剧院，开始什么也不会，连谱子都不认识，排练时要一句一句地教。她深深地认识到，要当好一名人民的演员，光嗓子好不行。她横下一条心，下一番苦功夫，练习基本功。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音乐理论，虚心向老同志求教，细致入微地揣摩歌曲的情感处理，倾听来自观众的意见，把听众寄来的信件，当做一面镜子，用以鞭策和鼓励自己。她在逐渐认识了自己的嗓音特点之后，又开始了在挖掘我国民歌和民族发声技巧方面的努力。她学习过京剧、河北梆子、山东吕剧、曲艺、皮影和其他地方戏曲，从这些姊妹

艺术当中吸收营养，不断充实自己的艺术素养。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样刻苦的努力，她逐渐形成了自己以抒情见长的演唱特点。观众评论她的演唱是“高如行云，低如流水，声从情发，歌由心飞”。目前她是剧院演出场次最多和担负业务工作量最大的演员之一，她不但在国内许多省市演出，而且还几次到国外访问演出，受到国际朋友的高度赞扬。象她所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李双双小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泉水叮咚响》、《浪花啊，浪花》和《漓江谣》等歌曲，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听，成为激励和鼓舞人们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的力量。

于淑珍除了活跃在音乐舞台上之外，她还是一名优秀的歌剧演员。从一九五九年以后，她先后在《向秀丽》、《洪湖赤卫队》、《江姐》、《刘三姐》、《煤店新工人》、《宦娘》等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她所精心塑造的许多性格迥异的舞台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淑珍有了广泛影响之后，一直能够冷静地对待这些来自各方面的赞扬和荣誉，把它变作鞭策，更加努力地拚搏，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近年来，除了在艺术上奋发进取之外，又和关牧村等同志合作，先后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南，最近又在广州、深圳和武汉，完成了大量的演出任务。并为中央和全国许多省市的电台、唱片社录制了大量的唱片。收到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鼓励信件。

人民演员，要为人民

于淑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人民的演员，又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艺术观。应该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时刻不忘记为他们歌唱，给他们以自然的、真实的和艺术的美。”她就是这样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去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去体现一个人民演员应有的品质。

她认为，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用我们民族的风貌和感情，以及严肃的作风、认真的态度去影响观众，去激发人们向上的力量。因此，她在曲目的选择乃至在舞台上的表演，都时刻注意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如果没有起到激发人们向上的效果，那将是一个演员的失职。多年来她很注意挖掘优美的民歌和健康的抒情歌曲，力求以真正的艺术去赢得观众。她始终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坚决走党所指引的文艺工作者与新时代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无论下乡、下厂、下部队，她都是带头参加，自觉地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并从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艺术水平。

有一次，剧院到农村去演出，领导上因她当时身体不好，决定叫她留下，但她坚持要去。到了农村，不但积极参加演出活动，还帮助舞美队装台、拆台、运道具。她经常利用休息时间走门串户，到社员家里访问和举行“炕头音乐会”。当她听到给演员做饭的社员和几位离不开家门的大娘没有看到演出时，就拉着乐队的同志一起赶到伙房和大娘们家里去演出。

一次到大港油田演出，由于途中的颠簸和紧张演出的劳累，她的嗓子嘶哑了，连说话都感到困难。当她看到石油工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节目，她不顾嗓子的肿痛，坚持了演出，而且只要工人们欢迎，她就尽力多唱几支歌。一位工人在寄给于淑珍的信中写道：“您唱的歌既优美，又朴实健康，激励我们鼓足干劲多出油，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去年，于淑珍和关牧村到青岛市演出，演出地点安排在纺机俱乐部，整个纺机俱乐部就象过年一样热闹。近年来于淑珍曾先后三次去青岛演出，观众印象很深，这次安排的剧场，又是个近万人大厂的俱乐部，定的场次少，满足不了要求，厂内的工人都要求看演出，急得售票处负责人东躲西藏。鉴于这种情况，于淑珍牺牲了白天的休息时间，积极和其他青年演员一起，深入到每个车间去进行慰问，使全厂工人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都看到了

演出。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在艺术团体内部，首先需要恢复和建立起优良的道德风尚。

在于淑珍同志看来，要建立这种道德风尚，必须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她是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的劳动模范，天津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又是全国知名的歌唱家，荣誉高了，地位变了，但丝毫看不出她和同志们有什么两样。不管到哪里，她都是以一个普通演员的身份出现，领导怎么安排，她就怎么工作，从来不争名次。在编排节目时，她总是从全局的演出效果出发，需要排在哪里，她就在那里，安排她唱什么，她就唱什么。

二十多年来，于淑珍同志换过几个乐队，但都合作得很好。在演出时，她帮助乐队同志一道拉车运乐器；在排练中，她很尊重乐队的劳动，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演出完了之后，她总是想着同乐队的同志一道谢幕，同时也表达自己对乐队的谢意。

于淑珍到外地演出时，从来不提个人要求，吃、住都和大家一样。去年夏天到南方演出，由于工作紧张，她和关牧村经常吃不下饭。领导根据群众的要求，就想办法给她们改善一下伙食，有时给她们买些鸡蛋、西瓜等，她们就把这些分给病号和大伙吃了。

于淑珍除了担负主要的演出工作以外，总是抢着去参加一些装台、拆台、装车和运景等工作。去年在南京演出的最后一天，领导宣布第二天早晨八点全体到剧场装运道具，同时又通知于淑珍，九点钟在招待所接待太平洋广播公司的同志联系录音事宜。按理说，中间只隔一小时，从招待所到剧场还有一段路，完全不必去剧场了，可是于淑珍仍然提前赶到剧场，和大家一起，把道具装上汽车之后，她才回到招待所商量录音事。

“是家不称家”，已经成为观众对于淑珍的赞美。一般凡属全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并在艺术上有一定造诣，又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音乐工作者，都可称作音乐家。事实上于淑珍早已是大家公认的歌唱家了，可她却要求不要这样称呼，凡记者采访时，她都声明，不要称呼“家”，在外地也公开请求大家，不要称“家”，在演出的节目单和报幕词里，她也不主张对她个人进行介绍，只承认是一个普通的演员。在新闻界采访时，她总是要求记者多采访和报道一些青年演员，而不过多地谈自己。

她非常关心剧院的演出，遇有演出时，即使是自己公休，也要到剧场看看。有一次，是她休息的日子，她来到剧场，正好有一个青年演员未到，她便立即抢妆上场，使工作未受影响。她对待工作没有高低主次之分。在歌剧《宦娘》中，她演女主角良恭，和她同演这个角色的第二组演员，是在戏中扮演过场丫环的年轻的同志。每当第二组换戏的时候，于淑珍便主动地去扮演过场丫环，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戏，她也认真对待。“主要演员跑龙套”，这是不多见的，但对于淑珍来说，这又是很自然的事情。

提携青年，主动让台

于淑珍把帮助和培养青年演员，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对青年演员亲如姐妹，经常在政治上、艺术上和生活上给予热忱的关心和帮助，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舞台经验传授给她们。她经常说：“人总是要老的，要承认这个事实，给青年演员创造条件，使我们的文艺舞台上多出现一些群众喜爱的，有一定影响的演员，这样，有利于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个老演员，应该想到这一点。”

平常，她很注意青年演员的业务情况，演出时也经常从侧台观察，发现问题，立即提出来。关牧村刚调到剧院的时候，很想学习一下歌唱家们的表演技巧，于淑珍发现后就向她指出，每个

演员都应当有自己的风格，你原来那种沉稳、朴素的演唱特点，群众很喜欢，不要随便改变它。关牧村很虚心 地 接受 了 这个 意见。

于淑珍常认为作为一个演员，应当讲究戏德，要能容人、让人、团结人、尊重人。关牧村到剧院后进步很快，对此，于淑珍心里非常高兴。她为了多给关牧村一些实践和锻炼的机会，主动向领导提出把“压台戏”让给小关。关牧村得知以后，感到压力很大，她诚恳地说：“于老师，还是你来压台，我年轻，进院时间短，还得好好学习。”于淑珍却亲切地对她说：“二十年前，当时的老同志为我让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又为你让台，这是个自然规律。我相信再过二十年，你也会为那时有才华的青年演员让台，这是我们文艺事业发展的规律。”“于淑珍让台”的事传出后，全国许多报刊、杂志都争相介绍，夸赞于淑珍的风格难能可贵。

于淑珍想方设法地为青年演员创造条件，使她们的演出受欢迎。在青年演员演出时，从每首歌的唱法、动作乃至曲目的排列顺序，她都帮着一起出主意。所以象关牧村、侯文菊等这些在近年来进步比较显著的青年演员们常说：“我们的进步是和于老师的帮助分不开的。”

于淑珍就是这样一扫“宁可台下让一丈，不可台上让一寸”和“同行是冤家”的旧俗，满腔热情地把培养和提携青年的工作，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她的这种高尚的风格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生我是娘，教我是党”

每当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问到于淑珍是怎样走上专业文艺道路的时候，她总是激动地说：“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唱的‘生我是娘，教我是党’的两句唱词，既道出了英雄对党的感情，也说出了我的成长过程。是党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为

一个演员的。”

于淑珍同志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共产党，她是不可能走上文艺舞台的。从一名工人到一名演员，在这个过程中，倾注了党的培养和领导的心血。在她调进剧院初期，是党教育她懂得了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在业务上给她创造了各种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加上老演员的热心帮助、细心引导，才使她日趋成熟。她经常对人说：“党和人民给了我艺术，我要把艺术还给人民。”

于淑珍同志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朴素大方的作风。她经常接到一些来自观众的信件，其中大部分是农村社员和学生写给她的。过去，她无论多忙，每周总要抽出半天时间尽力回信，有的在信中向她要歌，她就抄好歌片给对方寄去，有时还买些音乐书籍寄去。有的找上门来求教，她都耐心地进行辅导。她说：“观众给我们写信、要歌片、讨论问题，是对我们的信任和尊重，我们每回一封信也和演一场戏一样，都是为观众服务。”近两年来，外出任务多，来信也越来越多。有时出去两个月，要积压几百封信，就来不及一一回信，对此她深感抱歉和内疚。

于淑珍今年四十六岁了，从一个女高音歌唱演员的角度来说，她也已经年逾中年。但是，她为了不辜负党的培养，不辜负广大听众的期望，她正以高昂的革命干劲工作着，她不但在艺术上继续攀登高峰，而且在思想作风、劳动态度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总第16期 1982年6月25日）

艺术精湛品德美

——记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

关肃霜是广大观众所熟悉的著名京剧演员。早年向戴绮霞(花旦)、王韵武(武生)学艺。解放后又拜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为师。她较好地继承了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同时,文武兼备,生旦俱佳,独树一帜,在广大观众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她曾三次出访欧洲,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中获金质奖章。多年来,在一片赞扬声中,她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政治上不断上进,艺术上精益求精,生活上艰苦朴素,作风上与群众打成一片。一九七九年被评选为云南省劳动模范。今年又被评选为云南省省级文化系统的优秀共产党员。

勇于革新 不断进取

关肃霜在艺术上总是不断探索,勇于进行革新创造。多年来,她所塑造的陈秀英、白素贞、穆桂英、杨排风、多沙阿波、黛诺、叶娘、娜蒂秀等古代和现代妇女形象,显示她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多方面的表演才能。

《铁弓缘》集中体现了关肃霜的艺术成就和革新精神。她从十六岁开始演出这个戏,到五十一岁把它拍成影片,经过了三十年的锤炼。特别是一九七九年初,她和舞台导演张宝彝等同志紧密合作,对《铁》剧作了较大的整理加工,突出了这个戏除暴安良,平反冤狱,共御外侮的主题,摆正了人物关系,并去掉了一些庸

俗台词，使它成为较好的剧目。同年四月，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在该剧中，她运用武旦、花旦、青衣、小生和武生多种行当的艺术手段，出色地塑造了陈秀英这个有胆有识的女豪杰的形象。影片拍成后，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

对于京剧演现代戏，关肃霜始终是一位积极的探索者和倡导者。一九六四年初，为了演好现代京剧《黛诺》，她和一些同志赴云南省潞西县三台山景颇族地区体验生活，较好地塑造了黛诺这个景颇族翻身求解放的先进青年妇女的形象。这个戏除了有好的思想内容外，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它根据剧情和人物思想感情来设计唱腔，把少数民族的民歌运用到京剧唱腔上去。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二年，关肃霜等同志先后赴北京和上海演出了本院创作的揭露林彪反革命路线的现代京剧《佘山雾》和揭露黎笋集团破坏中越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现代京剧《娜蒂秀》，受到了许多同行和观众的好评。有的同志认为她不应该演这种戏，弄不好会砸自己的牌子，有损于自己的声誉。关肃霜同志却说：“我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演现代戏还是一名新兵，需要很好锤炼。周总理生前曾鼓励我要带头演现代戏，我一定要遵照总理的教导，努力探索，为京剧演现代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肃霜十分注意向同行学习。无论什么剧种、什么演员，她都看、都学。一九五四年，她在北京看了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在《梵王宫》中饰演耶律含嫣的一段表演，她学过来用在《铁弓缘》中，把人物演得更加活灵活现。上海著名京剧演员张美娟等同志出国演出路过昆明，关肃霜向她学习了打出手，受益不浅。关肃霜在《霸王别姬》中饰演虞姬的舞剑，是一九五六年从东欧演出回到北京后，向著名京剧演员李丽芳、刘元桐学的。

如今，关肃霜在艺术上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她仍然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拾玉镯》是她演得烂熟的戏，但不久前在上海安排演出这个戏时，她主动提出要排戏，并邀请戎伯铭老先生到住地来给她说戏，她学得很用心。当云南省京剧院一团到达南

京演出时，正值湖北省宜昌市京剧团在南京演出《白门楼》，这个戏剧本改编得好演得好，伴奏也很好。关肃霜等同志观看了演出以后，到后台看望了这个团的同志们，并高兴地接受了他们赠送的《白门楼》剧本。她对本团一些同志说：“人家演的《白门楼》是经过改编的，而我们演的《吕布与貂蝉》还是老的，我们应向人家学习，加工整理我们的《吕布与貂蝉》。”

在整理加工和演出传统戏的过程中，关肃霜还注意选择那些有较好的思想内容和较完美的艺术形式的剧目，对于有争议、思想内容不好的剧目，她坚决不演。

谦虚谨慎 不计名利

关肃霜不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而且在政治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在荣誉面前，她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从不追求特殊待遇。

今年二月，在研究赴上海等地巡回演出节目单对主要演员的介绍时，有的同志建议最好称关肃霜为著名京剧演员，不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她听了以后说：“这样讲比较好，我们不能自我吹嘘，随随便便就称上一个‘家’。”

动身去上海以前，因路途遥远，为了保证关肃霜的休息，减少她在途中的劳累，团里为她和副院长高一帆等同志订购了飞机票。她说：“我不坐飞机，和大家一起坐火车，在火车上可以说说唱腔。”高一帆也赞成她的意见，不坐飞机，改乘火车。根据有关规定，团里又准备让她坐软席卧铺。她知道后又说：“我不坐软席，和大家一起坐硬卧就行了。”在住宿安排上，团里原打算到上海后在宾馆给她包个房间。她说：“我不单独住，大家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三月九日到达上海以后，她和团里的演职员一样，住在劳动剧场后台宿舍，到里弄食堂搭伙。剧团内外的同志都称赞她能以一个普通演员的身份，和大家生活、工作在一起。

在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益阳和长沙七个城市巡回演出期间，每次演出《铁弓缘》、《战洪州》、《杨排风》等剧目，她都坚持提前上台练高难动作，常常练得一身是汗。有的青年演员问她：“这些戏天天演，为什么还要这样练呢？”她说：“对我们来说，这些戏都不是第一次演了，但观众都是第一次来看的，我们要把最好的艺术呈现在观众面前。”

更值得提及的是，三十多年来，关肃霜曾多次主动要求降低薪金。解放初期，她在工作中接触了我们党的一些老干部，看到他们享受的是供给制待遇，吃的、穿的、用的都很简朴，而自己拿的薪金跟他们悬殊太大，就主动向领导提出降薪。从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四年，她的工资先后降过四次，从一千五百个大洋陆续降为人民币五百元。一九五六年入党后，把五十元交党费，自己拿四百五十元。关肃霜的父亲是一个在旧社会饱经风霜的老艺人。他支持关肃霜的工作，但不同意降薪。关肃霜耐心地做她父亲的工作，说：“现在是国家出钱，又不是向资本家要的，领到的薪金够我们生活，有点富裕就行了。”终于把父亲说服了。

一九六四年，关肃霜从北京演出回来，向云南省文化局提出再次降薪，要求给她定为文艺三级。领导上做了她的思想工作后，给她定为文艺二级。

根据关肃霜的艺术成就和贡献，一九七九年职工升级时，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她的工资从文艺二级(281.50元)升为文艺一级(320.16元)。

关心群众 助人为乐

关肃霜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注意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能关心体贴群众。今年在上海最后一次演出《铁弓缘》时，由于疲劳过度，加上感冒，关肃霜的嗓子哑了。团里有的同志提出是否退票，关肃霜说：“观众排队买票不容易，不要轻易退票。”

下午看看我的声音能不能出来再说。”当天下午，她没有休息，一个人在舞台上拿大顶，翻跟头，走技巧。有的同志对她说：“肃霜，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她说：“我有个经验，身上练热了，声音会出来的。”练到下午三点，她高兴地对剧团领导和剧场经理说：“我的声音出来了，晚上照常演出。”

今年五月份到南京演出时，当地气温突然增高。有一天，习惯于四季如春的昆明气候的关肃霜一进入化妆室，头就晕了，但她心里想着有一千五百个观众要看戏，仍然咬紧牙关化好妆，并以拼搏精神坚持演完了《杨排风》这出戏，谢幕后，大幕刚一闭拢，她就瘫倒在舞台上。经过随团医生的救护，才清醒过来。

一九七九年三月，关肃霜带队参加中央慰问团，赴个旧鸡街慰问对越自卫还击回师的云南边防部队某部。在演出《杨排风》最后开打时，她的额头上被饰演韩昌的青年演员王玉柱不慎刺伤，鲜血直流，当即送到部队医院缝了三针。王玉柱情绪非常紧张。关肃霜不仅不责备他，反而安慰他说：“不要紧的，武打戏谁碰谁一下是常有的。”回昆明以后，王玉柱的母亲和爱人听到此事，十分焦急，准备买些东西去看望关肃霜。她知道后主动登门去做工作：“演出中出点事故，并不奇怪，我们会从中吸取教训的。请你们放心好了。你们不要给我买什么东西。”经过交谈，解除了对方思想顾虑，互相关系更密切了。

多年来，关肃霜和刘美娟、李春仁、高一帆、高俊林、高俊保、刘万祥等同志义务赡养在北京的失子老人胡淑贞、冯祺的事迹，更是早已传为佳话。

（云南省京剧院）

（总第22期 1982年9月29日）

为了理想，永远跟着党向前奔

——王虹剑同志事迹

中共北京市文化局委员会最近作出决定，授予中国评剧院二团舞台工作队副队长王虹剑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号召全系统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职工向王虹剑同志学习。决定指出：王虹剑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同自己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他把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舞台美术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全部身心。

两件遗物引起的怀想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三日上午，王虹剑因患肝癌久治不愈逝世了。

噩耗传来，弦歌盈耳的中国评剧院里，顿时一片肃静。人们沉痛地垂下头，默默流着泪。……

同志们忍着悲痛为王虹剑的遗体更衣，只见他那枯瘦的躯体上，还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在场的同志个个热泪夺眶，有人失声恸哭起来。

这套工作服，同志们太熟悉了，就象熟悉活着的王虹剑一样。看到这套工作服，人们就看见了虹剑那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忙碌着的身影。

王虹剑常年离不开工作，离不开工作服，逢年过节，他爱人

要他换一身中山装，他笑着连连摇手：“过年过节，演出多，工作忙，闲了再换吧！”可是，谁见他有“闲”的时候呢！一九六四年剧院排演合成《南海长城》时，他五天五夜没回家，那身工作服，干活时穿着，打盹时盖上，湿了干，干了湿。他负责舞台灯光，彩排那天，奇妙的灯光效果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王虹剑兴奋不已。但当他骑车回家时，却在车上打起盹来，车倒了，人摔了，他磕了一脸血，用摔伤的手推着车子回了家。

常常在深夜演出后回到家里，他仍不脱掉工作服：一是担心剧团又有事，二是家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呢！吃过饭，不看书，就是动手修理一些小道具。他人勤、手巧、心肠热，团里的零碎活儿常捎回来干，对演员的要求也有求必应，家里成了他继续工作的“小工厂”，工作服回家老脱不下。

王虹剑的遗物中，还有一辆旧自行车是大家熟悉的。他早出晚归，上剧场，奔仓库，全是骑着这辆车子。在研制控制舞台灯光的新型设备60回路流动型配电盘时，一万多元钱的材料，除一次因部件太大用汽车运回外，其余都是他用这辆自行车驮回来的。同志们说，虹剑一辈子，有多少时间是骑着车子在跑、在奔波呀！

一次，剧团要到仓库去选演出用的东西。当时，他正肝部疼痛在床上打滚，浑身都湿透了。爱人劝他去医院，他却说：“不，我得去仓库。要选什么东西我最了解，少一件会影响演出。”说着，忍痛穿上工作服。他连车子都搬不动了，爱人泪流满面地把他的自行车搬到门口。他安慰爱人说：“躺在床上，心里难受。我的岗位不在床上。”爱人扶他艰难地跨上车子，目送着他穿着工作服的背影渐渐远去……

王虹剑的病情越来越重，可他从不悲观。他说：“有那么多工作要做，我怎么能想到死呢？病好以后，我可以去看仓库，继续修灯，保证让每一只灯发光。”这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他的生命和心灵中闪光啊！

生命的价值在于贡献

中国评剧院和首都许多文艺团体，目前使用的控制舞台灯光的理想设备——60回路流动型配电盘，就是王虹剑在几位同志的配合下，利用五年时间研制出来的；是他在癌症缠身的日子里，用自己的生命向着理想最后冲刺的成果。

五年前，首都舞台采用的可控硅配电盘算是性能较好的。可这种大型设备只宜于固定剧场演出使用。王虹剑决心研制一种功能齐全、先进的小型设备，以满足文艺团体流动演出时使用。这是一项吃力而冒风险的硬任务，许多同志为他捏一把汗，但也对他寄予高度信任。王虹剑勤奋好学，不但有“老黄牛”的苦干精神，而且具有可贵的创造性。参加工作三十多年来，他先后自学了电学、光学、机械学以及美学理论和绘画知识。他为剧院几个有影响的剧目设计的灯光效果，都曾受到人们交口称赞。他研制的投光面幻灯机，使六十年代风行的天幕用大玻璃投影方法大为改进。他制作的三头幻灯，首次把幻灯技术用于内景，成为舞台灯光技术革新的一大突破。他创造的利用灯光效果显示各种形套的水纹波浪的幻灯水滚发展成受欢迎的水滚灯具。

王虹剑研制60回路配电盘，用的主要是业余时间和同病魔抢来的时间。五年的星期日，他差不多一天也没休息。连吃饭的时间也要尽量节省，常常是两个烧饼、一块咸菜。医生确诊他为晚期肝癌患者，告诉他必须全体，而他，却动用了全部“全体”时间，日夜三班地投入研制工作。

他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吗？知道，知道得清清楚楚。正因为感到自己体力越来越差，自己时间不多了，才拚命抢时间。他把爱人和孩子也动员起来，请爱人帮他点焊零件，让儿子帮他跑材料。他每天早上钻进车间，晚上十点才出来。他发誓说：“完不成任务，死不瞑目。”随着研制进程的加快，他的生命也在无情地加快向终

点接近。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团演出《评剧皇后》，60回路流动型配电盘首次在北京音乐堂试用，王虹剑亲手操作，舞台上灯光——亮起来了，好极了，比预期的效果还要好！剧场出现了少见的场面，观众为灯光效果鼓掌、喝彩，许多人情不自禁地赞叹。可是，他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戏刚演完一场，他第一次破例提前离开剧场回了家。

60回路流动型配电盘震动了首都灯光界。在一九八四年七月举行的鉴定会上，权威人士一致认为这台设备是国内首创，质量是头等的。它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功能齐全，经济实用，能使舞台上出现各种理想的灯光效果。各文艺团体纷纷订货。鉴定会的气氛十分热烈。可是，为研制这台设备奋战五年的王虹剑却未能出席。他已耗尽心力，再也支撑不住了。

60回路灯亮了，王虹剑的生命之火却要熄灭了。可他的理想和精神之光，却在闪耀着，不会熄灭。

陋室里的光辉

王虹剑的工作是头等的，在生活上却从来不向组织伸手。他家五口人，三个孩子都大了。住的是十二平方米的小屋。这怎么住得下呢？他给两个女儿隔出五平方米，同爱人和儿子占了七平方米。仅有的两只木箱没处放，就悬吊在女儿们头上的房梁上。冬天装炉子时，缝纫机也得吊起来；天气暖了，再吊起炉子，放下缝纫机。小屋里空间少，终年不见阳光，通风也不好。为了使空气流通，虹剑在房顶开个洞，下雨时漏水，他又在洞上用一截管子顶起个破锅挡雨……

屋里实在太窄了！一家人出去进来，都要互相让着。全家人没在一起吃过饭，因为屋里放不下饭桌！为节约几寸土地，他只好挖地掘坑，把煤气罐放到地下。

“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就在这间窄小拥挤的陋室里，虹剑每晚要学习、工作到很晚。邻居们说，虹剑屋里有盏长明灯。

王虹剑的爱人纪桂芳是位先进工人，也是位贤妻良母。她理解虹剑，支持虹剑，几十年如一日同丈夫同甘共苦，全心支持丈夫的工作。当虹剑感到将要永远离开妻子儿女的时候，他对前来看望的领导同志说：“我爱人跟我受了一辈子苦，我对不起她，将来有条件时，请考虑给她调一下房子。”剧院正在盖新楼，虹剑的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啊！可是，就在他去世前几个小时，在医院看到剧院领导同志，又负疚地哭了。他说：“我不该提房子的事，党员怎么能开口向组织要价……”围在他身边的许多人都忍不住自己的眼泪，默默地哭了。虹剑啊虹剑，你一颗赤诚纯真的心，一生一世都向着党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为了理想、为了信仰

王虹剑很早就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可是，直到一九八一年才成为共产党员。一次，他跟党支部委员们谈心时，真诚地说：“我爱我们的党。我的心愿，我的理想，就是为党的事业献出一切。”他的话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称他为“不是党员的党员”。他说：“我的信仰，就是马列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我的奔头！”为了理想和信仰，他舍得个人的一切。一次他因公负伤，大夫特许他自购药品，费用报销，可他一分钱也没报。为工作，为公事，他经常自己花钱，也从来没有报销过。别人劝他，他一笑置之，再劝，他说：“我是国家的，国家是我的。儿子能跟母亲斤斤计较吗？”群众感动地说：“虹剑事事吃亏在前，从来不想自己，这样的党员才是真格的！”

王虹剑常说：“我们国家还很穷，建设社会主义，还得艰苦奋斗，更需要咱们时刻想着尽自己的心，添砖加瓦；谁也不能挖墙角，有损党的事业！”研制60回路配电盘时，需要三角铁，为

了节省开支，他到处买旧的用。连需要的小螺丝钉，他都严格计算，需要九十不买一百。有人讥讽他：“买螺丝钉也数数，真是！”他认真地说：“能为国家省一分，就要省一分！”

他严守纪律克己奉公。凭他的手艺，揽点私活，捞些“外快”，是太容易了。可他从不往那里想。他分内分外都干，上班下班都干，干的全是公家的事。有人不上夜班，却无理要求他给加补夜餐费，他不给加，为此挨了一个多月的骂。他说：“制度、纪律，谁都得遵守。违反纪律的事，别说骂我，打我也不能干！”

他不但自己做第一等的工作，还时时想着培养年青人，为了带动青年工人进电工训练班学习，他拖着重病同青年人一起上课……

他想得长远，干得踏实，充满勇气。前年，二团响应党的号召，试行改革。他热烈拥护，身体力行地支持改革，出了很多好主意，不辞辛苦地为改革努力。改革碰到困难的时候，他说：“改革是正道。跟着党中央走正道，怕什么？怕困难，就不是共产党员了！”同志们忘不了他，尤其忘不了他在入党转正的支部大会上的发言，他说：“建设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这就是我的目标、我的奔头。为了理想，为了信仰，心里才不空虚，才感到永远有奔头。虽然我能力有限，水平又低，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我要永远跟着党，向前奔！”

（据新华社七月二日电讯稿）

（总第63期 1985年8月2日）

人民需要这样的艺术家

——记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

近年来，武汉歌舞剧院抒情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在国内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国音乐界人士称誉他为“盼望已久的中国式男高音”，“民族声乐的骄傲”，“为中国民族声乐学派打开了通道的‘工程兵’”。他到过许多国家访问演出，在意大利米兰演唱《啊，我的太阳》时，被公认为具有世界第一流声乐鉴赏水平的，当地观众，不禁狂呼“妙极了”！把一束束鲜花抛向这位来自中国的歌唱家。

人们不仅称赞吴雁泽在演唱艺术上为创立和发展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民族声乐学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更赞扬他坚持走正确的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有一阵子，港台歌曲及其仿制品潮水般涌向大陆舞台，一些有名望的歌唱家也竞相演唱。但吴雁泽却没有去赶这个时髦，始终坚持演唱健康的曲目。翻开他这几年来的演唱节目单，有歌唱党和人民领袖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手捧红枣想念周总理》，有歌唱祖国河山和劳动人民的《草原之夜》、《一湾湾流水》、《清江放排》，有世界名曲和外国民歌《三套车》、《小夜曲》、《拉网小调》，也有我国近年来的优秀创作歌曲《金梭与银梭》、《祝酒歌》，唯独没有一首“路边的野花你莫采”之类的东西。有一次，他在演唱会上接到台下听众的两张条子，分别点了一首歌要求他演唱，他临时加唱了其中一首，而对另一首他认为不健康的歌则坚持没有唱。还有一次，他在武汉体育馆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报幕员刚报完歌名，观众中有几个人高声怪叫“不听！不听！”要他换个歌。他不为所动，以更加嘹亮的歌声，坚持演唱这首抒发人民内心真情的歌曲，激起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演唱会结束后，他走出大门，正想上汽车，却被一群青年人团团围住，要他唱港台歌曲。他先是一再解释说不会唱那些歌，也不愿意唱。但这些人不依，纠缠了半天，最后他唱了一首《祝酒歌》。

吴雁泽坚持唱好歌，不唱格调低下的东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赞赏。上海音乐厅的工作人员在听了他的演唱会后，感叹地说，吴雁泽唱歌，台下观众秩序很好，不象有些音乐会那样，台下又是吹口哨，又是敲椅子，奇叫狂呼，秩序很乱。真是台上歪一寸，台下歪一尺；演员台风正，观众也认真。这次演唱会后，该音乐厅的工作人员还特地赠给吴雁泽一块题写“雁鸣震海”的匾。有一次，吴雁泽在北京街上某餐馆就餐，旁边有几个青年人认出了他，跑过来要他签名留念，还热情地说：我们都是音乐爱好者，对那些低级的流行小曲泛滥十分反感。我们听过你的演唱，你不是那种人，我们很敬佩你。

唱时代之歌，抒人民之情，是这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执着追求的崇高目标，舍此，名誉不能为之所迷，金钱不能为之所动。某歌唱家来武汉举办音乐会，主动邀请吴雁泽参加演唱流行歌曲，并许以重金酬谢，他托故推辞了。而一九八五年春节，家里人等着他回家过年，他却应伐木工人之邀，路远迢迢地到东北大兴安岭为群众演唱。一九八四年，他在北京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排演，休息时，临时应邀到沈阳参加一场音乐晚会，当他下了飞机，匆匆赶到演出场地时，演出已经开始。他刚进后台不一会，意外地听见有几个人在为演出报酬高低而争吵不休，继而又谈论起他来参加这场晚会的“价钱”。已经开始化妆的吴雁泽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换下演出服，退出了演出场地，连夜去买返回北京的飞机票。事后，有人埋怨他太不通人情了。他却正色说道：也许我不该罢演，但我不能为金钱演唱。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

真有说不出的难受。一个艺术家如果把金钱看得太重，就会毁了艺术，丢了人格。吴雁泽从来不用自己的名声谋取私利，建设小家庭的“现代化”。一位到过他家的同志说：除了屋角有一架钢琴，这哪象一个著名歌唱家的家。

除了正式演出，吴雁泽还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演唱。外出途中，他常常在火车、轮船上为旅客唱几首。他到菜市场买菜，认识他的营业员和顾客请他唱一个，他放下菜篮子便唱。他去服装厂试穿演出服，为工人们唱了一首又一首。一次，他去参观工厂，他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一个上午便唱了四次。还有一次，他到船上送日本大分市的客人，船上的水手和几个旅客见了，便提出请他唱歌，他毫不推辞，站起来就唱。日本客人惊诧之余，赞叹不已，翘起大拇指说：在日本，象他那样的第一流歌唱家是绝对不可能如此随便地为人们演唱的，中国的艺术家和群众打成一片，真了不起！

更令人感动的是，有一次到少年犯人管理所演唱，他走上舞台，面对一张张稚气未脱的面孔，破例先深情地说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好不容易来这里看望小朋友们。你们可曾想过，你们在这里，你们的爸爸妈妈是多么难过，我希望你们听了我的歌，快悔过，回到爸爸妈妈身边。说着，他掉下了泪。他饱含感情地唱道：“妈妈呀，我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如今我已长大，我该怎样来报答……”唱得孩子们失声痛哭，纷纷跑上前来象对亲人一样和雁泽抱在一起，表示要痛改前非，不辜负吴叔叔对他们的希望。

吴雁泽常说：人民哺育了我，我要全身心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他确实做到了尽心尽力，毫无保留。前年，湖南衡阳市一个全身瘫痪的音乐爱好者谱写了两首独唱歌曲，联系了六七个专业和业余歌手，请他们帮助演唱和录音，可是，有的不屑唱，有的开口便要一百元报酬，他失望了。后来，他想起了吴雁泽，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托人把歌谱带到武汉。对这样一个素昧平生，

又无名气的人的要求，吴雁泽二话没说，便答应了下来。他在紧张工作之余，认真地反复练唱，用自己的磁带录制好这两首歌，给作者寄去，还在磁带里录了一段热情鼓励作者的话。作者收到磁带后，在病床上一边听一边止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他投书湖北日报社，感谢吴雁泽同志！

为人民服务的人，人民是永远尊敬他的。武汉的群众说：老吴没架子，是我们自己的歌唱家。今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授予他市劳动模范称号。广大观众还拥推他为武汉地区“十佳演员”之一。最近，他又被任命为武汉歌舞剧院院长。

人民衷心祝愿这只矫健的大雁在为人民服务的广阔天地里，在音乐的无限空间里飞得更高。

（武汉市文化局）

（总第65期 1985年10月26日）

将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记王玉梅同志生活片断

山东省话剧团演员王玉梅同志，从事文艺工作三十多年来，兢兢业业，沥尽心血，成功地塑造了许多妇女的艺术形象，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较大贡献。

为表彰王玉梅的模范事迹，今年八月，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大会，授予她省劳动模范称号。继而，王玉梅被选为党员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在欢迎王玉梅归来的茶话会上，她激动地说：“我没有做出什么事迹来，比起那些在保卫祖国战斗中，流血流汗，甚至献出年青生命的战士们，我算得了什么呢？……党和人民给我这样大的关怀和荣誉，我很不安，说实在的，我有一种负重感！我要继续努力，戒骄戒躁，为党的艺术事业而奋斗，将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养育我的土地和人民！……”

这里介绍的，仅仅是王玉梅生活中的几个片断。

“党员，不是挂着牌子给人看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是王玉梅终生难忘的日子，追求了三十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年内乱，给党的威信造成了严重影响，而王玉梅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入党的愿望却未曾动摇。前几年，社会上流行一种“入党不自由”的错误论调。而王玉梅却是这样说的：“有人说，入党就

戴上了紧箍咒，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如果有人把党的纪律当作紧箍咒，那这个紧箍咒我愿意戴。过去极左思潮看不到我对党的感情，践踏了这种感情，可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对党的感情也没有动摇过，今后，我更不会动摇，永远不会动摇！”

入党之后，她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她说：“党员，不是挂着牌子给人看的，要用自己的行动提高党的威望。”

王玉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团里有一位青年演员，犯了错误，感到没脸见人，整天独自一人关在宿舍里。王玉梅知道后，主动找上门，把她请到家里，为她包饺子，和她谈心，帮助她提高认识，痛改前非。

八五年的春节到了，人们正采购年货准备欢度新春佳节的时候，王玉梅来到传达室给老师傅“拜早年”，将挂历、塑料盆景送给他们表示问候，使老人感激不已。

深入生活时老房东儿子有病，王玉梅把他带到济南，为他找大夫治疗，让他住在自己的家里，象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主动承担全部费用，时间达半年，房东大哥很感激，把她当做自己的亲人……

王玉梅取得的成就被社会所公认，但她仍象从前那样谦逊、和蔼，从不摆架子。

在电影《花环》摄制组中，流传着一个“包饺子”的故事：影片中有一场吃饺子的戏，这本应是道具部门的工作，身为“梁大娘”的王玉梅主动承担了包饺子的任务，受到全组的好评。

在一次外景拍摄中，一位年轻演员初上镜头，有点紧张，出戏较慢，又时值仲夏，顿时憋出一身汗来，这时一股凉风从背后吹来，原来是王玉梅在镜头外为她搥扇子！

青年演员倪萍的成长也凝着王玉梅的心血。她逢人就说：“我的台词、表演，王老师帮了大忙了。”她在拍摄电影《山菊花》和广播剧《暖流》的时候，和王玉梅同在一起，为了一句台词、一段戏，王玉梅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教她，使她进步很快。

王玉梅从我做起，自觉地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甘当配角，谦虚谨慎，受到人们的好评和赞誉。一九八三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一九八四年被评为省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在山东省话剧团，年青人尊敬地称她“王老师”。同辈人亲切地叫她是“我们的梅子”。

一丝不苟、奋力拚搏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王玉梅同志焕发了创作热情和艺术青春，她以瘦弱之躯在文艺园地忘我工作，辛勤耕耘，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闯出了一条自学成才之路，为专家和群众所喜爱。

近几年来，她连续在话剧《沉浮》、《苏丹与皇帝》、电影《喜盈门》、《内当家》、《高山下的花环》、《谭嗣同》以及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中饰演重要角色。一九八二年在电影《喜盈门》中扮演仁文妈，获上影最佳女配角奖。一九八四年在电影《谭嗣同》中扮演慈禧太后，获长影特别奖。同年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扮演梁大娘，获上影“小百花”最佳女配角奖。一九八三年全国电视剧评奖中，她扮演的梁大娘，获“金鹰奖”和“飞天奖”两项优秀女配角奖。继而又在一九八四年全国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评选中，以在影片《高山下的花环》和《谭嗣同》中分别扮演梁大娘和慈禧太后双获最佳女配角奖。她是我国电影大奖评选中首次在两部影片中以饰两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双获最佳女配角奖的演员。

荣誉是令人羡慕的，但在它的背后却凝结着追求者的血汗。成就的取得，是与王玉梅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艺术上一丝不苟、奋力拚搏分不开的。

长期从事文艺工作，生活很不规律，加上过度劳累，王玉梅身体多病。她动过两次手术，患有胆囊炎、胃病、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腰脊劳损、声带三分之二闭合不拢……但，她在病魔面前

没有退却，拖着瘦弱的身体，向新的高度攀登。

有一次，剧团在烟台演出，急需王玉梅参加。正在栖霞外景地拍电影的王玉梅，因劳累过度又一次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她不顾身体虚弱，还在发烧，打了两针，直奔烟台参加演出。“我是个党员，团里工作需要，观众要看我演出，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我累，可心里舒畅。”

为了艺术事业，王玉梅牺牲了照顾家庭和家人团聚的温暖，常年在外拍片，还要兼做些社会工作。一九八四年，腊月二十八才赶回家中，匆匆过个年，正月初四就乘上赴上海的火车，有时路过济南，将家人叫到火车站，叙十分钟的儿女情后又匆匆走了。

“我何尝不需要一点天伦之乐呢？但，还是把乐趣献给更多的人吧；人，不能什么都得到，总要牺牲一点东西，两者相比，后者更重要”，她总是这样宽慰自己。

艺术生命在于真实，为了真实地表现人物，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王玉梅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角色。她的刻苦钻研，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人所共知的。为了寻找挨饿的感觉，她曾饿过一天不吃饭；为了演一个吸烟的反面角色，她学吸烟；为了拍摄雨中行走的镜头，她先在水笼头下把全身淋透，才肯走到镜头前拍摄……

为了追求真实，王玉梅常常要忍受皮肉之苦。在拍摄《花环》的同时，她还接受了扮演慈禧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睡眠减少了，甚至有时通宵达旦，大量翻阅清史资料，向历史学家求教，并借了一双慈禧当年穿的花盆底鞋。在拍摄《花环》的过程中，一有闲时，便穿着走起来，有的同志说：“你穿花盆鞋走的路，登泰山也到了。”慈禧的冠饰很重，压得头痛，但她忍住疼痛，一声不吭，即使一时不参加拍摄，她也不肯摘下来，拍完片后，她的头顶竟被沉重的“皇冠”压出一个大疤！

在电影《花环》中，有一场“噩耗传来”的戏。为了充分体验角色，准确表现梁大娘失去儿子的巨大痛苦，拍摄前，她投进全部

感情，独自一人，失声痛哭，直到哭干了眼泪，两腮象凝固着两根冰柱一样凉冷，不自觉地缩起身子，真象剧本描写的那样，“听到噩耗，梁大娘象矮了半截”。人物感觉终于找到了，她毫不放松感情，等待拍摄。事后，导演看样片很满意，更佩服王玉梅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

《花环》公演后，人们纷纷赞誉她创造了“中国母亲的形象”，称赞她的演技。王玉梅是这样说的：“我不聪明，也不要称我家，要问有什么成功的诀窍，那就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爱，真心的爱它；没有党的关心，没有人民的哺育，便没有我，这是我的心里话。”

“人民的生活，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艺术生命的母体是人民的生活，他们是我思想上艺术上进取的母亲，人民的生活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王玉梅一直执着地坚持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把个人感情融进人民和时代的感情中去，在向生活学习的过程中陶冶情操，升华思想，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为群众竭尽自己的一切，受到农民群众的爱戴。

一九六三年，为演好《丰收之后》中的赵五婶，她去栖霞县陆家沟深入生活，和女支书形影不离，情同姊妹。一九八三年拍《内当家》又来到栖霞县，王玉梅没有忘记二十年前她生活过的地方。她不顾劳累，翻山过河来到陆家沟。乡亲们早已站在村口迎接她，他们拉着她的手说：“俺们的赵五婶又回来啦！”当年的女支书已经去世了，但墙上仍然挂着二十年前王玉梅和她一起生活劳动的照片。她来到村里第一批老党员之一、八十六岁的鲁珍大娘家，鲁大娘老泪纵横，拉着她的手指着墙上的照片说：“孩子，俺想你想得整天看墙上的照片！可见到你啦！”……在农民当中，王玉梅再次感受到人民的纯真的感情。当听到他们还没有看到《喜盈门》时，

她非常难过。她找到县委领导，诉说着自己的心情：“我演的电影是给农民看的，我做为一个演员，希望我的电影能给他们添一点乐趣和劲头。”县委领导很理解她的心情，立即决定把影片送到那里去。王玉梅不但关心村里的生产、生活情况，而且回济南后还亲自帮他们联系购买锅炉，发展商品生产，村领导非常感动地说：“你不但是个好演员，还是俺们的贴心人哪！”

王玉梅向生活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走到哪里学到哪里。拍《花环》，她丝毫不放过和前线战士的接触，和他们促膝交谈，她说：“我所演的尽管不是战士，但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做为一个英雄的母亲的感情和襟怀。”她怀着对战士的深厚感情进行角色创造。在拍《花环》圆坟一场戏时，在场的导演摄影师和观看的所有群众都被王玉梅的真实表演感动得哭了；有一位解放军宣传干事，照片拍不下去，大哭起来：“看到梁大娘，我想起我的母亲和死去的战友。”

王玉梅将自己置于群众火热的生活之中，所以对人民的要求才有着较深的理解。她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他的产品只有在群众中盖上了‘合格证’的印章，才是最大的幸福。”她创造的艺术形象鼓舞了人民，人民的鼓励使她获得了艺术创作的力量。当《花环》到云南献映时，一位十八岁的战士要亲眼见见“梁大娘”，他的双眼在自卫反击战中被敌人的炮弹炸得几乎失明，他颤抖地握着王玉梅的手说：“你不光是梁三喜的妈妈，也是我们全体战士的妈妈！你演得太好啦！你多象我娘啊！我……我叫你一声娘行吗？和你一块照张相行吗？……”王玉梅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把这位战士紧紧地搂在怀里！她的感情就是这样，一次次在人民的生活中得以净化和丰富。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是艺术的主人。王玉梅在云南前线的一次大会上，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没有和前线的战士的接触，没有前线血与火的战斗生活的冲击，我是演不好梁大娘的。是战士的情操和可歌可泣的事迹，开扩了我的视野，充实了我的感情，

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望。谁是今天最可爱的人？是战士，伟大的战士们！”

人民艺术家来自人民，人们在评价王玉梅的艺术造诣和思想修养时，普遍赞誉她投身于时代的生活，扎扎实实向生活学习的精神和勇气。

王玉梅同志是个有造诣、有情操的艺术家。她一丝不苟，刻意求真；她面向生活，扎根生活，自觉地把个人命运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革命的功利主义进行严肃的创作。她不骄不躁，平易近人，愿做配角和青年人的益友，为文艺事业培育人材，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楷模。

在新的形势面前，王玉梅表示：要突破自己，向更高的目标攀登，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无愧于时代和人民。“永远不满足自己。前面的路有困难，但必须走下去！”王玉梅说，“一个艺术工作者，应该有一种使命感；人生短促，我要抓住每一分钟，为党和人民多做一点事情。”

（总第66期 1985年11月25日）

一家办得比较好的文学期刊 ——《当代》

在全国数百种文艺刊物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型文学期刊《当代》，是办得比较好的刊物之一。

《当代》创刊于1979年6月，1980年底以前为季刊，共出7期，1981年初改为双月刊至今，又出15期。

《当代》创刊四年来的主要成绩

(一) 在新创刊的大型文学期刊中，《当代》发行量较大，创刊时为7万册，现在稳定在50万册左右。只有“文化大革命”前创刊的《收获》比《当代》的印数大。几年来文艺期刊的印数曾一度起落不定，甚至普遍下降(连《收获》也大起大落)，《当代》的发行量能稳定在50万册左右，是很不容易的。

(二) 发表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全国性的文艺评奖活动中获奖的有16篇作品，其中有话剧剧本《未来在召唤》(赵梓雄)、《噢，大森林》(都郁)，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路遥)、《洗礼》(韦君宜)、《太子村的秘密》(湛容)、《赤橙黄绿青蓝紫》(蒋子龙)，短篇小说《心香》(叶文玲)、《你是共产党员吗?》(张林)、《雕花烟斗》(冯骥才)，报告文学《命运》(杨匡满、郭宝臣)、《励精图治》(程树榛)、《热流》(张锲)、《啊，龙》(李君旭)、《继母》(韩少华)、《播鲁迅精神之火》(何启治、刘茵)、《中国姑娘》(鲁光)。有些作品被改成电影，如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张

贤亮的《龙种》、鲁彦周的《廖仲凯》、胡扬的《举头望明月》等。有些作品被拍成电视剧，如张林的《你是共产党员吗？》、郑九蝉的《能媳妇》。

（三）没有发表过思想倾向不好的作品。

（四）发现、扶植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据不完全统计，从《当代》创刊到1982年6月，在《当代》发表过作品的国内作者300多人中，新作者就有100多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话剧《未来在召唤》的作者赵梓雄，中篇小说《职责》的作者陈中冀，中篇小说《宿愿》的作者鲍咏石，中篇小说《这一家》的作者冷杉，短篇小说《能媳妇》的作者郑九蝉，短篇小说《姐姐》的作者刘文忠，报告文学《热流》的作者张镗等，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五）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的作家，既注意发现和扶植新人，注意向创作力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组稿，也为老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机会。几年来，《当代》发表了一批知名老作家如舒群、罗烽、廖沫沙、许幸之、吕剑、萧乾等人的作品，发表了一批台湾和香港作家的作品。

《当代》编辑部办好刊物的主要经验

（一）认真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办刊宗旨。努力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到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对于达到一定艺术水平而在思想上存在某种缺陷的稿件，通过与作者商量，修改后再发表。对于创作倾向不好的作品，则坚决退稿。

（二）把发表反映当代生活的新创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尤其重视发表反映当前四化建设进程中的新的社会生活的作品。力求使作品反映时代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特别是四化建设者的形象。注意既不回避或掩盖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矛盾，又尽可能正确、全面地认识和反映生活，让作品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

不断进取的力量。使读者从中领略高尚的思想、道德和情操，获得健康的艺术享受。读者反映《当代》有“活、新、实”等特点。

(三)为了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他们比较重视组织发表报告文学，一旦发现好的题材和线索，便积极组织作者进行采访，有时派出自己的编辑亲自采写。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命运》、《热流》、《励精图治》、《战马的风骨》、《她有多少孩子》、《国土、民族、士兵》等，都在读者中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映。

《当代》创刊时，只有两、三人兼做工作，后来成立了一个六人编辑组。现在，《当代》编辑室有12人，做具体编辑工作的只10人，每人一年处理来稿平均约在一千万字以上。

(总第38期 1983年9月10日)

《文艺研究》五周年小结

《文艺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创办的一本综合性文艺理论刊物。五年来出版了三十一期，发表了六百万字的文章和大量的美术作品及漫画，在国内外文艺界、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注意反对“左”右两种倾向

五年来，文艺界从两个方面开展了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文艺研究》还是比较“稳”的，这是由于《文艺研究》筹备创刊期间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小平同志在务虚会议上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时。这样就使我们认识到要准确地、完整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创刊号上，我们发表了本刊编辑部《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旗帜》的文章，强调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强调解放思想，强调坚持“双百”方针。指出：“历史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什么时候认真贯彻了‘双百’方针，文学艺术就得到发展、繁荣，否则文学艺术的发展就停滞。”五年来我们比较注意防止文艺战线上“左”和右的两种倾向，比较注意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的问题。

二、发表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文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自创刊号起，我们先后发表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共十二篇。如毛泽东同志《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刘少奇同志《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周恩来同志《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陈毅同志《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陈云同志1981年《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谈话和最近《春节时会见曲艺工作者的谈话要点》等文章。这对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对社会主义艺术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三、强调学习、研究、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1980年前后，文艺界出现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社会上出现所谓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时候，我们同《文艺报》、《文学评论》联合召开了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座谈会，我们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长篇报道，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要学习、研究、继承、发展，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根据文艺形势的发展，为了使社会主义文艺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先后发表了陈荒煤、冯牧、贺敬之、周扬、林默涵、朱穆之、周巍峙、赵寻等文艺界领导同志的文章，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贺敬之同志在1981年发表的《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看

法》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文艺上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注意研究和克服两种片面性、两种倾向”。最近在本刊发表的《正确地进行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一文中，又结合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进一步指出：“要从两个方面开展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实践证明，这是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的。

四、强调解放思想，坚持“双百”方针

在文艺战线上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除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必须强调解放思想，坚持“双百”方针。

我们曾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及署名文章，即通过争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重要的是在编辑实践中，发表了大量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文章。如形象思维问题，关于阶级性与人性、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我们都先后发表了不同观点的文章，并结合创作实际对抽象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作了批评。此外，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创作方法、深入生活、以及美学问题、“红”学问题、鲁迅研究等问题上，我们都发表了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

五、重视文艺研究中的探索和求新精神

有读者说《文艺研究》给人的印象比较“新”。这主要是指内容的新。其中包括下列各种情况，各类文章：鲜明地提出问题来探讨，如召开电影美学问题座谈会，讽刺艺术座谈会，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座谈会及所发表的那些文章；有的是首先提出对某种艺术需要的呼吁，如1980年我们发了一组文章，提出要重视雕塑艺术，重视在城市及风景名胜地方增建雕塑；有些问题虽在社会上有所讨论，但未被重视，我们集中发表了一组文章，以便引起注意，如建筑艺术、舞台美术等。

六、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有分析、有批判地介绍外国文艺

对于西方文艺，一面要警惕、设防、批判；一面要遵照“洋为中用”的方针，以我为主有分析、有批判地借鉴、吸收，这对发展、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是不可或缺的。陈涌的《论艺术与现实》、唐弢的《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等文，读者反映很好。

七、既要有学术性、理论性又要有战斗性

《文艺研究》的方针，是既要有学术性、理论性，又要有战斗性；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对一些比较专门的学术性著作，我们要求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意义；文章要有民族性又要有时代感。对一些探讨当前文艺问题的文章，则要求有理论性、学术性。

一本学术性、理论性的刊物，如何体现战斗性，是一个问题。从五年来发表的文章看，关于坚持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是一种战斗性文章；戚方的《中国文学和中国现实》（批评香港李怡文章的）、林志浩的《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问题的商榷》以及一些批评当前不良的文艺倾向、现象、作品的文章，是一种战斗性文章；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如陈涌针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论艺术与现实》，也是一种战斗性文章。而这种通过学术性、理论性体现的战斗性文章，似更适合《文艺研究》。

《文艺研究》一创刊，就有意识地运用漫画这个武器。五年来发表了二百多幅漫画，对文艺界的一些不良倾向作了批评。

八、既要有重点又要注意多样化

《文艺研究》是研究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一个大型文艺理论刊物，包括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曲艺、电影、电视、摄影、杂技、书法、印章等。如果每期漫无中心，即失之过散。因此，自创刊以来，几乎每期都有一组有中心主题的重点文章。有些中心，比如关于《茶馆》的革命现实主义问题、戏曲现代戏问题、“深入生活”问题、雕塑艺术问题、电影美学问题、电视剧问题、建筑艺术问题等的文章都反映较好。

九、形式要严肃大方、活泼多彩

由于刊物的性质基本上是学术性和理论性的，形式就必须严肃、大方；由于刊物还有战斗性的一面，而且内容包括所有的艺术门类，形式就应该活泼多彩；又由于一些艺术的理论文章特别是美术方面的，如能辅之以图，必相得益彰。因此，决定刊物取文图并茂的形式；决定封面、封底及中缝用彩色画页。

十、搞“五湖四海”，注意培养中青年作者

刊物联系作者的方针是搞“五湖四海”。来稿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都予以刊登。文中如有不利于团结的词句，一经发现，必予删去。由于我们坚持搞“五湖四海”，获得了读者和作者的好评。我们还比较注意中青年作者，以刊物培养“名家”。

(总第51期 1984年6月3日)

大型军事文学期刊《昆仑》 受到读者喜爱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型军事文学期刊《昆仑》，自1982年3月创刊到今年9月，已出版了15期，共发表了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71部，报告文学28篇，以及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若干篇。中篇小说《射天狼》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解放军文艺奖”，并被改编成电影《道是无情却有情》。话剧剧本《彭大将军》获1982年全国优秀话剧剧本奖。长篇小说《两代风流》在今年《昆仑》第三期发表后，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了读者好评。中篇报告文学《奔涌的潮头》、《省委第一书记》、《共青畅想曲》，传记文学《元帅外交家》等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在大型文学期刊中，《昆仑》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较高的艺术质量、独特的风格，受到广大读者的注意。

一、《昆仑》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以军事题材为主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是发表军内外作家军事文学作品的重要园地。三年多来，在这块园地上，不断推出有创新和突破的军事题材文学佳作，不断涌现有艺术才能和创作潜力的文学新人，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可喜成就。在已发表的71部中篇小说中，军事题材占81.4%。

二、主攻方向明确。在以军事题材为主的前提下，近年来，编辑部进一步具体明确了两个方向，一是紧扣时代脉搏，下大气力抓好反映新时期四化建设和改革题材的作品，热情扶持、大胆鼓励作者在这方面作勇敢的、有益的探索。如反映部队干部制度

改革的报告文学《奔涌的潮头》、中篇小说《雷，在峡谷中回响》、《晚露》、《蒲叶溪磨房》等。二是进一步抓好战争题材的创作，特别是革命历史战争题材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题材。如《东方》新增部分《彭总》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同志的感人形象。

中篇小说《男儿女儿踏着硝烟》、《横槊捣G城》、《绵亘红土地》则以火热的感情和遒劲的笔触讴歌了对越自卫还击前线的我军英雄将士的英勇事迹和高尚情操。

三、注重作者扎实的生活基础，鼓励和支持作者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并为他们深入生活创造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在丰厚的生活中捕捉保卫和建设四化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并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

四、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作为自己的基调。《射天狼》中的袁翰，《路魂》中的罗志杉，《沙漠蜃楼》中的岳龙弟，《引而不发》中的西帆父子，《两代风流》中的李辰和耿爱国，《横槊捣G城》中的秦龙、季泓、李小龙，以及报告文学《滦河水南流》中所描写的那些在建设和保卫四化中英勇献身的将士们，革命前辈的那种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这些形象身上闪光，而这种献身精神是源于对祖国、对人民炽烈的热爱之情。

五、广泛地团结军内外作家，特别是一批锋芒初露、潜力很大的部队中青年作家，使刊物充满朝气。已发表的71部中篇小说的作者中，部队作者有51名，他们大部分是青年人，开始创作活动时间很短。

六、在编辑思想上注意克服“左”的思想影响，也注意防止右的错误倾向。在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健康的创作思想基础上，鼓励革新与创造，重视和珍惜部队作者在军事文学创作中的新的探索、新的尝试。对西方的一些文学流派，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鼓励作者正确借鉴、吸收，在艺术形式上做一些新的尝试。

七、开辟一些吸引读者的栏目。“昆仑风”选发部队青年诗人

的佳作，并配以“知音与诤友”展开评论、探讨；“昆仑览胜”刊载短评，对本刊发表的优秀作品进行研究和评价，帮助读者去更好地欣赏、阅读。“《昆仑文学丛书》序文选”发表《昆仑文学丛书》中对创作有所启发的序言。另外还选发一些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对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和有关的文艺思想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与研究。

《昆仑》编辑部除了在军内外作家中积极组稿外，主要力量放在举办中篇小说创作研究班，既培养了人才，又保证了稿源。从创刊到现在，已办了8期，每期时间一般为两个月，人数5—12人。基本作法是：

1. 学习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进一步明确方向，提高对军事文学的作用、地位的认识；分析、研究当前的文学创作现状和发展趋势。对创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如怎样反映部队内部的矛盾、冲突，艺术形式的继承与创新，对外国文学流派的评价与借鉴，以及怎样反映新时期变革着的生活和涌现出来的大批立志改革的社会主义新人，怎样开掘革命历史战争题材等问题，结合创作实践加以探讨。

2. 发展作者的创作个性，尊重作者有益的探索，在题材、风格、表现形式和手法等方面，编辑部决不强加于人。只要是有益于军事文学的创作繁荣，编辑部就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有的作者对和平时期军人的甘苦、向往和烦忧的精神世界思考较深，立志要开发这个“矿藏”，表现出当代军人的心灵美，编辑部就鼓励他由此入手。有的作者认为军人来自社会，部队本身就是生活在社会中，要写出军队生活的广泛的社会性，编辑部就帮助他在这方面作探索。有的作者基层连队生活的底子厚，“兵味”十足，编辑部就注意发挥他这方面的长处。有的作者对军人的价值、军人应有的素质以及当代军人与历史的联系等思考较深，编辑部就支持他作这方面的尝试。编辑部还注意帮助作者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根据作者不同的特点和优长，和作者一起商讨，

帮助作者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更快前进。

3. 创作研究班不搞形式主义，选一些有基础的作者集中精力打攻坚战，同时也选一些刚刚踏上创作道路、经验还不多、但很有发展前途的新作者到这一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创作研究集体来进行创作实习，力争在班上拿出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力争使参加学习探讨的新老作者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提高。创作研究班在编辑部的主持下，开展集体和个别的互相交流、切磋，遇到创作难点，大家集中讨论，帮助每一个作者较好地完成自己的作品。创作研究班重视创作队伍的长远建设，要求出作品，更注意育人才，三年来，已培养较优秀的作者三十人左右。

三年来，编辑部经常收到作者和读者的来信。战士们来信说：“《昆仑》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干部战士，我们感到亲切可信，受到鼓舞。”

地方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来信赞扬《昆仑》给人向上的力量，给人以艺术享受。太原工业学校李云等19名同学联名投书编辑部：“感谢你们送来如此好的作品，为我们塑造这样多的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改革者形象，激励我们为四化奋斗。”广西造纸厂庞民祖来信说：“感谢您们为广大读者编辑出版了《昆仑》这样一本好的杂志。我每期都买，每期都通读，因为里面的文章大都是反映部队生活的，给人以力量。”某部队胡占林来信说：“《奔涌的潮头》宛如一把锋利的剑，把部队干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得淋漓尽致。”河北《冀东文艺》王立新来信说：“报告文学《省委第一书记》受到空前欢迎，《昆仑》刚到报刊亭，上百本一售而空。”他们希望编辑部继续多多编发这种鼓舞人的斗志、同时又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的好作品。空军张廷发司令员高厚良政委等领导同志交代空政宣传部代他们订阅《昆仑》。昆明军区张铨秀司令员说：“《昆仑》这本刊物好，我们部队很需要。”他要求全军区部队的基层单位都要普遍订阅《昆仑》。

（总第53期 1984年10月30日）

·论 评·

推荐《故事会》的好经验

本刊向文艺界——特别是文艺报刊的同志们郑重推荐上海《故事会》办刊的好经验。

在许多文艺刊物销路下降、许多不健康小报到处泛滥的情况下，《故事会》这个三十二开小型通俗文学月刊却越办越有劲，销路越来越多。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发行达七百三十多万份。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事。它不是用格调低下的作品、标题、插图和封面来招徕读者，不是用胡编乱造的奇闻秘史来赚钱赢利，而是风吹不倒、雷打不动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又千方百计地做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因而，为办好刊物，打开了广阔的天地。能做到这一点，关键又在于《故事会》有一个思想业务水平较高、具有开拓精神的编辑部。

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文艺体制也应当改革，要改变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讲经济核算、不讲工作效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精神生产也是一种生产，要讲经济效益，不算经济帐是不妥的。但是，精神产品又不能与物质产品等量齐观，不能单纯以经济价值的高低来衡量质量的优劣。因此，文艺改革不能只考虑经济效益，而是首先要考虑社会效果和艺术效果，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故事会》编辑部在改革中注意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时刻不忘通过故事来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培养读者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这就保证了正确的办刊方向。事实也证明，反映上述内容的故事，群众是欢迎的，刊物的印数不断上升，使经济效益也得到了提高。这与

借改革之名，单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而不惜滥发低级庸俗作品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故事会》值得赞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文艺的更大繁荣和发展，应该使作家艺术家享有充分的创作自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自由或权利总是和一定的责任或义务连在一起的，没有无责任的自由或无义务的权利。《故事会》编辑部十分重视来稿，从每日近二万件来稿中认真发现好作品，通过奖励等方式提倡作者多写有益、健康、艺术感染力强的故事，这样，既充分尊重了作家的创作自由，又注意引导作家增强社会责任感，编辑部本身也做到了对人民负责。这样来对待创作自由，我们认为也是很好的。

故事作品基本上属于通俗文艺的范畴。通俗文艺，因其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而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欢迎。我们历来认为，人民需要通俗文艺，通俗文艺应该得到支持和发展，它是文艺百花园中一朵鲜艳美丽的花，不应贬低和排斥。但是，通俗不等于庸俗。近年来某些报刊，特别是一些小报和少数刊物，打着通俗文学的招牌，大量发表低级庸俗、格调不高的东西，败坏了通俗文艺的名声，有害于精神文明建设，人民群众很不满意。其实，所谓通俗，主要是指一些作品，发扬了中国传统说唱文学的特点，其体裁、形式、风格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易于接受。至于思想内容，和所有的文艺作品一样，当然要健康有益、格调高尚。在这些方面，决不能因为是通俗文艺就降低了要求。相反，上乘的通俗文艺之作，却是我国文艺百花园中具有中国气派的佳品。《故事会》之所以值得赞扬，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促进通俗文艺的繁荣普及和健康发展方面，作出了自己可贵的努力，路子正、格调高、效果好。在某些不健康报刊泛滥的时候，他们能不为这股风所动，坚定地走正路，确实难能可贵。他们的经验，对推动通俗文艺的健康发展，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故事的一个特点，是趣味性、传奇性、知识性、娱乐性比较

强，因而能适应较大范围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的欣赏要求。这四性，是应当肯定并发扬的。然而，文艺作品的趣味性和娱乐性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要给人以健康的美感，它对人们的思想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人们常说的“寓教于乐”，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文艺作品，包括故事，要讲趣味性，娱乐性，也要讲思想性，要重视教育与认识作用，要注意艺术欣赏价值。总之，对于文艺作品来说，要提倡健康积极的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因此，对于那些只讲娱乐性、趣味性，不注意思想性与艺术性，甚至用胡编乱造、色情凶杀、兴妖弄鬼之类所谓“传奇”来招徕读者的所谓“故事”，应该批评。这不是通俗文艺创作的正道。《故事会》既注意作品的娱乐性、趣味性，又注意思想性、艺术性，发扬传统民间文学的刚健、清新风格，又注入新的时代特点。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也使刊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受到读者的信任与欢迎。这一点，值得搞通俗文艺刊物的同志们学习。

我们希望，《故事会》的编辑同志们在已有的成绩面前不要止步，要继续开拓、进取，把刊物办得更好。也希望其他文艺报纸、刊物，特别是通俗文艺报刊的编辑同志们，能够从《故事会》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坚定地在“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办好自己的报刊，使之真正成为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

（总第58期 1985年5月14日）

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办刊方针

《故事会》编辑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故事会》，是一本面向群众，具有民族民间文学特色的通俗性的文学刊物，它以发表反映我国现实生活的故事为主，同时刊登各类传统的中外故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办刊方针，发行量逐年上升。从一九七九年的二十五万册，到一九八五年一月份已上升到七百三十多万册。订户、零售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受到了广大城乡读者的欢迎。尤其在农村，它是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据了解，湖南省浏阳县就订了三千多册，广西有一个县竟订了一万册左右。这个刊物在海外也逐渐有一定影响，除香港地区外，日本、美国、苏联等国也有少量的订户。日本、苏联的民间文学研究专家都曾指定访问过刊物编辑部。

《故事会》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引起了各地出版单位的注意。今年以来，各地新办了不少故事刊物，《故事精选》、《故事大观》、《故事选刊》也大量地涌现，许许多多的小报也打着故事的牌子刊出了不少所谓的故事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故事会》如何坚持自己的办刊方针，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是摆在编辑部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 加强编辑队伍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

经过几年的实践，编辑部的同志深深感到：编辑人员是否具

有革命的事业心和一定的业务能力，直接影响到刊物的质量。

故事是一种群众性很强的口头文学。虽然它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但往往又被一些人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这种思想对编辑人员有一定影响，但通过社会调查和工作实践，编辑人员逐步地认识到，故事之所以能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与故事这种文学体裁在人民生活中的独特功能是分不开的。它不受文化水平高低的限制，能直接地面对面地交流感情，打动人心，能深入到其它文学样式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去。比较其它文学样式，它在人民群众中，欣赏、感受起来更简便、亲切，接受、掌握、运用它的人也就更多，尤其是对于农村八亿人民来说，这种形式更适合他们的口味。如能办好这个刊物，将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有了这样一种认识，编辑人员就比较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积极认真地编选稿件。不少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品，例如《彩蝶》(1984年第1期)，都是经过几个编辑之手加工出来的。吉林有位作者看了编辑帮助加工的稿件，说：“看了以后心情很激动，实在感到做编辑工作是很辛苦的，每一篇稿件，从选稿、改稿……到看校样，哪一件工作都要付出许多心血。我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向您表示衷心感谢！”

在加强办好刊物的事业心的同时，编辑人员还注意努力提高业务水平，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使通俗性的刊物避免庸俗化。编辑部的不少同志都注意社会主义时期故事作品的理论研究，积极撰写这方面的文章，探索如何把社会主义的内容，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加以反映，探索如何使这本刊物既具有传统的民间文学那种刚健、清新的风格，同时又有新的时代特点；并利用外出组稿的机会，进行讲课辅导。这样，不仅提高了编辑的理论水平，同时也增强了编辑在作者中的信任感。由于把编辑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结合了起来，编辑人员对刊物的性质、读者对象、社会功能等问题看得比较明确，使刊物开始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也使刊物工作的发展和推进有了比较稳定、扎实的思想基础。

(二)根据刊物的特点，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编辑人员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积极探索如何利用这本刊物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编辑人员认为，作为群众性的刊物一定不能脱离群众，要摸清群众的实际需要和他们的艺术口味；但也不能因此迎合群众中落后的思想和趣味，而是要在正确思想指导下挑选和组织稿件。通过寓教于乐的途径，潜移默化地来陶冶读者的心灵，使刊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一点作用。

今年以来，不少小报大量以刊登格调较低、迎合部分落后读者口味的作品，来扩大发行量。在这股势力的冲击下，编辑部没有改变自己原来的方针，坚信群众中大部分读者对这些作品是不满意的，他们希望的是健康有益的作品。编辑部每月收到群众中的来稿约有二万件左右，这些作品大多来自基层，散发着泥土气息，具有刚健、清新的特色，只要我们下功夫挖掘，一定能从中找到受群众欢迎的作品。我们在选稿时主要是注意了这三方面的问题：

(1) 通过故事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培养读者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几年来，在刊物上陆续刊登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说，爱国将领的传说，英雄模范的故事。对于这类传说和故事，有些人认为现在“不吃香了，没有人要看了”，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只要能够提高艺术质量，照样能够打动读者。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张功升在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宣讲时，讲了几则革命家的传说，把听故事的人感动得热泪滚滚，我们用录音机当场把它录下来，整理后加以发表，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2) 通过故事促进社会风貌的改变。编辑部根据党中央提出

的“使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指示，把反映改变社会风气和伦理道德观念的题材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宣传，以充分发挥故事在人民中“劝人方”的传统作用。近几年来，这类作品占全部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故事的百分之七十。由于这些内容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所以在社会上的反响较大，产生了编辑部所意料不到的效果。不少读者来信说：看了《故事会》登的有关故事，原来吵闹不和的夫妇，重归于好了；嫌弃老人的儿媳，孝敬婆婆了；要求大办婚礼的新娘，把彩礼退了等等。江苏徐州有个失足青年来信说：“我是个失足青年，整天处于苦闷之中，最近当我读了《失足恨》这则故事后，我又振作了精神，鼓起了重新生活的力量。”江西有位公安干部还来信介绍了他如何利用刊物上发表的一则名叫《第三个条件》的故事，使一个幸福的小家庭避免了破裂。

(3) 通过故事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胡耀邦同志在谈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曾指出：“健康、愉快、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使人民在紧张劳动的休息中，得到有高尚趣味的精神上享受。”编辑部在办刊时也尽量注意到这方面的内容。现在刊物总共有二、三十个栏目，笑话、寓言、谜语故事、名人传说样样有，每期内容都力求丰富多彩。甘肃有位读者来信说：“《故事会》一到，我们全家都聚集在一起叫我读，读到高兴时大家一齐哈哈大笑，读到坏人坏事时，大家一齐骂。”黑龙江有位读者来信说：“一本《故事会》，饭后茶余、工休地头，拿来可看，看了能讲，一讲就传，那些生动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大家。”

(三) 建立和发展作者队伍，坚持依靠广大作者一起办刊。

由于故事被不少人认为是“下里巴人的艺术”，长期来，写作队伍很难形成，但要办好一个刊物，必须有一支基本的作者队伍。这些年来，编辑部主要采取了这样几条措施来团结和依靠作者：

(1) 从大量的来稿中发现作者，自1984年的《故事会》改为月

刊后，每月来稿近二万多件。编辑同志处理来稿时以沙里淘金的精神，在挖掘、选择优秀作品的同时(每期刊物的稿件70%选自来稿)，努力发现优秀作者。编辑部对新发现的作者，不断加强联系和培养。目前基本作者队伍中有20%的同志来源于这方面。

(2)对优秀故事作品实行奖励。一九八五年编辑部将举行全国优秀故事大奖赛，通过对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的故事作者实行奖励，来推动故事创作，提倡多写一些有益、健康、艺术感染力强的作品，并进一步加强故事队伍的建设。

(3)加强故事活动基地的建设。现在刊物编辑部不仅团结了二百多人的基本作者，而且还建立了二十多个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故事活动基地。他们一有活动，编辑部就派人去参加，借此机会倾听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熟悉群众的艺术口味，进一步改进编辑工作。这些基地的主要作者同时是我们的业余编辑。他们为我们刊物组织了不少稿件，对办好刊物起了一定的作用。

《故事会》月刊这几年来虽然发展很快，但有待改进的地方仍然很多。群众性的刊物发行数百万册，对于十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并不算多，尤其是如何通过改革，进一步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把刊物办得更好，是当前摆在编辑部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总第58期 1985年5月14日)

夺得电视剧“三连冠”的回顾

山东电视台

我们山东电视台八二年拍摄的《武松》、八三年拍摄的《高山下的花环》和八四年拍摄的《今夜有暴风雪》，连续三年同时获得“飞天奖”与“金鹰奖”的优秀电视连续剧一等奖，夺得“三连冠”。这在全国广大观众中，在全国广播电视战线上引起较大反响。回顾几年所走过的道路，我们有成功的欣慰，也有跋涉的艰辛，更有坎坷中的深思。“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适时地总结经验，对我们今后生产更多更好的电视剧，为繁荣我国的电视剧艺术事业做出新贡献，是十分必要的。

加强领导 把握电视剧创作的正确方向

电视剧这种新型的艺术形式一出世，就以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低估的社会功能，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电视台拍摄电视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用什么思想指导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这是决定方向的原则问题。在省委的领导下，省广播电视厅党组明确指出：“不能仅仅把电视剧看成是取悦于观众的娱乐形式。它首先要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服务，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武器。电视剧的主要功能是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通过塑造光彩照人的现实和历史的典型形象，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斗志和建设四化的热情，并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与追求。”由于领导指导思想明确，在抓

剧本的选材上，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突出强调强烈的时代感、浓郁的地方性、淳厚的民族性。从我们连续三年的获奖剧目，到几年来拍摄的较有影响的剧目，如：《家乡红叶》、《闪光的青春》、《凤愿》、《山胖子》、《母爱》、《老兵》等，都体现了严格选材的精神。在艺术表现上我们始终保持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摒弃那种置思想内容于不顾，片面追求表面形式的倾向。因而逐渐形成了我们山东电视台自己的纯朴、真实的艺术风格。

尊重艺术规律 实行切实有力的指导

厅党组对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有原则领导，又有具体指导，既大胆放手，又严格要求。尊重艺术规律，抓好电视剧的工作，这是我们台电视剧事业不断兴旺的又一重要因素。厅长金钊同志懂艺术规律，直接抓电视剧创作。《西游记》是我国古典名著，在世界文坛上有深远影响。我们没拍，而日本人根据他们的需要却拿去拍了，而且拍得不伦不类，不象样子。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把我们的古典名著拍成电视剧呢？在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决定搞《水浒》，尽管“文革”中“四人帮”曾把《水浒》作为反党工具进行批判，直至八〇年全国还没有一篇文章为其正名；而且我们台设备差，全国也还没有一个台拍过带武打的历史题材，无经验可循。但我们没有动摇，在领导的支持下，选择了《武松》为突破口。这是因为：一、武松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容易被群众接受；二、武松是山东的英雄好汉，主要活动场所也在山东，易于发挥我们台的地方优势；三、本着古为今用的精神，“武松”身上体现的匡扶正义、惩治邪恶、嫉恶如仇的火热性格，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就这样，我们揭开了拍摄古典名著《水浒》电视连续剧的第一幕。

作为领导，要熟悉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规律，又要懂得如何不失时机解决工作中的关键问题。一九八三年初，当《高山下的

《花环》准备开拍时，领导上考虑到题材重大，小说声誉很高，能否拍好，影响非同一般，便果断地改变了原来的拍摄计划，将两个最强的摄制组合二为一，集中优势兵力，并指定电视台台长滕敬德同志为主要导演，带队开赴云南边陲，取得了好的效果。

我们每拍一部重大题材的电视剧，都要顶着社会上各种思潮带来的压力。例如，我们改编《今夜有暴风雪》时，社会上对原著的毁誉参半，看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时搞《暴风雪》时机不成熟，消极的东西太多，知青大返城对不对？怎样理解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受干扰，经过领导上慎重考虑，鼎力拍板，不误时机地抢拍了这个难度很大的戏。事实证明，我们台的电视剧之所以能在全中国连续三年夺冠，与领导有胆有识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发扬艺术创作上的开拓进取精神

艺术贵在创新。

三个获奖剧目，各有不同特色，但又共同贯穿着一个精神，就是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开拓、追求的精神。我们孜孜以求的也就是一个“新”字。拿《武松》而言，有人说我们“开了改编古典名著之先河”。但这“先河”如何开？是颇费心血的。武松是扬善抑恶、专打不平的梁山好汉，他的主要行为离不开打。怎样理解武打？象海外某些功夫片那样，为了取悦、刺激观众而玩弄镜头技巧，一味地打？显然不行。首先从思想上明确，我们拍的不是“功夫片”，而是描写古代英雄的人物片，着眼点要求符合历史环境的真实，强调刻划人物的深度。因此在武打设计上，我们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努力做到武戏文唱，坚持把武打作为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决不能脱离故事情节、脱离人物性格发展而乱打。打就打出戏，打出人物性格，打出戏剧的发展。至今人们之所以对“醉打蒋门神”的精采武打津津乐道，道理就在于此。白《武松》

问世后，描写历史人物的电视剧，在全国不断涌现，各具特色，然而《武松》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不仅它的出现完全符合观众的心理，唤起民族的自尊心，激发了广大观众的爱国热情，而且是我国第一个走上屏幕的历史英雄人物。

《高山下的花环》是战争题材。用电视剧来表现这类题材，往往是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的。作为一种题材上的开拓，我们摆脱以往手法，以战争为背景，将镜头牢牢对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人们在战争这块试金石前，灵魂的美与丑，真实地再现了人民子弟兵及其家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精神风貌。我们的设想达到了预期效果。艺术上的探索，得到了观众的赞许。

《今夜有暴风雪》是以大返城为背景，再现知识青年文革中十年的生活、命运、遭遇以及建设边陲的不朽业绩。但原小说大返城的时间是一天一夜，活动的范围也只有团部、哨位、医院等几个空间，这给改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结构上，我们把现有的几个空间做为现在时的支点，通过主要人物的眼睛，多层次、多视角的深沉回忆，打破以往的时空观念，利用大幅度的时空转换，以完成全剧的创作意图。我国的观众习惯于悲欢离合的故事，起承转合的结构方法，这种跳跃式、时空转换幅度大的结构，观众是否能接受？我们捏着一把汗。然而播出后，观众不但对这种结构方法能接受，而且反响强烈。观众鉴赏力的提高，为电视剧在表现方法上的不断开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群众基础。创作者与观众在认识与感情上的沟通，将对电视剧质量的提高，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武松》、《花环》、《暴风雪》的成功，也是我们在艺术表现形式和方法上勇于探索、开拓、追求的结果。

建立专业队伍 大胆启用人才

发展电视剧，要有可靠的组织保证。零打碎敲不行，必须当

作一项事业来办，必须有一支事业心强、能吃苦的专业队伍，基于这种认识，早在八〇年，我们就在省委、厅党组的支持下，组建了专门生产电视剧的山东广播电视艺术团。经过不断充实与加强，编、导、摄、录、灯、服、道、效、化各门已基本健全。在办公地方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厅党组毅然将仓库改建为摄影棚，虽然简陋，但颇为宽敞实用，这在全国各电视台也是绝无仅有的。现在艺术团已发展为拥有两个摄影棚，一个录音间，能同时承担四至五个电视剧录制任务的专业队伍。

人才的开发，是电视剧事业不断兴旺发达的主要标志。几年来，我们在组织一定社会力量参加电视剧创作的同时，把主要着眼点放在培养自己的人才上。

选用人才，领导要有魄力，敢于打破学历、资历的限制，不拘一格，从实践中选拔。《暴风雪》的导演孙周，过去一直担任摄象工作，他年青、肯钻研，有强烈的上进心。他不单单追求画面的构图美，而是注重让镜头为塑造人物、深化主题服务。在长期的摄象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表现了导演的才干。厅领导便毫不犹豫地启用他独立执导《暴风雪》，并放手让他大胆工作，带队远离山东，到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去实地拍摄。象孙周一样，《顾大嫂》的导演王汉平，《晁盖》的导演张新建，还有几位年轻导演和摄象都是这样脱颖而出的。

重视思想建设 培养好的作风

一个摄制集体的思想作风是否过硬，也是一部电视剧能否高质量完成的保证。我们在几年的实践中，狠抓了摄制组的思想建设，培养在艰苦环境中吃大苦、耐大劳的工作作风。

艺术贵在真实。搞《花环》时，曾有人提出在山东境内拍摄。领导指出，故事发生在云南边境，在山东拍摄必然失去环境的真实，一定要到现场去拍。领导的决定得到摄制组全体同志的拥护。

他们在云南边陲，冒着敌人炮轰的危险，在摄氏40°的高温下，顶烈日、抗酷暑，终于完成了《花环》的拍摄。《暴风雪》却又是在零下40°C的茫茫北大荒拍摄的。在拍摄中扮演刘迈克的吕毅冻休克了，扮演裴晓芸的任梦冻僵了，带到现场临时充饥的熟鸡蛋冻成了冰疙瘩，摔也摔不开。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当地老百姓都说：“山东电视台这帮人是在玩命啊！”难怪有人讲：“山东电视台敢于在零下40°C拍片，是电视界的一大创举！”我们这支队伍经受了两个40°C的考验，不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改行，反而增强了献身于电视剧事业的信心。

电视剧是综合艺术，也是社会事业。离开社会力量的支持是寸步难行的。拍摄《花环》，云南部队首长不但亲自接见摄制组全体同志，而且派出一个加强连一面保护，一面配合拍摄，枪支弹药一切军事装备无偿支援，做到缺什么给什么。如果没有云南部队的无私帮助，《花环》能达到现在的艺术高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广大观众的鼓励、鞭策，也是我们三次夺冠的主要动力。

今天，当我们回顾夺取三连冠这段历史的时候，强烈地感到不安，大有坐不住之感。因为，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今后如何继续取得新成绩，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我们决心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下，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努力工作，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电视剧，来回答时代与人民对我们的要求。

（总第63期 1985年8月2日）

《四世同堂》为电视剧创作的 发展提供了经验

北京电视制片厂根据老舍先生的原著《四世同堂》改编录制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播映后，受到广大观众交口赞誉，引起文艺界的关注。中宣部文艺局八月十六日在该厂召开《四世同堂》座谈会，应邀参加的有首都文艺、新闻、宣传等部门的同志和观众代表。

座谈会由梁光弟同志主持。会上发言的有：唐达成、刘厚生、阮若琳、陈志昂、李筠、赵正晶、张永经、程路、钟艺兵、丁浪、张淑华、赵树国、王永信、傅中樞、刘臣中、李文玲等。

他们热情赞扬《四世同堂》的成功，充分肯定北京电视制片厂和《四世同堂》剧组为观众创作了这么一部富有教育意义和艺术特色的电视连续剧，给大家带来了思想上的启发和艺术上的享受，并为我国电视剧今后的提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富有爱国热情的抗战时期人民生活画卷

到会的同志一致认为，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成功，首先一点就是它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北平人民的生活，表达了北平沦陷区人民的爱国精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同志说，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救亡的战争，老舍先生的原著《四世同堂》没有从正面去写这场战争，而是通过北平市小羊圈胡同里普通的小市民的生活，表现了社会风云的变幻。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尊重老舍先生的原著，并有所创造，不仅表现了普通人民的爱国之

心，而且还让我们感到了老舍先生热烈的崇高的爱国精神。中央电视台台长助理陈志昂同志说：电视剧要得到人民的认可，必须紧跟时代，而表现时代，又不能简单地做传声筒，应该从各个角度去反映时代精神，《四世同堂》就是这样的。我们处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面对世界，如何确立自己的立足点，如何树立自尊自信心，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人家的先进，也激发了我们振兴中华的热情，这个时候，祖国的尊严，民族的自信，就成为最敏感的琴弦。《四世同堂》恰好触动了这根弦，所以它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它是通过生动的情节、场景、人物性格的对比、纠葛等等来表现时代精神的。别林斯基说过，文章中最不能忍受的是缺乏时代精神。《四世同堂》是历史题材，但它同样能反映时代精神，这是作品成功之处。反之，有些剧写的是八十年代的人和事，但不一定有时代精神，这就值得思考了。

生动地刻划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座谈中，同志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四世同堂》剧组的编、导、演在塑造角色性格，挖掘角色内心世界的工作上，下了很大功夫。剧中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唐达成同志说，抗日战争犹如一束强光照进小羊圈胡同，所有的人物在这束强光下暴露和展现自己的灵魂，有的卑下，认贼作父；有的狐假虎威，喝同胞的血；有的寡廉鲜耻，出卖同胞。老舍先生没有掩饰我们民族中的败类的灵魂，而是狠狠地鞭挞了他们。同时，尽管有这些败类存在，我们并不感到悲哀，因为我们从剧中更多地感到一股浩然正气，淫威不可屈的正气，在祁老太爷、祁瑞全、钱先生、祁瑞宣等人身上，闪现着正义的光辉。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这正是我们民族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灭的素质。剧中的日本老太太这个形象很有意义，这说明，一个侵略别民族的民族，一个企图剥夺别民族的民族，也不是自由和幸福的，因为对这个民族来说，军

国主义、侵略战争同样是一场灾难。剧中还写了小人、奴才，这些人靠出卖灵魂做奴才苟延残喘，最后的下场都如一条癞皮狗，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在当前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我们要吸收外来的好东西，但不应是崇洋媚外，那是一种奴性，我们应该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

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

同志们在谈到《四世同堂》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时，一致称赞它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认为它具有极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是我们自己的电视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厚生同志说，《四世同堂》从小说到电视，都深刻地体现了现实主义，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人物，写的是普通老百姓，又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这是文学艺术民族化的成功作品。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阮若琳同志说，《四世同堂》以情动人，很感人。它写了人，写人物的高风亮节，人物的语言，生活细节，民俗民情，都很真实。真实就是艺术的魅力。翠微路理发馆特级理发师张淑华同志和中国舞蹈家协会编导傅中枢同志都是北京人，他们都住过小羊圈那样的地方，有过《四世同堂》中各种人物那样的邻居。他们说，看《四世同堂》就感到非常熟悉和亲切，尤其是那一股子“京味儿”，真让我们犹如置身于小羊圈胡同的左邻右舍之中，剧中人物的一举一动、一哭一笑，都紧紧牵着我们的心。《四世同堂》是北京的“特产”，这样的“特产”应该多多益善。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刘臣中同志说，我很喜欢《四世同堂》的艺术性，朴实无华，用北京话说，“土得掉渣了”，但正因为这个“土”，才显出它的艺术魅力来。大家认为，正由于该剧具有这些特色，播映后受到各方面、各个层次观众的普遍欢迎，确实做到了为人民喜闻乐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为我国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到会的同志在讨论《四世同堂》成功之处的同时，还谈到了《四世同堂》对今后电视剧制作的经验。认为它的成功，是我国电视事业的一件大事，对今后电视剧质量的提高，具有普遍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文艺报》副主编钟艺兵同志谈了几方面意见，一是电视剧的文学性。要搞好一部电视剧，忽略它的文学性，是很难以想象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所以成功，首先应归功于老舍先生的原著为它打下了一个很好的文学基础。二是写人。如果只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离奇的情节，不行。关键是要回到扎扎实实的现实主义上来，写真实的生活中的入，写入的性格、心理，性格的发展等等。三是不脱离作品的内容去搞形式上的创新。四是改编文学原著时，有严肃性，也有创造性。有些人看不起改编，认为那是吃现成饭，通过《四世同堂》，应该纠正这种看法。五是制作精心，《四世同堂》用了两年时间，演员从各方面挑选来，他们的创作态度是很认真的。刘厚生同志说，电视剧也要重视演员的表演艺术。这部剧里很多演员是舞台演员，包括京剧话剧的演员，这些演员在舞台上锻炼的机会多，功底厚，发挥了他们的表演上的长处。

也还存在不足之处

对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不足之处，一些同志也提了些意见，例如，节奏较拖缓；舞台味还较浓；有些地方没有充分利用电视的镜头语言，致使效果不够强烈；剧的结尾不够理想等等。有的还提到不要人为地拔高人物。

最后，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筠、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赵

正晶、副局长张永经、北京电视制片厂厂长李牧等同志也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们说，这个剧组的成员来自五十多个单位，应该说，这部电视剧的成功是五十多个单位合作的成果。如果说这部电视剧有成就，也要首先归功于老舍先生的小说。《四世同堂》的成功，只是一个起点，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他们感谢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带来了热情的鼓励和意见，并表示目标应该是“下一个”，今后要继续努力，制作出更多更好的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电视剧来。

（总第64期 1985年8月23日）

鄂川黔三省群众文化见闻

去年底和今年初，我们在贵州、四川、湖北三省，走访了十几个城镇、街道、公社文化馆(站)，每到一处，边听、边看、边座谈，即听取地方基层党委领导和文化站长的情况汇报，开了一些小型座谈会，参观一些文化站的设施和活动内容。所见所闻，很受教育和启发。

温饱思娱乐，送来“快乐神”

四川温江地区文化局同志说，近几年来，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广大农村“温饱思娱乐”，农民要求看戏、看电影、听说书、开放茶馆的呼声很强烈。党中央31号文件《关于关心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合民心，顺民意，为农民又办了件大好事，受到农村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拥护和支持。

四川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同志反映，中央〔1981〕31号文件，和同时转发的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的《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文件，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了农村群众文化工作方向，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文化站的建设。1980年底，四川农村文化站有778个，到1981年底已发展和建成近2,000个，增加一倍多。

湖北荆州地区文化局同志说，过去多年来，地方工作往往是注意抓物质文明，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群众文化经费缺，人员少，农村文化生活贫乏、落后，农民一年忙到头，三百六十天，没有休息和玩的时间。正月开门红，二月忙备耕、三月闹春耕，

四月插早稻，五月插中稻，六月忙田间管理，七月忙双抢，八月“立了秋，不罢休”，九月忙秋收，十月上水利，十一月把冬闲变冬忙，十二月为明年夺丰收作准备打基础。一年十二月，月月是关键，天天要大干。学大寨，背大债，一天三餐不得饱，夜晚没有被子盖。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政策暖人心，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农村干部和群众听了党中央〔1981〕31号文件传达，拍手称好，高兴地说：“79年党中央75号文件（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给我们送来了‘财神’；80年党中央21号文件（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给我们送来了‘门神’；81年党中央31号文件（关于关心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又给我们送来了‘快乐神’。”洪湖县委对31号文件学习讨论了三天，县委书记说，我们不仅要领着群众一起干，还要学会领着群众一块儿玩，两个文明要一起抓，互相促进。

文化娱乐场所，思想教育阵地

我们在三省的一些城乡文化站亲眼看到，目前许多地方以兴办农村集镇（或城市街道）文化中心站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文化工作，不仅丰富了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他们文化科学知识水平，而且加强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促进了五讲四美和精神文明建设。

据四川省文化局在简阳县农村典型材料调查，过去全县的农民平均每人每年看戏看电影10次左右。兴办文化站后，近两年来农村业余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发展。简阳县30%的农村，现在平均每月可演五场电影和戏，平均每周一次多。

四川崇庆县崇德公社文化中心站，经过几年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兴建起一批群众文化设施，如图书馆、报刊阅览室、青少年之家、文化书场、茶园、照相部、电视室、体育场等，可以常年组织戏剧、电影演出，开展图书借阅、墙报、科普画廊、卫生知识、体育比赛等活动。文

化站还带动了公社、集镇市场繁荣。农民看戏、看电影和赶集的人多了，集镇上茶园由一个增到三个，商业、手工业、服务业日益兴旺，农村充满生机。崇德公社文化站所在地市场商业营业额，前年5万元，去年猛增到17万余元，公社真正成了附近农村的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

三个省有不少生动事例说明，哪里的群众文化开展得较好，哪里的生产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就气象一新，赌博、迷信、偷盗、打架、斗殴、不孝敬老人、犯罪行为等歪风恶习大大减少。

武汉市民族街中心文化站活动场所只有百余平方米，一年接待读者、观众和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的有100万人次，受到湖北省、武汉市党政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多次表扬。

依靠集体经济，坚持群众路线

群众文化事业面很广，国家财力、人力有限，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坚持群众路线，群众文化群众办，才能办好。

多年来，地方文化经费偏低。如去年每人平均文化经费四川省只有0.28元，湖北和贵州只有0.40元。国家拨给地方上的文化经费，主要用在发给剧团和表演团体工资了，四川省的文化经费70%发了剧团的工资，创办一个文化站，只能投资160——200元。文化站创办以后“以文养文”，经费自给，艰苦奋斗，甚为感人。文化站设备简陋，一般有两个退休工人或待业青年负责，每天有一、二百人来活动，群众反映：“这样的文化站是有生命力的！”

近几年来，城乡群众文化事业发展很快，其经费来源绝大部分是从社、队、街道企业利润中拿出一些钱投资兴办的。1980年以来，湖北省按公社下拨文化经费，每个公社五百元，对文化站的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仅够一个文化干部工资支出，这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了，谈不上用于其他业务开支。有的文化站把社、队、街道的破旧礼堂、仓库、牛马棚改建成影剧院，把演出卖票和茶

园、照相等收入作为“以文补文”使用。沔阳县三伏潭公社文化中心站办了工艺美术服务部、裱糊加工厂，文化站业余剧团和皮影队成员，都被安排在这些社办企业做工，有的半工半艺，有的半农半艺，忙时从工从农，闲时从艺。这个文化站去年全部收入达十七万三千元，除去各种开支后，尚结余二万一千元。这种“以企养文”的做法，促进了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

群众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不但要让群众享受文化生活，而且要善于团结和依靠他们参加群众文化活动。城乡有不少熟悉和擅长群众文化的“能人”和民间艺人，要善于组织和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湖北省进行了民间艺人的调查、登记、考核、发证工作。全省共有民间艺人4,100多人，七十三个县有五十个县成立了“民间艺人协会”，拟定了“民间艺人暂行管理规定”，加强了对他们的思想领导，帮助他们端正服务方向，提高演出质量。新州县有民间艺人210多人，有的组成演出小组，自负盈亏，走村串队。两年多来在全县农村演出过六万多场次，听众观众近百万人，既活跃和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又解决了这些人的生活出路问题，不占编制，不用国家花钱。

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四川同志反映：凉山、阿坝、甘孜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有几个公社，解放后还没看过电影。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干部说“背靠一个大省，吃了一个大亏”。

二、贵州雷山县是苗族聚居地区，全县11万人，没有一个专业剧团，仅有一个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用苗语说唱，跳苗族舞蹈，很受欢迎，外地一般文艺表演团体来到这里不受欢迎。县委多次写报告，要求批给县文艺宣传队15个人员编制，至今未获批准。县委副书记余国茂(苗族)说：“上级党委、政府对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关心和扶助太不够了。”

三、三省普遍反映，文化馆、站的干部工资待遇只规定和民办教师同等待遇，但不落实。要求中央文化主管部门发个补充通知，作个明确规定，以利于下面办事和文化干部队伍的巩固。

四、要重视和加强群众艺术的创作和评论工作。各地群众文艺演出的节目，传统剧目多，反映社会主义新人的新作少。

中宣部文艺局赴贵州等地调查组

一九八二年二月

（总第13期 1982年6月1日）

剧团体制改革的新尝试

本刊编者按：重庆市建立厂团联合体进行剧团体制改革做法，只是一种尝试。各地剧团进行体制改革时，一定要从本地、本团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适合本团的具体方式来进行改革，不宜都按照一种模式去搞。我们希望各地剧团在改革实践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新经验。

重庆是我国城市综合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带动和促进了重庆市一些专业剧团体制改革，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被动状况。

在重庆市委领导关怀下，今年初，重庆市属八个专业剧团与九个大企业，经过充分协商，组成了八个经济文化联合体。它的组织形式是在双方隶属关系和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采取工厂与剧团挂钩的办法结成对子，共建“经济文化联合体”。他们分别是：

重庆钢铁公司——市话剧团

重庆特殊钢厂——市京剧团

长安机器厂——市杂技团

四川仪表总厂——市越剧团

中南橡胶厂——市歌剧团

重庆家俱公司——市曲艺团

市公用局所属企业——市川剧院

西南铝加工厂、建设机床厂——市歌舞团

长期来，由于十年内乱和一律由国家统包统管等原因，剧团普遍存在布局不合理、人员臃肿、吃大锅饭、经费短缺、设备陈

旧、艺术质量不高、上座率不景气等问题，严重束缚了艺术团体的活力，影响了出人出戏；另一方面，工厂农村的文化生活又较贫乏，广大群众迫切要求送戏下厂下乡，希望文艺界深入基层创作出更多更好反映“四化”的作品。实行厂团挂钩，共建经济文化联合体，则是促进文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具体做法是：剧团定期定量为企业职工演出（剧团每年为厂提供五十至一百场演出），为厂辅导业余文化活动，为厂宣传产品，有条件的还为厂提供一定场地作团厂联合体经营的产品销售场所；工厂提供剧团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辅导、演出的方便条件，通过联合经营和其他方式每年为剧团提供一定数额资金，帮助和辅导剧团开辟第三产业，剧团有了演出、生活创作基地和比过去较多的经费，并消化了富余人员，使剧团更有活力，有利于出人出戏出成果。

重庆市经济文化联合体成立十个月来的实践证明：厂团挂钩，本着互惠互利、以精神产品同物质产品的交换这种方式，填补了剧团多年来艺术建设经费不足的困难，稳定了人心。由于剧团同工厂建立了“演出、辅导、创作”三个基地，在当前文艺演出不景气的情况下，使广大文艺工作者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希望。九个月来，经济文化联合体初步显示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主要表现为：

1. 打破了体制的界线，促进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执行。厂团挂钩是在经济和文化两个不同领域的横向联系，它突破了闭关的界线。在广阔的社会领域里，发挥了文艺的功能作用。厂方为剧团提供的演出、辅导、创作基地，使剧团人员演出有了观众，辅导有了对象，体验生活有了条件，为剧团的演出和创作带来了活力。据初步统计，一至九月市属八个院团共演出了七百四十一场（其中为联合体厂方演出一百七十六场），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点一六。例如，往年春节期间，受电视、电影冲击，不少团被迫停演，今年他们把演出重心转向联

合体厂矿，在节日一周时间，市属八个院团共演了四十七场，既丰富了厂矿职工文娱生活，剧团演员也有事干，心情格外舒畅。九个月来，各剧团还通过办训练班、排练、个别辅导，为厂矿培训了友谊舞、器乐、声乐、舞蹈、化妆等大量业余文艺骨干。市越剧团与歌舞、歌剧、话剧等团合作，为四川仪表总厂厂庆二十周年辅导了一台大型歌舞《开拓者之歌》，受到广大职工的好评。

厂方在支持文艺改革上，“重钢”为市话剧团出省巡回演出无偿提供运输工具，市歌剧院为中南橡胶厂慰问用户演出，厂方从人、财、物上无私援助。“特殊钢厂”、“家俱公司”均为剧团业务建设，按协议提供购置乐器、服装、道具的经费，厂团双方关系融洽、文艺工作者与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友谊。

2. 解决了剧团搞艺术建设经费困难的窘境。厂团挂钩后通过联合体共同经销产品的赢利所得，为群众开辟了一条可靠的资金来源。一至九月八个院团从联合体厂方共收入三十七万零五百元，使剧团发展艺术生产、改善职工生活有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3. 丰富了职工文化生活，提高了工矿企业的声誉。联合体建立，基本上满足了企业职工文化生活的需要，剧团利用为厂方用户的慰问演出，为厂方作宣传和为订货会服务，扩大了企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增加了厂方的产品销售，提高了经济效益。

4. 为剧团内部体制改革提供了条件。联合体共同建立的产品经销门市部，为自己安排剧团富余人员，减轻国家的负担，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九个月来的实践证明，建立经济文化联合体，是当前城市体制改革综合改革横向发展的一个新成果，这种作法对剧团改革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可它仅仅是为剧团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这种联合体能否巩固发展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剧团自身的改革和艺术上的创新，以及演出质量上的提高。这方面的工作要比建立厂团联合体更为艰巨复杂。因此，把文艺工作者和直接进行四化建设的创业者和改革者紧密结合起来，为文艺工作者更好地感受时

代的脉搏和群众的审美要求，获得文艺创作的源泉，达到出戏出人出成果，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剧团找到了一个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辅导、演出实践的固定基地，同时在经济上为剧团开辟了一条可靠的资金来源，并为消化剧团大量富余人员准备了条件，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经济文化联合体的建立，虽然在打破旧的文艺体制和经费来源上取得了成效，但是，它毕竟还是一种外部的改革，要使剧团改革解决根本问题，必须下功夫着手剧团自身的体制改革。重庆市各剧团正总结经验，进一步巩固完善经济文化联合体，使剧团的改革从外部改革走向内部主体改革。目前一些剧团正逐步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各种经营管理承包责任制，既按艺术规律办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又注意一定的经济效益，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把剧团搞活，有利于发展艺术生产。

（总第65期 1985年10月26日）

在新形势下搞好工厂的 业余文化工作

安徽芜湖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五七二〇工厂

我厂是一座空军航空修理工厂，地处芜湖市郊区。全厂职工中，三十五岁以下青年职工和高中、中技、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各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为满足青年职工在工作和学习之余，求知、求乐、求美的需求，针对当代青年的特点，结合我厂地处郊区，青年人多，职工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实际情况，厂党委把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当作一件大事，重点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建设一套以厂“文化中心”为轴心的文化设施，为开展职工业余文化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建厂初期厂党委就把文化设施的建设列入了统盘规划，不断投资，在工厂生活区逐步建设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以厂“文化中心”楼为轴心的文化设施。主要有：

1. 读书园地。建有文艺、科技、职工教育、青少年教育及文史哲资料等五个图书馆，其中四个附有阅览室，总藏书量近三万册。这五个图书馆，分别由工会、技术科、教育科、子弟学校和宣传部管理。此外，部分车间、科室还在车间或单身宿舍开办了小型图书阅览室，可随时供青年职工借阅。

2. 文艺设施。建有一座拥有一千六百多个座位的俱乐部。配有一套完整的固定放映设备、舞台幕布及灯光设备。俱乐部购

置了一套管弦乐器和一些常用的民族乐器，还购置了一些常用演出服装和主要少数民族的舞蹈服装。还有一座占地4,900平方米的露天电影场，有一套活动式放映机，夏季可在室外放映。去年又兴建了一座275W×2的广播站和一座10W×2的电视差转台，可以同时转播安徽和江苏两套电视节目；购置了四十五台彩色和黑白电视机，分发给各车间、科室使用。

“文化中心”楼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辟有老干部活动室、退休职工活动室(兼职工游艺室)以及文艺、科技两个图书馆。

此外，厂里还建有两个占地5,000平方米和10,500平方米的田径运动场以及灯光球场、足球场和50×25米的游泳池，为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创造了条件。

二、开展多类型的文化活动，满足各种不同对象的不同要求。

我们充分利用一切文体设施，拿出主要精力，大力开展服务性、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变有限的文化投资为巨大的社会效益，为全厂广大职工填补业余文化生活的空白。主要有：

1. 办好广播、电视转播等事业。厂广播站除担任播放工厂统一作息号令，宣传中心工作等任务外，以很大一部分精力直接为文化工作服务，如播放工间操音乐，组织科技动态、卫生常识、周末文艺、为您服务、报刊文摘等专栏节目，每天要播音六次。同时还办了有十三种二十六份报纸的阅报专栏，每日更换。电视在我厂基本普及，绝大多数职工家庭都有电视机。厂电视差转台按时播放两套节目，用户可选择收看。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差转台工作时间有时延长到十八小时。与此同时，厂内数十个公用电视机的收看工作，有专人管理，每天开放。

2. 开展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厂里有业余文艺创作小组，包括歌词、歌曲、舞蹈、曲艺等创作人员近二十人。各车间、科室还有一批文艺创作骨干。遇有较大活动时，我们采取广泛征集，层层选拔的办法搜集作品。几年来，经排练演出的各类创作节目

共有一百多个。一些比较好的节目参加了省、市的文艺汇演，并到南京、当涂、芜湖等兄弟单位慰问演出。在这些工作中，除组织厂代表队活动外，我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文艺汇演或歌咏比赛，从厂领导到中青年职工，从子弟学校的学生到幼儿园的小朋友，凡愿意表演者均登台演出。

3. 搞好图书阅览工作。厂里各种类型的大小图书馆及阅览室，根据自己业务的特点，自行组织阅览。文艺图书馆每天晚上开放，另每周有三个下午对离退休职工开放。为帮助大家看好书，我们开展了书评活动，开办了《读书园地》。

4. 开展游艺活动。厂里辟出专门场地，布置了老干部活动室和退休职工活动室(兼全厂职工游艺室)，除陈列一些适合于离、退休老同志阅读的书报杂志外，还辟有扑克、象棋、军棋、康乐球、汽枪射击等项游艺活动。为满足一部分职工学习桥牌的要求，我们请了兄弟单位的桥牌队来厂表演，讲解桥牌基础知识。

5. 举办小型联欢会。近几年来，每年年底各车间、科室都要举办小型联欢会，联欢会内容比较丰富，形式比较活泼，小型文艺节目表演、游艺活动和交谊舞等，应有尽有，深受职工欢迎。

6. 举办美术、书法和摄影展览。厂里有业余美工和摄影小组，各车间科室也有一批美术、摄影爱好者。为了推动职工美术创作活动，让有专长的同志有发表自己作品的机会，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美术、书法展览，内容包括书法、绘画、金石、雕塑等，并从中挑选优秀作品，送到芜湖市和南京军区，空军航空工程部参加展出。仅青年工人陈定远同志一人就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漫画103幅。今年，我们和团委一起首次举办了摄影展览。最近，厂里还成立集邮协会，并在国庆节期间举办集邮展览。

7. 培训文化活动骨干。近年来我们一是请教员进厂(或本厂教员)讲课，办了小提琴、舞蹈、素描等集训班；二是派人出去学习国画、歌词创作、音乐创作、声乐、器乐等业务知识，大

大提高了骨干队伍的业务水平。

除上述服务性群众文化活动外，我们也尝试了一些有偿性的活动项目，略收一些费用，以减轻厂里对文化工作的投资。比如：

1. 影剧活动。我厂地处郊区，居民不多，但我们基本上保证了每周平均有三次电影。节日期间我们还邀请专业、业余艺术团体来厂演出。最近，厂里又为我们添置了录像机，准备开展内部录像放映活动，补充电影的不足。

为了帮助职工看好中外影片，我们成立了影评组，开展影评活动，在厂内宣传橱窗和广播站发表他们的评论文章。

2. 举办交谊舞会。为了适应广大职工特别是大龄未婚青年职工的社会交际，我们从去年九月份起，办起了交谊舞会。舞会开办以来，次数逐步增加，从重大节日办舞会过渡到每月一次舞会。

有偿文化活动的开展，不仅对保持较好的活动秩序有利，活动收入除支付业余服务人员的补助外，盈余部分还可用于工会建设的其他方面，可谓一举两得。

我们开展了以上这些活动，不但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对提高职工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技术素质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几年来，工厂连年全面超额完成任务，主要经济指标同步增长，企业整顿一次验收合格，被芜湖市授予“文明单位”称号。在参加上级举办的文体活动中，多次受到好评和奖励。俱乐部被安徽省评为俱乐部先进单位，被芜湖市评为业余文化工作先进单位。但是，我们也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跟形势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厂党委还准备继续为我们添置文化活动器材，进一步完善文化设施。今后，我们将广开思路，尽量丰富文体活动项目，今年内拟举办一次游艺、交谊舞、电视录像和电影的综合“娱乐晚会”。总之，我们的心愿是：要让我厂的业余文化工作为搞好工厂的改革，增强企业的活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第65期 1985年10月26日)

天津市文化局组织文艺演出队 赴引滦工地慰问

根据市政府的统一安排，我局组织的文艺演出队随市慰问团于七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分三路到引滦工地和为引滦工程做出贡献的有关专区、县所在地进行慰问演出。

文艺演出队由市歌舞剧院、曲艺团、京剧三团、河北梆子剧院、评剧院的二百三十名演职人员组成。在高温酷暑的条件下，十天累计行程四千余华里，演出二十五场，近四万名战斗在引滦工程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和干部观看了演出。此外，还由河北区、北郊区、南开区电影队组成四个放映小分队，携带《贺龙军长》、《剑归》、《军礼》等十几部新故事片，在引滦全线各工地放映电影二十三场，观众达四万六千余人。由于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慰问任务。

这次慰问演出，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目的明确，准备充分

“引滦入津”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一项国家大型综合性重点水利工程。引滦全线干部、群众，为解决天津用水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可贵的“引滦精神”，鼓舞着文艺工作者。当接到慰问演出任务后，局和有关院、团分别召开了动员会和座谈会，使大家对这次慰问演出的意义更加明确，纷纷报名参加，并表示要发扬“引滦精神”，克服困难，团结协作，以搞好慰问演出的实

际行动，为引滦工程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保证这次慰问演出，一些演出团、队，退掉了原订的在此期间的演出合同。青年独唱演员李青和指挥张建国与他们的承包小分队刚从外地回津，还没来得及休息，就积极参加了慰问演出。

在演出节目上，各院团做了较充分准备。歌舞剧院赶排了《慰问歌》、《登上燕山望滦河》、《风枪，我亲密的伙伴》、《滦河的浪花你去哪？》等独唱歌曲。曲艺团赶排了四人相声《报喜》和山东快书《献给长城一束花》等节目。

二、精神饱满，热情演出

慰问演出队分三路出发，十几天中，人不间断，车不停轮，无论在剧场、工地和营房，大家都是精神百倍，认真表演。特别是看到和听到战斗在第一线的英雄们顽强的战斗事迹，大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他们满怀深情地唱道：“我唱起赞美的歌情如波涛，叫一声亲人解放军，你们辛苦了！”台下的掌声响成一片。山东快书演员储从善演出时，联系现场情况即兴表演小段，当看到解放军指战员穿着军装，在烈日下坐在会场，秩序井然，他激动地唱到“我愿变成一柄大伞，给你们遮凉，我愿变成河水，给你们解渴，你们的精神鼓舞着我”，此时台上台下感情交流，气氛活跃，情景十分动人。著名河北梆子演员王玉馨同志，患了急性痢疾，领导要送他返津，她执意不肯，病情稍有好转，就上台演唱，受到人们的称赞。评剧院李秀云同志、高金元同志身体有病，正在服药治疗，歌舞剧院李青、李瑛、刘惠敏、吕宝荣、王志清等同志经常晕车，都积极带病坚持了演出。

演出中，同志们服从统一安排，表现出了良好的组织纪律性。京剧演员康万生、武广江，独唱演员刘惠敏、胥学亮、张桐龙，山东快书演员储从善等，有时一天演三场，总是愉快接受任务，

毫不讲条件。报幕员宋兰芝同志，烈日下一站就是二三小时，始终情绪饱满。评剧、河北梆子、歌舞三个分团的舞美工作人员更是辛苦，十天装台卸台二十多次，还要装车卸车，大家争分夺秒，保证了演出的正常进行。

三、团结友爱，互相协作

演出场地的频繁变换，给装台卸台增加了劳动量和各种困难，同志们不分演员、乐队、舞美队，一齐动手，听从舞美队负责同志的统一调动。以往几个小时的工作量，这次一、二个小时就完成了。

在生活上同志们互相关心。歌舞剧院的同志，主动把带有空调的汽车让给其他院团的同志坐，而他们始终坐没有空调的车。每到一个地方，在安排住房时，大家都能互相体谅，从不计较住好住坏。评剧院的同志每到一个地方都搞好室内卫生，主动帮助食堂收拾碗筷。歌舞剧院孙桂芳大夫、防治所迟文兴大夫，认真护理病人，受到好评。

四、深入工地，感受深刻

潘家口水库是引滦入津的源头。库区周围的农民，为了建成水库，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毅然告别了家乡和土地，向外地搬迁。仅迁西县就损失土地六万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迁移二万五千多人。另外，承德、唐山地区和蓟县、宝坻等县人民，以全局为重，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解放军指战员，在施工中以顽强的拼搏精神，硬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挖隧洞、筑大坝，提前完成了施工任务。所有这些，都使参加慰问演出的同志深受教育和鼓舞。每到一地，他们都满怀激情地放声歌唱：“滦河水呀清悠悠，清凉甜美又可口，海河人民需要它，

战士们叫它穿山流。”“我登上高高的山坡，望着蜿蜒流淌的滚滚滦河，闪亮的浪花激荡我心潮，汇成一曲深情的歌。你从引滦战士手中流过，他们把青春溶进河水，正为祖国增添春色。你从天津人民心中流过，我们把敬意溶进河水，赞美战士高尚品德。”

通过这次慰问演出，全体同志对如何搞好文艺创作、演出工作感受很深。歌舞剧院邢汝迎同志说：“搞文艺工作，只有走这样的路才能创作出感人的作品，才能真正做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王玉馨同志说：“文艺工作者不能只注意钱，要很好学习宣传引滦同志们的好思想、好品德。”参加慰问演出的各院、团负责同志和文艺工作者一致表示，要抓紧时间，组织创作，在九月份全线通水的庆功会上，拿出更多更好的反映“引滦精神”的新节目，热情地歌颂和衷心感谢引滦英雄们。

在这次慰问过程中，演出队每到一地，当地群众奔走相告，踊跃赶来观看，临行前再三挽留，恋恋不舍。大家深切感到，广大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十分迫切，作为专业艺术团体，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珍重群众的期望，在积极搞好创作排练，不断丰富上演剧(节)目的同时，要尽可能多地安排演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第39期 1983年10月7日)

文艺演出中值得注意的倾向

近来，有些文艺演出单位为了迎合某些观众低级庸俗的艺术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演出中存在某种商业化、庸俗化的倾向，因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这里有一封读者来信和一则广告，指出和反映了这种倾向，值得引起重视。

一封读者来信

《长江日报》1981年11月19日发表了题为《我们不要靡靡之音》的读者来信，信中说：

“最近，听了一场广州歌舞团来汉演出的轻音乐会”，“一位女歌唱演员把一首质朴开朗的苏北民歌《杨柳青》，唱得油滑轻佻。另一位女演员连续唱了几首海外某歌星的歌曲，甚至把旧社会流行的《花好月圆》也唱了出来。昏暗的灯光，萎靡的歌声，情调十分不健康。”这个音乐会的高潮“是‘介绍’世界各地几种流行舞曲，从爵士乐、爵士摇滚乐、直到‘迪斯柯’。他们把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中雄壮的《凯旋曲》改编为爵士乐”，“一边演奏，一边左右摇摆，前后扭动，跳起了摇摆舞”。来信感叹地说：“如果威尔第还在人世，一定会提出抗议的。”

来信呼吁：正在坚韧地为实现四化而奋发努力的广大群众，需要鼓舞斗志、积极向上、健康优美的音乐艺术，不需要靡靡之音。

一则戏剧广告

1981年11月28日的《羊城晚报》刊登了一则新戏预告：广东话剧团(广州话)创作演出九场话剧《网下情丝》，于12月5日起在南方剧场演出。广告上是这样宣传这个戏的：

兄弟残杀，姐妹成仇
夫妻离异，冤家聚头
冤魂不息，苦海沉浮
惹情惹恨，欲罢难休
善有善报，恶有恶收

看到这则广告的话剧工作者认为，从这出戏的剧名，到为招徕观众而做的广告，简直不能想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省级话剧团八十年代新创作的剧目。

(总第6期 1981年2月9日)

文艺作品描写“中央特科” 历史题材要慎重

“中央特科”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保卫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安全、开展对敌斗争、惩办叛徒、获取情报、发展通讯联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并在党史上作出准确的评价。鉴于“中央特科”工作的特殊性质，有关这一工作的具体情况不应公开宣传，以免授敌以柄，也不利于今后正常的情报、保卫工作的进行。

近几年来，有些小说、戏剧、电影、传记文学等文艺作品是描写这一历史题材的，如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陈赓同志在上海》（内部发行）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霞飞路侧的枪声》、《人民日报》连载的《伍豪之剑》，以及青岛话剧团曾来京演出的话剧《猎狼》，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姐妹俩》，长影正在拍摄的《穿心剑》，贵州省京剧团创作的京剧《峨嵋刺》等，内容不尽合适。有的应严格控制发行，不再翻印或在报刊上公开引用；有的戏剧已停演、影片未予通过或停拍。今后，文艺作品描写“中央特科”历史题材要慎重。各报刊、出版、宣传和文艺单位要严格审核把关，已写出的作品应报送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审定。

关于“中央特科”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由各级党史资料征集部门在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统一指导下，有组织地开展。其它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收集和发表这方面的资料。

（总第13期 1982年6月1日）

关于不宜与外国艺术团体 结成姊妹团体的通知

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开展，一些外国艺术团体提出要求同我艺术团体结成姊妹团体，如法国里昂交响乐团向我中央乐团、日本新制作座向我东方歌舞团、日本歌唱家协会和作曲家协会向我音协等都提出了这类要求。经慎重研究，我均未同意。但是，今年以来，个别单位事先未同对外文委商议，便宣布与外国艺术团体结成姊妹团体，同时宣布授予外国某某人为名誉会员的荣誉称号。甚至还准备派代表团出访，进一步落实建立姊妹团体及送荣誉证书。我们认为此做法不妥，应予制止。主要考虑是：

(一)国务院所发(81)50号文件 and 44号文件，都强调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统一领导，克服当前对外文化交流中存在的政出多门的混乱现象。如果我艺术团体与外国艺术团体纷纷结成姊妹团体，势必会出现多条渠道。这样就不利于我加强归口管理，而且也容易为某些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开方便之门。这对我国的“四化”建设以及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不利的。

(二)我中央和地方的艺术团体数量很多，外国对我友好的艺术团体也不少。如我某艺术团体与外国某艺术团体结成姊妹团体的先例一开，将会引起中、外艺术团体的连锁反应，接踵而来，难以掌握。同时，也不利于我广交朋友，扩大统一战线。

(三)外国艺术团体情况较复杂，政治倾向、意识形态变化较大，且演出节目的内容有很多是我不能接受的。如结成姊妹团体，对方提出各种要求，我不可能都满足，定会引起对方的不悦，也

容易给自己造成被动，反而对发展友好不利。

个别已宣布与外国艺术团体结成姊妹团体的单位，应根据上述精神，设法进行婉拒和妥善处理，绝不能以既成事实，将错就错。

此外，我授予或接受外国荣誉称号也是一项涉及外事政策的严肃的事情，不能随便处理，必须按国务院有关规定经上一级组织同意并报对外文委审批，获准后才能对外宣布。

以上已报经国务院批准，请各地和各有关部门遵照执行。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文件〔81〕委文字第60号)

(总第13期 1982年6月1日)

为什么要翻译和大量出版 《爱娃与希特勒》?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年底，出版了一部由美国格伦·贝·因菲尔德著的传记文学体裁的书，叫做《爱娃与希特勒》。

在该书封底的内容提要中说，“该书可为我国历史工作者提供研究资料，亦可作为历史知识读物供一般读者阅读”。该书中文版第一版就印了八万六千余册，并迅速一销而光。

事实上，正如作者序言中毫不隐讳地承认的，这是一部专门探究希特勒和他的情妇“看来颇为神秘、时而显得怪诞并且往往令人惊诧的风流韵事”的书。作者说，这本书所回答的问题是：“谁是爱娃，这个在性方面牢牢控制住希特勒的女人？”“当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怎样对待她的？”“希特勒是一个性的‘怪物’吗？”等等。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专门写希特勒的私生活，特别是他的性生活的书。

书中对希特勒的性生活的描述，是从他的性机能谈起的。首先考据了希特勒是不是一个花柳病的患者。医生检查的结果，“他阴毛生长完全正常”，“生殖器上没有发现梅毒的明显病状”。然后，又根据作者掌握的“希特勒性生活方面的许多详细情况”，津津有味地详细考据了希特勒在同爱娃恋爱之前，和自己的亲外甥女、那个“性欲很强的年轻姑娘”的一段风流韵事。书中还以很大篇幅描述了希特勒是一个“性施虐狂”和“性受虐狂”者，并有希特勒的变态性行为的不堪入目的详细描述。作者还用大量篇幅，考据和描述了爱娃在与希特勒的私生活中，争风吃醋，一个个排除

了她的情敌的详细过程。

我们认为，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知识读物”提供给一般读者阅读，是完全不适当的。这是出版工作从“向钱看”的经营观点出发，打着普及历史知识的幌子进行“文化走私”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应当予以批评和纠正的。

(总第15期 1982年6月15日)

云南人民出版社对翻译 出版《爱娃与希特勒》作出检查

六月十五日，中央宣传部《文艺通报》第十二期刊登《为什么要翻译和大量出版〈爱娃与希特勒〉？》一文，对云南人民出版社提出批评。七月十三日，云南人民出版社就翻译出版《爱娃与希特勒》的问题作出检查。

检查报告谈到，中央宣传部对我社翻译出版《爱娃与希特勒》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检查报告认为，从社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来检查，翻译出版《爱娃与希特勒》的主要错误和教训有三条：

第一，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出版工作方针不够自觉。一段时间内，在“向钱看”的经营观点影响下，总想出几本能盈利的“长版书”，“以丰补歉”；加上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没有严肃认真地考虑社会效果。对《爱娃与希特勒》一书，就是这样。

今后一定要从这一错误中吸取教训，从出版社的领导干部到所有的编辑人员，都要自觉地认识到出版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所担负的责任，无论出什么书，都要从多方面严肃、认真地考虑其社会效果。只要是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利于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的读物，即使赔钱，也要出版；相反，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利于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读物，再能赚钱，也坚决不出。

第二，《爱娃与希特勒》一书，是在学习贯彻中央去年三十号文件，检查和纠正思想工作中的涣散、软弱状况的过程中出版的，因此，错误的性质尤为严重。这反映出我们对学习、贯彻中央的指示不够严肃认真。

第三，对图书的宣传介绍，有时不够实事求是，并迎合某些读者的不健康的趣味。《爱娃与希特勒》一书的“内容提要”，就是一例。本来是写希特勒私生活的书，却说成是“历史知识读物”。这种言不符实的做法，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对读者的欺骗。

检查报告最后表示，社领导班子在最近深入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检查和总结贯彻党的出版工作方针的情况，对今年的选题计划进行必要的调整，并制定改进今后工作的措施；要组织全社职工进行学习和总结，自觉地贯彻党的出版工作的方针，遵守宣传工作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进一步讨论和健全各种有关制度，以便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

（原载文化部出版局《出版情况》，本刊有删节）

（总第20期 1982年9月5日）

浦安修同志给 杨尚昆、习仲勋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八三年七月九日)

最近一个时期，在电影、电视、话剧、戏曲等文艺形式中描写彭德怀同志的题材多了起来。但我们看到的出现于舞台、银幕、电视屏幕上的彭老总形象，除少数较好外，符合于历史真实的甚少。有些虚构过于离奇，甚至有歪曲彭总性格的描写，而致有损于他的形象，看到这些情况，我们心里很不安。

为此，建议您们考虑可否由总政、文化部、广播电视部等有关部门通知所属电影厂、剧团、电视台等单位，今后凡有关于彭德怀同志的影片、电视、戏剧等，除由各部门严格审查把关外，并宜征求军委彭德怀传记组的意见为妥。

(总第40期 1983年11月8日)

列宁关于文艺问题谈话 一段译文的重要更正

长期以来，列宁对蔡特金谈文学与艺术的一段话译得不准确。

一九六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据一九五七年的俄文版译）中，有这样一句话：“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想做艺术家的人，都有权按照他的理想独立自主地来自由创作”。三联书店版《列宁印象记》大体上也是这么译的。但是读一下列宁这句话的上下文可以感觉到，这句话前后不大衔接，因为列宁接着就说：“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能袖手旁观，听任混乱的局面随意发展下去。”既说有权自由创作，怎么又说不能袖手旁观呢？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书根据原文中这段文字，作了新的翻译：“每一个艺术家和每一个希望成为艺术家的人，都能够有权利按照他的理想来自由创作，不论那理想结果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样你就碰到激动、尝试和混乱了。

“但自然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

许多搞翻译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都认为，这一段话的重译是很重要的。因为列宁的这段话，曾是我们文艺理论文章经常引证的，而且常常被作为党不能干预文艺的话来使用的。而列宁的原意却是批评那种借口“创作自由”，不顾社会效果的现象，并且强调党对此不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的。这一重要重译值得引起注意和重视。

（总第48期 1984年4月28日）

